《追求卓越》作者汤姆·彼得斯倾力推荐

你属哪座城？

【美】理查德·弗罗里达 著

WHO'S YOUR CITY？

对不起，世界不是平的！

在哪里定居是你人生最重要的决定



你属哪座城？ WHO'S YOUR CITY ?

为什么某些人特别适合居住在某些城市？

■ 世界并不是平的，三维的“地点”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理查德·弗罗里达说得非常对。作为弗罗里达观点的长期拥趸，我要把这本书送给更多的同事！

汤姆·彼得斯 《追求卓越》(*In Search of Excellence*)作者

■ 理查德·弗罗里达告诉你为什么选择居住地比以往更为重要。这本书富于热情，思想深刻，是了解我们所在城市的必读书。

蒂姆·哈福德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生活的逻辑》(*The Logic of Life*)作者

■ 弗罗里达是美国最睿智的工作与生活的观察家。他带着那种知识分子独有的优雅，一次又一次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进行了明确的阐释。

米歇尔·科林 《商业周刊》网站

■ 这本书说出了我一直没能用言语来表述的想法：为什么某些人特别适合居住在某些城市。如果我能说出弗罗里达写的这些内容，我将不需要竞选助手。

约翰·希肯鲁普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市长



上架建议 经 济

ISBN 978-7-301-15414-4

9 787301 154144

定价：39.00元

你属哪座城？

【美】理查德·弗罗里达 著
侯 鲲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08－569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你属哪座城？/(美)弗罗里达著；侯鲲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8
ISBN 978-7-301-15414-4
Ⅰ．你…　Ⅱ．①弗…②侯…　Ⅲ．城市经济—通俗读物　Ⅳ．F290－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05183号

书　　　名：你属哪座城？

著作责任者：［美］理查德·弗罗里达 著　侯鲲 译
责 任 编 辑：张　可
标 准 书 号：ISBN 978-7-301-15414-4/F·2240
出 版 发 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　　　话：邮购部62752015　发行部62750672
编辑部82893506　出版部62754967
电 子 信 箱：tbcbooks@vip.163.com
印 刷 者：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本　16印张　212千字
2009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39.00元

目录

CONTENTS

目 录

CONTENTS



1　何处为家？

当有人问你你生命中最重要的决定是什么，你会怎么回答？或许和大多数人一样，你可能会提到两件事。

第一，我称之为“做什么”。许多人会说生活中最重要的决定之一就是找到你职业生涯中想做的事情。即使金钱不能带来幸福，许多人仍然相信做喜欢做的工作会让人充满活力并感到成功。我父亲将这一理念灌输给我。“理查德，”他会这么说，“你不应该像我一样，只是在工厂中辛苦劳作，靠在钟上打孔赚取微薄的收入。你应该成为律师或者医生，这样你就能做很重要的事情，赚大钱。”

许多人会说，要想在事业上成功，赚大钱，必不可少的前提是去顶级的大学接受良好的教育，比如去哈佛、麻省理工、斯坦福或者普林斯顿。据说，一旦获得了良好的教育，你以后的生活就会一帆风顺。良好的教育是获得好工作、赚大钱和幸福生活的敲门砖。我的父母和其他的父母一样，是教育狂热分子。尽管他们要努力避免入不敷出，他们还是把我和罗伯特兄弟俩送进了天主教学校——这不仅需要交学费，还要定期给当地教区捐款。他们不分日夜地向我们强调努力学习、取得好成绩和考上好大学的重要性。当我们取得了好成绩，他们就会给我们奖励。和其他许多勤劳、虔诚的父母一样，他们认为教育是开启通往更好生活的大门的钥匙。

还有人会说，虽然工作、金钱和教育很重要，但是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是选择适合的生活伴侣，一位总是支持你，毫无保留地爱你的伴侣。研究人类心理学的学者发现，爱情对于快乐的生活至关重要。我母亲天生就知道这一点，她拒绝了许多受过大学教育的追求者，和我父亲结了婚。我父亲是一名工人、二战老兵，只上过八年学。她经常对我说：“选择了理查德是我一生做的最正确的决定。当然，有些人更有钱，但是爱情才是最

重要的。我一生都一直疯狂地爱着你的父亲。”

毫无疑问，“做什么”与“和谁一起”这两个决定对我们的生活都很重要。但还有一个决定对于我们的经济收入、快乐和整个生活而言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那就是“在哪儿”的问题。

可能因为这个问题太显而易见了，所以很多人都会忽略它。找到合适的地方与找到合适的工作和生活伴侣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因为它不仅会影响其他选择，而且会决定在我们的一生中改正错误的难易程度。尽管如此，很少有人真的看重地点的重要性，这可能是因为很少有人对选择居住地有着足够的理解和认识。

人们并不是在所有的地方都同样快乐，选择居住地将影响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将决定我们的收入、人际网络、我们的伴侣以及子女和家庭能得到的机会。有些地方能够提供更高质量的生活，有些地方能提供更活跃的就业市场、更好的职业前景、幅度更大的房产升值空间和更好的投资赚钱机会。有些地方让人更容易找到好的伴侣，还有些地方能给养育下一代提供更好的环境。

居住地的选择也会在其他的方面悄悄地影响我们。它可能是在充满风险的汪洋大海中的一个安全岛，这些风险包括失业、失恋等。总之，选择合适的地方能够让你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不开心。我不喜欢过多讨论负面话题，但是我们的确需要未雨绸缪。失去工作令人烦恼，和爱人分手更糟糕。如果你住在一个工作机会很少，适合交往的对象也很少的地方，那就再糟不过了。如果你所在的地方经济形势很好，有很多的工作机会，有很多适合交往的单身一族，那你将更容易从不开心中恢复过来。

我认为，选择在哪儿居住是我们生活中的关键，这一决定将影响我们的所有其他决定——事业、教育和爱情。这一决定会影响我们的工作和个人关系，它也会为我们打开通往新世界的大门。不论我们希望过何种生活，不论是成家还是单身，我们首先要做一个决定——在哪儿居住。许多

人会做好几次决定。美国人平均每七年搬一次家，超过4000万人每年都要搬家，其中1500万人会搬到很远的地方，离以前的家80公里到160公里之外。[1]

选择居住地的赌注是很高的。但是当开始这个选择的时候，很多人并未做好作出正确决定的准备。如果你问大多数人，为什么会选择住在现在的地方，他们会说碰巧他们就住在那儿了。他们住在离家人和朋友们很近的地方，他们在那儿求职，或者更普遍的情况是，他们跟随旧情人来到这个地方。有些人甚至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可以作出选择的。

尽管如此，在我们所处的年代，一个伟大的奇迹就是我们确实有能力作出选择。有史以来，我们很多人第一次能够有作出选择的自由和经济实力。这意味着我们拥有前所未有的机会来找到最适合自己居住的地方，但这种自由也迫使我们在一大堆的可能中作出选择。如今，有许多不同的生活社区，每个社区都有自己独特的地方。

关键是找到适合你居住的地方，找到能够让你快乐和实现生活目标的地方。对于有些人来说，职业成就和财富是他们快乐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还有很多人不是这样的，他们会放弃很好的工作和很有前景的职业生涯，比如当律师或工程师等，去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另外一些人大学毕业后返回自己的家乡去经营家族生意，或者选择住在离家人和朋友很近的地方。这些人通常很清楚他们自己放弃了什么，并且毅然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他们热爱家庭和自己生活的社区胜于财富，他们对自己的选择乐在其中。这些人可能比其他人更清楚自己生活的社区的真正价值，他们所珍视的是住在自己生活过的城市中，和熟悉的人在一起。

要记住，选择居住地就像选择其他生命中重要的东西一样，我们不能拥有全部，我们需要平衡各种关系。许多人为了寻求职业的发展而远离亲人和至交，而选择和亲人与朋友在一起则可能要放弃经济上的机会。

在继续讨论之前，我希望你能认真想想下面的问题：

你喜欢你现在居住的地方吗?这是你真正想居住的地方吗?它让你充满活力吗?当你在清晨走上街头或是乡间小路,你感觉充满希望还是倍感压力?它能让你真实地表现出你自己吗?你在实现自己的个人目标吗?你会向亲人和朋友推荐这个地方吗?

你想过要搬家吗?如果这样,你最想定居的三个地方是哪里?你喜欢它们什么呢?具体而言,你觉得它们能给你带来什么呢?居住在这些地方你的生活会有所不同吗?

你可曾坐下来静静考虑你现在住的地方和那些地方有什么不同?诚实地面对自己,你可曾用你投入到工作和事业上的能量的一小部分,或者是你用在情感生活中的一小部分精力来考虑这个问题呢?

如果你已经这样做了,那么你确实属于极少的一部分人。对于一个生活中如此重要的问题,只有寥寥几个人考虑到所有的可能性或者思考所有的问题,真是令人吃惊。

或许这是因为我们知道得太少。在全球化时代,住在哪儿似乎并不重要,这种说法就仿佛是一道魔咒。我们无论在阿斯彭滑雪胜地的小木屋中,还是在普罗旺斯的农家小院中,都可以与在硅谷的办公室中一样高效地工作。只要有手机和无线网络,在这几个地方并没有什么不同。

科技不断进步,地域差别在消失的提法并不是现在才有的。首先是铁路引发了贸易和运输上史无前例的革命。然后电话让人们互通有无,拉近距离。汽车出现了,然后飞机也出现了,接着是互联网——可能这是全球化世界的核心内容。所有这些科技都展现了一个不存在任何界限的新世界。科技让我们摆脱了地理上的束缚,我们可以离开拥挤的城市回归我们期待的乡村生活,可以忘记过去,忘记那些城市和文明被肥沃的土壤、天然良港和资源所限制的年代。在当今的高科技时代中,我们能随意选择居住地。如果按照这种越来越流行的观点,居住在何处并不重要。

这种说法看似很有说服力，但它是错的！当今世界，推动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在全球的分布并不均衡，如人才、创新和创意等，它们集中在特定的地方。很明显，信息和交通方面的重大创新促使经济活动在全球扩张，而不那么明显的是被我称之为“聚集效应”的东西。在当今的创意经济中，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来自有才能和充满创意的人聚集在一起所产生的巨大能量。当我们聚在同一个城市、同一个地区时，新的想法产生了，生产率提高了。聚集效应产生的力量提高了我们个人的效率，也促进了我们居住地的生产率提高，从而创造了更多的财富。

由于聚集效应，城市和地区成为经济增长的真正引擎，毫无疑问这些地方将继续扩大。如今，超过半数的世界人口生活在城市。在美国，超过90%的经济产出是由大城市创造的，其中五个最大城市的经济产出占了全国总量的23%。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形成了超级都市，数以千万计的人们聚居于此，创造了数千亿甚至上万亿的产出。地点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问题，它对世界经济和我们个人生活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深。

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具流动性的人们，我们非常幸运，无论在哪个国家，当我们考虑我们想要住在哪里时都有很多选择。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需求和偏好，而幸运的是，不同地点就像不同的人一样风格迥异。有些地方有繁荣的就业市场，有些地方在基础服务方面很棒，比如说教育和安全。有些城市更适合单身人士，有些城市适合家庭；有些城市适合工作，有些城市适合游玩；有些城市比较保守，有些则较为开放。城市有自己的特性和灵魂，它们适合不同类型的人们。虽然城市的不同特性似乎很难理解，不过也不是不可理解的。为了让你更好地理解城市的不同特性，我们在第11章做了几幅图。

不只是城市的特性有所不同，在生命的不同阶段，我们需要的东西也会变化。刚刚走出校门的单身青年，大多都喜欢充满刺激的城市，那里能提供很多工作机会并有很好的职业发展前景，那里夜生活丰富，能见到许

多单身异性并与之约会。当我们成熟一些，结婚生子，我们生活的重点也随之变化。我们希望生活的地方能有好的学校，治安良好，能为家庭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当孩子们上了大学以后，我们的需要和兴趣会再次发生变化。

在每个转折点或者别的什么时候，很多人都有机会选择适合自己的定居地点。

但应该怎样选择呢？五十年以前，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查尔斯·蒂布特（Charles Tiebout）列出了一个非常有用的表格来衡量我们定居地点的优劣。[2] 蒂布特认为，一些社区能提供很多服务，或者说它们能提供"公共品"，例如教育、治安、消防、公园等，不同的服务和不同的服务质量会有不同的价格，我们通过缴税来为这些服务买单。所以当选择定居地点时，我们不仅仅是选择一个地点，也是在选择居住地的公共品和服务。正如蒂布特的著名论断——用脚投票，人们选择自己喜欢并能满足自己需要的社区。有些人喜欢好学校，也乐意为此付钱，而单身人士，或者那些孩子已经离开家的人们，就不会觉得学校有多重要。他们可能更看重好餐馆、世界上最棒的沙滩、高尔夫课程和低税收。蒂布特的模型为我们考虑如何选择社区提供了一个基本思路。当我们面临许多选择的时候，我们需要想清楚自己到底需要什么，什么对于我们来说是重要的，然后找到在我们支付能力范围内的适合我们的地方。

谈到价格，我们的生活地点所需的费用是生活花费中最多的一块。有些人喜欢像伦敦、纽约那样的大城市带给他们的刺激、兴奋和机会，但是也要明白为得到这些感受需要支付大价钱。而且其他的一些大城市，比如旧金山、阿姆斯特丹、波士顿、芝加哥、多伦多和悉尼的生活成本也非常高。在金融部门工作的人可能会觉得，在纽约和伦敦，高生活成本被经济上所取得的成就抵消了。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在洛杉矶电影制片人和米兰或是巴黎的时装设计师身上，也可能发生在其他引领某一行业的地方。

但假如你在其他的领域工作呢？如果这个行业并没有行业圣地，或者你并不渴望登上所处行业的顶峰，那么将会有许多其他宜人的地方可供选择。很关键的一点是你需要平衡你的职业目标和你想要的生活质量。

我写这本书是为了帮助你选择适合你生活的地方。我将与你分享我25年来的个人研究成果以及许多他人的工作成果。我将围绕以下三个主要观点来提出我的建议：

1. 尽管现在人们都在强调全球化和“世界是平的”，但实际上定居地点在全球经济中起着比以往更为重要的作用。

2. 不同的地方正在变得更加不同并更具特色，从经济结构、就业市场到那里的人们的生活质量。

3. 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流动的社会中，因此我们对于居住在何处有了更多的选择。

总之，这三个因素意味着，你选择的定居地点将对你的收入和工作、朋友圈、生活伴侣和孩子的未来产生重要的影响。

这本书的第一部分描述总体情况。它将解释为什么定居地点在全球化的经济中依然重要以及它怎样产生影响。在这一部分中，我将用图表和数据来解释全球化的真实情况以及超级都市的作用。这种超级都市是一种新的经济体，我因此将之称为“不平的世界”。

第二部分将解释定居地点的选择如何影响你的经济状况，包括就业市场的真实情况、住房市场的趋势、房地产升值等所有这些热门话题。这一部分还将说明为什么经济优势在一些地方的累积速度比在别的地方快，具体解释了人才和技术工人是如何涌入某个地区的，同时总结了影响住房市场涨跌的原因。这一部分也描述了工作机会聚集的趋势——硅谷的高科技行业、纽约的金融业、好莱坞的电影业。

第三部分将讨论选择定居地点时我们最需要权衡的问题。如何平衡职

业目标和我们想要的生活方式间的关系。这一部分将讨论我们生活在何地以及我们过上幸福生活的能力。我与盖洛普公司（The Gallup Organization)[①] 一起做了一项主题为“居住地与幸福程度”的大型调查，有2.8万人参与了这次调查。调查的结果表明，定居地点对于一个人的幸福感所起的作用与工作、经济状况和人际关系同样重要。

第四部分主要研究我们的需要与偏好如何随着我们人生的三个主要阶段而变化。这三个阶段是：年轻单身时、结婚生子以后和孩子们离开家后的空巢期。

最后一章很实用。它提供了一些基本工具，供你在确定最适合你生活的地方时使用。即使你对现在生活的地方很满意，它也会帮助你更好地了解你最渴望和需要的是什么。如果你正考虑搬家，它会为你需要什么以及在哪找到需要的东西提供很好的指南。读完这本书，你将会更好地理解定居地点在当今全球化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了解如何充分利用机会选择适合你的地方过上幸福充实的生活。

① 全球知名的民意测验和商业调查公司。

第一部分

定居何处——最重要的人生抉择

WHO'S YOUR CITY?

2 世界不是平的

《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说，世界是平的。[1] 由于科技进步，现在全球竞技场已经变平了，世界为获胜者准备好了奖章。无论我们居住在世界的哪个角落，所有人都是参与者。弗里德曼写道："当世界是平的时候，即使你不移民也可以创新。"

这个提法已经有年头了。当我们刚刚进入20世纪时，评论家们就在写作关于贸易和科技使世界变平的文章，这种世界变平的效应使得生活在何处不再重要。由于电报和电话的发明、汽车和飞机的出现、个人电脑的兴起，还有互联网的普及，许多人都认为科技进步削弱了实际地点的重要性。

这一预言在今天仍然很流行。1995年，《经济学家》杂志封面上赫然印着"距离的消亡"。该杂志的记者弗朗西丝·凯恩克洛斯（Frances Kairncross）预测："由于科技和电信竞争，距离将不再是问题。"四年后，这本杂志又很自豪地宣称："无线通讯的革命从根本上粉碎了地域限制。"[2] 新的通讯技术将成为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的"重要杠杆"，我们因此而可以自由选择定居地点。

在过去十年中，我的大部分时间花在了研究上述理论上，以便为我的具有挑战性的理论寻找证据。我的团队帮我做了大量研究，收集了许多数据以及能够证明地点在全球经济中极为重要的证据，在随后的两章中，我将具体谈到这个问题。那么，我的基本论点是什么呢？

无论如何，国际经济形势都不能用"世界是平的"来形容。

"如果孩子们一来到这个世界就能拥有聪明才智、强健的体魄、灵活的头脑、好看的外表和疼爱他们的父母，他们就会在未来占有很多优势，但同时定居何处也很重要。"[3] 这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经济学家和贸易

专家爱德华·利默（Edward Leamer）在著名的《经济学文献》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批评《世界是平的》的书评中的一段话。理论上，我们可以选择居住在任何地方，但是有些地方会提供更多的机会。

对“世界是平的”这一论断的最明显的挑战是全球城市和城区的爆发性增长，越来越多的人聚居在城区中。生活在城区的世界人口的比重从1800年的3%上升到1900年的14%，到1950年，这一数值已经达到30%，而现在已经超过了50%。在发达国家，四分之三的人口生活在城区。[4]

人口增长并不是世界不平的唯一标志。在本章中，我将提供具体的图表来证明经济活动和创新的极度集中。就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增长和前沿创新而言，今天的全球经济是由很少的几个地方推动的。另外，全球竞技场并没有任何将要变平的迹象，原来的最高点——那些推动着世界经济发展的城市和地区正在变得更高，而原本的谷底——那些几乎没有经济活动的地方正在变得更加缺乏活力。

的确，全球化非常强大，过去从来不曾参与到全球经济中的地方现在也开始行动了。但所有这些地方都能够平等参与全球化并从中获益吗？新技术和经济资源仍然高度集中，所以对世界经济最为重要的地点仍然屈指可数。

其实，全球化有两方面表现。一方面比较明显，就是日常的经济活动（比如说简单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各地扩展开来；而另一方面不是很明显，就是更高层次的经济活动，比如说革新、设计、金融和传媒日益集中在少数地点。

弗里德曼这样的思想者把注意力集中在全球化如何使经济活动不断铺开（我们可以称之为全球化的离心力），同时他们也忽略了经济活动集中的现实（向心力）。哈佛商学院教授和竞争战略专家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称之为“地点悖论”，他在2006年8月对《商业周刊》

的记者说："地点还是很重要的。当一切都越来越具有流动性时，地点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一点，迷惑了很多聪明人。"[5]

这些学者所犯的错误是将全球化看成了非此即彼的事情，而事实并非如此。理解新的全球现状的关键是要认识到世界既是平坦的又是起伏的。

夜色中的世界

下面几幅图是由马里兰州立大学国际安全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蒂莫西·古尔登（Timothy Gulden）根据研究结果绘制的。这些图在世界地图上描绘了全球的经济活动。2005 年 10 月，当这些图的早期版本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6] 我们随后更新了这些图以便反映更多的信息。根据传统的人口密度标准和全球经济产出与创新的新标准，这些图都反映出全球化导致的惊人的集中趋势，大概有 20 ~ 30 个地点对于全球经济而言至关重要。

图 2 – 1 描绘了全球人口分布情况，为了确定那些对世界经济至关重要的"超级地区"，我和我的团队收集了许多数据（我将在第 3 章中进行详细讨论），图 2 – 1 就是根据这其中的数据绘制的。人口最密集的地方是印度德里到拉合尔①一线，这个地区生活着 1.2 亿多人口。还有其他几个地区人口超过了 5000 万，有 12 个地区的人口在 2500 万到 5000 万之间，有 33 个地区的人口在 1000 万到 2500 万之间。

当然，人口密度只是衡量经济活动的一个很基础的指标，不能完全反映生产率最高的地方与其他地方之间的巨大落差。有时，相对较小的城市（比如赫尔辛基）的人均产出反而非常高。相反，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聚居区经济产出并不高，甚至相当贫困。所以，在确定"超级地区"时，不仅仅要考虑人口，还要考虑经济产出。

---

① 拉合尔，巴基斯坦第二大城市。



图 2-1　不平坦世界中的人口分布

资料来源：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　制图：蒂莫西·古尔登

很遗憾，关于世界各地区的经济产出，我们没有来自同一个权威机构的完整数据，但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个大致的估测指标。图 2－2 备受关注，它表明了夜幕降临之后全世界的照明情况。灯光更为集中的地方会消耗更多的能源，也可以假设这些地方有更多的经济产出。

为绘制这些图，古尔登使用了美国国家海洋大气局（NOAA）的国防气象卫星计划的数据。他绘制了照明地区，标出了照明原因——家庭照明、工厂照明、街道照明、休闲娱乐照明。凭借一系列空间和数据统计技术，古尔登能够根据这些地区的照明情况来估算当地的经济活动。我把古尔登的估测指标称为“以灯光为基础的区域生产总值”（light-based regional product），简称 LRP。

得出了预测结果之后，古尔登根据美国城市区域的经济产出和世界银行国别 GDP 数据来检验预测结果。他随后又将这个预测结果与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①公布的人口预测结果进行比较，以此来证明这一方法可以对经济活动进行合理预测。最后，他将 LRP 的预测结果与耶鲁大学的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和他的团队对 GDP 的预测结果进行了比较。[7] 最终的结果反映在图 2－2 上，它描述了我们对 2000 年全球每一平方公里的以灯光为基础的区域生产总值的预测。

如图 2－2 所示，全球经济主要集中在二十几个超级区域里，在下一章我将会具体解释。其中，两个超级区域的经济产出超过了 2 万亿美元。大东京区域（2.5 万亿美元）以及另一个极大的超级区域——从波士顿经纽约到华盛顿特区（2.2 万亿美元）。就经济总量而言，这两个超级区域可以在世界上排第三和第四位，大概和德国相当，仅次于美国和日本。

① 橡树岭国家实验室（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简称 ORNL）是美国能源部所属最大的科学和能源研究实验室，成立于 1943 年，现由田纳西大学和 Battelle 纪念研究所共同管理。



图 2-2　不平坦世界中的经济活动

资料来源：美国国防气象卫星计划　制图：蒂莫西·古尔登

另外还有四个超级区域的产出超过了 1 万亿美元，分别是美国的芝加哥—匹兹堡大区域（1.6 万亿美元）、欧洲的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安特卫普大区域（1.5 万亿）、日本的大阪—名古屋区域（1.4 万亿）和英国的大伦敦区域（1.2 万亿）。上述任一区域都可以列入世界国别经济总量排名的前十名，他们都比意大利、加拿大、印度、韩国、俄罗斯和巴西的经济总量大。全球有四十个区域的经济产出超过了 1 千亿美元。超级区域不仅仅是国别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也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

尽管不能与美国、欧洲和日本相比，印度和中国经济的分布也非常不平衡。根据古尔登的灯光照明数据，中国 65% 的经济产出是由 25% 的人口所在的区域创造的。在印度，26% 的人口所在的地区创造了超过一半（54%）的经济产出。对比美国的情况可以看出，美国各大区域的经济产出大致和人口成比例。尽管美国的人口和生产力分布不平衡，但是分布在相对而言比较多的几个区域，而中国和印度的工业化开始得较晚，他们的资源和生产力更加集中。当前的进程将会让世界变得更加不平衡。

智慧之城

人口和经济活动分布都将变得更加不平衡，而创新这个经济增长的引擎将变得最为集中。全球竞争在创新领域的情况是最不平衡的。图 2－3 描述了根据获得的全球专利多少来衡量的世界创新中心。古尔登通过另一种新的方式制作了这些图。他使用灯光照明来确定经济区域，又使用美国专利和商标局的数据来查询每一位在美国注册专利的发明者来自何处。由于美国专利数据偏重于在美国获得专利权的发明者，因此他使用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数据对世界各个地点作出更为精确的预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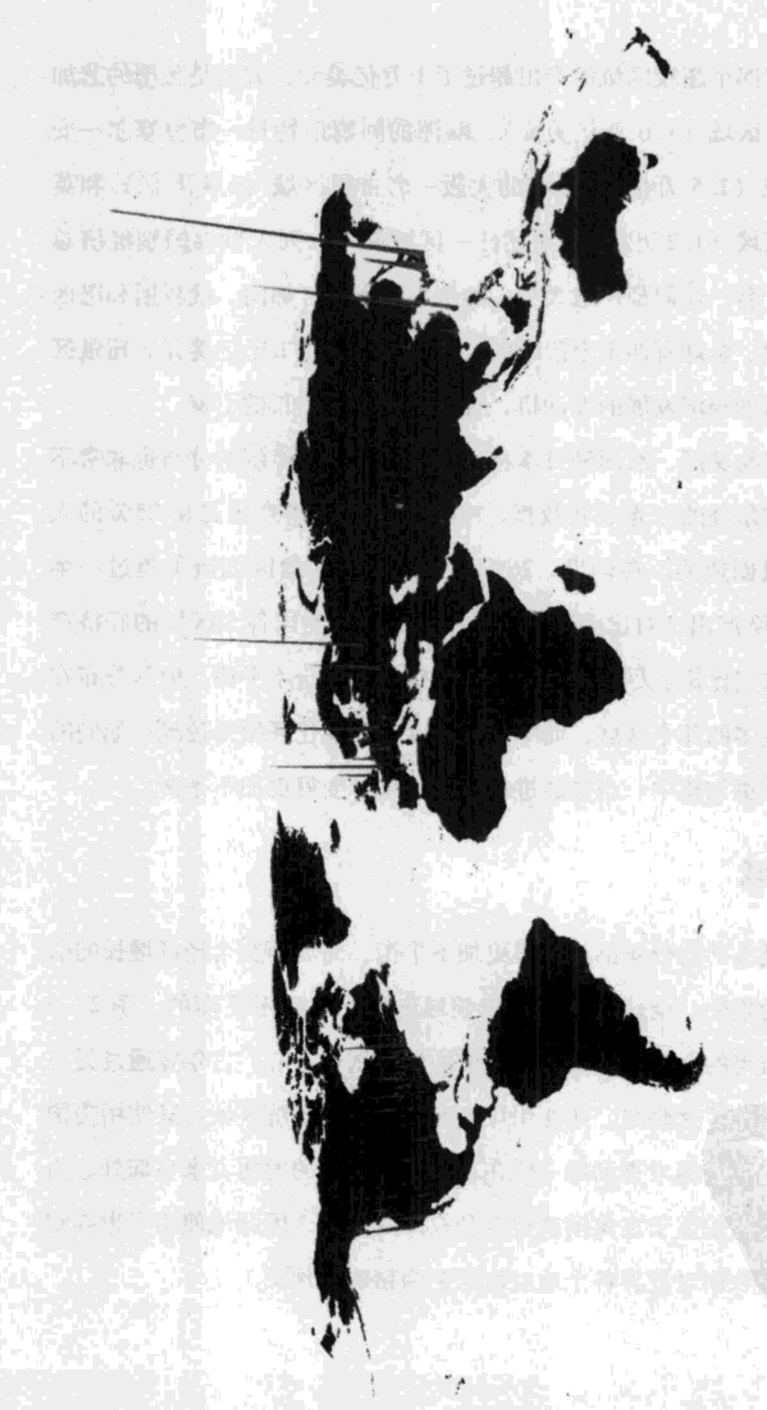


图 2-3　不平坦世界中的创新活动

资料来源：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美国专利和商标局　制图：蒂莫西·古尔登

图2－3很清楚地表明了一个包括创新的“山峰与低谷”的世界。制高点是围绕东京、首尔、纽约和旧金山的大都市区域。此外，波士顿、西雅图、奥斯汀、多伦多、温哥华、柏林、巴黎、斯德哥尔摩、赫尔辛基、大阪、台北和悉尼也很突出。随着国家的经济增长，创新在中国和印度也变得突出。这些国家的一部分城市正在快速发展创新能力，尽管它们目前还不能达到最高点。在印度，班加罗尔获得的专利权和雪城（Syracuse）①相当；在中国，北京的专利数和西雅图或者凤凰城相当，上海则和多伦多或者是盐湖城相当。我们估算，1996年到2001年间，这些城市的创新翻了四番，并且增长速度还有可能进一步加快。北京和上海的地位在上升并将加入全球创新者的行列。

这一趋势可能会影响到美国，因为美国长久以来一直依赖印度和中国移民的创新能力和进取精神。根据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安娜李·萨克瑟尼安（Annalee Saxenian）教授的研究成果，从1980年到1999年，印度和中国的企业家创办了硅谷25%的初创企业，创造了170亿美元的年收入和5.8万个职位，到2005年，该比例已经上升到了30%。[8]

如图2－3显示的，全球至多还有20几个地方有着重大的创新成果。这些地区有非常得天独厚的条件：领先的大学、充满活力的企业、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以及适应商业创新需要的风险资本，而这样的地区并不多。

这种商业创新的不平衡分布也表现在融资情况上。风险资本——投向高科技公司的资金——就地域而言也在集中。在美国硅谷有一个风险资本中心，小一些的风险资本集中地包括波士顿、纽约和其他一些城市。在欧洲、印度、中国和以色列，风险资本也颇具潜质。尽管风险资本中心的相对数量较少，但是风投公司常常采用“20分钟规则”，即只有距本公司所在地20分钟路程之内的公司才值得进行高风险投资。即使是生产远距离

① 雪城：锡拉丘兹，美国纽约州中部的工商业城市，因当地降雪极丰而得名。

通信产品的高科技公司，如果距离风投公司太远，也会被认作不适宜投资。这并不是说没有例外的情况，那些能直接提出要求，能够贴近客户、投资者和同行的公司也将会得到优先考虑。"20分钟规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初创企业最终会选择进入硅谷，尽管它们可能是在别的地方成立的。而且全球只有三个地方垄断了首次公开募股的全球市场，它们是伦敦（510亿美元）、纽约（460亿美元）和香港（410亿美元）。[9]

著名科学家

科学研究发现，许多科技创新的源泉分布得也很集中，很不均衡。大部分重要的发现都集中在美国和欧洲。

图2-4描述了在前沿领域被引述最多的科学家的居住地。这张图是根据伦敦大学学院的地理学家和城市规划专家迈克尔·巴蒂（Michael Batty）的数据绘制的。[10]一份由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林恩·朱克尔（Lynne Zucker）和迈克尔·达比（Michael Darby）所作的研究也反映出类似的特点。通过追踪1982年到2004年间，美国179个地区和其他25个国家的5千位著名经济学家和工程师的居住地，朱克尔和达比发现，这些居住地集中在美国的东海岸（波士顿、纽约、华盛顿—巴尔的摩）、西海岸（旧金山、洛杉矶和西雅图）和芝加哥等地以及欧洲（伦敦、阿姆斯特丹和巴黎）和日本的一些城市，另外还有其他几个地点。[11]

请注意图2-3和图2-4的相似性。商业创新和科技进步都非常集中，有些地方既是商业创新中心又是科技进步中心，而且它们在全球经济中的表现非常突出。但并不是每个地区的表现都很好，东亚的几个城市，特别是日本的几个城市，虽然是非常重要的商业创新中心，但仍然严重依赖其他地方的科技进步。同样的，有些地方科技进步做得很好，但是缺乏商业应用。



图 2–4　不平坦世界中的知名科学家分布

资料来源：迈克尔·巴蒂　制图：蒂莫西·古尔登

把四张图放在一起，你会看到很有意思的现象，柱状图标集中的趋势更加明显，这种集中趋势的基础是世界人口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城市中。经济活动的分布更加不平衡。许多地方尽管人口众多，但是经济活动很少。而创新活动和知名科学家的分布就更加集中了。

如果顺着经济发展的扶梯不断向上攀登，从制造基本商品到重大的创新活动，你会发现世界变得越来越不平坦。

地域上的集中对于创新非常重要，这一点我们会在第 4 章中详细讨论。如果创新者、执行者和投资者在工作时间和非工作时间都能经常交流，创意就能更自由地流通，也能被修改得更具特色，并且更快地付诸实践。创意人聚在一起并不只是因为他们喜欢聚在一起，也不仅仅因为大都会中有许多好玩的东西，虽然这两点都是事实。创意人和创意公司聚集的主要原因是聚集带来的高效生产率、规模经济和知识外溢效应。

所以，尽管没必要为了创新而移民，但地理位置上的集中确实是创意优势的前提条件。创新、经济增长和繁荣不断吸引大量的顶尖创意人才。全球化增加了对创新的回报，因为全球化可以更快地为全世界的消费者推出创新产品和服务，这样就会增加创新中心对全球最优秀和最聪明人才的吸引力。而所有这些又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经济活动的不平衡分布。

山峰与山谷

在过去，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中的城市在一国或者同一地区内相互争夺资金和人才。现在，不同的地方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竞争，对于优秀、有创意和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才的争夺正在变得越来越激烈。

不平坦的世界的特性可以用四类地方来描述。

- 第一集团包括为数不多的几个能够产生创新的地方。这些地方是最高的山峰，它们能够吸引全球的优秀人才，产生新知识和全球绝大部分的创新。由于远距离通信和运输效率不断提高，创新能在这些地方之间便

捷顺畅地流通。

● 第二集团包括使用已有创新的地区。这些创新往往从其他地区输入，用以生产商品和服务。它们是世界上正在崛起的高峰，包括都柏林、首尔，可能还包括新加坡和中国台北。这些地方正在逐步转变，从使用创新转向产生创新。在21世纪的全球经济中，它们大多是制造业和服务业中心。从瓜达拉哈拉和蒂华纳①到上海和菲律宾，它们生产全球性商品，接听来自各地的电话并支持世界的创新引擎。

● 第三集团由发展中国家的超级大城市组成。这些地方人口非常集中，但经济活动不足以供养这些人口。许多这种超大城市都有着规模庞大的“全球贫民窟”。无家可归的人，贫穷甚至是赤贫人口聚居在这些地方，社会和政治骚乱频繁，几乎没有像样的经济活动。[12]这些地方越来越与全球经济相隔绝，因此它们也很难支持这个仅仅是对一小部分幸运儿而言的平坦的世界。

● 最后，在这个不平坦的世界中还有非常巨大的峡谷——农村和偏远地区。这些地方人口稀少，几乎没有经济活动，和全球经济几乎毫无关联。

现在和几十年前最大的不同不是世界变得更平了，而是世界上的地点变得更分散了，而且世界的小山或是新出现的山峰——也就是工业和服务业中心，分布更广而且变动到了不同的地方。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美国占据了世界大部分的经济和创新山峰，只有少数几个山峰分布在欧洲和日本。但此后，随着美国工业时期的经济增长源，比如说匹兹堡、圣路易斯和克利夫兰从全球领先的位置上跌落下来，美国丧失了大多数的山峰。同时欧洲、加拿大以及环太平洋的一些地区逐渐加入进来。

对于一些人而言，世界变平了，因为山峰之间的经济和社会距离缩短

---

① 均为墨西哥城市。

了。生活在山峰所在地的人们联系更紧密，甚至他们与地球另一端的人们的联系比与自家邻居的联系还要紧密。由于大约有1.5亿人口的创意阶层的流动性很高，这种山峰与山峰之间的联系发展得越来越快。创意阶层参与到全球科技系统和全球劳动力市场中，这两者都需要他们在世界领先城市中自由流动。当世界还与变平相去甚远的时候，山峰之间密集的交流网络使得世界对于幸运的少数人来说已经是平的了。

布鲁金斯学会的一项由人口学家罗伯特·兰（Robert Lang）和世界城市研究员彼得·泰勒（Peter Taylor）提交的一份研究报告记录了山峰之间的种种联系途径，以及他们与世界中的山谷之间的经济和社会差距。[13]兰和泰勒也指出了很少的几个主导山峰之间联系的城市，像伦敦、纽约、巴黎、东京、香港、新加坡、芝加哥、洛杉矶和米兰等。他们也发现，其他更多的城市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比这些城市少得多。

《经济学家》2007年的一份报告表明全球的金融市场也有类似的情况。当科技进步使跨国金融交易能在弹指间完成时，世界的主要金融中心比以往更高，更集中。这篇文章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金融家愿意生活在价格昂贵、到处堵车的城市丛林中?""使用宽带、手机和黑莓①，他们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工作。"但是伦敦、纽约和东京，以及香港和新加坡这样的新兴枢纽也在加强它们在全球金融领域的地位。文章随后写道："与中世纪被围墙围住的城邦不同，今天的金融中心日益依赖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科技、资本的自由流动和全球管制放松，创造了一个繁荣和不断扩大的网络。当一个城市入睡，另外一个城市还很清醒，所以交易可以24小时进行。由于投资者在各地区的各种金融产品间分散投资，金融中心间的交易近来迅速增长。"[14]这只是关于世界最高的山峰之间的密切联系

---

① Blackberry：由加拿大RIM公司推出的一种移动电子邮件系统终端，特色是支持电子邮件、手机、文字短信、互联网传真等无线资讯业务。

越来越多的又一证据，另一方面则是它们与全球其他地方日益扩大的经济和社会差距。

认为世界是不平坦的与认为世界是平的所产生的地缘和经济影响大不相同。“世界是平的”的理论认为新兴地区能够很快融入世界之中，像印度和中国这样的国家，有成本优势、高科技技能和企业家精神，所以能够很有效地参与到制造业和标准化服务行业的竞争中去。这一观点还认为，日益变平的竞技场引起的紧张状态主要影响的是发达国家，因为在这些国家中，不仅仅制造业在逐渐转移，一些更高端的行业，比如说软件开发和金融服务业也正在转移。

这一理论使我们对世界经济中潜藏得更深的问题视而不见，更严重的是，政策制定者对这些问题无能为力。用传统的二分法来看待这个世界已然不够了，这个世界不能简单地分为富裕和贫穷，发达或是发展中。在可见的未来，全球政治将取决于在世界不断增长的山峰、不断下沉的山谷和不断移动的山丘之间日益加剧的紧张状态。通过这一视角，我们可以发现在几个相互交叠的领域不断增长的紧张和差距：在颇具创新能力并能吸引人才的山峰和人才输出的山谷之间；二级城市对工作、人才和投资的竞争，从底特律到名古屋到班加罗尔，竞争日益加剧甚至恶化；全球的不平等现象日益加剧，甚至是在最为成功和最具创意的区域中心。

这儿是滋生有害物质的温床——比弗里德曼描述的平的世界更让人担忧，比传统的贫富差距更为复杂。塞缪尔·亨廷顿的观点描述了犹太基督教价值观与“落后的”穆斯林文明的对抗，与亨廷顿的观点相悖，实际上我们所面对的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在世界的山峰和山谷间不断加深的经济差距。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冲突虽然看起来似乎与经济因素无关，但往往也根源于这个不平坦世界中的基本因素。

十多年以前，政治学家本杰明·巴伯（Benjamin Barber）预言了全球经济的兴起，他称之为“麦当劳世界”，它十分强大而且无所不包，同时

它也造成了巨大的反作用。[15]巴伯将这一趋势命名为“圣战”——其根源在于，受到全球化无情威胁的宗派和“部族”中的数百万的人们感到恐惧和焦虑。缺乏教育、技能、流动性和与全球经济的联系，这些人只能被困在那些越来越落后的地方。

毫不令人意外，不平衡的全球化正在对转型中和新型的经济体造成严重威胁。中国在过去十年的飞速发展使它跻身于全球经济前沿。它日益成为“全球工厂”，是世界领先企业的制造中心和外包目的地。专家断言，由于中国的科技人员不断增加，高等教育质量不断提高，并且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科技工作者，中国正在创意行业阶梯上快速攀登。

但中国引人注目的经济增长是少数几个快速发展的地区带动起来的，这些地方吸引了绝大部分的优秀人才，产生了绝大多数的创新，并且创造了中国绝大多数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财富。人才集中在少数的几个山峰，如上海、深圳和北京，这些地方就像虚幻世界，和广大贫穷的农村地区隔离开来。中国十个最富裕地区的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16%，却拥有接近45%的大学和60%的科技创新。[16]

中国是新兴阶层影响到经济发展的一个例证。中国的大城市中生活着5.6亿人口，这些地方正在变得越来越充满活力和创意，越来越国际化。而另外7.5亿中国人大多生活在农村，他们则被远远地落在了后面。根据盖洛普公司2006年的一份详细的调查，中国城市人口平均每户的收入是农村地区的2.5倍，而且自1999年以来，这一收入几乎翻了一番。根据我们自己的调查，中国的超级区域的居民比生活在其他地方的居民要富裕3.5倍。我的一个中国学生很简明地总结了这一情况：“在上海，普通中产阶层人民的生活要比那些生活在美国的普通中产阶层过得好，但就在城区之外，人们的生活还处于比较落后的条件中。”他的这一印象是从数据中得出的：17%的中国人每日生活费低于1美元，接近50%的中国人每日生活费低于2美元，8亿中国农民付不起看病的钱。中国政府相应地推

出了新的政策，比如在商业、教育和医疗领域的农村发展计划，以应对日益加剧的社会经济差距。[17]但是，缩小差距的前景不容乐观。随着中国与国际接轨的山峰越来越接近于它们同类的水平，农村地区和那里的人们将会落在后面。

但如果和印度穷人的困苦情况相比较，这些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印度不断增长的经济山峰，像班加罗尔、海得拉巴、孟买和新德里的部分区域，正在与这个人口稠密的国家的其他地方拉开距离。正如斯坦福大学的拉夫克·多萨尼（Rafiq Dossani）谈到的，印度科技和商业服务——这两个行业在印度发展很快——缺乏像中国制造业那样的广泛的就业基础。[18]除非印度能够找到解决低技能工人就业问题的方法，否则，全球化只能加剧它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分裂。

不平坦的世界造成的影响不仅仅存在于新兴经济体。2005 年，法国和荷兰拒绝了欧盟宪法，投反对票的主要是郊区和农村的低技能工人，他们对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担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们生活在发达国家，但是他们也被落在了后面。

不平衡的全球化也是使美国出现政治和文化分化的原因，美国与全球紧密联系的大都市地区与其他地方的经济和社会差距不断扩大。根据我自己的计算，美国最突起的、最具创新性的中心，例如硅谷、波士顿和北卡罗来纳州三角研究园区，也具有全国最严重的不平等。

这种不平衡也在两极分化的房地产市场上起了关键作用（第 8 章详细说明）。伦敦、纽约、旧金山和香港这些城市的住宅价格在过去二十年中不断升值，而这些城市所在国家内陆地区的住房价格则出现停滞和下跌。

此外，全球化不平衡引起的不安与焦虑已经产生了一定的政治影响，这种影响对全球创新引擎具有潜在的破坏作用。那些被世界山峰远远甩在后面的人们的恐惧、不安全感、愤怒和报复情绪散布在全球的各个角落。特别是一些国家眼睁睁地看着它们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才离去（或者是

打算离去）。而且，极其自恋的政治狂热分子愿意助长这种日益增长的恐惧，仅仅是为了政治利益。

如果这很像霍布斯[①]所描述的世界，这是因为全球化、贫穷和富裕带来了新的选择机制，这一机制将人们按照经济和社会地位在地理上分离开来。在今天这个不平的世界中，社会融合的浪潮在各国国内和各国间退去。毫不奇怪，我们会发觉自己生活在一个有断层的社会中，在这个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正准备给他们曾经认为的世界经济精英们投反对票。

"世界是平的"这一理论并不完全在误导我们。世界正在日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商品和财富的总量在增长，总之，全球各地的人们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全球经济中去。但大多数的人们并不在意这种总体效应，他们更有理由关注自己的生活。当新兴经济体从不平衡的全球化中得到了最多的利益时，它们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负面因素的影响。因为现代化的通讯让世界变小了，同时全球化也让世界变得更为不平坦，那些被困在山谷中的人们抬头仰望山峰，财富、机会和生活方式上日益拉大的差距直接对他们造成了冲击。

我们因此正面临着当代最大的两难困境：经济增长需要山峰变得更高更强大，但这种增长只会加剧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孕育进一步威胁到创新和经济增长的政治反应。如果坚持世界是平的，竞技场是平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份，我们就无法面对全球化导致的种种困扰全世界的问题。只有理解了世界经济的不平衡本质，理解了世界经济受到了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和紧张状态的困扰，我们才能着手解决问题，解决全世界山峰和山谷的不平等问题，即抬升山谷而不削低山峰。毫无疑问，这是我们当今时代所面临的最重大的政治挑战。

---

① 英国的政治哲学家，他在1651年所著的《利维坦》为之后所有的西方政治哲学发展奠定了根基。

3 那些最亮的点

世界闻名的滚石乐队（The Rolling Stones）做过无数次环球巡演，在他们2006年的全球巡演中，首次包括了一个新地点——上海。“我们都知道上海是一个很重要的大城市，”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对媒体说，“所以我们希望在行程中一定要包括上海。”滚石乐队明白国际投资者、全球制造企业和投资银行家在数年前就明白的一个道理：上海一点也不像中国的其他地方。它不仅在吸引投资和人才，也在通过主办艺术活动，兴建热闹的酒吧街以及加强与其他世界大都会的联系来努力打造全球创意中心。

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的差距不断扩大，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案例，它实际上反映了一个更加广泛、更加强大的进程，那就是作为我们当今时代基础经济单元的超级区域的兴起。如今的超级区域是指拥有5百万到1亿人口的区域，它们创造了数千亿甚至上万亿的经济产出。这些超级区域进行着大量的创新活动，而且也产生了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科学成就和科技创新。

城市一直就是世界的自然经济单元，但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们所理解的城市已经由那种被农村和郊区围绕的一个市中心，发展成为有两个或多个城区组成的超级区域，比如波士顿—纽约—华盛顿走廊。城市是由单独的邻近区域组成的，大都市是由一个中心城市和周边的郊区组成的，而超级区域是全新的自然经济单元，是由不同的城区不断发展，人口不断聚集，不断往外扩张并相互交叠形成的。

当今的超级区域行使的职能和过去的大城市的功能有些相似——将人才、生产力、创新和市场聚集在一起。不过超级区域的活动平台更广阔，过去城市是国家体系的一部分，而现在全球化使得城市要面对全球竞

争。由于经济活动已经全球化，城市系统也变得全球化了，城市要参与全球竞争。这也意味着超级区域这个更大更有竞争力的经济单元已经取代城市，成为全球经济的真正引擎。

唯一重要的经济单元

我们常常按国别来思考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问题。传统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都认为，国家是经济增长的地理引擎。正如李嘉图在他的著名理论中所阐述的，不同的国家要专注于不同的行业，这样它们才能够在与别国的竞争中获得并保持“比较竞争优势”。[1]

大多数学习经济学历史的学生都会发现由农村到城市再到民族国家的渐进过程。实际上，贸易、商业活动和创新之类的经济活动通常是从城市兴起的。城市，以及现在的超级区域一直都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核心引擎。

首先发现这一点的是伟大的城市规划专家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她因对城市规划的严厉批评而闻名，著有《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以及其他两本不是特别出名的重要作品《城市经济》和《城市与国家财富——经济生活的基本原则》。[2] 在1969年出版的《城市经济》一书中，雅各布斯反驳了一个长期流行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城市的兴起是因为农业生产力提高，使农产品在满足基本需求之外还有盈余。依据雅各布斯的说法，实际上，最早的城市是围绕野生动物和谷物的原始交易形成的，这使得当地居民认识到了农业生产以及产品输出的经济效益。甚至之前人们公认的典型的“农业”活动，实际上也起源于城市，随后向周边扩散。雅各布斯指出，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往往起源于城市，而后在农场地区得到普及。例如机械收割机，最初是在城市发明、完善并使用的，随后这一科技成果进入农业地区，并在这些区域产生了革命性的效果。为了更好地阐明她的观点，雅各布斯描述了19世纪40年代大饥荒爆发后的爱

尔兰，由于城市活动受到抑制，整个国家都无法从困境中恢复元气：

> 没有港口接受救援食品……没有磨坊碾磨救援谷物。没有技工、工具和设备来建造磨坊。没有烤箱来烤面包。没有办法传播种植土豆之外的种庄稼的信息。没有办法销售其他农作物的种子，也没有种植其他庄稼的农具。

雅各布斯继而说明，使爱尔兰陷入如此困境的是英国统治的铁拳：

> 英国对爱尔兰征服的核心是对城市工业的系统性压制，正是这种压制使爱尔兰人如此无助。英国也对美洲殖民地中的小城市工业采用了同样的压制政策。

按照雅各布斯的说法，一个生机勃勃的城市，将融合它所在国家的内陆地区并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城区”。城市附近的农场由于采用了城市的科技创新而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农村的居民逐渐向城区靠拢并在城市中找工作。随着城市经济产出的增长，市政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更大了，同时支持城市周边发展的技术创新也多起来。

李嘉图所提出的“比较优势”在今天仍然起作用，但是已经不能再用国家的界限来定义经济体了。相应地，超级区域已经成为新的自然经济体。它不是人为设定的，也不像民族国家或者国家的省份那样是人为的政治边界，而是创新、生产中心和消费市场聚集的产物。今天的超级区域，实质上是邻近的城市和它们的郊区的聚合，它们的范围大大超出了单个的城市和它们的内陆区域。

1957 年，经济地理学家琼·戈特曼（Jean Gottman）首先使用了“超级都市（Megapolis）”这一术语来形容新兴的经济枢纽——波士顿—华盛顿走廊。[3] 这一词语源自希腊文，意思是“很大的城市”，随后被应用到了其他几个地区：从加利福尼亚的旧金山到圣迪亚哥的广大区域，从芝加哥

到底特律再到克利夫兰最后到匹兹堡的超级大都市，以及喧嚣的日本东京—大阪地区。

1993 年，日本管理专家大前研一（Kenichi Ohmae）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非常有影响力的文章，文中提出“全球自然经济区”，或者称为“地区国家”，已经取代了民族国家，成为他著名的提法“无边界世界”中的经济单元。[4]

> 地区国家有可能完全在民族国家之内，也有可能超越国界。这无所谓，这只是历史偶然形成的。它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不取决于它们在政治边界中的位置，而取决于它们的大小和规模是否真正是今天全球经济中的自然商业单元。在无边界的世界中，“地区国家”的边界及其与外界的联系才是最重要的。

并不是所有的大城市都能成功地按照超级城市的模式运作。例如加尔各答和德里都很大，但也很贫穷。正如大前研一所写：“或者是它们面对全球化的经济没有找到解决之道，再或者是它们没有相应的资源来实施他们的解决之道。”

大前研一的观点非常重要。人口和经济增长并不一致。这些超大型城市与超级区域有很大的不同，超级区域不仅人口众多，而且有广阔的市场，强大的经济实力，大量的创新活动和高技能人才。

只通过民族国家的数据来观察财富的增长是很误导人的，因为对于经济活动在哪儿发生而言，国界并不那么重要。资金总是流向回报最高的地方，人们总是涌入有机会的地方。确实，这使得全球经济更为一体化。但同时也意味着资金和人才将会集中在生产率和回报最高的地方。

国界对于文化认同不是特别重要。我们都知道，在同一个州或者省中的两个城市都会大不相同，更不用说在同一个国家中了。那些被束缚在“山谷”中的人不仅要忍受落后的经济，在文化上也变得与他们生活在超

级地区的邻居们不同。这些不断加重的痛苦和显著的经济差距，更拉大了世界上“拥有者（haves）”和“不拥有者（have-nots）”——城市中的“阅历丰富”的人和农村人之间的差距。

同一国界中的城市渐行渐远，而超级区域尽管在地理位置上相隔很远，却正在变得越来越接近。如果两个超级区域发展情况相似，不论它们的地理距离或者历史关系如何，它们都可能形成相似的社会道德准则、文化品位，甚至政治倾向。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纽约和伦敦（被一些人称为“纽伦”），甚至也发生在纽约和上海，尽管人们对此仍有争议。[5]

超级区域分布图

让我们来更深入地了解世界各国以及全球经济更现实的情况吧。

一些专家已经进一步用实证数据发展了戈特曼和大前研一的观点，用图表展示了全球超级区域的范围。2005 年，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城市研究院的罗伯特·兰和唐·德哈维尔（Dawn Dhavale）发现，10 个支撑着美国经济的超级区域中生活着差不多 2 亿美国人，占美国全国人口的 2/3 还多，并且这些区域内人口增长的速度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

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将美国经济的规模和增长速度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比如德国和日本，或者与新兴经济体相比，比如说印度和中国。国界仍然决定着我们如何衡量经济产出和生产效率以及如何统计人口、创新和增长速度。所有参与者，从国际组织和媒体机构到全球金融机构——都使用这些数据。

很幸运，蒂莫西·古尔登采用了更为聪明的解决办法。他使用夜间的世界卫星图（在本书最后一章中有描述）来证实超级区域就是那些灯光绵延不绝的地方。据此，他就能将大的经济活动区域与较小的经济中心区分开来。将这些灯光的数据与其他经济指标结合起来，并根据现有国家和地区的预计产出进行微调，他就可以计算出世界上每一个超级区域的经济

产出。[7] 古尔登喜欢把超级区域说成这样一种地方：你可以一直穿过它，从这一边走到那一边，只要带了钱，就根本用不着忍饥挨饿。

当我2007年秋天乘夜班飞机从南卡罗来纳州的哥伦比亚飞往多伦多时，我意识到了这些夜间世界图片的威力。当我们离开夏洛特—亚特兰大超级区域的中心——哥伦比亚的时候，至少看见45分钟灯火通明的景象。然后的一个小时，天是黑的，直到我们接近位于多伦多—布法罗—罗切斯特超级区域外围的布法罗时，灯光才从前方天边的云层中透出来。尽管我们飞行的时间是深夜，但看起来就像天已破晓。

从技术上讲，超级区域需要满足两个标准。首先，它必须是一个灯光绵延不绝的区域，这个区域要大于一个主要城市或者是大都市区域。其次，它的以灯光为基础的区域生产总值必须超过1千亿美元。根据这一定义，全球有40个超级区域（参见附录A）。下面有一些重要数据：

如果我们研究人口最多的超级区域：

- 最大的10个超级区域中生活着6.66亿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10%；
- 最大的20个超级区域中生活着11亿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17%；
- 最大的40个超级区域中生活着15亿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23%。

如果我们研究经济活动，这些数据将更加令人吃惊：

- 经济总量（或者是以灯光为基础的区域生产总值）最大的10个超级区域中生活着4.16亿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6.5%，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13.4万亿美元）的43%，拥有全世界57%的专利创新和53%被引述次数最多的科学家。
- 经济总量最大的20个超级区域的人口数占世界人口总数

的10%，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57%，拥有全世界76%的专利创新和76%被引述次数最多的科学家。

- 经济总量最大的40个超级区域的人口数占世界人口总数的18%，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66%，拥有全世界86%的专利创新和83%被引述次数最多的科学家。

现在让我们看看关于世界最重要超级区域的更为详尽的地图。

美国的超级区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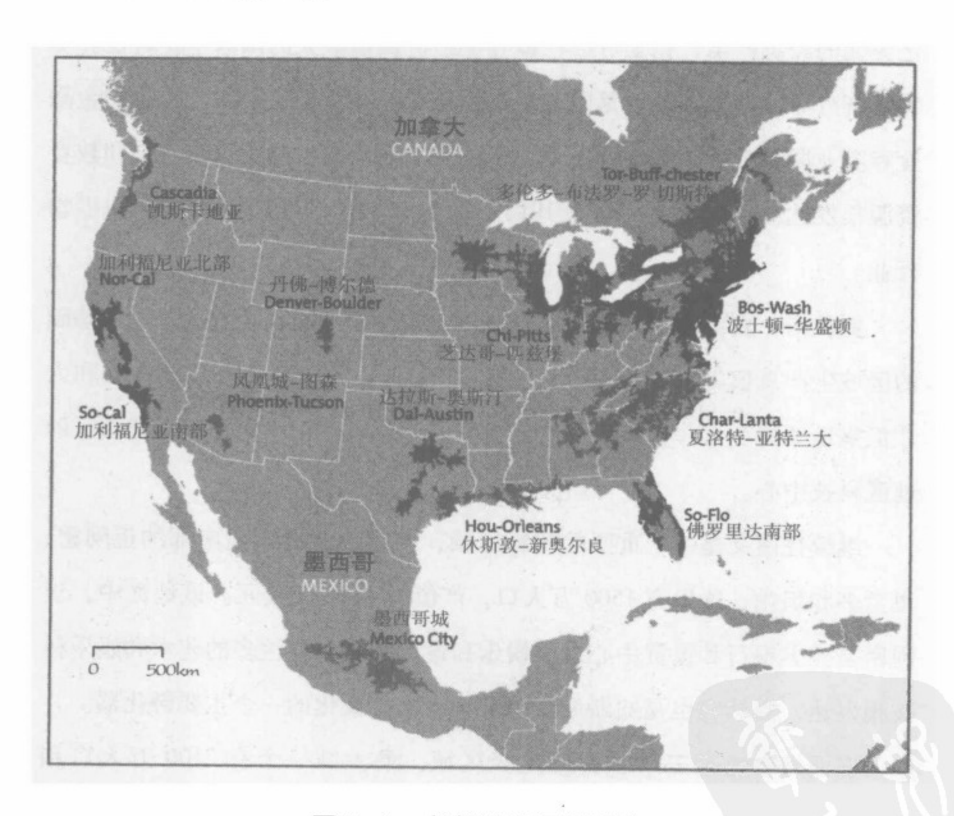


图3－1　北美洲的超级区域

制图：蒂莫西·古尔登和莱恩·莫里斯

图3－1展示了组成北美经济的各个超级区域，从它展现出的信息中

可以看出，认为美国经济是由50个州组成的观点是个多大的错误。在现实中，美国和北美经济的核心是由大概12个超级区域组成的，它们包括加拿大，某些时候也包括墨西哥，并且承担了墨西哥大部分的经济产出。

如图3－1所示，最大的超级区域集中在沿海。波士顿—华盛顿走廊沿着东海岸绵延800公里，从波士顿经纽约到华盛顿，这是世界上经济产出第二位的超级地区——只有大东京地区的经济规模更大。戈特曼在1957年首次提出波士顿—华盛顿走廊这一说法时，这儿有3200万人口。今天，这儿有5400万人口，超过美国人口总数的18%。这一区域2.2万亿美元的经济产出，完全可以在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中排首位。尽管经济分布比较分散，但是同时也非常专业化和富于竞争力。纽约的金融业和商业服务业非常突出，文化艺术也很发达。波士顿的生物科技和教育资源很发达。在华盛顿特区及其周边聚集着媒体、战略管理研究和生物行业。

更往南，夏洛特—亚特兰大超级区域总人口2200万，以灯光为基础的区域生产总值为7300亿美元。在这一超级地区内有地区总部中心和人才汇集地亚特兰大，金融中心夏洛特和位于北卡罗来纳州三角研究园区的地区科技中心。

继续往南又是一个重要的超级区域，包括佛罗里达州南部的迈阿密、奥兰多和坦帕，这里有1500万人口，产值为4300亿美元。该地区中，迈阿密是拉美银行和投资中心以及娱乐和设计中心，奥兰多的艺术和娱乐科技很发达，当然它也是迪斯尼所在地——流行文化的一个主要孵化器。

在西海岸也有三个主要的超级区域。最大的一个有2100万人口和7100亿美元的跨国界的以灯光为基础的区域生产总值，该地区从洛杉矶经圣迭戈直到墨西哥的蒂华纳。洛杉矶在电影、娱乐和流行文化方面的地位不可撼动，它也是一个主要港口，还是金融、银行和科技企业中心。圣迭戈有着世界级的信息科技、电信和生物科技。蒂华纳有世界上最大的制

造业中心，它在电视、电子和高科技产品制造方面最为发达。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组合，把前沿的创意和创新以及相对低廉的制造成本结合起来，这个地区几乎有着独一无二的优势。

第二个超级区域是环旧金山海湾区域，这儿生活着1300万人口，经济产出4700亿美元。这儿是领先的科技和风险投资中心，也聚集了大量的世界顶级高校，这些高校都有自己的优势：斯坦福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科学和工程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农业和酿酒专业均闻名于世。这一地区的娱乐科技业也很发达，这儿有著名的皮克斯公司（Pixar）、艺电公司（Electronic Arts）和工业光魔公司（Industrial Light & Magic）。当然，它的核心是硅谷，那里聚集了大量的科技创新厂商。

西海岸也包括凯斯卡地亚（Cascadia）超级区域，这一区域从俄勒冈州的梅德福和波特兰经过西雅图进入加拿大的温哥华，这儿生活着900万人口，以灯光为基础的区域生产总值为2600亿美元。它不仅仅是传统的航空制造业中心，也是全球软件和互联网行业中心，像微软、亚马逊和Real网络公司都在该区域，还有像星巴克、耐克、REI和好事多（Costco）等领先的生活和消费公司。另外两个超级区域，丹佛—博尔德和凤凰城—图森以灯光为基础的区域生产总值均为1400亿美元。

美国南部海岸也有自己的特点。巨大的能源生产带从休斯敦到新奥尔良，这儿生活着1000万人口，以灯光为基础的区域生产总值为3300亿美元。得克萨斯州有达拉斯、圣安东尼奥和奥斯汀等城市，居住着将近1000万人口，区域的生产总值是3700亿美元。根据达拉斯美国联邦储备银行2004年的一份报告，这几个超级区域可以合在一起形成巨大的"得克萨斯三角地带"。[8] 成功的折扣机票航空公司——西南航空就是通过在这些得克萨斯的城市之间运送旅客发家的。这份报告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将休斯敦的港口、达拉斯的内陆物流能力、圣安东尼奥对得克萨斯更南方的地方以及墨西哥北部的影响，甚至还有得州政治中心结合起来，这儿

将形成第三个沿海超级区域，这一区域可以和纽约、洛杉矶及芝加哥相抗衡。”

但是，那些所谓的被忽略的州也不必担心：在北美洲的腹地也分布着一些超级区域。从匹兹堡和克利夫兰经过底特律、芝加哥和明尼阿波利斯的芝加哥—匹兹堡超级区域面积有25万平方公里，居住着4600万人。该地区以灯光为基础的区域生产总值达到了1.6万亿美元，是世界上第三大超级区域。

在它附近还有另外一个跨越两国的超级区域。2002年我在一个讨论布法罗未来的会议上首次提出了这个超级区域。当被问及布法罗地区的经济前景和我对复兴该区域的建议时，我脱口说出了“多—布法—切斯特”来推动多伦多、布法罗和罗切斯特间的融合。现在由于有超级区域地图的帮助，我能看出这一超级区域扩展得更远——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滑铁卢和伦敦经过多伦多往东到渥太华、蒙特利尔和魁北克然后向下到达美国的锡拉丘兹、伊萨卡和尤蒂卡。考虑到新的地理分布情况，可能这个地区更好的名字是“多—布法—卢—蒙—太华。”不论怎么称呼这一地区，这个跨越两国的超级区域中生活着超过2200万人口，经济产出超过5300亿美元，是北美地区第5大和世界第12大超级区域。

多伦多是一个重要的经济中心，有非常好的大学，艺术、娱乐、设计和文化行业都非常发达；而且虽然会有争议，它也是世界上人口最为多样化的城市。与大多数的美国大城市不同，多伦多像伦敦一样有不错的中学，犯罪率低，社会治安很好。它的物价水平又不像伦敦、纽约、洛杉矶或者旧金山那样让人难以承受，这样就吸引了多样化的社会和经济阶层。离多伦多不远，安大略省的滑铁卢是一个重要的科技中心，Research In Motion公司——黑莓的生产商就坐落在此。蒙特利尔有索拉奇艺坊

(Cirque Du Soleil)①，它也是世界级的音乐圣地，推出了像拱廊之火(Arcade Fire)这样在21世纪初期最为成功的乐队。[9] 罗切斯特的居住人口尽管在减少，却仍然是光电研发密集型公司，如施乐、柯达和许多其他重要公司的所在地。

欧洲的超级区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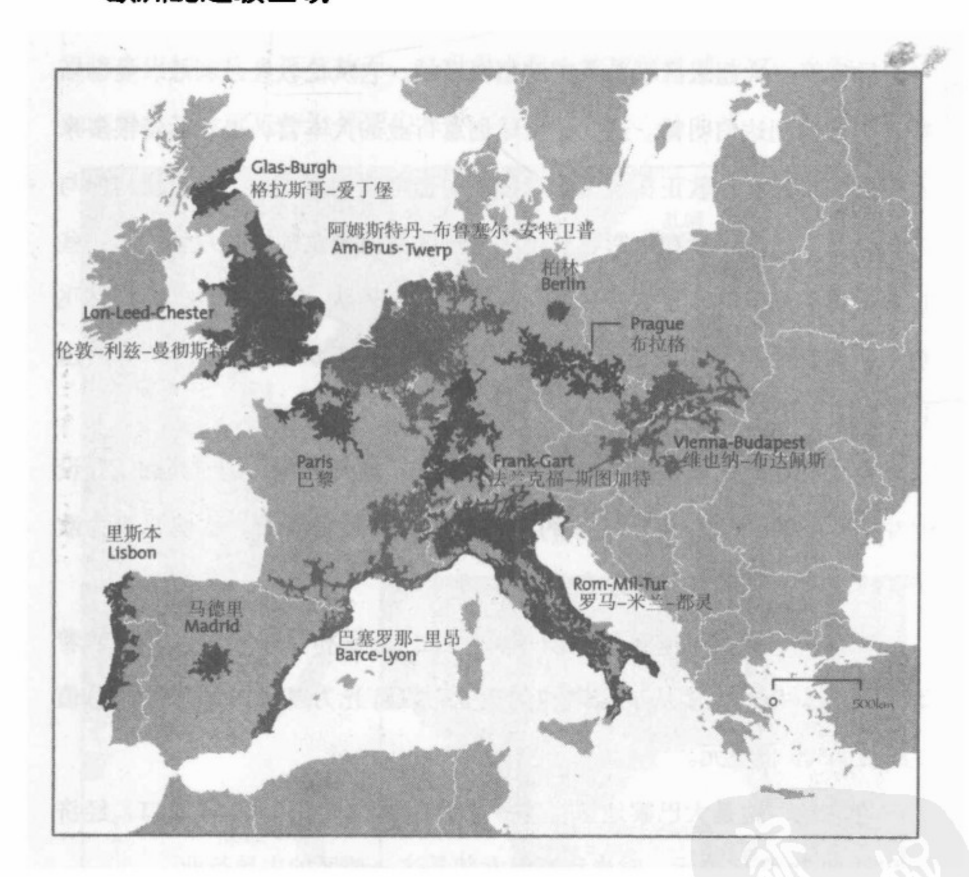


图3-2　欧洲的超级区域

制图：蒂莫西·古尔登和莱恩·莫里斯

① 索拉奇艺坊(Cirque Du Soleil)，是马戏艺术的革命者，它的叙事性及艺术表现是以往马戏节目的升华，颠覆了人们心中小丑、杂技和野兽传统马戏形象，而完全将马戏变成了一种文化。

就像美国的50个州一样，欧洲的国家也是由历史上的政治分界人为形成的。欧洲真正的经济体是由大约12个超级区域组成的，它们提供了欧洲大陆绝大多数的创新和产出（见图3－2）。

欧洲最大的超级区域是我称为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安特卫普的巨大经济区域。这儿生活着6000万人口，经济产出接近1.5万亿美元，是世界上第四大超级经济区域。

欧洲第二大超级区域是英国的超级区域，它从伦敦经过利兹、曼彻斯特、利物浦到达伯明翰。这儿是全球创意行业的大本营，也生活着很多来自美国的移民。伦敦正在成为全球领先的金融和创意中心，只有纽约能与之相匹敌。这一区域在电影、戏剧和音乐等文化创意领域非常领先，一些世界最棒的乐队就来自这一区域，包括甲壳虫乐队、滚石乐队、齐柏林飞艇乐队和性手枪乐队等。这一超级区域生活着5000万人口，经济产出1.2万亿美元，是世界上第六大区域经济体。

意大利超级区域从米兰经罗马到达都灵，这儿是领先的时尚和工业设计中心。4800万人口生产了大约1万亿美元的经济产出，这使它成为欧洲第三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七大经济体。

在德国，超级区域包括斯图加特、法兰克福和曼海姆，这儿生活着2300万人，他们大多从事金融和制造业，以灯光为基础的区域生产总值达到了6300亿美元。

在它的西边是大巴黎地区，这一超级区域生活着1500万人口，经济产出达到3800亿美元，时尚和高级女装是这一地区的主导行业。

跨国界的巴塞罗那—里昂超级区域生活着2500万人口，以灯光为基础的区域生产总值达到6100亿美元。欧洲北部的人们长期以来把这个区域当作度假地，来这一区域寻找工作机会的人也在增加。荷兰一位主管贸易的高级部长私下里偷偷告诉我，她很担心那些目前坐落在欧洲北部的公司会被这个天气好、景色美、人才多的超级区域夺走。

维也纳—布达佩斯、布拉格、里斯本、苏格兰的格拉斯哥—爱丁堡、马德里和柏林是另外几个欧洲超级区域。

超级猛虎

亚洲的经济也是由超级区域构成的（见图3－3）。日本有四个超级区域，其中两个在世界上来看也是最大的。大东京区域生活着5500万人口，经济产出接近2.5万亿美元，是世界上最大的超级区域，它的金融、设计和高科技行业都处于世界顶尖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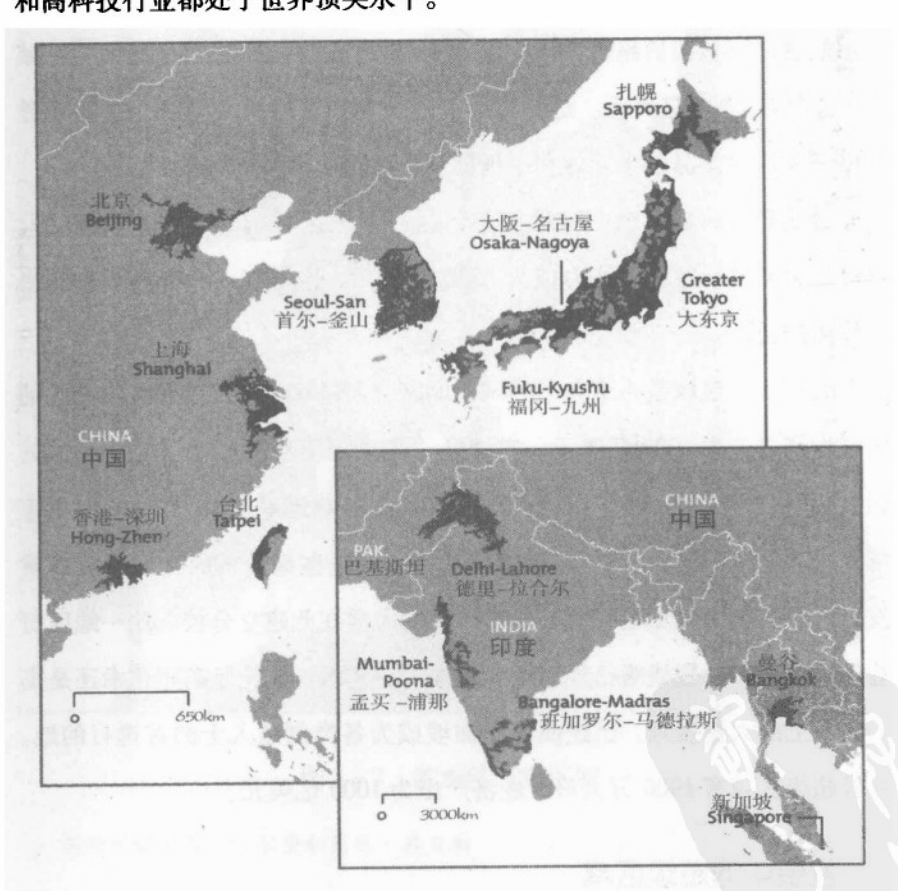


图3－3　亚洲的超级区域

制图：蒂莫西·古尔登和莱恩·莫里斯

日本第二大超级区域从大阪到长崎，生活着3600万人口，经济产出达到1.4万亿美元。它的强项包括高科技创新和制造——从汽车到领先的电子产品。福冈—九州超级区域中生活着1800万人口，以灯光为基础的区域生产总值为4300亿美元，大札幌地区生活着超过400万人口，以灯光为基础的区域生产总值为2000亿美元。日本各超级区域之间的界限正在日益模糊。日本的大部分地区可能正在形成世界上首个巨型超级区域——一个经济活动在地理上看是相互重叠的巨大的独立经济体，这里生活的人口超过1亿，以灯光为基础的区域生产总值超过4.5万亿美元。

从首尔到釜山的超级区域生活着4600万人口，以灯光为基础的区域生产总值为5000亿美元。这儿高新产业公司数目一直在增加，主要业务从电子和通信产品到半导体和平板显示器，无所不包。

台北是另一个超级区域的核心，这一超级区域的人口超过2000万，以灯光为基础的区域生产总值为1300亿美元。这里有一些世界领先的半导体生产企业。

大新加坡区域是一个典型的城市国家，人口600万，以灯光为基础的区域生产总值为1000亿美元。它已经“主动而明确地走出了民族国家的误区，”大前研一写道，“这样它才能不受影响地在全球经济中开拓市场。”它是全球重要的磁盘驱动器生产中心，一些细分的科技行业也非常发达，而且它也成功地吸引了西方的顶尖大学在此建立分校。这一地区打造创意中心的长期战略已经取得了回报：在艺术，无论是高雅艺术还是街头艺术上的大量投入，已经使得新加坡成为各类创意人士的首选目的地。曼谷超级区域有1900万人口，经济产出为1000亿美元。

发展中的超级区域

超级区域在所谓的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几年前，高盛公司的研究人员用“金砖四国”来称呼飞速发展的四个新

兴经济体——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10]但“金砖四国”以及墨西哥和马来西亚等其他一些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发展，从地理上而言，是很不相同的。

推动这些新兴经济体增长的是大型的超级区域。在某些情况下，这些超级区域飞速发展，而其他一些地方即使有增长也非常缓慢，因此大量农村人口涌入这些超级区域，这就造成这些区域内也形成了全球性的贫民窟。大多数的新兴经济超级区域都是严重的经济和地缘不平衡的根源，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区域的经济发展远比周边的农村区域要好，另一方面是因为区域内“拥有者”和“不拥有者”间巨大的经济差距。

比如，中国的经济取决于它东部沿海的三个超级区域。人口最多的区域是上海—南京—杭州三角区，这儿生活着超过6600万人口，以灯光为基础的区域生产总值达到1300亿美元。在它的北边，大北京区域生活着4300万人口，以灯光为基础的区域生产总值达到1100亿美元。在南边，香港—深圳走廊生活着4500万人口，以灯光为基础的区域生产总值达到2200亿美元。这三个超级区域加在一起的以灯光为基础的区域生产总值达到4600亿美元，占到了全国经济总量的43%。如果我们把中国所有的超级区域加在一起，他们以灯光为基础的区域生产总值达到7350亿美元，占全国经济产出的68%（以上均为2000年的数据）。

由于在新建大学上的大量投资、日益增长的全球研发能力和看似无穷无尽的人才资源，这三个超级区域将有可能从世界工厂迅速转型为新兴的创新中心。当然，这些超级区域能否具备世界中心所需的开放、宽容和独立还有待观察。

印度的经济也取决于它的超级区域。德里—拉合尔超级区域生活着1.2亿人口，以灯光为基础的区域生产总值达到1100亿美元。

印度还有两个人口众多的中心即将成为完全意义上的超级区域。在北面，6200万人口居住在从孟买到浦那的超级区域，以灯光为基础的区域

生产总值达到600亿美元。这一区域有全球最大的单一电影制片商宝莱坞，每年发布900多部电影。从班加罗尔经过马德拉斯的科技走廊生活着7200万人口，以灯光为基础的区域生产总值达到500亿美元。这两个区域都在爆炸性地增长，每年增长10%甚至更多。由于我们的预测从2000年开始，很有可能现在这两个区域都已经跨过了1000亿美元的门槛，成为完全意义上的超级区域。拥有宝莱坞的电影产业和班加罗尔的科技，印度已经不只是一个低成本的离岸制造中心。印度理工学院是世界知名的工程科技学院；印度的时装和产品设计师也正在异军突起；在伦敦、多伦多和纽约的音乐剧目中，满是印度旁遮普舞曲的节奏。很少有人知道，印度的视频游戏产业计划在2010年之前翻十番，它的动画产业规模也将达到现在的三倍。

超级区域在其他的新兴经济体中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拉美，大墨西哥城区域生活着4500万人口，以灯光为基础的区域生产总值达到2900亿美元，超过墨西哥经济总值的一半。

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圣保罗超级区域的经济产出是2300亿美元，超过该国总值的40%，该区域生活着4300万人口。

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区域生活着1400万人口，以灯光为基础的区域生产总值达到1500亿美元，超过该国经济总值的一半。

在中东，从特拉维夫到安曼、大马士革和贝鲁特的巨大超级区域生活着超过3000万人口，以灯光为基础的区域生产总值达到1600亿美元。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许多新兴经济体的超级区域中生活着众多人口，经济活动频繁，但同时也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和社会不平等。在某些情况下，这些超级区域中甚至有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生活赤贫，住在世界上环境最恶劣的贫民窟和棚户区中。

本书的最后两章提供了关于“世界不是平的，而是起伏不平的”的实证研究和图表证据。世界是由超级区域推动的，而超级区域是由数个城

市和郊区组成的大都市圈，有时超级区域会超出国界，形成贸易、交通、创新和人才的巨型汇集地。

至此，我已经展示了世界到底处于什么状态，但还没有作出解释。世界经济活动和经济增长日益集中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在全球经济中，地点仍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什么经济活动没有因为全球化贸易和让世界变小的科技成果的普及而日趋分散？尽管出现了上述的推动力，为什么城市和区域仍然在地缘上紧密相连？为什么经济活动面临如此多的不利于它们聚集的因素，但却依然继续聚集？



4 越聚越大的 Superstar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在 1988 年写道："如果我们只考虑普通的经济因素，城市应该越离越远。"[1] 不管怎样，卢卡斯提醒了我们，土地"在城外总是比在城里要便宜"。那么为什么大多数企业和居民没有离开城市去成本明显低很多的地方呢？卢卡斯用另一个同样简单的观察回答了这个问题："如果不是为了和其他人在一起，为什么要支付曼哈顿或者芝加哥闹市的高昂房租呢?"

卢卡斯的这句话强调了地点的重要性，而且深入到了对经济增长动力的探究。他确定了经济增长的动力——人口的聚集、生产率的提高、创意技能和人才的汇集。

这就是为什么城市和超级区域是推动世界前进的真正经济单元。这些组成了人口集中、人才汇聚的地缘生产系统和市场。卢卡斯认为，这些地方有其他地方所不具备的社会经济优势，它们在创新和生产率方面的收益将远远超过生活和商业活动的成本。

经济增长研究是一个很深奥的领域，直到最近，它仍然没有对地点的重要性有足够的重视。1776 年，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他提出经济繁荣的主要原因是不断细化的劳动分工，也就是专业化。他用经典的徽章工厂的例子论证了如果 10 个工人各自专注于他们的某一道工序的工作，将生产比 10 个工人独立工作多得多的徽章。斯密认识到企业需要通过专业化来更为有效地运作。[2]

25 年后，大卫·李嘉图开始创立自己的经济财富理论。在 1823 年他英年早逝之前，李嘉图简要地提出了比较成本的理念，解决了国家如何从贸易中获益这一基本的经济学难题，而这一难题一直困扰着斯密直至他去世。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在资源和生产能力方面比另一国有优势，那么这两国都将从贸易中获益。举个简单的例子：让我们假定 A 国专长于生产布料，B 国专长于生产纽扣。为了相对容易地（低成本地）生产衬衣，这两个国家应该进行贸易。但如果 A 国拥有绝对优势，既能生产布料又能生产纽扣，而 B 国只能生产纽扣怎么办？李嘉图认为这种情况下贸易仍然是合理的，因为 A 国如果集中人力物力去生产 B 国不能生产的商品，情况会更好。A 国集中生产布料获得的利润比它分散一部分人力物力去生产纽扣的利润更多，它可以通过贸易从 B 国获得纽扣。[3]

和斯密一样，李嘉图也认为民族国家是基础的经济单元。但到了 19 世纪晚期，早期的地域理论家们开始对于为什么制造业集中在诸如曼彻斯特和匹兹堡等制造业中心提出新的观点。再晚一些，伟大的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提出了解释为什么公司和行业会聚集在一起的基本理论：获得聚集在一起的经济利益（欲了解关于这一题目的更多讨论请参阅第 7 章）。

尽管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对于城市和聚集的本质有了新的洞见，但他们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仍然围绕公司和民族国家展开。对于大多数的经济学家而言，城市经济增长并无重大影响——它们只是为国家的经济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当讨论究竟是什么因素使经济规模增长这一问题时，经济学家仍然会忽略地点的重要性。

直到 20 世纪中叶，流行的理论认为更多的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将产生更大的经济产出。也就是说，工厂规模越大，机械工具越多，赚钱就越多。

在大萧条和二战后，这些都改变了。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商业领袖和政策制定者认同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理论：决定经济增长的是创新和企业家，而非规模经济和专业化分工。这也导致了他称

之为“创新型破坏”的浪潮，它破坏了既有体系并催生了新的公司和行业。[4] 他指出改进很重要，但不能低估创造全新事物的价值。在他的晚年，熊彼特对日益严重的官僚作风发出哀叹，因为他认为官僚作风影响到了公司的研究和实验室的发展，而且将会把发明的渴望和企业家排挤出局，而这两者对于资本主义的企业家精神至关重要。[5]

1957年，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发展了熊彼特的理论。他采用经济计量学工具，严格测算了科技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6] 索洛通过他的模型计算出，美国人均经济增长的4/5左右应归功于科技进步，科技进步使得人力和资本的使用更为有效。根据索洛的模型框架，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长期拥有科技优势，但某些地方可以拥有短期优势。索洛还在论文中说明科技的成果能够自由流动。

新的增长理论是由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Romer）在1980年到1990年间提出来的，新理论对索洛的观点做出了重大调整。发生在“体系外”的创新并不会带来额外的经济增长，财富是由对现有资源自身进行创新而产生的。[7] 技术知识不是在系统外产生然后应用到系统上的，而新理论和知识是从内部产生的，这些新理论和知识催生的新技术和新信息是经济增长的源泉。用罗默的话来说：

> 当人们用更为有效的方式重新安排资源时，经济就会增长。经济产出可以用做菜来打比方，为了创造有价值的最终产品，我们根据菜谱将便宜的配料混在一起，人们只能根据配料来做菜。大多数经济中的“做菜”都会产生一些副作用。如果经济增长只是通过做越来越多相同的菜来实现的，那么最终我们会缺乏原材料并且要承受污染和灾害。然而，历史教育我们，经济增长是通过更好的菜谱，而不仅仅是更多同样的菜来实现的。对于每一种原料来说，新的菜谱通常会有较少的副作用并有更高的经济价值。

这些当然是非常重要的理念，但是新的增长理论仍旧没有考虑地点的重要性，它也认为知识能自由在各地之间流动。理论上，经济增长是一个与地点无关的抽象过程。

“芝加哥租金”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卢卡斯把对城市和地点的应有评价带回到经济学中。为此，他先回顾了简·雅各布斯的早期作品。他意识到他以及整个增长经济学[①]领域都对雅各布斯认识不够，他因此预言雅各布斯的真知灼见将最终成为以后增长经济学研究的焦点：“我将紧紧追随简·雅各布斯的开创性研究，对我而言，她的杰作《城市经济》对人力资本的外溢效应进行了研究，令人信服。”他随后在他的一份流传很广的电子邮件中补充道，尽管雅各布斯不是经过正规训练的经济学家，也不是科班毕业，但这些真知灼见是如此重要以至她应当获得诺贝尔奖。

在雅各布斯理论的基础之上，卢卡斯宣称，人才聚集引起的乘数效应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决定因素。他也同意劳动力、资金和技术知识都很重要，但是如果人们不能真正聚在一起发挥他们的才智、创意和能力，光凭这些因素并不能取得重要的成果。

当人们，特别是有才华和充满创意的人们聚在一起时，新的想法能更加自由地流动，因此个人和团队的智慧都将呈指数增长，最终的结果将远远超过各个部分的总和。聚集在一起使我们的生产效率提高，创意和经济财富也相应增长，我们生活的地方更是如此。简言之，这就是聚集效应。聚集效应的一个后果就是将不同的区域进行经济分层。本书第 6 章和第 7 章将说明，随着有才华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们聚集在某些区域，工作的地点变得更加集中和专业化，因此这些地方的生活成本将会上升，形成那种

① 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研究发达国家再生产和长期经济发展理论。

"芝加哥租金"，这也是卢卡斯提出的。最后，社区和居民将会根据经济水平排出次序。

卢卡斯指出了我认为是雅各布斯在此领域最为根本性的贡献——人才聚集的核心作用以及他们的创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际上，雅各布斯自己也这么看。2001 年，当被问及她希望因为什么而被人缅怀时，她回应道：

> 如果我能被人们作为本世纪一个重要的思想家而记住，我所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回答了"什么使得经济扩张？"这是一个经常让人们感到疑惑的问题，我想我已经找到了答案。扩张和发展是不同的，发展是改变——与现存的东西相比发生变化。实际上每一种新生事物都是前一事物的变化，从新鞋底到新法律——所有的东西都在变化。而扩张实际上是尺寸和数量上的增长。两者是不同的。[8]

雅各布斯谈到的扩张指的是经济增长中更为普通的方面。扩张只意味着经济产出在数量上的增长，例如增加一条组装线。这样理解的话，城市只是小镇的加大版本，超级区域只是城市的加大版本。

但还有第二种更具有爆炸性的经济增长。对于雅各布斯或者是熊彼特而言，这种经济发展引起了创新，它不仅仅增加了产出而且还拥有创新能力。不是专业分工推动了经济增长，其实是各种资源汇聚而产生的创新推动了经济增长。雅各布斯认为多样性最有可能出现在特定的地点。在《城市经济》中，她指出：

> 多样性，不论是何种多样性，都是由这样的一些城市产生的，这些城市中有许多人聚居，他们有不同的品味、能力、需求、进取心和对某些事物的痴迷。

当公司开始专业分工，一些地方会因此成为各种各样的才智和特长的汇集地，这种广泛的多样性对于创新至关重要。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城市不仅仅在规模上变得更大，它们也更加多样化，差异化。这样，城市而非公司成为创新的源泉，产生新的工作机会和新的行业。雅各布斯认为城市是一个复杂的、自我构建的系统，它的形式不能预先决定也不受外界控制，它的多样性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9]

加速，加速

雅各布斯的理论描述了地点如何影响生产效率和创新。但是该如何应对那些伴随城市经济增长的不可避免的负面因素呢？交通拥堵、犯罪率上升、高昂的房价，都是城市生活必然的副产品，它们很有可能成为城市未来发展的严重阻碍。

看起来这种“不经济”会毁掉城市。然而研究结果出乎意料地恰恰相反。根据由美国圣塔菲研究院（Santa Fe Institute）① 的杰弗里·韦斯特（Geoffrey West）领衔的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团队的研究结果表明，大城市和超级区域拥有一种基本机制能够超越这些制约条件。[10]

任何一个科学家都可以告诉你生物有机体的新陈代谢速度，即生物将食物转化为能量的速度，它随着生物体的生长而变得缓慢。圣塔菲研究团队推测，尽管城市和超级区域不是生物体，但也有可能出现像生物体一样的情况。是否随着人口的增长，城市的“新陈代谢”会加快，因此它们的生产率和创新也会变化？为了验证这个想法，研究人员收集了美国、欧洲和中国在不同时期的数据，并且观测了大量不同的指标，例如犯罪率、疾病传播、人口、基础设施和能源消耗、经济活动和创新。他们很确定地

① 位于美国新墨西哥的圣塔菲研究院（Santa Fe Institute）是复杂科学研究的前沿阵地。这里汇集了一批不同领域的科学家，他们通过对不同学科之间的深入探讨，试图找出各种不同系统之间的一些共性。

得出了以下结论：

> 社会组织就像有机体一样，它们消耗能源和资源，依赖信息和原材料流通网络，制造产品并产生垃圾……城市的发展呈幂数变动，类似于在有机体上观察到的规模经济关系。人口增长一倍时，资源的消耗少于一倍。

或许这是预料之中的，但是出乎研究人员意料而且与生物体几乎没有相似之处的是，像创新、专利、超级创意人员的人数、工资和 GDP 等指标相对于人口变动的级数大于 1。换句话说，人口增长一倍会导致创意和经济产出超过一倍。不像生物有机体，生物有机体的新陈代谢速度会因机体变大而变得缓慢，但是城市却由于变得越来越大反而更加富裕和更具创意。研究人员将这种现象称作“超线性”变化：“毫无疑问，城市人口越多，人均创新和财富就越多。”这种加速增长本身就是聚集效应的产物，它是人才聚集引起的生产率提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它们将会变多大？

由于像卢卡斯和雅各布斯这样的思想家的贡献，还有圣塔菲研究院研究人员和其他人的努力，我们现在能够理解城市和区域是怎样刺激创新和推动经济增长的。我们已经知道人才和劳动力的集中能促进生产率和创意的增长，而且我们看到城市的发展受到了内部因素的刺激。我们也知道世界是由许多不同规模的城市和超级区域组成，大规模的如东京、纽约和伦敦，快速发展的如上海和班加罗尔，高度创新的如硅谷，另外还有中小型的和正在衰落的城市和超级区域。这样广大的一个城市系统是如何形成和演变的呢？

为了了解这一点，我与乔治梅森大学的罗伯特·阿克斯特尔（Robert Axtell）合作，他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计算机建模专家，他的研究无所不

包，从社会如何演进到公司如何形成再到经济如何增长。[11]我们一起潜心设计了一个能够刺激城市和区域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模型。我们希望模型能够找出城市最初是怎样兴起的，为什么一些城市增长而另外一些消亡，以及它们最终怎样演变成一个全球系统。

我们采用三个基本假设来建立模型：

1. 人们可以选择怎样工作。人与人是不同的，有一些人努力工作，有一些人并不努力。不同的人喜欢以不同的方式打发时间。不是所有人都想要学习同样的技能或者以相同的强度工作。

2. 我们设定工作最努力，最有能力的人聚集在一起，至少最开始如此。这些人聚集的公司最有可能迅速发展，而其他一些雇用了不是那么有生产力的人员的公司就会落后，最终倒闭。

3. 我们假设有效率的公司将向同样有效率的地点聚集，而低效率的地点将衰落。

模型中经济增长遵循“优势依附”的原则，有技能和高效率的人才会吸引同样的人才聚集在一起。当他们组织起来形成公司，便开始形成新的想法和产品。当这些公司不断成长，它们会吸引其他努力工作的人才和高效率的机构。

这是一个模拟真实世界的动态模型。努力工作、富于冒险精神和有创意想法的人们聚集到一起，建立新公司，这些公司会迁往特定的地点。其中一些地点，只要能保持对人才的吸引力，就会加速繁荣。其他地点的居民如果决定迁往他处，这些地点将会逐渐衰亡。在早期的公司创立阶段，高技能的人才加入中小企业将会激起第一波增长浪潮。随后，这些公司所在的城市会吸引更多有相同想法的人们和企业，最后这些城市形成了区域。这些区域吸引更多不同领域的人们聚集到原有的人群周围。随着新公司不断成立和旧公司不断消失，新人不断被吸收到这个圈子中，带动城市扩张和增长。

之后，有趣的事情发生了。这些城市区域不仅仅保持增长，它们同时也向外扩张，直至与其他城市区域连接起来。通过这个成核的过程，这些城市区域形成了超级区域。最大的那些超级区域保持的时间最长，而小一些的超级区域或者是单独的大城市，会更快地兴盛或衰退。但没有任何一个城市或区域能够永远保持强盛，最大的超级区域也会在某一时刻衰落。

结果证明这一模型是对我们当今世界近乎完美的模拟。创意人士和他们的公司紧密地聚集在一起，形成城市区域的最高一层。这一现象显著地体现了乔治·齐普夫（George Zipf）提出的著名“幂律”①。在模型的中间部分是单个的城市和区域，它们相互竞争希望成为更具影响力的地点。在顶端，情况则相对比较稳定。这不仅仅是地点的等级安排，更是生产率、更新速度、更加高速生产和更加昂贵的等级安排。能够生活在这些地方的人们需要在更加专业化的公司中更加高效地工作。同时，这些地方留给努力打拼的艺术家甚至普通人的空间越来越小。聚集效应引起的地点分类最终也将引起人员的重新分类。

我们的模型也预测了世界将逐渐由超大型的超级区域统治。到 2025 年，我们的世界将比今天更加集中在超级区域周围，到那时，科幻小说中描绘的生活着几亿人口的超级区域可能真的会出现。这听起来很牵强，但你试着这样想：就在 200 年前，最大的城市只有不到 10 万人口，在那个时候，100 万人口是不可想象的。到 1900 年，纽约的人口已经有大约 350 万了。没过多长时间，仅仅 50 年之后，像纽约和伦敦这样的大都市的人口只比 1000 万少一点点。今天，已经有超级区域的人口达到了 2500 万、5000 万、1 亿甚至更多。

根据这种增长方式，我不认为几亿人口的超级区域是不可能的。阿克

---

① 幂律（power-law），幂律分布表现为一条斜率为幂指数的负数的直线，这一线性关系是判断给定的实例中随机变量是否满足幂律的依据。1932 年，哈佛大学的语言学专家乔治·齐普夫（George Zipf）在研究英文单词出现的频率时发现了这一分布关系。

斯特尔完全遵循幂律分布来计算世界上的超级区域会变成什么样子，最小的会有 1000 万人口，最大的超级区域将有 4 亿人口。什么样的地方能够容纳这么多人?

我们的模型表明，现有的超级区域在发展的过程中很少会只在原有基础上发展，建更多更高的建筑，增加更多的人。超级区域会往外扩张，两个超级区域的联系会越来越密切，最终形成超大型的超级区域。照亮整个日本的灯光已经表明一个从东京北部直到福冈的超大型超级区域有可能形成。在可见的将来，超级区域将是世界经济的组织单元，它们将引导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

当然，超大型的超级区域也会带来新的挑战与矛盾。随着创新和人们迁移的速度加快，可以预见更多的重要职能将越来越集中在世界领先的超级区域中。领先的超级区域和落后的城市与地区之间的经济社会差距会越来越大。超级区域会变得越来越拥挤和富有，造成更严重的经济社会隔离现象。超级区域将非常需要交通运输和环境等级的重大进步。对于领先的超级区域，维持创新速度将是它们面临的首要挑战。正如韦斯特和他的同事们所警告的，没有创新，它们“将停止增长，甚至收缩，导致经济停滞甚至崩溃”。

处于世界经济第二层或者是第三层的区域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其中一些会更加繁荣，而更多的地区将要在全球无情的竞争的重压之下挣扎。全球的城市和地区将会经历全球钢铁、汽车和电子产品等行业的联合重组，之后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少数几家更大、更高效的竞争对手。

世界未来的经济将由更少数的超级区域和更专业化的中心确定，而更多的地方将发现它们面临的形势更加恶化，它们必须拼命争取不被踢出局。



第二部分

流动的财富

WHO'S YOUR CITY?



5　四海为家与故土难离

自马克思以来，阶级已经成为所有社会的决定因素。高薪人士与普通工人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占世界1% 的最富裕人口所占经济产出的比重越来越多，对于此类问题的研究已经有很多了。[1]

但还有一个观察经济财富差距日益扩大的角度很少有人触及，那就是地点的重要性。

我从地理范畴来考虑社会经济中的阶级，把它们简单地分成两种，四海为家者和扎根故土者。四海为家者愿意而且有能力和资源，去寻找并迁移到最能发挥他们才智的地方。他们并不是生来就喜欢漂泊，他们也不是生来就富有。四海为家的人们明白，对经济机会的追求使他们必须四海为家。

出生在匈牙利的投资大师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曾经说过，如果呆在家乡他很可能一事无成，因为他的家乡缺少能让他施展才华的舞台。他移居美国以后，他的过去就是历史了。

今天，大约有2亿人口——全世界每35个人中就有1个人——生活在出生国之外的地方。而且第一代和第二代国际移民的后代越来越多。已故的《纽约时报》作家赫伯特·马斯卡姆（Herbert Muschamp）将这些数量日益增长的四海为家的人称作“全球游牧民”。[2] 不论怎样称呼，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一些城市区域中，在国外出生的人已经占到40%。我的课堂就是这个高度流动社会的一个完美缩影：我的学生来自欧洲、日本、中国、印度、南美和非洲——当然还有加拿大和美国本土。

扎根故土的人数更多。有一些人当然运气很好，一直生活在经济繁荣、机遇很多的地方。但也有许多人实际上被困在了资源有限，经济落后，机会越来越少的地方。当然，有人生来贫困，没有办法离开故土。

但并不是所有故土难离的人们都是因为经济环境，有些有能力的人也植根故土。他们对于生活很满足，即使他们知道在其他地方或许能够过得更好。这不是坏事，研究表明：靠近家庭和朋友们，而且经常拜访他们能提高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我应该留下来还是离开？

当社会学家讨论流动性的时候，他们通常是指社会经济学意义上的流动性，即人们是否能很容易地在社会经济地位的层级中流动。但我的研究和个人经验使我相信，社会经济学上的流动性和地理意义上的流动性相互联系，并不互相排斥。

2007 年谢菲尔德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地点在我们的社会地位、健康状况、教育选择和经济意义上的流动性上发挥着重大的作用。研究表明，出生在相对劣势地区的人们往往在随后生活的各个阶段都会带着这种早期的劣势。该项研究的负责人之一贝森·托马斯（Bethan Thomas）说："在你生活中的每一步，你的机会都会受到限制，当然这不是决定性因素，确实有很多来自欠发达地区的人们完成了生命中的跳跃，这种麻烦在最具优势地区的人们是不会碰到的，但这种例子往往是特例。"研究人员发现，高于和低于平均水平的区域数量很像一条钟形曲线①（贫穷和富裕区域在曲线两端，而大多数区域分布在两者中间）。今天我们的地理位置可以分为明确的两类，一类是不发达的，一类是发达的。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们总结说，这种阶级的地理分布更为清楚地反映了"你的居住地能够决定你从摇篮到坟墓这一生的机会。"[3] 今天，居住地与种族、教育、职业和收入一样，成为划分"拥有者"和"不拥有者"的界线。在过去，一个人的地位主要是由他们出生在何处决定的。在今天这个高度流动和相

① 也称做正态分布曲线。

互联系的社会中，一个人一生的机会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他们迁移和重新定居的能力的影响。

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已经开始关注四海为家和植根故土这两类人了。流动性高的这一类人往往受过很好的教育，职业要求他们经常迁移。其中也包括年轻人，因为他们可能是这些四海为家的人的家人或者好朋友，他们将从迁移中得到更大的收获。

尽管如此，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很少想到迁移。谁能有时间和能力去评价每一个候选地点的优劣呢？只有到了紧要关头，大多数人，借用耐克的一句话，“做就是了（Just Do It）”。有些因素最终会起决定性的作用，比如在另外一个城市有一个很重要的人、更好的家、更有吸引力的工作和将过去一笔勾销重新开始的希望，我们告诉自己远方可能风景更好，这样我们就会很快作出决定。我不是信口开河，心理学家和行为经济学家对此进行过研究，发现确实如此。我们大多数人都过高地估计了迁移的好处，一头猛扎进去。

在一档很流行的电视节目《超级制片人》（*30 Rock*）[1] 中有一集很有意思，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女主角利兹完全融入了纽约的生活，但是她来自克利夫兰的新男友拒绝了到纽约工作的晋升机会，而准备在当地的律师事务所找一份工作。于是利兹决定去克利夫兰看看。他们住在闹市区，沿着克利夫兰河边的休闲娱乐区散步，参观了克利夫兰摇滚名人纪念堂。人们很友好，跟他们打招呼，问长得很普通的利兹是不是模特。吃晚饭的时候，当地一家电视台的执行官问利兹是否愿意主持一档早间的烹饪节目。邻居们都很友善，房价也适中。他们回到纽约之后，满脑子想的都是克利夫兰的生活会有多美好。他们关于克利夫兰生动的记忆和他们回到位于大

---

① 30 Rock 是洛克菲勒中心的简称，该片中文也译作《我为喜剧狂》。

苹果。①的家所经历的各种不愉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全副武装的警察守在地铁的入口；人们在路上推推搡搡；一个陌生男人对着利兹吐唾沫。她的男朋友接受了克利夫兰那家律师事务所的工作，他觉得很兴奋并要求利兹也去克利夫兰。经过长时间焦躁不安的考虑，分析这一行动对她的职业和社会生活的意义，利兹觉得放弃纽约提供给她的充满前景的工作和其他一切将是愚蠢的决定，不论是好是坏。

我不能判断利兹做得对不对。对于利兹的男朋友来说，这个选择看起来相对容易。为什么不放弃一份已经没有前途的工作和高额的房租来换取薪水更高的职位和更低的房租呢？

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移民都不是主动的，他们为了躲避战乱，逃脱政治和宗教迫害，或者寻找工作机会。甚至直到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大多数人——白领和蓝领们——迁移的目的都是为了工作机会。实际上人们没有太多选择，蓝领工作都集中在资源型城市和交通枢纽。对于白领而言，他们是公司的人，上级要求他们去哪，他们就得去哪。在上世纪70年代，IBM的员工开玩笑说，公司名字的意思就是"我已经换地方了（I've Been Moved）"。这个笑话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真实的情况，而且不仅仅适用于这个电脑巨人，也适用于其他公司。

今天，更多的迁移是主动的选择，在发达国家中只有少数人被工作束缚。根据美国普查局的迁移人数和迁移原因数据，只有少部分人选择"新工作和工作变动"作为他们迁移的主要原因。[4]

今天美国人迁移的主要原因是住房。根据统计，超过半数（51.6%）的人是因为这一原因迁移的。他们是希望拥有自己住房的租户，希望改善居住条件的年轻夫妇，还有希望换一处小一些的房子的退休老人。另外，有超过1/4（26.3%）的人说他们因为家庭原因而迁移——结婚、离婚、

① 指纽约。

生孩子、家庭团聚、丧偶等诸如此类的原因。

工作是排在第三位的迁移原因。少于1/6的美国人说他们迁移的主要原因是与工作有关的。毫无疑问，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最有可能因为工作原因迁移。但即使是那些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们也只有1/4是因为工作原因迁移。

尽管如此，因为工作而迁移的观念仍然植根于人们的脑海，尽管这与事实相悖。自从我开始对人们怎样选择居住地感兴趣以后，我常常问我的学生毕业后打算去哪。

"我会去工作最好的地方"，这是通常的回答。

"好的，"我接着问，"你会去北达科他州的法戈么?"

"很可能不会。"

"那么路易斯安那州的拉斐特呢?"

"也不会。"

这样的对话持续下去，我问他们："那么你到底想去哪?"

"好吧，"他们都会回答，"我希望去芝加哥、波士顿、西雅图、可能还有奥斯汀、纽约、亚特兰大或者是华盛顿特区。"

"为什么?"

"那儿机会很多，"他们说，"有很多的机会，生活在那儿很棒，我有很多朋友也在那。"

这一通常的模式表明三件重要的事情。首先，人们倾向于在特定的地方寻找工作机会。第二，朋友们居住的地方确实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第三，可能是最明显的一点，人们并不仅仅是为了工作而去别的地方。

多项研究证实了这一趋势。2002年，下一代咨询公司（Next Generation Consulting）的一项调查发现，3/4的高校毕业生先选择居住地，然后再在那个地方选择工作。2006年6月扬基洛维奇研究公司（Yankelovich）为城市CEO组织（Group CEOs for Cities）做的一项调查表明，接近2/3

（64%）的25～34岁的年轻人都采用前面提到的选择方式。[5]

人们迁移的原因多种多样，那么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选择不动呢？

对于很多人来说，经济环境起了重要作用：这看起来并不是主动选择的结果。许多选择原地不动的人们受的教育不高，也没多少钱，事业上没有太多的抱负和个人期望。

我个人的家族历史就反映了四海为家和原地不动的矛盾。我的祖父母来自意大利南部的坎帕尼亚区，在20世纪早期移民到了美国。他们一句英文也不懂，从意大利南部来到纽约——当时最大、最具有活力的城市，行程接近8000公里。通过整整一代人的努力，他们从埃利斯岛移居到纽约的小意大利，再到纽瓦克，在工厂中做一些简单的活计来养家糊口。他们的经济地位上升了，从农民阶级变成了城市的工人阶级，也为他们的子孙创造了更大的经济流动性和向上发展的空间。

但是在纽瓦克定居之后，我的家庭开始原地不动了。我的几十个叔叔和姑姑中只有一个搬到了离纽瓦克30公里远的地方。这样我的母亲和她的姐妹兄弟还有他们的孩子每个星期天就可以聚在我祖母家里一起吃晚餐了。

幸运的是，我的父母一直强调高等教育的重要性。对于他们来说，高校的学位就意味着无论身在何处都可以立足，是通向更好生活的道路。可惜他们偏爱离家近的学校，这样我可以住在家里，坐车上学。但我非常希望去远一些的学校。确实是这样，我渴望离开家自由自在地生活，随心所欲，可以在外面呆得很晚，和我的朋友们一起开心而没有父母和亲戚们时时关注我。同时，我的本能也告诉我，离开我的那些工人阶级的朋友、我的玩伴们对我有更多的好处。我的许多朋友毒瘾已经很深了，还不时地做一些轻微违法的事情。几乎没有人希望上大学，更不要说追求职业生涯了。我知道在某种程度上，上大学不仅仅能让我实现梦想，更是我的出路所在。

我拿到了花园之州项目奖学金（Garden State Scholarship）上了大学。奖学金不仅包括我的学费，还能支付我的生活住宿费用，这样我说服了我的父母让我去念离家 50 公里的拉特格斯学院（Rugters College）。实际上拉特格斯学院离我家很近，但是我的家人们都觉得我好像要去另外一个世界。他们每次探望我时开来的雪佛兰羚羊汽车里都装满了食物、啤酒和其他的生活必需品，就像朝圣一样，似乎我确实是去了另外的世界。

上大学只是许多事情的第一步，每次我生活中出现新的事件时，我的父母总觉得我又开始了一段新的旅程。甚至当我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时，我只要坐上火车就能回家，可在那五六年的时间中，他们两次长途跋涉到大苹果（纽约）来看我。现在他们已经去世了，他们可能只去过三个州，却没有一次是乘飞机或者是体面地旅行。旅行很费钱，旅行就意味着要把钱从其他更要紧的东西上抽走，同时也意味着离开家庭和家人，而家是我的父母希望呆着的地方。

我的父母可能很快乐，他们难离故土，而我则四海为家。通过努力工作，他们在纽瓦克购买了一套小房子，这样他们的经济地位就从工人阶级上升到中产阶级的中低层。如果不是因为我在地理上的迁移，我不可能去研究生院，最后成为教授和作家。尽管没有听过经济学的课程，我的父母非常明白留在原地和四海为家各自的利与弊。

2007 年伦敦大学经济学家那塔乌德·鲍德哈维（Nattavudh Powdthavee）用调查的数据来估算经常见到朋友和亲人的货币价值。[6] 研究表明，每天见朋友和亲人的价值几乎比 6 位数的额外收入还多。例如，鲍德哈维发现，如果你从一个你能经常见到家人和朋友的城市搬到另外一个不能常看见他们的城市，你需要多挣 13 万 3 千美元来弥补由于远离这些人所失去的幸福。鲍德哈维很明确地指出，每个人对于时间都需要做出慎重的选择。他这样写道："要获得更高的收入或者是维持与他人稳定的社会关系都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每个人的投资决定都取决于他们所拥有的

东西，比如金钱或者是友谊，他们相信自己的选择会对他们的幸福产生更好的影响。

我觉得很难给人们之间的亲密关系贴上精确的价格标签。但是，按照鲍德哈维的计算，我欠我的妻子拉娜一大笔钱，因为当我们结婚时她离开了五个姐妹、双亲、很多侄子侄女，还有数不清的亲朋好友。

许多人选择不离故土，甚至当搬到别处从经济上而言是可行的时候。可能他们本能地知道密切的社会关系的经济价值。许多人离开家乡最终还是决定回到家乡。家乡的吸引力如此强大——家庭的纽带，照顾年迈的双亲或是帮助孩子们，希望靠近毕生的朋友。在我的研究当中很吃惊地看到，我为这本书收集的大约200个具体的地点变迁案例中，许多换了很多居住地的人在晚年选择居住在家乡附近。

例如，琳达·马圭尔（Linda Maguire），一位才华横溢的歌唱家，她放弃了在多伦多极为成功的事业，回到她在弗吉尼亚州的家乡。“我已经过够了难以置信的充满艺术、创意和学院气息的生活，这要感谢政府对我演唱事业的支持和我作为顶级专业歌手的经历，”她接着写道，“我必须要回到我永远不能回避的一点——我是一个来自弗吉尼亚的美国人。再次回到家乡的感觉真的是无与伦比。”

还有韦洛妮卡·艾斯科巴（Verónica Escobar），一个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年轻、充满活力的政治领袖。她离开家乡读研究生并寻求职业的终极目标。我在她参加我们的“创意城市领导者项目”的时候见过她。我的团队对她欣赏有加，我们建议她作为这个项目在其他城市的推动人员和我们一起工作。“我希望离开是因为我知道在埃尔帕索没有什么东西适合我。我觉得我在那儿找不到工作、职业或者是未来。我知道其他城市更有吸引力，更有趣，更喧闹和更加激动人心。”读研究生的时候她去了纽约，作为学生她很喜欢那个地方。她写道：“谁会生活在其他地方呢？我想我会在拿到硕士学位后去旧金山，因为在旧金山海湾地区我能够继续读博，而

且在那里也有着和纽约一样的高质量生活，有着许多令人兴奋的事情。”但是在她去西部的途中，她在埃尔帕索停了下来，她立刻发现了截然不同的情况。她写道：“当地的作家群体正在壮大，政治也在升温。”她很吃惊地发现自己和家乡重新联系到了一起，这是她之前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埃尔帕索突然变得像一个全新的地方。我开始和政治运动人士还有文学组织交往起来，我的世界开阔了。我意识到，在一个边界小城，所有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这多么令人兴奋！我和像我一样的人们决定回来，住下来，在这儿工作，为我们的城市努力奋斗。”看来即使是流动性最强的人们，也不是总能抵御家乡的吸引。

伟大的社会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提供了一个框架可以帮助我们决定是走是留。赫希曼1915年生于柏林，在纳粹的年代移民美国，并在二战期间在美国军队中服役，随后他在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担任教授。在1970年的经典著作《退出、呼吁与忠诚》（Exit Voice And Loyalty）一书中，赫希曼认为在面对令人不满意的状况时，我们可以“退出”或者是“表达”不满，我们越是觉得“忠诚”，就越有可能采用后一种方式。就地点而言，我们决定是否离开取决于我们对这个地方的忠诚度，还有我们的社会关系。[7]

但是，今天的经济发展水平可能正在拨动这一敏感的天平。随着聚集的好处不断增加，世界变得更加不平坦，更多的人可能会觉得不得不迁移以取得更好的经济收入。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将永远成为全球游牧一族。迁移的确关乎我们潜能的发挥和幸福，我们必须认识到地点的重要性，知道如何对我们的选择进行权衡，并在需要时搬到别的地方。

6 聪明人都去哪儿了？

为了找到食物，逃离战乱，躲避宗教和政治迫害，或者寻求经济机会，人类经常迁移。纵观人类历史，人们生活的区域还是相对较小的。《经济学家》2007 年的一篇文章这样总结了人类迁移的长期轮廓：

> 无论你认为人类的历史是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的伊甸园，还是分散在今天东非大草原一带，很显然智人并不是一种天生的城市动物。初期人们的居住地最重要的是能满足找到食物的需要，而打猎和寻找吃的都得在农业区域。直到最后一次冰河时代快结束的时候，大约 1.1 万年以前，人们才开始建设可以称得上是乡村的东西，那个时候，人类已经存在了大约 12 万年了。大概又过了 6000 年，也就是今天被称为古代的时期，才出现超过 10 万人的城市。甚至在 1800 年，全世界也只有 3% 的人生活在城市中。而在未来几个月中，这一比例将超过 50%，即使现在还没有达到。不论是对是错，智人已经成为“智城人①”。[1]

这一趋势远没有结束。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到 2030 年，将有超过2/3 的世界人口（44 亿人）生活在城市中。[2]

有些人说自从 1960 年以来，人口迁移的方式已经发生了改变，人们正在从城市和市区中心迁往郊区。这些人认为数以千万计的人们离开城市已经改变了农村迁往城市的浪潮。的确如此，因为郊区有更新的住房、更新的基础设施和更好的生活质量。[3] 这毫无疑问加速了阶级和种族的重新划分，使人们更加依赖汽车，也带来了更多的消费和全新的生活方式。

---

① 英文原文为 urbanus，为根据智人的英文创的词。——译者注

但是与这一趋势背道而驰的是全球的城市化浪潮，以及美国出现的显著的回归城市的浪潮。中产阶级化的强大过程已经席卷了城市，把阁楼、公寓、历史遗迹保护、新的餐馆、零售店和夜生活重新带回城市。有些人预言这一趋势将会退潮，因为最初推动中产阶级化的人们已经买不起那儿的房子了。

根据顶尖的人类学家和政治社会学家的观点，这两种相互竞争的浪潮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人们根据价值观、文化和政治重新“分类”的过程。最精确地捕捉到这一矛盾的人可能是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他使用了两个象征性的美国人物来说明：一个是喝卡布奇诺的“布尔乔亚—波希米亚族”（也简称为波波族），另一个是郊区的“院中人（Patioman）。”[4]

才能迁移

2006年，我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文章指出，现在世界正在进行更为重要的人口重组：拥有高技能、高学历和高薪的人大量移居到少数大都市区域，与之相应的，传统的中低阶层则从大都市迁出。这种人们根据经济收入潜力在地理上的重新分布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我称之为才能迁移，把吸引这些人的区域称为才能都市。

才能迁移最好的证据是大学毕业生在地理上的分布日益集中。根据哈佛大学的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和芝加哥大学克里斯托弗·贝里（Christopher Berry）的研究，1970年美国人才资源的分布相对平均。[5] 全国25岁以上的人口中有11%拥有大学学历，在美国一半以上的城市中，这一数字都在9%到13%之间。这一数值最低的城市是克利夫兰，只有4%；底特律和圣路易斯稍好一点，都是6%。这一数值较高的城市是旧金山，而华盛顿特区以18%排在第一位。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拥有大学学历的美国人的比率翻了一番还多，在

2004 年达到 27%，而这一增长并没有平均分布。例如，超过半数的旧金山地区居民拥有大学学历。全国有五个地区的大学毕业生比率都超过了 45%。在华盛顿特区，几乎所有人都有大学学历。然而像底特律和克利夫兰这样的地区并没比三十年前好多少——分别是 11% 和 4%。2004 年，全国有 12 个大都市区域的大学毕业生比率小于 20%，其中的几个地区甚至小于 10%。

研究生的分布也有相似的趋势。2004 年，在华盛顿特区和西雅图有超过 20% 的成年人口有研究生学历，克利夫兰有 5%，底特律有 4%，纽瓦克只有 2%。在繁华城市的闹市区，受过高等教育人口的集中趋势更为明显。2000 年，芝加哥中心区域和曼哈顿的中心区域有超过 2/3 的人口有大学学历——这一水平通常在发达的郊区才能出现。[6] 许多更老的工业城市的郊区和农村落在了后面。更为明显的是，单身人口正在加速涌入这些才能都市（这些地方聚集着受过高等教育和高收入的人群）。尽管如此，他们往往过得很寒酸，直到获得成功或者是被高昂的生活成本逼得离开。

才能迁移也体现在地区收入差别中。过去的一二十年中，高收入家庭急剧地向才能都市集中。2006 年，加利福尼亚州的圣何塞的中等家庭收入是 86 638 美元，华盛顿特区是 78978 美元。相比之下，新奥尔良和俄克拉荷马城的收入则低于 50 000 美元。如果再看看人口少于 100 万的城市，那么差异会更加明显。得克萨斯州的麦卡伦的中等家庭收入是 28 660 美元，布朗斯维尔是 27 672 美元。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人们喜欢生活在才能都市中。确实，很多才能都市都是令人愉快的地方，那里风景美丽，生机勃勃，充满乐趣，但同时也很拥挤，人口稠密并且物价很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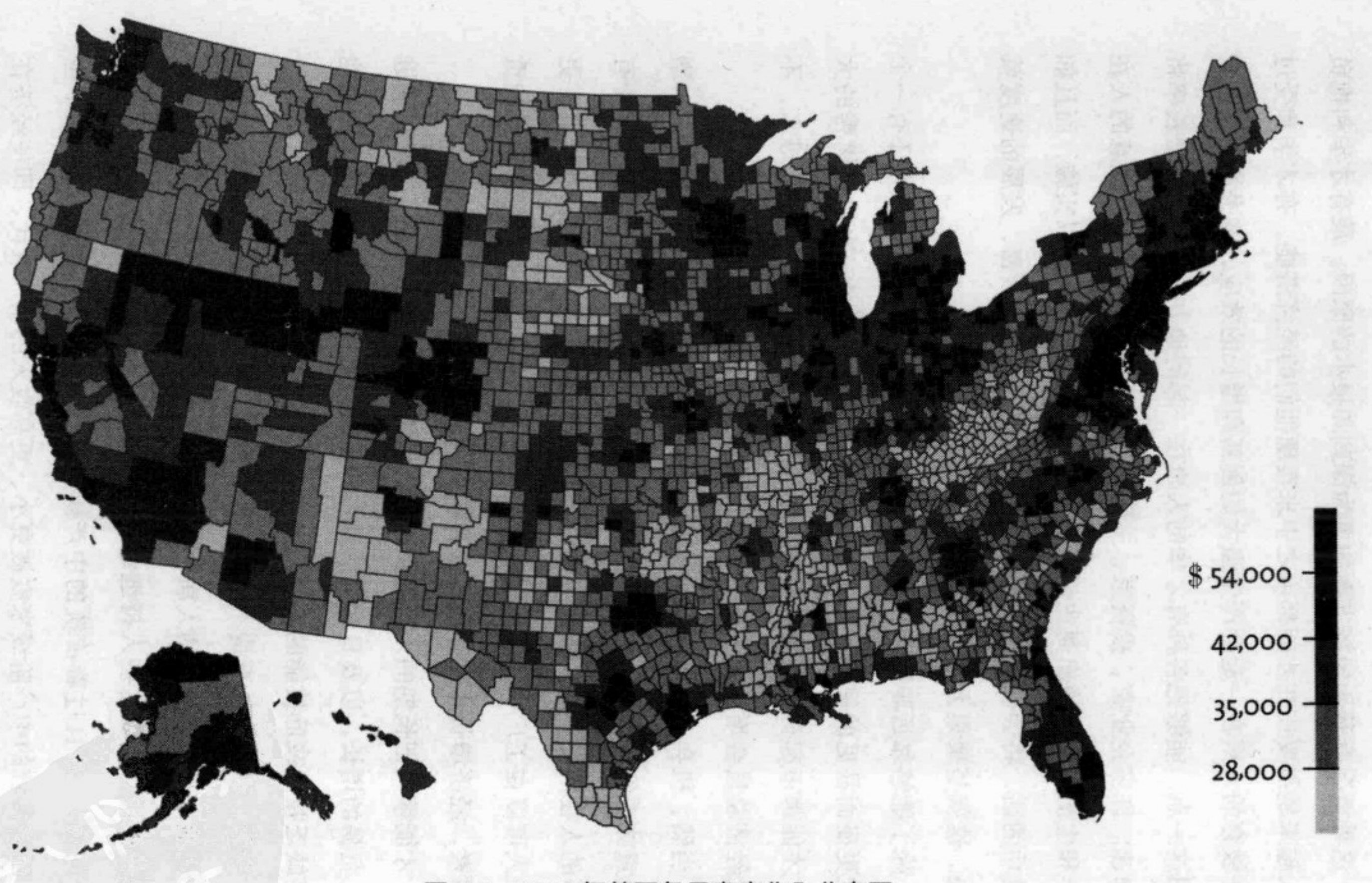


图 6-1 2000 年美国各县家庭收入分布图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局 制图：莱恩·莫里斯

这种情况有基于经济方面的更为深刻和根本的原因。最有才华和抱负的人越来越需要住在才能都市之中来实现他们的经济潜能。有才华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聚在一起会产生强大的创新和增长的效应，本书第4章将会说明这一点。能够把各种有才华的人聚在一起的地方，它的经济增长率将会加速。许多企业家、投资家、工程师、设计师和其他聪明有创意的人在工作和生活中会碰撞出商业创意，这些创意被细化之后得以实施，而且如果成功的话，将会被推广普及。人们越聪明，联系越紧密，发展的速度就越快。这就是聚集力量的倍增效应。

除了能够靠近聪明人和他们的创意，才能都市相对其他地方还有一个更大更显而易见的优势：高起点。由于一些历史原因，比如有优秀的大学，才能都市起初有相对集中的人才。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才加入进来，不仅仅经济总量会增长，而且个人收入和机会也会增多。

当然，机会对于所有人并不是平等的。在人类的历史中，通常人口增长也意味着经济增长。在农业经济时代显然如此，因为人口增长意味着有更多的人在农场中工作。在工业经济时代也是如此，人口增长意味着有更多的人可以在工厂中工作。在这两种情况下，人口增长都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经济增长也意味着机会会增加。

才能移民把长期的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切断了。科技的进步，贸易的增长，以及日常生活外包的可能，使高技能的人们可以更少地依赖缺乏技能或低技能的人。

今天，最重要的事情不是人们住在哪里，而是最有技能的人们大多住在什么地方。最有能力的人居住在一起的回报实在太高了，而且他们的收入增长很快，所以这些人持继续推高房地产价格（我将在第8章中讨论这个问题），并且过着传统的中产阶级工人和家庭不能接受的高成本生活。随着传统的中产阶级家庭被更小、更高收入的住户取代，即使经济在增长，人口还是可能下降的。美国和世界上最成功的城市和地区中富余

的、高流动性的人将越来越多，他们的生活水平很高，住在远方的下层服务工人会满足他们的日常生活需求。

结果将会是这样：才能移民把世界分割成两类地区，它们的经济前景截然不同。一小部分才能都市将吸引绝大多数的四海为家的高技能人员，他们将发现收入和房价攀升，其他人则要经历完全相同的情况。随着居住价格和生活成本上升，一些今天的才能都市最后可能会落后，我们也可以由此推断，一些城市区域和其他地区的经济差异将会继续扩大，甚至还有可能加速，这就是人才汇聚的滚雪球效应。

沃顿商学院的经济学家约瑟夫·吉尔科（Joseph Gyourko）说："这种地点上的重新选择"，将会影响美国的根本情况，这种影响将会和19世纪晚期人们从农村涌入城市所产生的影响一样。"[7] 他让我们想象一下，在未来的社会，人们只与有相同教育、经济和心理背景的人交流。"在都市中，因为收入差异人们已经产生了比较严重的隔离问题，"他写道，"但如果在大都市中的每一个人都和我所居住的社区中的人们一样有钱并拥有高技能，情况会如何呢？"

吉尔科的问题，再加上我自己的问题：四海为家和故土难离的两类人之间越来越大的差异会怎样影响社会结构？如果富裕的城市对于有着不同背景的人们是排斥的，我们怎样保持多样性？随着美国变得越来越多极化，一些人向一端移动而大多数人呆在另一端，怎样才能确保美国仍然是一片机会之土？

7 创意阶层的崛起

让我们在更微观的层面上进行研究。聚集效应在区域之内集中人才，同时也根据工作和职业来对人才进行排序。人的收入会因为地点不同而受影响，而且我们在做什么和我们能把它做到多好也会影响收入。

区域随着它们提供的工作种类不同而变得越来越有差异。我们所做的工作越来越专业化，这不仅仅与我们从事的职业有关，也与我们工作的地点有关。高端金融业集中在伦敦和纽约，科技在硅谷，电影制作在洛杉矶，音乐产业在纳什维尔，这都是一些最明显的例子。并非每一个行业都存在这样的情况，医生、律师、护士和老师无论在哪都有需求，他们的收入在全国也是很一致的，但这种专业聚集效应在越来越多的工作和职业中都能看得到。

我们许多人都会花很多的时间思考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努力学习，考进大学，许多人继续读研究生。毕业后，我们找工作，发简历，参加面试，花很多的时间来找到我们希望为之工作的公司。一旦获得工作，我们希望我们的表现能给老板深刻的印象。我们努力向上，获得加薪和提升。我们花时间和金钱给自己充电，获得新技能。我们在与工作相关的领域进行社交来扩大我们的视野。如果决定自己当老板或者成为自由职业者，我们还需要找到项目和客户。[1] 我们做所有这些事情来谋生，来养家糊口。

几乎很少有人明白在哪工作的重要性。我并不是说人们在找工作之前应该先决定在哪居住，我是在讨论就业市场本身：不同地点的就业机会和报酬会有差异。与软件相关的工作在硅谷更多，而且高科技行业的雇员工资要比全国的平均水平高 75%，其中有许多人还参与到期权计划中，这会让他们更富有。

“我认为有件事情很重要，那就是有抱负的人要认识到去让他们满意

的地方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卡托研究所月刊》（*Cato Unbound*）的编辑威尔·威尔金森（Will Wilkinson）写信给我说，“你喜欢戏剧表演却厌恶洛杉矶、纽约、华盛顿特区和芝加哥？那你的运气真糟：认命吧！或者辞职去比洛克西（Biloxi）的晚餐剧场”。

狂欢者和不满者

发达的经济体正在经历历史性的转变。从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过了一两个世纪前的农场向工厂的转变。因此，制造业在缩减，同时，另外两个行业的工作机会在增加，一个是低收入的服务业（从零售业到个人服务，另一个是高收入的具有专业性和创意的工作，也就是所谓的创意产业。这一转型过程很痛苦，对于某些人来说是灾难性的，对于那些在过去几十年中失去了制造业中的高收入的工作机会的人们尤其悲惨。

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这些工作对于以此为生的家庭有多么重要。我父亲在一家光学仪器厂工作了五十多年。这份工作的薪水帮我的父母买下了城外的一套小房子，又将我和我的兄弟送进私立教会学校，最后让我们进了大学。

我在匹兹堡的那段日子，这一地区有超过15万个蓝领工人失去了工作，炼钢厂大量关门。我得以近距离地观察经济转型给整个地区和人们带来的痛苦。

更近一些，我看到了汽车工业衰落对底特律造成的影响，我的妻子就来自那里。

举个例子，在美国，制造业工作在1950年占了所有工作的49%，1990年下降到了27%，2005年到了24%，而且仍然在持续下降。在未来的十年中，预计美国有50万个这样的工作机会将要消失。

同时，美国和其他的发达国家中也产生了新的就业机会。劳动力日益分化成两种类型，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经济学家爱德华·利默将他们称

作“狂欢者”和“不满者”，狂欢者从事创意产业中高收入、高技能的工作，而不满者是那些服务行业的劳动者，他们缺乏技能，收入也较低。

我们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一个“后工业化社会”，这是哈佛大学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来的，这一概念将我们的繁荣与知识阶层的增长联系在一起，强调依靠科学来进行创新和推动社会进步，提出相对商品而言，人们更依赖服务。大约5900万美国人是零售业销售人员、内科临床医师、口腔卫生学者、家庭健康助理、餐饮服务人员、理发师、美甲师、庭院设计师等，超过美国工作人口总数的45%。许多工作的从业人数都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据美国劳动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预计，到2014年美国将增加数百万的服务业就业机会，其中零售服务业有73.5万个，食品服务业有55万个，消费者服务业有47万个，门卫有44万个，餐厅服务业有37.5万个，庭院设计23万个。但这些都是低收入的职位，至少现在如此。在这些服务行业工作的工人平均每年工资少于2.7万美元。

服务行业的未来对于美国和全球的经济影响都很大。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成为医生、律师、工程师，或者其他专业人士。由于大部分制造业的工作都已经永远地消失了，所以我们必须将数以百万计的新的服务业工作机会转型为安定的、受人尊重的、高收入的工作机会。当我问我的学生们是愿意在稳定的、高收入的工厂里工作，还是愿意做低收入的、临时的发型设计时，他们绝大多数都选择了后者，因为它更富有创意，所以似乎更有价值。就业市场似乎也反映了这种心态，职业培训中技工类的培训总是生源奇缺，而美容类的课程的报名人数总是会超出招生计划。

2005年春天，我去一家温泉疗养中心时，切实感受到了这一点。我和服务员闲聊，问她是从哪儿来的。

“康涅狄格（Connecticut）。”她回答说。

“那你怎么会来华盛顿呢？”

“来念大学。”

“你去了哪所大学?”

“马里兰大学。”

那是非常好的学校，我暗想。便问她在那学什么。

“经济学。”

等等，学经济学的怎么会来温泉疗养中心工作呢?

“是这样的，我毕业以后去了劳动统计局工作。”

我的嘴张大半天合不拢。

“劳动统计局?”我问她，那儿几乎是我所有最好的数据的官方来源。

“是的。”

然后我问她为什么要换工作，我很坦率地说，从劳动统计局辞职到温泉疗养中心工作，对于一个像她这样二十来岁而且有着良好教育背景的人来说似乎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她说她不在乎。

“我在那待烦了，我整天坐在格子间里，看各种分析报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没办法忍受了，这份工作太无聊了，我需要一个目标!”

之后她去上了一个美容学校，接着在整形外科医生的诊所找了一份工作，现在她在乔治敦的四季酒店和弗吉尼亚郊区的另外一个温泉疗养中心工作。

我问她工作的收入是否稳定，福利怎样，等等这些我们想了解的情况。“这些都不重要。”她说，一点也不含糊。

她的收入是按佣金提成的，非常好，而且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干多干少。她热爱这份工作，每天都很兴奋。她喜欢自由，四海为家。她现在并不想找安稳的工作。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在某个时刻，她会希望安定下来，这样她才能继续做她喜欢做的事情，而且也不至于危及她的财务状况。

她最初的工作就是已经故去的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所谓的

“知识型工人。”她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在联邦政府的知名机构中工作。[2] 而最后她厌倦了这份工作，想去寻求职业中的快乐，她明白了职业快乐不是要应用她在学校中学到的知识，而是要运用她天生的创意才能。我认为她现在的工作并不一定比她以前的工作好，但对于我们的社会而言，为了维护社会的最大利益，应该确保这些创意服务行业工作的稳定性和高收入，因为与其他的行业相比，它们最不可能被外包。

为什么现在这些工作的收入不高？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些人认为这是因为市场上的各种力量合谋将工资压低了。其他人则认为这一行业需要大幅改进才能获得高薪。但是当经济学家和政客喋喋不休地争论的时候，全球的公司都在设计战略来提高服务水平。它们提高薪酬和福利，让员工能够发挥聪明才智以便更好地服务顾客，进而增加盈利。

百思买（Best Buy）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特色电器零售商，拥有 14 万员工，年销售额高达 360 亿美元。通过借鉴丰田公司广受赞誉的管理系统，百思买的首席执行官布拉德·安德森（Brad Anderson）已经将以下内容作为公司的明确目标：“创造一个有凝聚力和创新力的工作环境，让所有人都能够发挥才能，同时他们也能从中得到快乐。”为了既能保证工作有效率并令人愉悦，同时又能增加销售额和利润，百思买鼓励员工改进公司的工作流程和技术来更好地为消费者服务。在很多情况下，一些小创意是在卖场大厅中产生的，比如十几岁的销售代表重新设计了 Vonage 网络电话的展示，或者移民销售员为了增强对非英语族裔的服务而采取了一些改进，这些改进在全国范围内的店面得以应用，产生了数以亿计的额外收入。安德森认为要在零售业取得成功决不能仅仅依靠应用新科技和设计有吸引力的新产品。他常说，创意时代的最大的前景就是：有史以来，国家的经济竞争力第一次取决于人们的创新能力。

或者可以这样说，我们未来的经济成功越来越取决于我们驾驭每一个

员工创意才能的能力——不论性别、年龄、民族和性取向。

更聪明地工作

第二类工作就是创意阶层所做的工作，这种工作正在更快地增长，而且对经济增长越来越重要。这一行业的工作包括科技、艺术设计、娱乐媒体、法律、金融、管理、医疗保健和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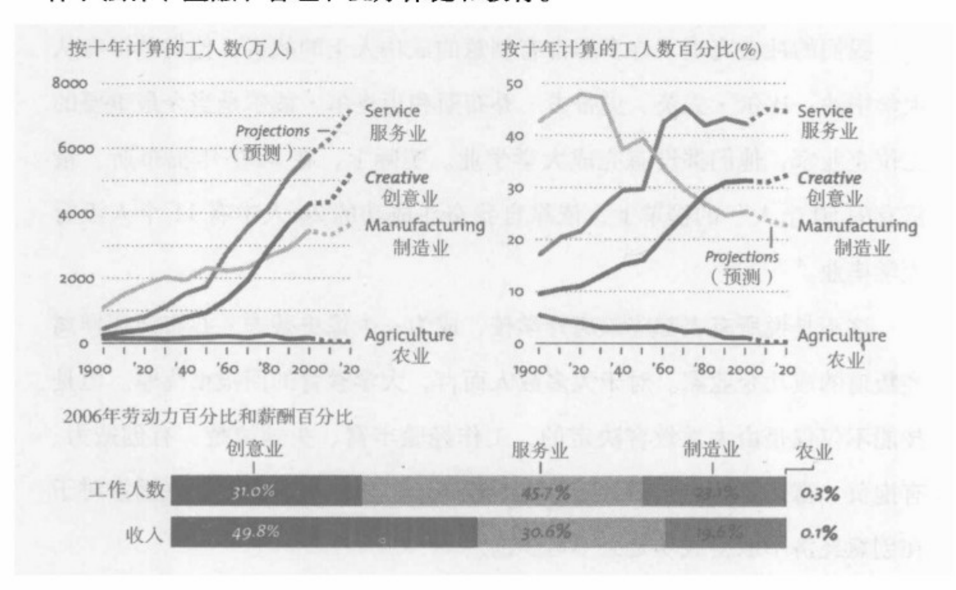


图7-1　创意产业的兴起

资料来源：凯文·斯托拉里克　制图：莱恩·莫里斯

尽管不是新的产业，创意产业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经历了巨大的增长。美国1900年创意产业从业人员只占所有就业人口的5%，1950年时上升到大约10%，1980年是15%，2005年的时候达到30%（见图7-1）。今天，接近4000万人从事创意产业内的工作。他们创造了2.1万亿产出，相当于全国所有工资收入的一半，并且享有70%的可支配收入（4740亿）。[3] 这一数字让服务业相形见绌，服务业约占全国所有工资收入的31%和仅仅17%的可支配收入。根据我们的预测，到2014年，美国将会新增

1000 万个创意产业的就业机会。几乎在所有的发达国家经济中都有相同的情况，根据国家的不同，创意产业大约占据工作总人数的 35% 到 45%。

一些人可能认为创意阶层实质上就是一群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当经济学家衡量人力资本即劳动力的总的知识水平和技能的时候，他们通常关注的是正式教育，也就是人口中具有学士及以上学位的人口数量。但教育只是衡量人创意潜能的一个指标。

我们的社会充满了许多非常有创意的成功人士的故事，他们并没有从大学毕业。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和迈克尔·戴尔是当今最重要的三位企业家，他们都没有完成大学学业。实际上，在 2007 年福布斯“最富有的 50 个人”的榜单上，依靠自我奋斗成功的 26 人中有 11 个人没有大学毕业。[4]

这不是说所有人都应该离开学校，成为一个像史蒂夫·乔布斯那样离经叛道的成功企业家。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大学教育的回报很优厚。但是技能不仅仅是由大学教育决定的，工作经验丰富、头脑清楚、有创造力、有抱负、富于企业家精神都不是大学教育的讲授内容，然而这些因素对于在创意经济中取得成功是必不可少的。

教育与创意产业中的职位是息息相关的，大多数在创意产业工作的人都有大学学位，但是这两点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完全不同。通过我与夏洛塔·梅兰德（Charlotta Mellander）和凯文·斯托拉里克（Kevin Stolarick）的研究，我们发现创意产业和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口通过不同的渠道来推动经济发展。[5] 与创意产业的人员相比，拥有大学学历的人们有更高的收入，包括工资、投资、资本利得、福利等，但是创意产业从业人员的工资更高。工资是对特定数量的劳动支付的金钱，因为工资反映了在特定地点所做的工作，能够更好地反映生产效率。佛罗里达的那不勒斯以及圣何塞是美国最富裕的两个都会地区，但它们财富的来源完全不一样。工资收入占那不勒斯人口总收入的 1/3 弱（32%），然而工资收入占到了圣何塞居民

总收入的90%。

我们通过研究发现了职业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另外一种方式。在我们研究职业和区域收入的关系时，我们发现一些特定的工作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比其他工作更为显著。商业和金融运作，以及跟电脑和数学相关的工作与区域经济的相关度最高，随后是销售，然后是艺术、设计、媒体和娱乐，之后是管理和技工类的工作，最后是律师和科学家。有关艺术和娱乐类工作的发现特别令人感兴趣。许多人认为财富推动并支持艺术和娱乐业的发展，而如果说艺术和娱乐业也在为区域经济作出贡献的话，那会怎样？

许多地方在失去了制造业的工作后，围绕教育和医疗保健重建了区域经济。在老牌制造业中心，如底特律、克利夫兰、圣路易斯和匹兹堡，最大的雇主是大学院校和医院。这听起来是好消息，因为这至少意味着这些城市的居民能找到工作。但根据我的团队的分析，这些产业的高度集中最终对于城市的经济发展是不利的。尽管他们可以雇很多人，并且提供优良的服务，但教育和医疗保健对于区域经济的贡献依然很小。如果我们将教育和医疗保健类的工作看成区域创意经济的一部分，那么情况就更加明显了。随着教育和医疗保健类工作机会的增加，地区收入反而下降，因为越多创意阶层的人加入教育和医疗保健业，区域的平均薪酬就越低。

为什么会这样？一个原因是教育和医疗保健行业有垄断当地劳动力的趋势，因为它们对雇工的需求量很大，所以其他产业能够雇到的人就会减少。教育和医疗保健是一种必需品，每一个区域必须有一些人在这些行业工作，而这些行业也很少能从区域外吸引资金，除了学费和政府研究拨款，他们大多数的收入都来自区域内。相反，一个创新型的公司，或者是一群这样的公司，会在全球范围内吸引客户的资金。经济发达的区域中，从事其他行业的人和群体更紧密地聚在一起，同时这些行业在地理上也正在日益集中。

聚集起来

工作机会和行业总是会在某种程度上聚集。钢铁厂集中在匹兹堡，巨型的汽车生产联合企业落户底特律，这都是聚集力量的历史性案例。

著名经济地理学家约翰·海因里希·冯·杜能（Johann-Heinrich von Thünen）和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弟弟），详细地阐述了在选择工业区位的过程中如何平衡原材料和运输费用。[6] 重工业的公司将会选择原材料丰富的水路交通要道，因为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运输成本。

工业时代的区域是围绕一个或几个核心工业来组织生产的。它们先是自身扩张，然后向外围扩张，围绕中心形成环形区域。[7] 制造业的某些特殊部门选择在港口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港口发展成了专门提供多种商业和金融服务的商业地区。住宅和公寓最初建在港口和工厂附近，逐渐开始沿着公路布局，这就形成了早期的郊区。这些郊区大多得到了附近农场和农产品生产商的支持。

创意经济的兴起完全改变了这一模式，它大幅度地减少了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基础制造业的工作机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但并非所有的工业都出现了分散布局的情况。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20世纪80年代的意大利，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被该国的服装与时尚工业的活力震惊了。为什么这些传统行业在意大利仍然蓬勃发展，而在其他地方则由于中国和印度这样的低成本竞争者的冲击而纷纷倒闭（或者转移到海外）？

我们可以从著名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聚集”概念中找到答案。[8]有些企业利用规模效应整合生产活动，做大企业。还有些企业在相近地点设厂，从“聚集经济效应”中获益。最近，社会学家将这种聚集效应称之为“工业区”的能量。不论怎么称呼，阿玛尼、普拉达和古奇这样的公司都能从高效的生产和创新中获益，当然靠近供货商、使用者

和顾客也是增加收益的原因。这种工业聚集带来的经济效益完全能够冲抵日益加重的将工厂迁至海外的压力。

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某些工业聚集区的活力引起了顶尖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注意，比如哈佛商学院的教授迈克尔·波特。[9] 波特是公认的全球最重要的管理专家，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仍然专注于对世界顶尖工业聚集区的研究。

波特根据研究绘制了一幅新的世界和美国经济地图，他认为经济由工业聚集区来决定：保险业聚集在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娱乐和博彩业聚集在拉斯韦加斯；高尔夫装备业聚集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卡尔斯巴德（Carlsbad）；先进成像技术业聚集纽约州的罗切斯特，等等。波特认为，这些工业聚集区能够存活下来是因为它们与高端使用者和客户距离很近，能够吸引附近的高技能人才，而且它们得到了当地大学和职业培训项目的支持。很多人认为海外建厂和全球化将冲击这些工业聚集区，但是波特的观点截然相反，他在2006年接受《商业周刊》在线采访的时候说："现在全球化仍在继续向前，事实表明，每一个地方的工业聚集区必须变得更加专业化，全球化正在加速推进这种专业化的进程。"

更有趣的事情发生在软件和生物科技等高科技行业，这些行业几乎不需要工业投入，它们的集中趋势更加明显。约瑟夫·科特赖特（Joseph Cortright）和海伊克·迈耶（Heike Mayer）2001年所做的关于生物科技行业一项详尽的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创立的生物科技公司中有四分之三都将总部设在了9个区域中。[10]这9个区域有8倍于其他地方的生物科技研究项目，10倍的生物科技公司和30倍的生物科技风险投资。

风险投资是衡量高科技产业集中的另外一个有效指标。2007年的第二季度，硅谷、圣迭戈和大波士顿区域的风投额占了全国风险投资总额的一半以上，其中的三分之二投向了硅谷。而且在硅谷这一趋势仍在延续。

尽管在硅谷从事商业活动的成本高昂，高科技企业和相关工作机会仍

在不断涌入硅谷。2006年《华尔街日报》上一篇名为《硅谷仍是科技企业的宝地》的文章中提到，有六家公司迁入了硅谷。

这些公司重新选址会增加成本，因为硅谷高科技员工的平均年薪比全国的平均水平高5万美元，但资源聚集产生的效应冲抵了这些成本。“硅谷有独特的资源，这在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其中一家公司的创始人马特·桑切斯对《华尔街日报》的记者说，“所以如果你要创立一家科技公司，就该建在这儿。”

并不仅仅只有高科技行业在聚集，许多其他行业也从相互聚集中获益。首先让我们来看看经济中两个主要行业：服务业和创意业。

许多在扩大就业方面排名靠前的地方，都是因为创造了大量的服务业的工作。在另一方面，还有一些地方因为有许多创意产业的工作机会而很受欢迎。那里大约有40%的人在创意行业工作——这个数字是全美国平均水平的4倍（参见图7-2）。

一些城市经济学家和区域经济学家用图表描述了专业分工在地理上日益显著的情况。区域经济学家安·马克森（Ann Markusen）是职业分析领域的先驱，他将这种趋势称为“独特的城市”，在这些城市中工作和经济生活变得越来越专业化。[11]

罗杰·马丁（Roger Martin）是我在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Rotman School of Management）的系主任和同事，他说过，当公司能够通过内部调整来维持竞争优势的时候，地点在商业成功中将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他将其称做“行政区优势”，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强项，而且是难以复制的。[12]或者可以这样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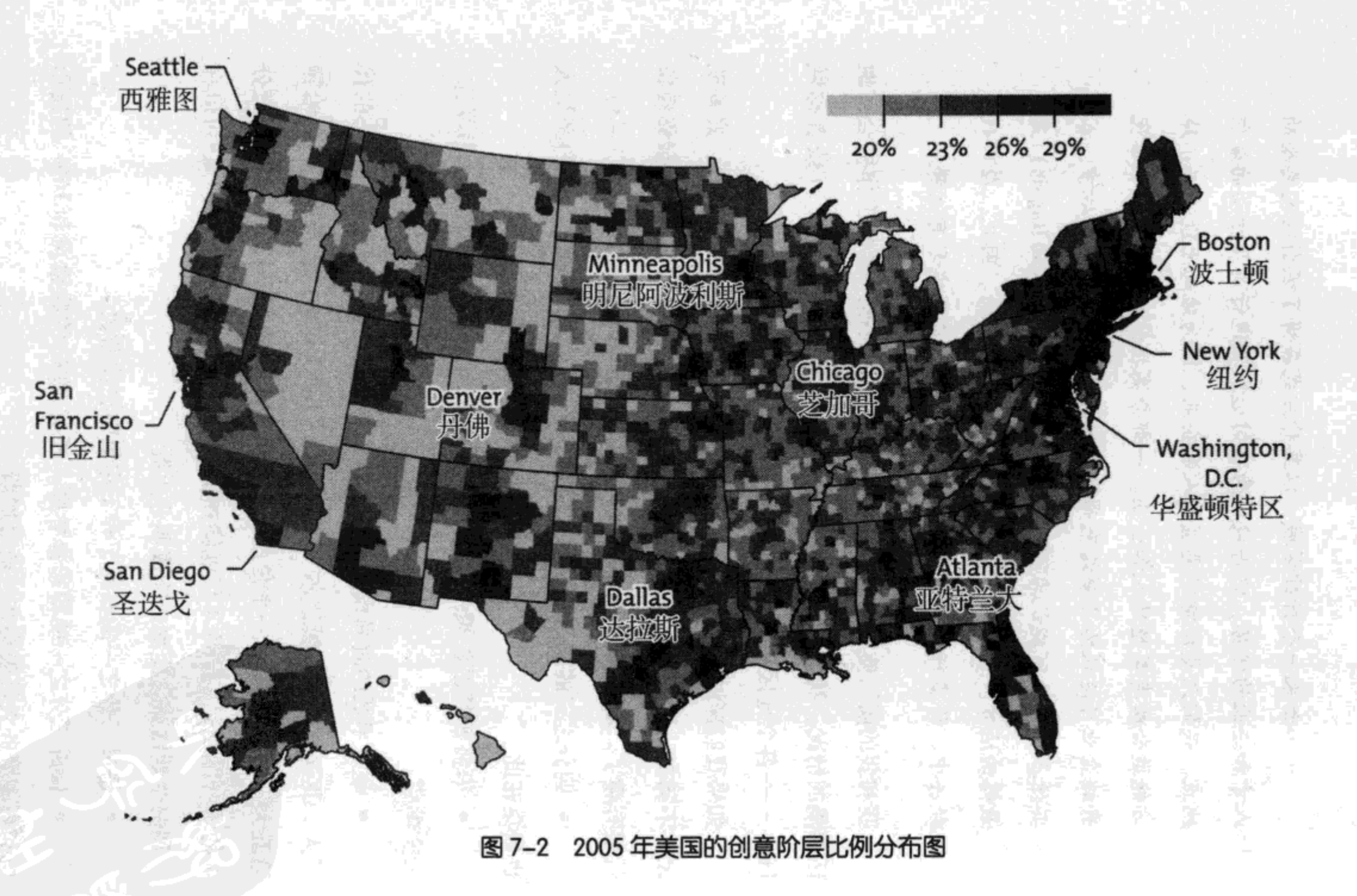


图 7-2　2005 年美国的创意阶层比例分布图

资料来源：凯文·斯托拉里克　制图：莱恩·莫里斯

……如果一个行政区域，以某种方式赢得了吸引特定类型的人才和企业的优势，它将被视为公司选址和进行商业活动的最佳地点。我们只是说特定类型的人和企业，因为地球上没有一个地方能适合所有类型的人和企业。一部分高技能的人和一些非常优秀的企业可能认为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是地球上最好的地方。而其他人和企业可能认为密歇根州的大急流城（Grand Rapids）是最棒的地方。毫无疑问，任何人的选择都是对的。因此，在当代经济中，许多行政区域都会在它们的专业分工领域享有优势。

我和我的团队使用劳动统计局的详细就业数据来推断工作机会按地区聚集的情况。我们预计“聚集比例（Location Quotients）”（或者称做LQ）——各个地区中某一行业在整个国家中所占的比重。

如果我们探讨的是像河道运输船驾驶员这样比较罕见的职业，聚集现象并不稀奇。但如果我们关注的是经济，雇用了大量雇员的行业聚集现象就很有趣了。看看提供大量就业机会的行业在美国的分布（见图7-3）。

- 四分之三的娱乐业从业人员和演员在洛杉矶工作，25%的经纪人也聚集在此。

- 华盛顿特区汇聚了78%的政治学家和大量的经济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

- 超过半数的时尚设计师在纽约工作。纽约也集中了四分之一的代理人。我这本书的编辑比尔·弗鲁科特（Bill Frucht）也指出，在曼哈顿第五大道的第23街有一个角落，有六到七个主要的出版社都集中在五分钟的步行距离之内，你不仅能够在不换停车场的情况下换工作，还可以在一到两个地铁站的距离内完成职业生涯。

- 超过三分之一的石化工程工作集中在休斯敦。

- 接近三分之一的博彩督导师，还有20%的收银员和16%的投币机和服饰服务人员聚集在拉斯韦加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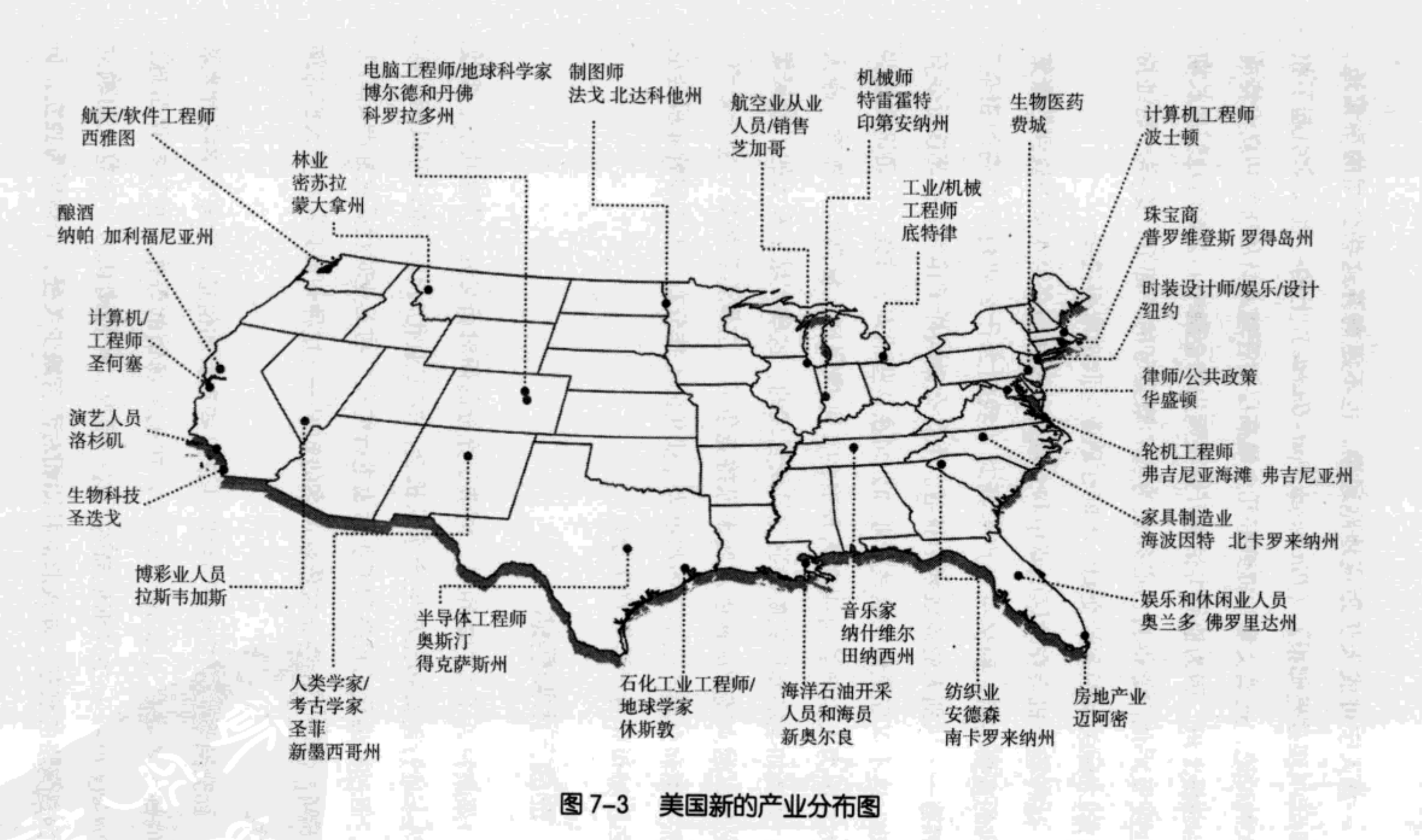


图 7-3　美国新的产业分布图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局　制图：莱恩·莫里斯

一些人宁可成天长距离地跑通勤，也不愿离开这些公司的聚集地。2005年《匹兹堡邮报》（*Pittsburgh Post-Gazette*）上的一篇文章引起了相当大的讨论，这篇文章中提到好几个最高层的管理人员从纽约和夏洛特前往匹兹堡上班，因为他们害怕离开这些领先的金融中心会影响他们的长期职业发展。[13]他们觉得自己必须成为核心聚集区的一部分，这样才能维持他们的人际关系网和社交圈，不断在职业生涯中取得进步。

这种就业机会在地区的集中和专业化就是我们在第4章中谈到的聚集效应的直接结果。回忆一下卢卡斯对"我们为什么要付那么高的租金"的解答——从别人的高效率中获益。为什么做同样工作的人彼此接近会有好处？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些行业和公司在这些地方。首先，公司设在这些地方是因为人们能够直接融入现有的工业聚集区，提高生产效率，赚大钱。或者如圣塔菲研究院的研究员所发现的，这些大城市和大的工业聚集区必须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发展来保持竞争力。工作聚集提高了生产效率，也在美国和全球产生了新的和更为专业化的工作分布，工作和就业机会也随之在城市和各个地区重新分布。

形成艺术聚居地

聚集拉近了人们的距离，创造了充分的面对面交流、信息共享、组建团队来进行创新和提高生产率的机会。在工业化时代，知识可以统一标准，通过标准化的程序和工业图表进行传授，与工业时代高度标准化的工作不同，创意工作则非常依赖内在的知识——这种知识只存在于人们的脑子中。

社交网络使员工和公司可以共享这些重要的信息，哈佛大学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在他最畅销的著作《独自打保龄球》（*Bowling Alone*）中详细地描述了这一情况。帕特南认为，随着之前确立的社交网络的衰落，新兴起的社团相对而言缺少关爱，个体更为独立，员

工的社会活力下降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了。[14]社交网络由两种社会资本组成：亲密关系和社会联系。亲密关系指的是在家族中或者是在种族团体中的亲密关系，帕特南教授对这一关系的衰落表示惋惜。

社会联系指的是跨越不同团体的松散的联系。对于聚集效应而言，这一类型的联系更为重要。它“使人们置身于在任何一个世界中的各种想法和行为中间，”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科技管理项目的总监安德鲁·哈加登（Andrew Hargadon）写道。[15]他认为，社会联系改变了人们对来自不同世界的想法的态度，也改变了人们对自己的想法和行为的态度。社会联系相关的活动为创意提供了条件，为人们提供了灵光乍现的欢乐时刻。

不论采取何种形式，社交网络体现了“松散联系的力量”。这个说法是由斯坦福大学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首先提出的，它抓住了这一问题的本质。[16]在一份主题为“人们如何找到工作”的影响很广的研究报告中，格兰诺维特认为，我们数不清的松散的社会联系比少数的亲密联系更为重要。也就是说，他认为与素不相识的人的关系比与亲朋好友的亲密关系还要重要。这听起来很奇怪，除非你认真思考了人际关系网络是如何运作的。与陌生人的松散联系的好处是它给我们带来了新的信息。大多数情况下，你和你的朋友都处在同一个圈子中，你们认识同样的人，去同样的地方，获得同样的机会。松散的联系更多，而且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去维护。它们有时会制造一些混乱，但更多的时候它们是你发现新机会和想法的关键。

我们进行社交活动的场所会因为我们的职业不同而不同，但是这些活动的作用都是一样的。在传统的办公室工作中，社交活动可能是在冷水机旁闲谈，或者是周末一起打高尔夫。对于投资银行家而言，则可能是重要的商务午餐或者是公司组织的在汉普顿斯（Hamptons）的活动。在高科技领域，社交活动的常用形式是早餐会、痛饮啤酒或者是骑自行车。一位硅谷的风险投资家把这最后一点说得很清楚：“如果你不是主车团（pe-

loton，在自行车比赛中的大团队）的一员，那么你就不是交易的一员。”他说的是事实。

我们还可以考虑艺术类的创意活动，比如说音乐、写作和艺术品创作的聚集区是怎样发展起来的。这为如何更好地理解工作是如何聚集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创意工作几乎不需要物质性的投入，也不需要产生规模效应。艺术家的工作是个体劳动的经典案例，因为这些创作都是独特的，互不相同的。

在创意活动聚集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当大多数的人想到创作艺术或者音乐的聚集地时，他们通常想的是一群做艺术或者是音乐的人在一起——经济学家把他们称作制作人。这种聚集很重要，因为从很早以前开始，艺术家的聚集地就能让有天赋的人们聚在一起合作竞争——追逐灵感，相互借鉴。在音乐的世界中，“地点”这个词往往跟某种地方的独特音乐风格联系在一起，但是这种地域风格如果没有社会和经济基础也是无法存活的。

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理查德·凯夫斯（Richard Caves）在他的著作《创意产业》（*Creative Industry*）中作了如下解释：音乐产业是艺术家、词作家、音乐人进行创作，经纪人和经理销售这些创作的一个系统工程，成功往往是很偶然的。伊丽莎白·克里（Elizabethe Currid）在她的著作《沃霍尔经济》（*The Warhol Economy*）中写道：这些艺术家的聚集地也吸引了酒吧、餐馆和表演场所，这些地方又提供了社交场所。[17]

这些聚集地是创作、消费和改进这些作品的场所，它们也能提供相关的经验。它们代表着“组织文化生产和消费的模式”，这一说法是芝加哥大学在这一领域的几个优秀学生丹尼尔·西尔弗（Daniel Silver）、特里·克拉克（Terry Clark）和劳伦斯·罗斯菲尔德（Lawrence Rothfield）提出来的。[18]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聚集地。在纳什维尔有音乐聚集地，在纽约有剧院区，在迈阿密有夜店区，在洛杉矶有电影区。但是这些作者们提出：“为什么这些地方会成为‘聚集地’？”究竟是什么使百老汇的剧院区和其

他地方的有所不同？

这些作者们指出，聚集地是根据“它所提供给你的观察其他人的机会和其他人观察你的机会来确定的”。它完全是“娱乐性质的，让你把工作抛诸脑后”。在这些地方的“各种娱乐设施和人们都是为了要分享共同的价值观和品位，培养交往方式”。这种聚集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现在工作持续聚集现象的重要视角。

杰克·怀特去了纳什维尔

有人会想艺术家、音乐家作为个体应该能选择住在任何地方，哪儿都需要艺术，而且这些地方按道理应该“分散开来”。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相关数据能够证明这一点。

乔治梅森大学的一个研究生斯科特·杰克逊（Scott Jackson）采用来自多方面的数据追踪了音乐家和音乐团队从 1970 年到 2004 年的分布地点。[19]由于 1970 年以来，大都会区域变了好几次，杰克逊花了大量的精力确保所有的地区划分都能够与数据匹配。这样他获得了 31 个大都会地区的音乐家的具体信息。

他的分析很清楚地显示出音乐产业逐渐集中和专业化的趋势。从 1970 年到 2004 年，在 31 个大都会地区中音乐家的比例从 52% 上升到 63%，其中有一个地区远远超过了其他地区。1970 年，纳什维尔只是一个次要的乡村音乐中心，到 2004 年的时候，只有纽约和洛杉矶两个超级都市比纳会维尔拥有的音乐家更多。

当你研究“聚集比例”时，纳什维尔的兴起就更加明显了。1970 年，纳什维尔还不能排进音乐产业“聚集比例”排名的前五名。到 2004 年，它已经是全国的领军城市了，它的“聚集比例”几乎是全国平均水平的四倍。这种增长如此明显，所以当杰克逊将 1970 年到 2004 年的聚集比例画成图的时候，纳什维尔是唯一一个有正增长的城市。它实际上借了整个

音乐产业增长的光，将它所涵盖的音乐领域从乡村音乐扩展到所有的音乐类别，特别是摇滚乐和流行乐。今天，它拥有世界上顶尖的制作室人才，在音乐创作、录制和出版方面连纽约和洛杉矶都相形见绌。

正如许多高科技公司迁往硅谷，很多顶尖音乐人最终迁往纳什维尔。2005 年，过去十年中最重要的一位摇滚音乐人杰克·怀特（Jack White）①，富有传奇色彩的白色条纹（The White Stripes）乐队的创立者，将他最新的乐队——健谈者乐队（The Raconteurs）及其录制计划从底特律神奇的音乐制作室迁往纳什维尔。[20]之前，怀特曾为洛丽塔·琳恩（Loretta Lynn）的专辑《凡里尔的玫瑰》（*Van Lear Rose*）担纲制作并演奏，专辑的录制是在纳什维尔完成的。他对纳什维尔的印象好极了，所以离开了底特律，在纳什维尔买了房子。健谈者乐队成员没有一个是来自纳什维尔的。怀特和布伦丹·本森（Brendan Benson）来自底特律；鼓手帕特里克·基勒（Patrick Keeler）和贝司手杰克·劳伦斯（Jack Lawrence）曾经是辛辛那提绿角乐队（The Greenhornes）的成员。当被问到为什么决定迁往纳什维尔时，怀特说底特律的氛围太消极，发挥空间太小，他曾经的朋友和同事非常妒忌他的成功。他说："纳什维尔不一样，更专业，更少敌对的气氛，没有伤感之情。"就像硅谷，它是一个行业中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汇集的地方，他们能与其他最优秀的人才合作，然后使用世界顶级的设备工作。

选择居住地对于我们的财富和生活水平至关重要，至于我们如何使用赚到的钱是另外一个问题。对于我们大多数人而言，最大的投资是对住房的投资。如果我们选择的居住地对于我们如何支付房款影响很大，那么它对于如何让我们的住房投资增值和以多快的速度增值起到的作用更大。

① 杰克·怀特（Jack White）是诞生于汽车城底特律的摇滚乐队白色条纹（The White Stripes）的吉他手和主唱。

8　超级明星城市

我并不热衷于看电视，但是有一档电视节目我却屡看不厌，它叫做《房有所值》（*What you Get for the Money*）。每一期节目都介绍全美各地四到五个城市，并向观众展示那里出售的房产，起价从30万美元到100万美元不等。比如，花30万美元，你就可以在亚利桑那州的弗拉格斯塔夫（Flagstaff）买一套上世纪50年代晚期建造的修整一新的房子，也可以在纽约州罗切斯特的郊区买一个2300平方英尺的殖民时期建筑，或者在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Louisville）买一所1800平方英尺的现代联栋房。如果你有100万美元，那么你可以选择在丹佛买一座现代化小木屋，或者在纳什维尔买一处新房，再或者在波士顿城区购置一套顶层公寓。

为什么花同样的钱买到的东西差距如此之大？这可以归因于房地产界的一句老话：地段，地段，还是地段。许多人说想要在支付能力范围内买一所尽可能大的房子。在我的环球之旅中，我经常听到有人夸口："在这里买一套豪宅花的钱都要比在曼哈顿买一间小型公寓花的钱少。"从未有人质疑为什么那些别墅还不如曼哈顿一间400平方英尺的公寓贵。

购买不动产并不是一笔简单的交易。房屋建造的成本往往不是最高的，土地成本才是最高的，也就是说地段才是最贵的。这也是那句房地产老话的来源。在需求高的地方，特别是在供小于求的地方，地段本身就值一大笔钱。

地段的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你最初买到了什么，更体现在你的投资如何随着时间流逝增值。地产投资和其他投资一样，比拼的绝不是你花钱买了什么，而是你的投资是否可以增值。买房子是我们大多数人所做的最大的投资，最重要的是从长远来看房屋增值率对我们个人财富的影响。

本章将要说明的是地段正在成为房地产交易中越来越重要的因素。房

价随着地段的不同有了越来越多的变化。一些房地产经济学家绘制了一张所谓的超级明星城市房价上升图。这幅图表明这些城市房价的升值速度远远高于美国平均水平。这些最具活力的房地产超级明星城市都位于美国乃至全世界的领先超级区域。

一切皆有价格

经济学家说房地产的价格最能体现人们对于地段的有效需求。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美国社区调查数据表明，最便宜和最昂贵的社区房价之间有很大的差距（见图 8－1）。[1]2006 年最贵的都市区域是圣何塞，房屋均价超过 74 万美元；而最便宜的地区是得克萨斯州的敖德萨（Odessa），那里的房屋均价仅仅是圣何塞的一个零头，5.4 万美元。旧金山、洛杉矶、纽约、波士顿和华盛顿特区的房子都同样贵得惊人。

如果从更小的地理位置上来看，比如说按邮政编码划分地段，我们会发现房价的差距更为悬殊。根据 2007 年《商业周刊》的报道，美国有 5 个邮政编码地段的房屋均价超过了 200 万美元。24 个邮编地段的房价平均在 150 万到 200 万美元之间。在另外 66 个地段，房屋均价是 100 万到 150 万。[2] 而且这些都是均价，这些地区至少一半的房子都要更贵。

另外一方面，据 2006 年美国社区调查统计，在很多都市，比如塔尔萨、埃尔帕索、威奇托以及布法罗，市区房价都不到 12 万美元。所有这些城市都是好地方。我曾在其中的一些城市居住或者工作过，而且参观过所有这些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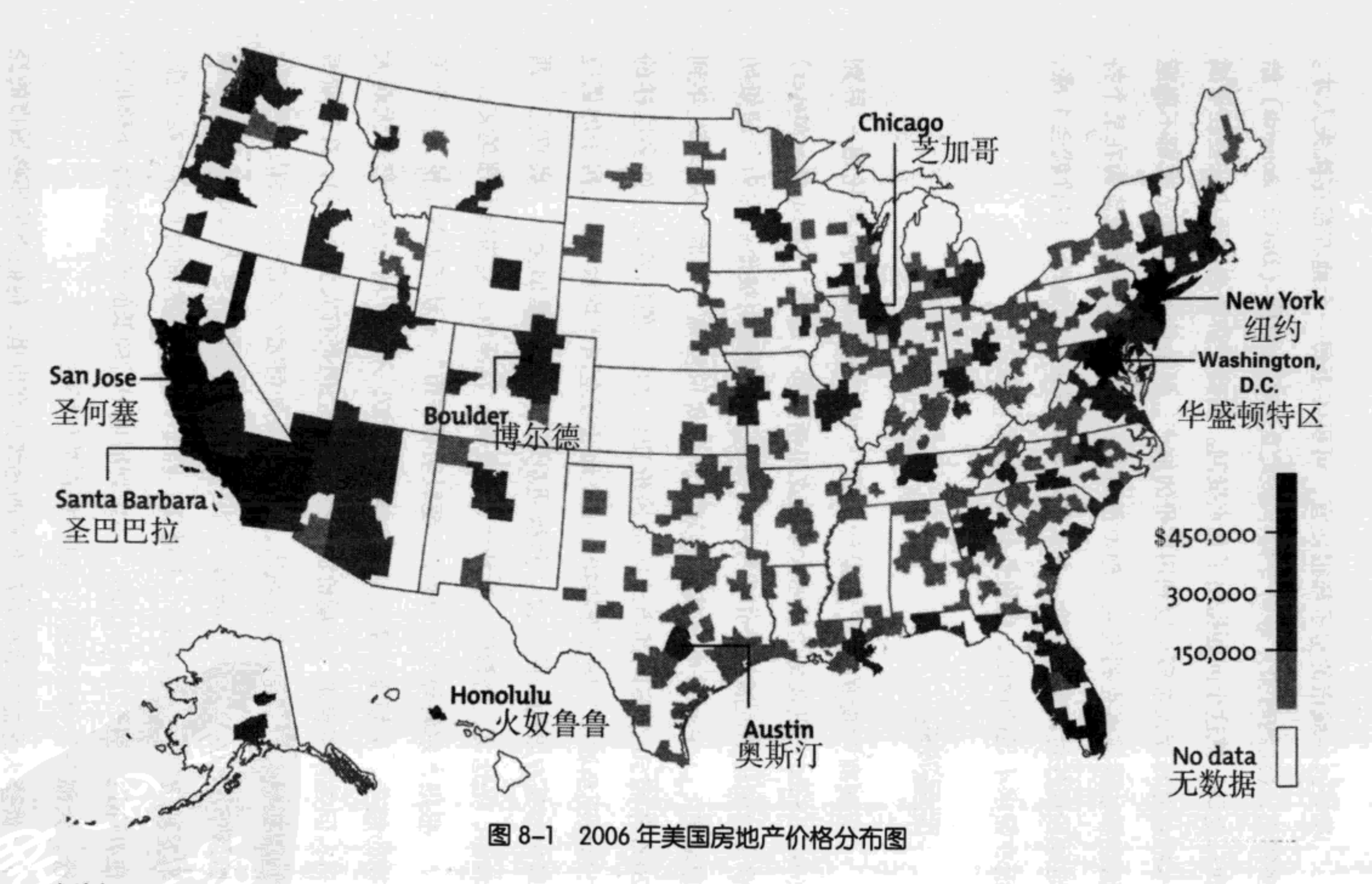


图 8–1　2006 年美国房地产价格分布图

资料来源：美国社区调查，美国人口普查局（USC）　制图：莱恩·莫里斯

尽管这些城市的房子都很便宜，可事实上每一个地方都在流失人才。多年前，《纽约时报》经济专栏作家大卫·李奥哈特（David Leohardt）给我打电话，就这个问题提出了几点疑问。基础经济学表明至少一些在乎成本的企业和商人希望可以利用廉价的地产，但为什么公司和人才都不愿意搬到布法罗或者克利夫兰？理由很简单，房价反映出人们愿意为在某个特定地段居住付出多少代价。在人们非常渴望居住的地段，房价就会上涨，而在需求不足的地段，房价就会停滞甚至下降。

明星效应

沃顿商学院的地产专家约瑟夫·吉尔科和他的同事托德·思耐（Todd Sinai）以及哥伦比亚大学的克里斯托弗·迈耶（Christopher Mayer）将房价的长期发展趋势作为标准，考察了美国境内被他们称为“超级明星城市”（中心城市及其周边郊区）的房价涨幅。[3] 考察了从1950年到2000年间50个美国都市地区的房价变化之后，他们发现在许多这样的“超级明星城市”房价涨幅持续快速地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而房子的供应增幅却是有限的。前十位“超级明星城市”分别是旧金山、奥克兰、西雅图、圣迭戈、洛杉矶、波特兰、波士顿、新泽西、夏洛特和纽黑文。

根据吉尔科等人的调查，“超级明星城市”不动产大幅上涨是一个长期的趋势。从短期来看，“超级明星城市”不动产的价格会经历大起大落，但是长期看来，房屋价值会持续上升。但是有人也许会问，在拉斯韦加斯那样人口迅速增长的城市，房价又会如何呢？大部分人会认为这将使拉斯韦加斯成为房价上涨的一个中心。吉尔科说，将人口增长和“超级明星城市”等同起来是一个错误，除非人口增长的同时房价也在上涨。他补充说，至于拉斯韦加斯，考虑到那里相对较低的价格涨幅和下降的房价，大部分喜欢那里的人可以选择在那里居住。

许多人愿意生活在为数不多的超级大都市里，他们声称那些城市的经

济实力雄厚。当然，房地产市场有波动，地产泡沫也会破裂，但是超级明星城市的耐力至少可以往前追溯半个世纪。吉尔科说，由于大城市的排他性和对价格的控制，居民在此居住的成本很高。这些超级明星城市通过不断吸引有技术能力又有钱的家庭来保持自己的超级明星城市地位。根据达尔文的理论，从长远来看，更富有的家庭会搬进来，而低收入的家庭则会被淘汰出去。一方面，在超级明星城市生活对空间的需求量很大，另一方面这些城市提供的空间有限，因此吉尔科等人认为，这些城市中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需要高于其他地方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

为明星城市房价上涨推波助澜的还有房地产市场的全球化。去年春天我和妻子在多伦多寻找房子时，发现多伦多内环社区的房价很高（远远比华盛顿西北部的房价要高），我问房地产代理人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她干脆地回答："外国购买者，不是美国人，大部分是俄罗斯人，几乎买走了高端房地产市场的所有房产。"

随着市场的全球化和美元的贬值，无论是曼哈顿还是比弗利山庄的地产与伦敦、东京、香港、莫斯科或者其他世界中心城市相比，都显得很廉价。这使得这些"超级明星城市"的地产市场出现了支付困难。过去，买家在有限的区域市场上竞争，现在购房需求几乎遍布全世界。

随着一个由少数几个全球超级区域构成的不平坦的新世界的出现，我们可能正在进入房地产发展的新时期，房地产市场分化为国际型市场和本地化市场。国际型市场的房价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增加，而本地化市场的房价则相对稳定，有时还会下跌。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认为超级大都市高昂的房价是一成不变的。耶鲁经济学家罗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就是认为这种价格攀升趋势必将终结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在其畅销书《非理性繁荣》（*Irrational Exuberance*）中就曾预言高科技股票在 21 世纪初必将崩盘。在 2007 年 5 月的一篇专栏文章中，[4] 希勒问道："谁说大城市的房价就得是永远上

升的呢？”事实上，进一步扩大纽约或伦敦这样超级大都市的规模是不大可能的了。但是，希勒也提到，“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能找到大片土地来开发建设新的城市”。而且这种做法在过去也曾反复出现。他还指出，精明的私营开发商总能在离大城市不远的小城镇中开发出新地皮。这种情况随时随地可见，以至于我们都习以为常了。

希勒的分析表明，在21世纪初的房地产繁荣时期，房产急剧升值，以至于到2007年时，房地产价格已完全和收入不匹配了。[5] 他还曾预计截至2010年，房价将会下降30%至50%。

可能会这样吧，但是房地产不同于其他投资。原因很简单，人们投资房地产最主要目的是有个避身之所，而不是赚钱。

“这正是我之所以不赞成将房地产投资等同为互联网投资的原因。”前《华尔街日报》记者罗杰·洛温斯坦（Roger Lowenstein）写道，“大部分的房屋持有者都得有个住的地方。如果价格下跌，他们的反应和股票交易者的反应是不同的。与其抛售，他们更愿意坚持久一点。当市场不景气时，每天思科的每一股股票都可能被抛售，但并不是所有的房屋都会被抛售。”[6]

在形势不好时，许多的房屋持有人都会静观其变。房地产市场通常不会通过泡沫的突然破裂来完成调整。更多时候，房市会萧条好几年，直到人们收入的不断增长赶上了房价水平，市场需求快速增长，快速升值的周期就会开始。

卡尔·凯斯（Karl Case）是韦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的一名经济学家，也是希勒的研究伙伴，2006年房地产价格开始下跌时，他对波士顿的600个房地产项目进行了追踪调查。4个月过后，大部分房屋都没卖出，但售房者最多也就只将价格降低了4%。凯斯得出的结论是，房地产比其他任何的金融财产都“更顽强”。希勒不同意这种观点，在他看来，房地产商认为价格只会上涨的想法太幼稚了。

华盛顿的一名城市规划专家瑞安·埃文特（Ryan Avent）指出，各个城市是不能互换的。[7] 在纽约生活和工作与在只有几千居民的小地方生活和工作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城市，尤其像纽约、旧金山，或伦敦这样发达的超级都市，有着其他城市不可复制的生产和消费上的优势。而且，对于这些地方而言，外来人口不但不会减少这些优势，反而会使之增加。

再者，事实证明，对于那些通过教育背景和技能获取高回报的人们来说，超级大都市就像天然的过滤器。因为，那些只想用自己的技能获得低回报的人们看不到在纽约生活的优势，尤其是当房价高涨时。他们会选择去其他地方，这样一来，纽约与其他城市的差距就越来越大了。人们天生的群居本能和超级都市一起产生作用，从而在地理上将人们进行分类。

艺术家、同性恋与房价

与其他任何投资一样，高回报房地产投资的关键在于学会怎样提前找到投资的热点。多年来，房地产开发商和投资商对于我做的各城市地区业绩指数统计非常感兴趣，像波希米亚指数和同性恋指数。森林城市公司（Forest City Enterprises）是世界上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之一，该公司董事会的联合主席艾伯特·拉特纳（Albert Ratner）总喜欢跟我说，就凭他一个人对《创意阶层的崛起》一书的钟爱程度，就足以使该书保持畅销书的地位了。另一名房地产投资商也曾这样评价我的作品："你的书给我们提供了一份投资热点地图。"

我被这种联系吸引，于是决定做进一步的研究。2007 年冬天，夏洛塔·梅兰德和我研究了各种地区因素，比如公共文化设施、人口等，是怎样影响房地产价格的。[8] 根据经济学理论，价格是由供（房屋的供应量）和求（取决于居民工资和收入）之间的关系决定的。在新房屋较容易建造起来的地方，供应可以满足需求，因此价格就相对稳定。但是，如果一个地方需求很大，而城市规划的规则又非常复杂或严格，那么当居民收入

增加时，房产价格就会上升，房屋也会增值。

超级明星城市的房价之所以高，是因为房屋供应量相当有限。目前美国房地产市场还没有统一，造成各个地区间房价差距的原因有很多。在那些可以吸引高学历高收入人口的地方，房屋需求相对也大，尤其是有许多人愿意花大价钱在那里购买房屋。而2002年针对硅谷的调查也表明，那些有许多高科技、高速增长产业的地区，房价也极可能超过居民收入水平。

有更多公共文化设施和旅游景点的地区，房价一向较高，比如海滨城市，詹妮弗·罗贝克（Jennifer Roback）在1982年时就曾指出过这种联系，她认为，公共文化设施比土地价格和居民收入都更能决定房屋价格。[9]

其他的研究也证明了这点。在针对“消费性城市”进行的研究中，爱德华·格莱泽及其同事发现，在大城市里，房价的上涨速度一般都高于居民工资的上涨速度，这表明城市公共文化设施比高收入更能带动房地产升值。[10]格莱泽和他的同事们用一个简单的公式解释了这一点：城市人口溢价+城市文化设施溢价=城市房租溢价。

但是漂亮的海湾，路边的咖啡屋和自行车道并不是房地产投资热点的唯一指标。

“想知道什么地方是未来五年或十年内最佳的房地产投资地吗？看看今天的艺术家们都住在哪就明白了。”2007年度《商业周刊》上一篇题为《今天的波希米亚，明天的高额租金》① 的文章这样写道。[11]该文指出，社会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一直就将艺术家、设计师、音乐家和作家视为城市的先锋和促进经济发展的万灵丹，这些群体的存在不但可以刺激当地经济发展，而且会带动周边的房地产升值。

① 原文为Bohemian Today，High-Rent Tomorrow，Bohemian（波希米亚）用来指代特立独行的文艺人士。

地区经济学家安·马克森和她的同事们将这种现象称为“艺术红利”。[12]同样地，社会学家也表示，将日渐破败的市区改造为中产阶级居住区（一般由艺术家、创意工作者以及同性恋构成）的确会大大提升城市房屋的价格。

然而，艺术家和同性恋人口相对较少，他们对于房价的影响也就极为有限。截至2000年，美国一共有大约130万波希米亚人口，包括所有在艺术领域、设计行业、娱乐界和媒体行业工作的人。这一数目只占美国总劳动人口的1.3%。另外在美国，还有880万自称为同性恋的人口，大约占美国成年人口总数的4%。

人口这么少的群体真的可以对房价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吗?

我和梅兰德详细地调查了我们研究的所有因素。我们详细分析了高科技产业、人力资本、高收入人群、职位结构、工资水平、收入水平以及艺术家、波希米亚人群和同性恋人群对房价的影响。我们对美国300多个国际型都市做了调查，利用统计技术分离出以上各因素和房价间的关系，以及以上各因素彼此间的作用关系。调查的结果很惊人。

我们发现有两个因素在共同决定房子的价值。第一个很显然是收入——居民收入越高，房屋价格当然也就越高。但这一关系中的收入指的是财富的多少，而不是工资高低。除去资本收入和其他收入来源，工资本身并不对房屋价格产生影响。就这一点来看，教育水平、人力资本、创意阶层的存在和职业结构都不与房价构成正比。

第二个同样也是影响更大的因素已经在我们的波希米亚—同性恋指数中反映出来了。该指数综合了一个地区艺术家、音乐家、设计师人口多少的因素和同性恋人口多少的因素。不管我们使用哪种因素做变量，采用哪种分析模型，也不管是对哪个地区进行研究，都会发现波希米亚和同性恋人口的多少会大大地影响房价。

许多人认为同性恋不会带动房地产升值，但他们的确更愿意住在某些

地区。通过使用路径模型（一种将独立、中介和非独立可变量联系起来的先进统计工具），我们可以得出波希米亚人口、同性恋人口和其他因素与房价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我们最初的调查结果正中要害。我们发现这些人口的存在会直接影响房价以及其他变量（如居民收入和人力资本），从而使得该地区更容易吸引其他群体和各年龄层的人士。也就是说，这些群体的存在不仅会带动房价上涨，而且会拉动收入增长。

这又是为什么呢？我们认为，波希米亚和同性恋人群的存在凸显了高价房的两大鲜明特点。

第一就是审美型文化设施溢价。艺术家和波希米亚人群不仅会带来更多的文化设施，而且会吸引更多的圈内人。他们都是挑剔的买家，对文化设施、真实性和审美有很高的要求，而且都愿意聚集在能很好地满足这些条件的地区。

第二是宽容或开放的文化溢价。有着大量波希米亚和同性恋人群的地区文化融合度较高，从而可以吸引各种族、各民族和各行业的优秀人才。艺术家和同性恋群体聚居的地区通常也比较重视思想开放，尊重自我表达。

而且，因为这些群体在历史上被边缘化，所以他们更加自主，也更容易接纳外来人口。这些人白手起家，建立起了自己的社会网络，能够独立地利用各种资源，并创立了自己的组织和公司。

正因如此，在有着大量艺术家或同性恋居民的地区，革新精神、企业家精神以及创业精神通常都会比在其他地区更受重视。可见艺术家和同性恋人群对房价的影响比较间接。他们之所以造成房地产升值，并不是因为他们买了更多房子，而是因为他们能使一些房地产发展条件原已成熟的地区吸引更多的人。

当一个地方变得无趣时……

与其他事情一样，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从房价增长中获益。在美国一些超级大都市，房价已经高得有点离谱，除了真正的富豪，其他所有人都已负担不起。凯文·斯托拉里克的研究显示，房价特别高的地方包括海滨城市，如纽约、旧金山、圣迭戈和洛杉矶，以及高科技大学城所在地和高级旅游休闲地。专家和金融顾问一直以来都建议人们，一名普通居民的住房支出应该只占其总收入的25%到30%。但是在这些地区，一些人收入的一半都用于住房支出。

我与梅兰德进行的研究说明了造成房价过高的原因。房地产已经与一个地区的财富创造、生产能力以及经济发展状况脱离开了。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决定房价的关键因素是收入、人力资本以及当地的波波族和同性恋人口的多少，而不是当地的工资水平和职业结构。与工资不同的是，一个人的收入不受地域的限制。比如，佛罗里达州南部和其他一些地区有许多富人，但是他们的财富很有可能是从其他地方获得的。并不是工人们带动了住房需求的增长，而是因为人们的购房欲望强烈，加上人员流动性增强，才使得房价高不可攀。

不断攀升的房价会扼杀革新。许多形式的革新或创造活动，不论是高新科技产业、艺术画廊还是音乐团体，都有一个共同的需求，即廉价的空间。这正是简·雅各布斯的名言"新思想需要旧建筑"所表达的意思。正是从硅谷、圣迭戈、剑桥、麻省和纽约市中心那些曾经廉价的住所中，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鲍勃·迪伦（Bob Dylan）等名人们开始走向成功。而这些城市的廉价住所现在却极为难求，几个曾见证了高科技企业创业的硅谷车库现在都已改为博物馆了。随着房价不断攀升，建筑物都被改造成了昂贵的商铺或高端零售店，可供创造力成长的空间也会随之消失。

极端的高房价同样会阻碍一个地区吸引和聚集新的人才。三十年前，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或圣迭戈的加州大学的一名普通研究人员就能够在学校附近买一套房子。但在今天，一个年轻科学家要想在以上任何一个大学十公里以内的地方买到一套房子简直是不可能的。而且据我所知，大部分熬到四十岁已经成家立业的教授们也买不起。由于他们租的房子不断被改为商铺，他们也不得不在不同的公寓间辗转流连。当培育创造力和生产力的地区变成了那些富人们（这些人的钱通常从他处获得）的生活区时，当地财富创造的周期就会终止。在这一点上，雅各布斯曾极富先见之明地告诉我们说："当一个地方变得无趣时，富人也会随之离开。"

然而，不管怎么样，这些地区还是生存下来了。这部分归因于一些大学努力为自己学校的教师提供住房；其他一些人则选择拿出更多的收入来支付房租，或干脆两三人合租以减少房租开支；还有就是通过将创新人才聚集到一起，来增加地区的生产力。当然，一些行业，如金融和高科技，本身薪水就相当高，足够让其工作人员在纽约和硅谷这些地方居住了。

当我问一名大型投资银行的高层人员，曼哈顿不断攀升的房价是否会影响到他们公司引进人才时，他简单地回答道："我们是带动房价变化的原因，不会受到房价波动的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地区没有因高房价而付出代价。尽管目前曼哈顿仍然拥有较大的创意产业市场，而它真正的创造和革新产品生产却已转移到了外部城区、新泽西州附近的城市乃至费城的市中心去了。

房地产市场对地区的一个更大的威胁在于，它会阻碍人口的流动。《卧底经济学家》（*The Undercover Economist*）的作者蒂姆·哈特福德（Tim Hartford）最近在其《记事板》（*Slate*）的定期专栏中问道："为什么还有人愿意住在底特律这样一个日渐衰败的地区呢？为什么不搬到芝加哥或纽约？"[13]他文章中还引用了英国经济学家安德鲁·奥斯瓦尔德（Andrew Oswald）的一个研究，该研究结果表明房屋所有权最终会束缚人们，

尤其是那些不怎么富有的人们。[14]奥斯瓦尔德发现，在美国和欧洲，房屋所有权率与失业率成正相关，而且比与其他诸如工会组织情况或社会福利等因素的正相关性更强。哈特福德还指出，其他研究也表明，尽管有房者和无房者找到工作的几率相同，但无房者更愿意接受工作地点较远的工作。

房地产影响了人口流动。正如一名经济学家所说那样："房子是不会动的。"房屋的供应情况并不仅仅与经济发展情况有关。"不管底特律或特雷奥奇（Treorchy）的情况变得多么糟糕，房屋都还会在那，而且只要房价够低，就还是会有人想住在那。"哈特福德这样写道，"这就可能导致这样一种可悲的分化：那些自认为可以在繁华城市找到好工作的人会搬去大城市，并开始支付更高的房租。而那些对自己能力不够有信心的人则认为，与其失业时住在贵房子里不如失业时住在便宜的房子里。"这一简单事实表明了日渐衰败的城市"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仍然会拥有大量居民"。

就这方面而言，今天我们的住房提供方式与当今高流动性、高灵活性经济的要求有点不一致。美国一直以来就自我标榜是个能让大多数人都有房子的国家。我们常自豪地说，60%的美国人都有自己的房子。我们鼓励年轻人攒钱购买自己的房子，提供各种各样的公共刺激政策，包括降低抵押贷款利率和增加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总之，拥有自己房屋也成了美国梦的一部分。

我不禁质疑，这种美国梦是不是该只属于已经过去了的工业时代。创意经济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其灵活性。人们不断地更换工作，公司实施业务外包，技术革新使我们能够在以前从未去过的地方工作。越来越多的个人和企业已经认识到，要充分利用新机遇，迁移必不可少。奇怪的是，我们的房屋所有权体系却极大地限制了流动性。当一个国家三分之二的居民都被房屋束缚时，这意味着其经济必将受到重挫。

创意时代可能需要新的房屋供应形式，一种介于所有权和租赁方式之间的形式。在当今许多市场上，租比买更符合金融学理论。但是租赁房屋的选择性相对有限，而且翻修租来的房屋使之符合你的品位也很费钱。一个办法就是学习商业房地产开发商和管理商的做法。他们通常根据房屋所有者提出的要求建立办公楼，然后取得该房屋的长期租用权。正如我们所发现的那样，选择住在一个超级大都市或房地产投资热点城市的原因有很多，而想在那儿拥有一个家并不一定是原因之一。

第三部分

幸福的地理分布

WHO'S YOUR CITY?



9　幸福闪光的地方

一直以来，我们以物质的富足程度来衡量人类进步。财富就意味着成功。一个家庭的社会地位取决于它是否有车有房；一个国家的发达程度以国内生产总值为标准；一个城市的发展前景要看它给居民提供的经济机遇。我们并不因此而觉得人们肤浅。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物质财富就像一个物种，关乎我们的生存与发展。

但是就像亚里士多德曾说过的，人类把快乐放在第一位。人们越来越注重幸福，或者说注重“促进人类繁荣的有利环境”，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在2005年《时代》周刊封面故事中如是说，并引发了大量新的研究和报道。[1] 有些人可能会将这种新的关注点称做我们自恋时代的副产品。不管是在一些网站，如“MySpace”和“YouTube”，还是在2006年《时代》周刊“年度人物”的封面上，我们都可以发现其中好像暗藏着写有“你”字的镜子。我们的社会已经开始专注于自身和我们自己的幸福。而且不管你喜欢与否，这都不可能改变。

从事幸福研究的人们则认为，尽管金钱和物质进步仍然很重要，但是这些本身不能够保证人类获得真正的满足感。普林斯顿大学的丹尼尔·卡内曼（Daniel Kahneman）认为：“对财富和健康的衡量并不能反映整个社会完整的一面，也不能反映社会中某一特定群体所从事的活动。”丹尼尔因为在行为经济学上的开创性研究，曾获得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2] 绝大部分从事幸福研究的人都认为，真正的幸福源自良好的社会关系——和睦的家庭和亲密的朋友，还有我们所从事的有目标、有热情的工作。

哈佛大学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特（Daniel Gilbert）在他的畅销书《为什么快乐不幸福》（*Stumbling on Happiness*）中写道：“我们绝大部分人在生活当中至少要作出以下这三个重要的决定：“在哪里生活，做些什

么，还有与谁一起去做。”[3] 他也把“哪里”这个问题放在第一位，但是也像其他幸福研究者一样，他的书中绝大部分都还是在讲述“做什么”和“与谁做”这两个问题。

吉尔伯特以及其他的幸福研究人员都忽视了“在哪里”这个问题。但是很明显，幸福生活的许多组成部分，比如我们能赚多少钱，我们能学到多少知识，我们的健康状况，我们承受的压力，我们面临的工作机遇，还有我们所遇到的人，等等，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居住在哪儿。居住地在我们追求幸福的过程当中起着关键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是一切的前提。

本章以及接下来的一章主要讲述居住地点如何影响我们追求幸福生活的能力。我与盖洛普公司一同进行了大规模的关于居住地与幸福程度的调查。本章将根据这一调查来说明我们居住的环境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我们的总体幸福，而接下来的一章将列出在我们居住地中我们真正重视，或者真正能使我们快乐的事物。

寻找幸福

仅有金钱是不能够买到幸福的，幸福研究人员在这一点上已经达成一致。在较为富裕的国家中，大部分公民的生活质量较高，人们通常会从一些相对无形的事物当中寻求满足感，比如个人成就、自我实现、快乐，还有积极的情绪。塞利格曼和爱德华·迪纳（Edward Diener）全面总结了该领域的上千项研究，并予以解释。他们写道：“因为商品和服务很充足，简单的需求在现代社会得到极大满足，所以现在人们能够奢侈地将注意力再次转移到‘高品质生活’上面，即一种身心愉悦、充满意义、丰富多彩、能够实现自我价值的生活。”[4] 他们还指出，人们“将幸福感和满足感置于金钱之上，作为人生的目标”，并且强调发达国家应该像注重收入和经济发展那样关注人们的幸福。如果存在 GDP（国内生产总值）这

一说法，为什么不能有一个GNH[①]代表国家幸福总值呢?

毫无疑问，幸福与收入相互关联、不可分割，但是程度有限。发达国家的人们普遍比不发达国家的人们更为开心。但是在跨过某一特定的收入“门槛”后，金钱和物质商品对幸福的影响就减少了。更高的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并不一定会增加幸福感。美国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自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得到极大的增长，然而其国家幸福感指数实际上保持不变。

与幸福感相关的深入研究发现，一旦年度收入增长到每人10000美元时，幸福感的增长就开始减缓甚至停止。而每年收入10000美元这个数目还不是很大。同样惊人的是，当研究人员关注个人而不是国家时，他们发现幸福感的确是伴随着收入的增长而增加的，收入达到一定值后，收入与幸福感的关联性会减小。

其他的研究表明，一方面金钱与幸福感的关联的确存在，传统智慧却削弱了这种相关性。并不是说越有钱的人就越幸福，而是更幸福的人可能更会赚钱。迪纳与塞利格曼这样写道：“收入与幸福的特殊关联多半是因为幸福感会带来更高的收入，而不是说更高收入能够带来更强的幸福感。相比于不幸福的人，幸福的人能够继续赚得更多。”不幸福的人通常会将时间和精力用于追求物质商品，他们变得功利，忽略了在研究人员看来对个人成就影响最大的人际关系与经历。一辆新车、一套新的高尔夫球杆、一个新的手提包，甚至一套新的房子只能使拥有者获得短暂的幸福感。这是因为汽车可能会有刮痕，手提包可能会过时，新房的地下室也可能会漏水。经历和人际关系即使有好有坏，通常也能够比其他任何物质商品带来更为持久的幸福感。

如果金钱并不能带来幸福感，那么又是什么让我们真正具有幸福

① GNH是英文Gross National Happiness的缩写。

感呢？

研究表明，充满活力的社会生活就是答案之一。与自己喜欢的人一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种人通常比其他人更快乐。

良好的生理和心理健康状况也可以增加幸福感。毫无疑问，患有抑郁症以及其他心理疾病的人的幸福感要比健康的人低得多。

幸福感绝大部分取决于个人的人际关系质量。与配偶或者恋人，与孩子之间的亲密关系，与家庭成员和朋友之间频繁而有意义的交流，这些对于个人的幸福都至关重要。研究还发现，总的来说已婚人士比单身人士更幸福。此外，宗教信仰也能够给人们的幸福感带来非常积极的影响。

幸福与个人的工作相关，然而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关键在于工作的实质而非工资的高低。

地点与幸福的关联

地点是幸福感研究领域中一条缺失的线索。这一点让我很惊讶，因为有太多人都从他们的居住地获得极大的乐趣和满足。绝大部分研究在地点因素方面最大的成就就是调查了通勤的负面影响。总的说来，通勤是我们生活中最不开心的事情之一。

但即使是这些通勤的研究人员也忽略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尽管通勤有许多的不良影响，人们还是得选择通勤。2007 年《纽约客》上的一篇文章写道：在美国，大约每六个工人中就有一个每天通勤要花超过 45 分钟。“极端通勤者”（即每次通勤单程时间超过 90 分钟）的人数增长最快。[5] 那么人们为什么选择通勤呢？答案也很明显：他们还不能够将房子搬到离工作地点更近的地方，或者说他们不乐意这么做；同时他们也不能或不愿意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工作。不管是出于哪种原因，很明显，他们都得往返两地。有些事情让这种短途旅程变得值得，比如维持一份好的工作，在自己喜欢（或者靠近自己爱的人）的地方居住，在充满鼓励的环境中工作，

与自己年迈的父母待在一起，等等。但是在我看来，目前还没有哪一项研究系统探讨过为什么地点仍然是我们幸福感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在与盖洛普公司的合作中，我进行的一项主要研究就是我所谓的“居住地与幸福程度调查”。我们把幸福感划分为四个基本范畴。其中有三个是我们从一些主要的幸福感调查中总结出来的，即个人生活的幸福感、工作的幸福感和财政金融上的幸福感。除了这三种幸福感，我们还增加了第四种幸福感，也就是居住地的幸福感。这个调查直接问及人们对于自己社区的满意程度、在社区的一些经历和期望、留下或者搬迁的意向、是否会向自己的亲戚朋友推荐该社区。

随后我们着眼于那些可能影响社区满意程度和人们总体幸福感的地点因素，就当地的就业市场、学校教育、卫生保健、文化艺术、公园及户外场所等其他因素进行提问。最终我们就幸福感和社区满意程度提出了100多个问题，涉及我们所能想到的方方面面。我们进行了预备调查并且对数据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以保证我们最终得出的答案能够如实地反映我们想要验证的观念和理论。在2005年夏季的第一次调查中，美国22个城市中的2300人接受了调查。一年之后的后续调查涉及的群体更广，全美大约8000个社区中有超过27000人接受了调查。这些样本涵盖了各种收入水平、职业类型、年龄阶段、民族种族、家庭类型、性别取向和教育水平的人。

我们的研究成果还表明，居住地点对于我们的幸福感极为重要。居住地点、人际关系和工作一并构成我们幸福三角形的三个角。当受访者被要求根据工作、经济状况、个人生活和地点等因素对幸福指数从1到5进行评分时，地点因素共得3.63分，仅次于个人生活因素（4.08分）和工作因素（3.98分），然而却高于经济因素（3.46分）。

为了更加准确地衡量这些因素是如何相互作用和影响幸福感的，卡耐基梅隆学院的伊伦·迪娜格里（Irene Tinagli）和我一起进行了多变量数

据分析，包括对居住地满意程度、工作岗位满意度和经济状况满意度的衡量，对压力感和安全感的衡量，以及对年龄、民族、性别和收入等人口统计学因素的控制变量衡量。

根据迪娜格里的分析，居住地、经济状况和工作满意度在总体生活满意程度变量中占四分之一，这从统计学角度看是一个很大的比例。并且我们发现包括收入在内的所有这些人口统计学因素整合起来只占总体生活满意程度变量的 1.2%，因此四分之一这个比例的重要性就更为明显了。与教育或者收入相比，我们的居住地对于幸福感的影响更为明显。

当我们从另一方面来衡量幸福时，这一点又得到进一步的证实。更多的沮丧和压力反映出更低的幸福感或者满意程度。不管是在美国还是世界各地，压力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受访者中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人表示自己至少有中度压力，有 11% 的人称自己有“严重”压力。但是几乎没有人认为居住地是压力的来源。当被问及是什么让他们感到压力最大时，30% 以上的人认为是工作，20% 认为是经济状况，13% 认为是家庭，10% 认为是健康，8% 认为是犯罪，只有 3% 的人认为居住地本身是生活压力的来源之一。在所有可能导致压力的因素当中，居住地的排名绝对靠后。

迪娜格里和我同时也注意过其他因素，如收入、教育、年龄和性别是如何影响我们对于居住地的满意程度的。调查结果表明以下一些明显的趋势：

收入：通常来说，收入在我们对社区满意程度方面的影响相对较小。但是当我们锁定某一特定的收入群时，很明显，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社区满意程度与收入成正比。在年收入不足 2 万美元的人中，仅有 43% 表明对自己的社区满意或者非常满意。而对于年收入在 2 万 ~4 万美元的人群中，这一百分比上升到了 56%；在收入为 4 万 ~6 万美元的人中有 65%；年收入 6 万 ~10 万美元的人中有 72%；而在年收入为 10 万 ~15 万美元的人中达到最高值——77%，然后随着收入继续上涨，这一百分比开始呈下

降趋势。

住房所有权：很有趣的是，一方面绝大部分人认为有房是所谓的美国梦的核心所在，另一方面，调查结果却表明，实际上租房者对自己社区的满意度比有房者略高。

教育：大部分研究发现教育与职业和财务上的满意度密不可分。人们受教育越多，就越容易感到职业和财务上的满足。迪娜格里同时还发现，教育和对居住地的满意程度也存在积极的关联。73%有研究生学历的人和68%有大学本科学历的人对自己的社区满意或者很满意，而在高中以下学历的人中，这一比例为57%，仅有高中学历的人中，比例为63%。相反，这些没有高中学历的人对于居住地不满的比例比有高中学历的人高出一倍多，分别为16%和7%。有更高学历的人在居住地方面有更多的选择和更大的流动性。

婚姻状况：已婚人士比单身人士对自己的居住地更满意。已婚人士中有69%的人表示对自己的居住地满意或者很满意，相比之下，单身人士中，这一比例仅53%，离婚人士中为60%。

年龄：总的说来，年长的人更满意自己的社区环境。65岁以上的人群中，有71%的人表示对自己的社区满意或非常满意，相比而言，25~45岁的人中，这一比例仅为65%，25岁以下的，仅为56%。

种族：种族对于社区满意度有着极大的影响。在所有的种族团体中，西班牙人对社区的满意度最高，紧随其后的是白人，非洲裔美国人对居住地的满意程度很低。

城市与乡村

在确定居住地和幸福之间的关联之后，我和团队随后研究了各种各样的社区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幸福感的。

我们发现不同的城市，以及不同种类的社区会从不同方面影响我们的

幸福感。有一部分原因是我们的社区不仅仅是物理概念上的地点，而且还孕育着就业市场和人际关系。有一些城市在各个方面都排名靠前：比如丹佛和奥斯汀。这些城市中的人们对自己的个人生活、工作岗位、经济状况还有社区本身都十分满意。

其他社区则不这么面面俱到，它们只是在某一方面较为突出。在华盛顿这样的地方，鸡尾酒聚会上第一个问题通常是“你做哪一行”，而不是“你住哪儿”。这些地方的受访者认为，工作上的满意度对总体幸福感的贡献最大。

根据“居住地与幸福程度调查”，有些地方的居民从他们的个人生活中获得的幸福感特别多，这个地方就是新奥尔良。尽管有传言说它的社会阶层分化很严重，但是我们在那里进行的满意度调查中，新奥尔良市民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度比其他任何城市的市民都要高。

前面说的都是些大城市，它们是由市区、郊区及老城区构成的。许多人认为住在郊区或者农村比住在人口稠密的城市中心区要幸福些，但皮尔中心（Pew Center）于2006年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总的来说，这只说对了一点点。

人们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找到幸福。有些人可能会在小镇平静的生活中找到安宁，但是其他许多人喜欢在喧嚣的都市中找到归属感。

根据“居住地与幸福程度调查”，给城市居民带来满足感的事情可能不是乡村居民所看重的。乡村居民从洁净的空气和自然美景中得到快乐，而城市居民看重教育、工作机会和安全感。城市居民重视自己迎接挑战和结交新朋友的能力，他们也注重接触不同的文化，比如去剧院、博物馆、美术馆和音乐会，在酒吧、俱乐部及餐馆中过着充满活力的夜生活。他们享受着公共交通的便捷，许多市民告诉我，他们宁愿不开车或者不买车。他们的快乐也源自他们生活的社会，即一个面向不同种族、不同民族、移民、年轻人及同性恋者的社会。当孩子自立搬走之后，他们把城郊的大房

子换成市区的公寓，或者搬到离市中心近一些的地方。也许他们一生的梦想就是生活得离热闹的城市中心区更近些。

但，最有趣的是，调查表明我们大多数人都对自己所选择的居住地感到满意。

在被问到对自己生活的社区是“满意”还是“非常满意”时，68%的城郊居民、67%的乡村居民和64%的城市居民都选择了后者。有超过一半（56%）的城市居民、57%的城郊和乡村居民认为自己生活的社区是最好的或者近乎完美的。

当被问到愿不愿意把自己生活的社区推荐给朋友时，61%的城郊居民、57%的城市居民及57%的乡村居民都表示愿意。

许多受访者说他们不会搬家，其中有71%的城市居民、73%的城郊居民及78%的乡村居民（这一类人群从最传统的角度来看是与土地联系在一起的）。即使是在纽约，居民们在调查中的回答也击败了其他人。尽管纽约以冷漠和毫无特色著称，但9·11恐怖袭击之后，纽约的自尊世人皆知，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虽然不是所有人，但我们中有许多人正在寻找适合自己居住的地方。

迪娜格里在她对“居住地与幸福程度调查”的分析中发现，任何地方的居民都同样注重自己社区的内涵，不管是城市、郊区还是乡村地区。说实话，城市居民和乡村居民对于自己生活的社区的体验是不同的，但是，地点影响幸福感的心理机制是非常相似的，大致有三个基本的原因：

首先，地点是兴奋和创意的主要来源，而兴奋和创意是人类心灵满足的基本组成部分。研究创意的顶尖心理学家米哈利·奇凯岑特米哈伊（Mihaly Csikszentmihalyi）一直以来都认为，创造性的活动，比如写作、演奏音乐、计算机编程、爬山及下棋都是快乐和生产力的主要源泉。他说这些活动使我们处于一种“心流”的状态，或者说是注意力高度集中、不受干扰的状态。[6] 这种状态的好处就是能使我们既快乐又有创造力。最

具创造力的人可以在良好的互动与专心致志之间往来自如 。在处于“心流”的状态时，他们更容易成为最快乐的人。

奇凯岑特米哈伊告诉我，伟大的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常常敞开办公室的门。如果是一般的旁观者，就会认为他好像无所事事。但实际上，戴森搜寻着有趣的走廊对话所带来的刺激。一两周之后，他会紧闭办公室的门独自一人开始为新的发现而工作。有创造力的地方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比如布鲁克林大街的表演现场，或者硅谷的高科技园区，它们到处都有能够激发人灵感的文化产物，在那里可以见到大人物，可以同他们一起工作，还可以享受充满激情的户外活动。这里有大量的外部刺激让你投入其中，同时这里也有很多私人和独立思考的空间。

我早期与罗纳德·因格哈特（Ronald Inglehart）进行的研究记录了创造力、自我表现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但是创造力与自我表现也是与人的快乐和幸福联系在一起的。哈佛商学院的特里萨·阿玛贝尔（Teresa Amabile）在对工作表现的研究中，发现幸福会让人产生创造力。[7] 对大量的因素进行了控制之后，阿玛贝尔和她的研究小组发现，好情绪可以产生灵感和创新，他们也发现创新能产生好的情绪。

找到一个能让我们快乐的地方对“激活”我们自己起很大的作用。这样的地方激励人们去完成他们无法完成的任务，比如开展更具创造力的活动，进行新的发明，或者开办新公司，这些都不仅让他们获得成就感，也让他们在经济上获利。迪娜格里发现这种“激活”很大程度上来自于那些地方所提供的视觉和文化刺激，比如公园、开阔空间、文化产物，她将这些称为“象征性的设施”。这又产生了一个循环：那种刺激激活了创造力，产生较强的创新能力，促进更大的经济繁荣，带来更高的生活水平，然后还会产生更多的刺激。

第二个原因与自我感觉有关。一般说来，人们从成为自我，从培养自己的个性中获得幸福。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早就指出，自我表现是产生幸

福感的一个主要因素。地点是实现幸福的一个途径，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我们能接受的环境，并使之为我所用。当今流动性社会的一个不可否认的优势就在于，我们不再在自己身上打上出生地的标记，比如祖上传下的规矩、家族的习俗、宗教及家乡等。如果愿意，我们能够根据我们的需要来重造我们的身份，比如工作、生活方式、个人兴趣等。尽管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这点，但我们都在寻找适合自己心理需求的地方来掌控自己的生活。

第三个原因就是凡事都有两面性，也给予我们归属地，让我们产生自豪感和归属感，也给我们提供了自我认同，提供了我们赖以生活的有形和无形的空间。有些人热衷于地方球队；有些人因迷人的自然风光而备受鼓舞；还有一些人因拥有和睦友善的邻居而开心。一旦我们认定某个地方适合我们，我们就会像佩戴荣誉勋章一样对待它。

既然我们大致了解了居住地通常是如何样影响个人幸福的，那么我们喜欢或者不喜欢的那些地方对我们的幸福感会有什么影响呢？又会有哪些让我们对社区感到满意或者不满的事情呢？



10　超越马斯洛之城

1945年，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提出需求层次理论（the concept of a hierarchy of needs）。[1] 马斯洛的这个理论常用一个金字塔的形状来描述，食物、水、空气和性这些基本的生理需求构成了金字塔的最底层，再向上几个层次的需求包括安全需求、归属感与爱的需求、自尊需求，直到最高——自我实现需求。只有通过首先实现初级的四种需求——马斯洛称之为"匮乏性需求"，这些需求是由于心理或生理的某些欠缺而形成的——我们才能够到达金字塔的顶层，并且发挥我们真正的潜力。

直到1970年，马斯洛逝世那年，他才发现他最初的自我实现需求理论并不完整。他拓展了自我实现的领域，增加了人类对知识的不懈追求和对美的一贯渴望。因此他创立了一个更高的层次，称之为"超越性灵性需求（Transcendence）"。如果有人实现了前面所提到的各种需求，进而达到这一层次，就会感到有义务去帮助他人以获得一种充实感。这些更高层次的需求看起来与我们的生理需求毫无关系，但是在现代这个物质充裕的社会，我们的心理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这些需求的影响。它们通过各种方式来激励我们，并且成为我们幸福生活的关键。

但有趣的是，人们都希望金字塔最上层的需求得到满足，但是忽略了底层的需求是否实现了。马斯洛的理论所暗示的是，要实现某一层次的需求，前提是前一层的需求已经得到满足。也就是说，在人们实现自我尊重的需求之前，他们需要满足基本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但是在当今"拥有者"和"不拥有者"比邻而居的社会中，没有人认为实现金字塔最上层的需求是一件奢侈的事。其中的一部分原因与"美国梦"有关，人们除了被赋予生命和自由的权利之外，人人都能够享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这样的话，自我实现的过程被看做是一种权利，并不需要努力去争取。

但是关于城市的讨论仍陷于非此即彼的争论中。甚至在这个物质条件发达、鼓励自我表现的社会，一些城市规划专家及社区的领导人仍然认为人类最基本的需要才是最重要的。他们认为，一个好城市应该有好学校、安全的街道，还有最新的基础设施。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公园、风景小道、博物馆或其他的文化设施都是奢侈浪费，是为了满足那些富人、雅士以及上流社会而建造的。还有的人认为，只有一个城市富裕起来以后，才能够修建这些文化设施。要创造财富和获取收入，就必须要有工作和基本服务，之后用创造的财富和获取的收入去换取社会中其他的东西。本章要证明这些观点是错误的。让我们真正感觉到快乐的地方并没有被限制在上述“此消彼长”的关系中。这些地方包括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不仅仅有好的学校、安全的街道，还有美丽的公园供我们散步。

本章所要讨论的是，在人们生活的地方，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在这个问题上，长期以来的观点大多是故作姿态地空喊口号，我们要超越这种理解。本章通过分析“居住地与幸福程度调查”中 27000 多个受访者的回答来确定一些关键性因素，并且研究这些因素如何影响人们对居住地的满意度。

这项调查总结了许多城市的具体特点，我们先将这些特点分为以下五大类：

- 第一类是个人安全和经济安全——也就是对犯罪、经济形势和就业保障的感受。
- 第二类是基础服务——教育、医疗、可支付的住房、道路以及交通。
- 第三类是领导层——包括当选或未当选领导的素质和效率以及当地民众参与决策的机会。
- 第四类是开放度—— 对多元化社会群体的包容度，这包括有儿童

的家庭、少数民族或其他种族的群体。

- 第五类是美感——包括物质环境的美观、公共设施以及其他文化设施。

这次调查收集了大量的统计数据，我们也观察了收入、教育、职业、年龄、种族和道德修养等一系列因素是如何影响人们对居住地的评价的。

那么，美国人认为自己生活的城市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尽管以上五大特点都很重要，但其重要程度各不相同。最重要的两个是美感和基本服务，紧随其后排名第三的是开放度。（可以参见附录B，获取这次调查的主要数据。）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并没有所谓的“此消彼长”，至少对于这2.7万名接受“居住地与幸福程度调查”的受访者来说如此。毫无疑问，每一种特点都很重要。

美丽溢价

我们的发现强调了美感在我们社区中的重要性——这包括物质环境的美观和户外空间，虽然这可能会有些争议，但实际上是言之有理的。大部分人都希望自己的社区能够提供基本的服务，并且大部分社区都做到了。我们的调查表明，人们极其重视基本服务。

但是，美感也非常重要。人们对自己社区的外观环境、休闲设施及其风景评价越高，他们对社区的总体满意度也就越高。因为大部分社区能够提供基本服务，所以我们就更加重视美感。这好比买车，如果车子在质量上有巨大的差别，人们肯定会选择高质量的车。但是现在大部分人都知道车子的质量有一定的标准，因此他们更多考虑车身的设计、款式、造型以及自己的偏好。

弗吉尼娅·波斯特尔（Virginia Postrel）在《风格的本质》（*The Substance of Style*）和她的其他著作中，表明了自己对美感的经济潜力和价值的深入理解。[2] 她写道：“只需要稍许的安定以及聊以维持生计的食物，

人类就会通过礼仪、个人服饰和装饰品来丰富自己的生活和感受。”原始人生活在洞穴，并且整日为食物奔波。即便如此，他们也知道用宝石和脂粉来装扮自己，并且用篮子和瓷器来装饰自己的住所。波斯特尔认为，人类本能地使某种东西变得别致，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情感或感官上的需要，更是一种普遍的内心的渴望。

芭芭拉·斯坦菲尔德（Barbara Steinfeld）生活在佛罗里达州。她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时候失去了工作。失业前她为该州的旅游业做市场推广，她认为她生活的城市奥兰多是旅游圣地。但不管她付出多大的努力，仍找不到与之前类似的职位。她于是想搬到俄勒冈州，虽然她在20年之前只在俄勒冈待过几天而已。不久之后，她就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旅游局发现了一份文化旅游主管的招聘启事。她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喜欢的工作，她说：“这个正是我想要做的工作。”她最终得到了那份工作。她认为俄勒冈正是适合她的地方，感觉好像是穿上了一只老“勃肯鞋”[①]。她爱上了俄勒冈的激情活力、含蓄的气氛、美丽的自然风光、浓厚的文化氛围，还有决策制定中公众的高度参与以及美味可口的菜肴。她还喜欢这怡人的气候——不冷不热，一直都有新鲜的空气。城市周边也适于散步，街道充满活力。她说：“起初的五年，当我步行到市区去吃午餐时，我感觉每天都在度假。”她曾经在佛罗里达、美国中西部生活过，她感觉与那里格格不入。但是现在，她头一次真正感觉到生活在一个地方能如此舒适。这个地方足够大，有一个发达的犹太人聚集地、一个同性恋居住群和一个艺术区，位于市中心，还可以免税购物。多亏有了城市发展限制规定和充足的绿色空间，这个地方看起来又像一个小社区那么小。

那么美感是怎样使得我们对自己的城市感到满意的呢？为了了解为什么美感与我们的生活联系如此紧密，“居住地与幸福程度调查”要求受访

① 世界知名的德国凉鞋品牌，拥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以穿着舒适著称。

者对自己所生活区域的各项外在环境因素进行重要性排序，如总体外观、户外公园、操场、休闲小道、气候和空气质量。然后我们将排列结果与人们对城市的满意度进行比较，结果非常有趣。城市的外观是最重要的一项因素，接下来是户外公园、操场和散步小路。气候和空气质量也比较重要，但没有前两项重要。

那么，马斯洛的理论都是错误的吗？波斯特尔认为，如果马斯洛的理论单凭简单的金字塔来描述，那么就会导致一个错误的结论：美感只是富人才关心的奢侈品。波斯特尔指出，在金字塔的各项需求层次中，人们并不用先完全实现下层需求才能实现上层需求。她说："我们对更上一层有需求是由于我们已经获得了基本需求……一些需求的边际价值最初是很高的，比如说食品或房子，我们不希望在暴风雪中忍冻挨饿而死。相对于其他包括美感在内的需求，这种需求的边际价值下降的速度要快得多。"人类酷爱美丽的外观，我们希望我们身边的各种事物都是美的，尤其是我们生活居住的地方。

经济学家称这种现象为"美丽溢价"。人们被更美观的事物吸引，也愿意为此付更多的钱。2007 年，英国和荷兰的经济学家一道开展了一项研究，他们想找到那些在一档荷兰选秀节目中被淘汰选手的外表特征。[3] 研究发现，选美效应也扩展到其他方面。人们对于长相漂亮的人更加偏爱，对长相不讨人喜欢的人有更多的偏见。尽管人们没有相应的理由歧视那些长相欠佳的选手，但研究者发现漂亮的选手被淘汰的几率要小很多。在首轮比赛结束时，长相欠佳的选手被淘汰的几率要比其他选手高出近两倍。此项研究的结论就是：长相欠佳的选手遭受偏见，这与他们在比赛中的表演或举止无关。如果人本质上就会疏远长相不好的人（我们暂且不考虑这种歧视所带来的心理损伤），那么我们如此看重我们所在城市的外观也是无可厚非的。

根据这种思路，有人会说那些处在工业"锈带"（衰落地带）的城市

应该被淘汰。在美观、气氛格调、自然景观以及户外休闲方面，匹兹堡或克利夫兰怎么能跟像洛杉矶、西雅图、博尔德或奥斯汀这样的城市媲美呢？实际上，在匹兹堡和克利夫兰，美感并不简单地来自于漂亮的公园和巍峨的山脉。一些有历史的城市既有美丽的自然风景，又有工业时代的建筑，这是一种绝妙搭配。这些城市到处都是过去的大仓库、历史遗址和美丽的风光。许多惊艳的城市公园群都是由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伟大景观设计专家们精心设计出来的。

我在匹兹堡生活了近20年，我深爱这里工业时代的独特景色。我发现，匹兹堡三条美丽的河流与其衰败破落的工业老城区之间的地带十分吸引人。至今，匹兹堡留在我脑海中最深刻的记忆便是骑着自行车穿过工业区，一直奔向崎岖的远郊，那才是考验一个人登山技巧的时候。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喜欢匹兹堡，但是我在那里的生活经历告诉我，每个地方总能够吸引一些人。

凭借其迷人的20世纪风格的建筑和漂亮的城区，芝加哥湖区的复兴证明了历史悠久的城市能够突出自己独特的美丽品牌。这得归功于市长理查德·戴利（Richard Daley）先生。他没有局限于那些地标式建筑，比如说千禧公园或改善后的湖区，而是通过改造社区公园和花园、植树、安装公共文化设施以及增加手绘长凳和城市花坛来改善许多社区的环境。

我有一次开车去芝加哥大学参加一个研讨会，途中经过一个社区。当时我的伙伴特里·克拉克指出我们正在经过的这个社区其实是个低收入群体聚居区。我感到很吃惊：繁茂的树木遮蔽天空、整洁的街道还有社区公园，这些特征只会让我联想到富裕的社区。我突然意识到，那些不太发达的城市之所以看起来“贫穷”通常是因为缺乏树木和绿色空间。

尽管许多人喜欢他们的城市整洁干净，我却钟爱多伦多的“混乱都市主义”——高耸的公寓紧邻着衰败的维多利亚城，奢华的时装店与夫妻店相邻，林荫小道与交通拥堵的商业街纵横交错，陡峭的峡谷穿过人口

稠密的社区，路上充斥着有轨电车、大巴和豪华轿车。[4]

社交

决定我们对自己生活的城市的满意度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能够结识更多的人并与他们交朋友，这点毫无疑问。

然而很可惜，我们当中越来越多的人缺乏这种能力。2006 年，来自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和杜克大学的一些社会学家做了一项研究。他们发现，在自己所在群体中感到被孤立的美国人的比例从 1985 年的 10% 上升到 2004 年的超过 25%。这项研究中被孤立的定义是没有倾诉个人隐私的对象。[5] 研究还发现，对被孤立感受最深的群体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可能是因为这群人长期出差并且工作时间过长。研究者还表示，人们在家里花大把大把的时间在电脑上，但却忽略了与家人的沟通。调查还表示，自 1985 年以来，人们的最大改变是邻里关系的疏远。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一个人生活，其中大部分人都缺少朋友或住在附近的亲人。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许多受访者都希望他们生活的城市能够方便他们与他人联系、建立新的亲密关系。那些生活中有朋友的人很珍惜自己所得到的，你可以去问问任何一群一起生活、一起活动的单身青年。作家伊桑·沃特斯（Ethan Watters）称这些群体为“都市部落”。[6]

文化饕餮

为了提高城市声誉、促进经济发展，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城市大力发展文化。“居住地与幸福程度调查”发现：尽管不如美感和社交重要，文化和夜生活在居住地满意度方面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相较于我钟爱的交响乐、歌剧和芭蕾艺术（我用 SOB 来称呼这些艺

术形式①），现在的人们对文化有着更宽阔的视野。尽管这些文化形式仍然吸引着很多看客，但是最具活力的文化城市是将高雅艺术和街头艺术、音乐和戏剧场景相融合。在现代社会，很多人无法掌控自己的日程安排，时间也逐渐成为我们最稀缺的资源之一。以前的人们有足够的时间从事“课外”活动，现在，要提前计划都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即便不能用有趣的活动填满日程表，人们还是希望能够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事实上，如果灵感闪现或有亲戚朋友来访，这样的机会唾手可得，这对于我们来说就足够了。[7]

回到基础服务

基础服务也影响到我们对社区的满意度。人们对自己城市的基础服务评价越高，他们对自己城市的满意度也越高。尽管有点啰唆，我还是想强调，根据“居住地与幸福程度调查”的结果：美感和基础服务之间并不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在评价到我们对自己居住地的满意度时，两者都很重要。

这项调查要求人们评价自己居住地基础设施的几个方面：小学和中学、学院和大学；医疗设施；就业机会；交通状况和公共交通工具的选择余地；住房以及宗教设施。

在这些因素中，居住地是否有小学和中学非常重要。人们需要让孩子在本地的小学和中学受教育；而达到上大学年龄的孩子有能力去远方接受高等教育。

这项调查最令人惊讶的发现之一是，那些将居住地离大学远近列为最重要因素的人们受过的正规教育反而相对较少。其中的原因可能是他们认为高等学府能够为孩子学习树立榜样，激励他们学习，或者可能他们认为

① 英文中交响乐、歌剧和芭蕾的首字母分别为 S(Symphony)，O(Opera)和 B(Ballet)。

这样方便自己接受继续教育，还有可能是因为他们（以及他们的孩子）没有条件搬来搬去，他们必须靠近各级教育机构——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这样就可以节省路费开支了。

在基础设施因素中排第二的是医疗服务：这是幸福的前提。紧随其后的是就业机会。这并非指任何具体的工作，而是指在个人喜好的领域内的工作。但是大部分城市在满足这一方面需求上不尽如人意。根据这次调查，只有约17%的受访者认为城市的就业机会还不错；超过三分之一的人认为“差”或“很差”。这就表明了在人们喜欢居住的地方和他们想要从事的职业之间潜伏着一种矛盾。我的看法是，我们在选择居住地和工作地点的时候需要考虑这点，并且要做出折中的选择。

宗教信仰也很重要。80%的受访者在居住地的宗教信仰服务方面都表示“满意”或“非常满意”。我们发现宗教设施和社区满意度之间有一定的关联，但并不明显。

不同的社区在宗教信仰方面差异明显，但越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居民越容易形成世俗的生活方式，比如西雅图和洛杉矶，但在新奥尔良和底特律就不是如此。他们不再去教堂，而是选择非传统的方式来进行宗教活动。

这种现象也引起了其他人的关注。许多宗教领袖和社区活动家正试图调整计划以适应这类人群的需求。罗德·加尔文（Rod Garvin）是我在北卡罗来纳州组织“创新社区领袖倡议”（Creative Community Leadership Initiative）时遇到的。他在他的个人博客上写道：

> 所有的基督徒是否可以团结起来一起解决一些棘手的问题呢？如果社会对同性恋的接受度增高会怎样呢？种族隔离是一个全球问题，但是与大多数的公司和社区相比，各类宗教的教堂间的隔阂才是最严重的。尽管有一定的个人原因，但贫困和低收入主要还是由经济结构和政策造成的。我们是否可以完善资本主义经济并且使社会更加富裕？

加尔文叹息道，那些有创意的人都纷纷离开组织严密的宗教体系，转而寻求较少等级制度、更为纯朴自然的灵性和精神诉求。这和其他在大型组织中工作的人遇到的情况很相似，组织严密的宗教很难适应新情况，无法用积极发展的眼光去看待变化。他还告诉我，这些宗教组织绝不能那么"制度化"，那么正式刻板，而应该成为更有创意的社区组织，能够用灵活的方式随时回应人们的精神需求和人文探究。

"居住地与幸福程度调查"还表明，像房价、交通状况和公共交通系统这些因素对城市满意度的影响并不大。但是，如果一个城市房价过高，交通状况特别糟糕，那么这些因素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非常关注他们所在城市的房价，4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目前可以选择的交通出行方式并不满意。持此类意见的大部分人都来自近年经济持续增长，拥有高水平人力资源的地区，也就是本书第5章所讨论的才能都市，比如洛杉矶和华盛顿。

许多人都不得不权衡地段和房价，塔拉·比尔德（Tara Beard）就是这样。她刚搬到了明尼阿波利斯的菲利普斯市中心，主要是她能够承担那里的房价。"许多人并不理解我为什么要搬到这里来，"比尔德说，"这可能是明尼阿波利斯第二糟糕的居民区了，在这里生活很辛苦，让人没有希望，还提心吊胆，但是这里的房价还行。"她还补充说，她很不理解比她收入少的同事选择了比她家房子贵三倍的居所。她说："我们每年大约挣10万美元，在房贷、契据和水电煤气等生活用品上要花掉30%。这就是我选择生活在一个糟糕的居民区，住在维修过的房子里的原因。房价和收入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对于我来说，没必要与别人攀比，量入为出过好日子更重要。"

比尔德和她的家人都为他们房子位于一条自行车道附近而开心，她每天骑自信车去位于市区的办公室，距离还不到三公里。家距离她常去购物的商店不到两公里，离公交车站和轻轨车站也不远，这个社区也很多

元化。

“我喜欢每天碰到与我不同的人，”比尔德说，“我也希望能够通过随意的交流驱散因为差异而带来的恐惧，同时能避免用负面情绪来看待问题。我认为每个人都有责任尽可能多地体验方方面面不同的生活。这对成为一位良好的社区成员和有奉献精神的市民很重要。在这个社区里，我听到的西班牙语或索马里语可能比英语还要多。我毫不怀疑所有人平等享有这个国家及它所有的一切。”

但是她所生活的社区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比尔德说：“我们经常能听到枪声。如果碰到住在附近的毒品贩子，我们就会有生命危险。最烦人的是噪音，汽车的喇叭声整夜不停。在我们希望入睡的时候，人们的吵嚷声和口哨声在街区上来来回回，我们很少能睡一个完整觉。我每次穿过街区的时候，几乎都能碰到拉客的妓女和兜售毒品的毒贩子。”

即便如此，她表示住在这里还是很值的，“对于我来说，住在这里是双赢的事情：我能够把钱攒下来，为把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而贡献自己的力量，用环保快捷的方式去我想去的地方。我还能了解各种各样不同的人，学会如何应对挑战和克服恐惧。”

开放的城市

格温·斯迈尔（Gwenn Seemel）出生于法国，她去过很多地方，但最终选择在波特兰定居。“我穿的衣服五颜六色，”她说，“我是说我的衣服既鲜艳又奇特。我穿青柠色或蓝绿色的塑料木底鞋。我的毛衣都是从老年人服装网站订购的，因为我在其他地方找不到我想要的这种深海蓝。我的围巾和帽子都是我祖母织的，她大概想织成一顶尖顶秘鲁帽，但实际上看上去像是一只套在头上的针织安全套，还多了两只‘狗耳朵’。我的牛仔裤不是蓝色的，而是染过色的，从臀部到裤口逐渐由黄色变成红紫色。”

斯迈尔说：“当我在巴黎的时候，人们都盯着我穿的裤子，露出一副

很不屑的样子，并且还跟同伴说一些讽刺我的话。他们如此大胆地说出声来是因为他们觉得我这样打扮的人一定不懂法语，可我就是法国人。我的表姐妹们也不愿意带我去夜店玩，因为她们首先就否定了我的穿着。”在纽约，人们更懂礼貌，但是也不会鼓励她这种奇怪的衣着。她纽约的一位朋友说他以前只见过一次如此搭配颜色的穿着——一个无家可归的人。

但是在波特兰，斯迈尔感觉很放松。她说：“人们看到我的裤子，然后他们的视线慢慢移到我身体的其他部分，最后与我进行眼神交流。他们对我微笑，继而就开心地笑起来。有一些人还说‘不错的裤子’。”

开放确实是波特兰的一大亮点。根据2007年《记事板》中泰勒·克拉克（Taylor Clark）的一篇文章，波特兰可以说是独立摇滚的圣地。[8]他写道：“实际上，新墨西哥州的四人乐队（The Shins）与波特兰的十二月党乐队（The Decemberists）的共同之处并不多。以往几乎没有任何乐队能称得上是“波特兰的乐队”，除了极少数特别情况。但是这些乐队在小有名气之后都移师波特兰……你可能会碰到史利特－金尼乐队（Sleater-Kinney）的鼓手珍妮特·魏丝（Janet Weiss）把她的沃尔沃旅行车停在斯坦普城咖啡店（Stumptown Coffee Roasters）前。但是你很少会感觉到这些名人对当地音乐施加影响。他们都只是在这里生活。所以有人称波特兰是“赶时髦的人在退休后定居的城市”。

显然，如果波特兰自身不能培养原创音乐人才，那么这个城市肯定有某种魅力吸引音乐家到来。克拉克表示，波特兰能够吸引大量摇滚爱好者的原因可能跟它能吸引格温·斯迈尔这样的人的原因类似——这个城市很开放，富有创造力，房价适中并且风景优美。“你可以打扮成受过审判的性骚扰者或无家可归的人，没有人会用异样的目光看着你。”克拉克写道，“波特兰的树木葱郁茂密。房价适中，尤其是与西雅图和洛杉矶相比。人们都很友好，食物也很棒。创造力是一切的主宰……这个城市可能不会吸引上流人士，但是综合看来，它适中的房价、美丽的自然风光和令

人放松的奇装异服等特征让它成为每一个独立艺术家的梦想之地。"

在"居住地与幸福程度调查"中，居住地开放度对于幸福感的影响排名第三。开放度是指社会对多元文化的宽容程度和接受程度。这次调查通过下面这些问题来剖析开放度：如果下面几类人来你所在的城市或地区生活，你会如何评价你的城市？

- 有儿童的家庭
- 少数民族群体
- 同性恋者
- 其他国家的移民
- 老年人
-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
- 年轻人或单身者
- 要寻找工作的大学毕业生

对以上各类人群的宽容度越高，城市幸福程度就越高。我们并没有将多元化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许多人都被吸引到开放度高的城市生活，这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样能够更好地实现自我。这也与罗纳德·因格哈特的研究结果一致。他通过对世界上五十多个国家的价值观进行调查分析后发现，个性表达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决定性因素。[9]

而"居住地与幸福程度调查"则有另一个令人惊奇的发现。当人们评价他们所在城市对各类人群的开放度时，你知道哪个群体处在最底层吗？不是移民，不是少数种族或宗教人士，也不是同性恋者，而是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和要找工作的大学毕业生。近45%的受访者认为，他们所在的社区对于大学毕业生来说是"差"或者"很差"的，只有7.3%的人认为"很好"。

我觉得这很令人吃惊。全世界的社区领导人和父母都担心失去他们的年青一代。当我在匹兹堡生活的时候，当地的人常常感叹这个地区出口最

多的不再是钢铁，而是有天分的年轻人。当地市长和商会都迫切希望年轻人在外学得技术，体验生活之后回来，并且在此成家立业。

调查结果与我的切身感受之间的巨大反差由几方面的原因造成。大学毕业生为劳动力市场带来了新的技术，这样就使现有的就业者感到紧张。毕业生多是单身，能熬夜并且喜欢玩乐，这对于其他人来说意味着噪音和恶作剧。对有些人来说，大学毕业生意味着改变现状。人们的这种心态很容易被年轻人察觉。我是从我所作的一项调查中了解到这一点的，我的主要调查对象是一些刚二十出头的大四学生和毕业生。我的结论与咨询师丽贝卡·瑞安（Rebecca Ryan）、卡罗尔·科勒塔（Carol Coletta）和乔·科特赖特（Joe Cortright）的分析一致。他们在调查中发现年轻人更愿意去能够接受他们的社区。他们寻找有很多其他的年轻人的地方，留意各个地方是否开放宽容，比如随意的穿着和充满活力的生活方式以及人口的是否多样化和是否有同性恋者。

很显然，开放度是决定城市满意度和总体幸福感的关键因素。但可惜的是，很多城市在这方面表现欠佳。许多受访者表示他们面对这些群体时会有很大的障碍。

近45%的受访者认为他们所在城市对同性恋者来说“差”或“很差”。近40%的人对外地移民群体也有同样的态度。超过一半的人认为，对那些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来说，他们的城市“差”或“很差”。

因此，城市在增加开放度和多元化方面还有很大的改进余地。这并不是为了提高开放度而宽容。根据我之前的研究，缺乏宽容度的城市几乎不会发展。同时，“居住地与幸福程度调查”表明，生活在缺乏宽容度的城市的人们没有生活在宽容度较高的城市的人们快乐充实。

安全保障

罗宾·伊科特尔（Robin Echtle）在36岁时决定做一件大事——买

房，她为此做了很多功课。她说："我买了很多书，我甚至还与其他12位买房者参加了一个为第一次买房者设立的辅导班。"最困难的问题就是在哪儿买房。她自称为"都市迷"，喜欢文化、艺术和都市生活的喧嚣。她被两座城市吸引：埃弗里特和塔科马①，这两个地方到西雅图都很方便。

到塔科马参观让她特别兴奋。她喜欢这个城市当时正在重建的商业区、充满魅力的老建筑、别具风情的餐厅、三家全新的博物馆、三所历史剧院和交响乐团，最重要的是，歌剧院。但是塔科马最打动她的不是完备的文化设施，而是这个城市的安定。在经过一番比较之后，她认为塔科马就是她要选择的地方，这里比埃弗里特的人均收入要高，也有更多的就业机会。

经济和安全保障是我们研究的第四个方面，它包括经济总体形势和发展趋势，就业市场的性质和发展趋势，以及可以保障个人安全的社会条件。这些都是一些根本性的特征，不能轻易改变，并且不受公共或个人行为的影响。经济和安全保障在城市满意度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根据我们的调查，其重要性只比开放度略低。

其他的研究也表明，快速的经济增长能够提高个体的幸福感。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本杰明·弗里德曼（Benjamin Friedman）在他的著作《经济增长引发的道德后果》中阐述了经济发展能够使人的道德感增强，从而减少犯罪的可能，也让人变得更加宽容和大度。[10]不断提高的幸福感也是经济增长的副产品，经济长期停滞不前或下滑则会有相反的作用。

根据这项调查，在社区幸福感方面，经济保障似乎比个人安全更重要。从统计数据上看，经济保障和总体社区幸福感之间的相关度比个人安

---

① 埃弗里特（Everett）：美国华盛顿州西北部的一个城市，位于西雅图北部的普吉特湾，是一个港口城市，并有木材、纸张和飞行器制造工业。塔科马（Tacoma）：华盛顿州中西部城市，位于普吉特湾畔，西雅图南部，是一个重要的海港和铁路枢纽，是美国西北部的主要工业城市之一。

全的相关度要高很多，也是整个调查中最高的相关度之一。总体来说，多数的受访者认为经济形势还不错，只有少数人认为不好，有40%的人认为“好”或者“很好”，29%的人认为“差”或“很差”。另外将近40%的人则处于中间位置。约有57%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感觉他们的城市“安全”或者“很安全”。只有9.1%的人表示他们所在城市“不安全”。

领导者还是“扼杀者”

领导层是一个社会最重要的无形价值之一。有很多研究这一主题的书籍，但是人们仍然难以定义什么才是好的领导者，怎样将其与不好的领导者区分开来，以及怎样估算领导层对组织、国家和社区所产生的影响。

这次调查要求居民对当地领导者的表现评分，以此来研究领导层对总体城市幸福感有何影响。在前面所谈的个人安全和经济安全、基础服务、领导层、开放度和美感这五大因素中，领导层是对幸福感影响最小的因素。

调查表明如果领导者积极向上、有远见，并且重视社会和谐，关注少数民族，当地的居民也就更开心。但是调查还发现，居民对领导层的看法也存在着较大的分歧。60%的受访者肯定他们所在城市的领导层，但是其他40%的人则意见相反。这可能反映了美国是两党制的国家，不同派别的选民之间的分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严重。

即使在今天的政治环境下，也并不是所有的领导人都鼓动两极对立。在科罗拉多的丹佛，居民对当地领导层的满意度高达90%。我知道其中的原因：约翰·希肯鲁普（John Hickenlooper）于2003年当选丹佛市长，他在这个城市迅速蹿红，就职两年后便荣登《时代》周刊，获得全美五位最佳市长的荣誉称号。他努力为社区构建积极的愿景，调动全城居民高涨的热情。在他上任后的几天，他甚至委任他的对手作为过渡班子，协助他组建自己的团队。他成功地超越了党派界限以及意识差异，这样他能够

集中全力为全体市民谋福利。

可惜的是，领导者更多的情况下都反其道而行之，扼杀民众的热情。简·雅各布斯曾经告诉我许多城市都充满了创造力，但是这些城市却由一些“扼杀者”管理。他们是控制狂，以为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怎样最好地服务社会，由于他们的领导（或者说领导才能的匮乏）导致聪明、有才华、有创意的人才大量流失。雅各布斯还说，那些领导经常说“不”，他们常常阻碍社区的活力和创意。我亲眼见过那些领导者是怎样耗尽社区的生命力与活力的。面对新的观点时，他们常常这样说：“我们不是这么做的”、“这种做法行不通”、“你为什么不到其他令你高兴的地方去呢”。

我一直想，如果有魔法将那些扼杀者暴露出来，然后用“定身法”定住他们，我们的国家会变成什么样？许多地方政府的领导者会不会所剩无几？也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最终释放“公众参与”所鼓励和需要的积极向上的活力。

人才、安全和绿色

我的朋友兼同事埃弗特·威尔哈根（Evert Verhagen）是一位荷兰城市规划专家。他喜欢跟他周围的人分享一个新的获取成功的方程式。以前一个繁荣的社区需要“安全和人才”，但现在则多了一个“绿色”，我想在此基础上再加上“公正”。

他的观点正好与这次“居住地与幸福程度调查”中我的团队的研究结论相符。对于城市满意度来说，以下七项因素有着关键性的作用：有培养下一代的良好环境，是结交朋友的好地方，风景优美，有好的学校、公园以及宽阔的空间，安全，最后是有利于创业和企业的发展。

迪娜格里根据这次调查总结出决定城市满意度的二十六个因素，其中的数据也再次证实了以上观点。她的分析确定了三大类决定我们城市满意度的因素。

第一大类因素让社区变得更有文化，更具活力。这包括当地的大学，艺术和文化设施，丰富的夜生活，充足的就业机会，适合结交朋友，适合大学毕业生、未婚者、创业者、艺术家和科学家。

第二类因素主要涉及社区的美感和居住环境。这部分由以下方面组成：外观、公园、开放的空间、操场、散步小路、气候和空气质量。

第三大类因素则是基于平等原则，包括适中的房价、管理良好的交通系统、利于老年人或贫困人口居住等。

我们要求我们的社区满足我们的基本需求。我们关上水龙头之后自动灌溉系统会为我们的花园浇水，我们随地扔的垃圾会有人拾起来。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在街上散步时感觉到很安全，并且我们相信我们的儿女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

不管怎样，如今我们的要求更高了。为了感觉到充实和快乐，我们想要得到更多，我们需要更多。在所有的这些因素中，最上层的是美感和开放度，它们是一种需求，而不是可有可无，我们期待能够得到这两者。

当我们第一次开展“居住地与幸福程度调查”时，新奥尔良居民做出了如下回答。他们最看重的是“城市的美观和规划”以及“有公园和绿地”，教堂和宗教组织也很重要。61%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每天都抽出时间祈祷。令人震惊的是，56%的受访者表示，在过去七天中他们去教堂做过礼拜——这个比例比其他城市都高。排在宗教因素之后，新奥尔良居民认为最重要的因素是“大学和学院的质量”。

新奥尔良因为混合了颓废情绪、南部风情和无邪童真的梦幻般的情调而知名。这些都一一体现在它的夜生活中，这就是新奥尔良最重要的资本之一。对于新奥尔良人来说，他们不单拥有波旁大街，也有各种风格的音乐、各种欢乐庆典和人们能够自我表现的社区，同时还有邻近的教堂——它为人们提供了在工作地点和家庭之外相识、聚会和联系的“第三地”，发挥了重要的纽带作用。

那些在美观和开放度方面得分较高的社区都有一些有效而且独特的做法。它们将空地铲平，建设活动场地供所有的居民使用，即使是有着严重的种族分化和社会经济差异的新奥尔良也是这样。一个地方的美观——外观和自然风景——都是我们能够使用和享受的公共财产。一个好的公园应该对所有的人开放，不论他们属于社会中的哪一类，也不论他们是何人种，单身还是已婚，同性恋还是异性恋，富裕还是贫穷。只要还有空间，一个人对公园的使用不应该阻碍其他人的使用。在多数情况下，公园里有各种各样的人，比如说有跑步的、骑自行车的、滑旱冰的、散步的、遛狗的或做其他运动的，年轻父母带着孩子来此野餐，信徒们在此聚集，这就说明这个公园变得更好、更安全、更有趣了。

开放的城市能够让我们自由地表达，并且有一种群体归属感。城市为我们提供了自我发现和自我实现的必要空间，在此，我们可以释放自己的潜力，实现自己的梦想，组建我们理想中的家庭。一方面，城市让我们成为整体中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城市又让我们能够做自己，为我们自己的生活增添意义。

这次调查的结论旨在表明哪些因素能为普通居民的幸福感带来最积极的影响。但正如我们的结论所描述的，每个人希望从自己所在的社区中得到的东西不尽相同，他们在人生不同阶段的需求也不尽相同。总而言之，要在定居地真正感到幸福，人们必须了解自己生活中最重要的是什么以及自己的核心价值观。

11　你的城市是什么颜色？

知道居住地会影响人们的幸福；知道最快乐的社区是开放的、充满活力的、人们可以自由表达想法并形成自我认同的地方；知道这些社区将孕育创意，这些都是好事情。但是要完成第一步——找到能让我们幸福的地方——并不容易。

找到令我们幸福的地方的关键，是要明确我们最希望从这个地方得到什么。如那句古老的格言所说："萝卜白菜，各有所爱"①，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希望或者需要同样的东西。知道对你最重要的是什么，即你优先考虑和需要的是什么，是这场战斗的关键。

我把我们的心中所欲和所需与我们社区所能提供的东西间的相互作用称作"适应（fit）"。[1]不论怎么称呼它，正确地了解它很重要。我的妻子拉娜和她的三个姐妹一起撰写一个有关亲密关系的专栏，这个专栏在多家刊物上发表。她有一次提到寻找适合自己的地方和找到适合的配偶。她写道：你必须内省，了解你到底需要什么，这样才会找到能够让你成长的地方。而且要记住，如果你不快乐，那就继续寻找。

我的一个刚毕业的年轻助手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她很年轻，但是已经搬了很多次家，而且在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人际关系。她还没有决定在哪个地方定居，而且在她生活的不同阶段，已经和好几个貌似合适的人约会了。她觉得有一个城市很特别，而且她很熟悉那个城市。在那儿她读完了研究生，而且认为那可能是她最喜欢的地方。而如今，她离那儿有好几千公里，而且很享受她现在的生活。

但对于很多人来说，这种"适应"并不合适。根据"居住地与幸福

---

① 英文原文为 Different strokes for different folks，直译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方式。

程度调查”：

● 大约有三分之二（67%）的人在现在生活的地方感到幸福，对社区满意度的评价为5分评分系统中的4或5分。

● 剩下的多于三分之一的人态度含糊或者感到不幸福，24%的人对社区满意度的评分是3分，10%的人对社区满意度的评分是1或2分。

● 当被问及他们怎样看待未来5年社区的发展时，43%的人态度含糊或者表示悲观，26%的人给出了3分，14%的人只给他们的社区评了1或2分。

● 当被问及是否会向亲人和朋友推荐他们的社区时，40%的人态度含糊或者是否定，21%的人给他们社区的评分是3，17%的人给他们社区的评分是1或2分。

思考一下：如果我们选错了地方会怎样？比如说发生在你身上或者你认识的人身上的某些事情，这就像找错了工作或者是选错了生活伴侣，它后患无穷，令人沮丧。预先看清一个潜在的糟糕的“适应”所花的时间和精力比随后不得不再次搬家要少得多。

我访问过的一个人说，将他的家庭搬到一个新城市后，他立刻感觉到错了。他发现和那儿的人沟通很困难。他的邻居非常好，也是他的同龄人，这些都不是问题，他只是不能分享他们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不能认同他们喜欢和不喜欢的事物。这个地方就是让他感觉不好，他开始消沉并且因为一些难以解释的原因发火。尽管他有好房子和好工作，但都无法真正令他兴奋。他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外貌与他一样的访客。他花了好些时间才重新振作起来，但最终他意识到这里不是一个可以表现自己和实现梦想的地方。

不只他是这样，我从许多人那里听到过类似的故事。首先，他们会对社区感觉不好，甚至感到生气。他们可能甚至没有意识到他们情绪变化的原因，或者他们认为是由其他事情引起的。最终他们开始意识到，因为某

种原因，他们并不真正适合他们所居住的地方。

生活在错误的地方是我们伟大文学作品中的一个主题，也是我们生活中最有趣的闹剧——处处潜伏着喜剧、恐怖片和处于两者之间的种种情形。还记得《绿地》(*Green Acres*) 中的伊娃·加博尔 (Eva Gabor) 在偏远的地方穿着晚礼服干农活儿吗？或者是《贝弗利山人》① 中的奶奶、爸爸和杰思罗，穿着工作靴，开着破破烂烂的皮卡车出现在洛杉矶吗？

所有这些故事都夸张地描绘了人们寻找最适合居住的地方的努力和我们真正想要的生活方式之间的错位。

五个重要问题

心理适应的问题对于我们对居住地的幸福感很重要。在写作了《创意阶层的崛起》一书后，我开始怀疑我们做出的决定背后，除了更为传统的经济和社会因素，可能还有心理因素。2006 年春天，当凯托研究所网上月刊的执行主编、政策研究员威尔·威尔金森 (Will Wilkinson) 读了本书的初稿后，直接向我提出了这个问题，我的兴趣被挑起来了。[2] 他希望知道我是否思考过不同性格的人会被不同的地方吸引，然后在那儿定居发展。是否在个人性格和他们的社区之间也存在适应问题？当人们找到了适合的社区时是否会更快乐？当一个人的性格与他们的社区不匹配时会发生什么？

心理学家说性格有五个方面。这个五要素模型有时被心理学家直观地称为性格的五大方面。[3] 第一类是开放型。开放型的人喜欢新的尝试，特别是知性的体验，艺术、幻想以及任何可以让他们感受新想法的东西。开放型的人往往表现得比较好奇，有创意，有艺术家气质。

第二类是勤勉型。勤勉型的人工作努力，非常自律。他们有责任心，

① 《贝弗利山人》(*The Beverly Hillbillies*)，又译为《豪门新人类》，美国喜剧电影。

注重细节，渴望成功。心理学家发现，在几乎任何工作中勤勉程度高的人都比一般工人表现更好，更胜任，效率更高。

第三类是外向型。外向型的人喜好出游、健谈、合群、有主见、热情、寻求刺激。他们喜欢结识新朋友，而且在大多数环境中都能保持相当稳定、积极的情绪。

第四类是容易相处型。容易相处的人热情、友好、有同情心，顾及他人的需要。他们通常信任别人也希望别人信任他们。

第五类是神经质型。神经质型的人情绪不稳定，更容易感到焦虑和敌意，压抑自我意识和冲动。

我们很容易把别人想成这一类或者那一类，通常会分成外向型和内向型，而现实是大多数人都落在某一个交叉范围内。当然大多数人身上都有着起决定作用的特质，但几乎每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五种特性。心理学家可能会把伍迪·艾伦（Woody Allen）[①] 描述成外向程度低（他看起来安静、克制）、容易相处程度低（冷漠、疏远）、比较勤勉（他拍了电影）、神经质程度高（专注于自己的想法且紧张不安），但开放程度非常高。不论如何，他是一个有创意和艺术气质的电影导演。

性格心理学家已经通过几十个研究实验证明了五要素模型，而且发现这五种基本的性格特征根源于生物基础，随着时间变化保持稳定，而且在跨文化的情况下也保持一致。其他专注于公司与组织研究的心理学家研究了性格类型和工作之间的联系。例如，外向型的人在销售类工作中做得更好；容易相处型的人在需要大量团队工作的职位上表现最好；勤勉型的人在所谓的标准作业的工作中表现优异；喜欢新体验的人在需要灵活性和创意的工作中表现优秀。

极少的几项研究探讨了个人性格特征和他们选择的居住地之间的关

① 美国著名电影导演。

系。我深受将地点和性格特征联系起来这一想法的启发，2006 年秋天，我还被邀请在盖洛普国际积极心理学峰会上作相关的主题发言，我决定围绕性格特征与地点的关系来阐述。但在会议上，我觉得这有些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说到底，我究竟对心理学了解些什么？所以我试图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待问题。我注意到在我为研究而采访过的许多人中，他们都提到被有“能量”的地方吸引。

于是我说：“最初我并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请注意，当我们经济学家谈到‘能量’时，我们通常指的是物质性的资源。”我又开玩笑说：“所有这些人有可能只是被低廉的燃气和电力价格吸引而选择去某些地方的。”

接着我解释道：“我渐渐理解了他们的意思。我的同事和受访者所谈到的能量不是指物质，而是指心理因素。他们描述一些地方充满活力，有许多事情发生，而且有充满能量的人们。”

很幸运，我的笑话效果很好。

随后，三位世界顶尖的积极心理学家——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马丁·塞利格曼、密歇根大学的克里斯托弗·彼得森（Christopher Peterson）和创意心理学权威米哈利·奇凯岑特米哈伊走过来问我是否能一起聚聚，这时我知道我的演讲引起了小规模的轰动。

在会面的时候，塞利格曼围绕能量的概念解释说，能量是一个跨越生物学、物理学和化学的概念，它无处不在，在脑部扫描和心律监测的时候都能很明显地感觉到。“人体是一个能量系统，实际上生命本身就是基于一种能量过程，活着的万事万物必须持续消耗和燃烧能量。”

“想象这个令人吃惊的事实，”他继续说，“人类大脑的组成物质只占到人体总量的 2%，但是通常要消耗 20% 左右的卡路里。美好的一天充满能量，会产生积极乐观的情绪和兴奋的感觉；糟糕的一天能量会很低，也会带来懒洋洋和失望等感觉。”

奇凯岑特米哈伊插话说："如果你希望找到有能量的地方，特别是有高水平创意能量的地方，你就要找到好奇心强的人们扎堆的地方。"我随后将在本章中谈到这一点。

然后塞利格曼下了结论："杰出人物的传记表明，他们有着极为惊人的能量，这一点比其他任何基础技能都更为重要。"

我问他们，地点起什么作用？我们知道杰出的成就、创意和创新常常出现在特定的城市，是否这些城市所具有的能够吸引人、给人以活力的东西也是一种特征？

我们决定研究这个问题，塞利格曼和彼得森为我提供了性格优势（VIA）评估中数以十万计的反馈形成的详尽数据。因为每一条数据都包括反馈者的地址和邮政编码，这些信息可以用来研究地点和性格特征之间是否有着明显的相关关系。

大约同时，我看到了一篇博客文章研究音乐品位和性格特征之间的关系。研究者是山姆·戈斯林（Sam Gosling），他是得克萨斯大学的心理学家，他因对动物性格特征的研究而知名。还有一位研究者是贾森·伦特弗劳（Jason Rentfrow），剑桥大学的年轻心理学家。

细读戈斯林的博客，我被他们关于性格特征的研究吸引住了。戈斯林和伦特弗劳发现，通过简单地询问人们喜欢什么音乐，或者通过观察他们宿舍和办公室的摆设和装饰就能大致判断他们的性格特征。他们的发现是基于直觉判断的，缺乏数据。我们怎样装饰办公室和家，买什么样的书，听什么样的CD，看哪些电影，穿什么样的衣服，如何布置个人空间，这些都不是随意的选择。这决定取决于我们是谁，我们希望成为什么样子和我们希望别人怎样看待我们。

我为之着迷，我急忙给戈斯林留言，问他是否知道还有其他人从事类似的性格特征和地点的研究。是否具有某些性格特征的人比其他人更有可能迁移？如果城市和地区形成了自己共同的性格特征，这种特征是否有可

能又随之吸引某些特定的人？

几分钟内他就回复了，他和伦特弗劳已经在这个领域进行了一定的研究。

他们最初的研究题目是《性格特征的地理分布》，研究了基本性格特征的地理聚集情况。[4] 通过参考过去的文献，他们注意到跨文化的性格特征差异是一个长期受到关注的研究题目，早期研究可以追溯到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和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在20世纪初开创性的人类学研究。[5]

从那之后，现代性格研究出现，性格特征五要素模型重新点燃了性格特征地理分布研究的兴趣。他们引述了一份1973年的研究，发现生活在美国东北部、中西部和西海岸地区的人们明显有更高的创意生产力，根据是这里人们的高水平的创意活动、想象力、聪明才智和打破传统的能力都高于其他地区。[6]

在这项研究和其他相关研究中，伦特弗劳和戈斯林利用互联网对超过60万人进行了调查，形成了大型性格特征数据库，在此基础上探讨性格特征按州分布和聚集的情况。[7] 他们得出的结论证实了某些州更为开放，某些州更具有和睦相处的特征，有些则比较神经质，等等。这些性格特征也和重要的社会经济产出有关系，比如说，在开放程度上，在东北部和西海岸的州得分最高，而且这也与艺术家和娱乐人士的多少、总统选举中投自由党候选人票的比例、对同性婚姻的支持程度以及专利生产多少等有关系。

2007年春天，伦特弗劳和我在华盛顿见了面，并决定共同研究。很明显，戈斯林和他的研究表明，就全国而言，地点和性格特征间有一定的联系。我们的直觉认为人们倾向于进行分类，然后聚集在特定的地区、城市和社区。

我的城市是什么颜色？

由于每一个参与了性格特征调查的人都提供了邮政编码，所以我们实际上可以将性格特征和某个居住地联系起来。因此我们可以根据全美国35万条个人性格特征记录来制作地点分布图。第一组图是由我的同事凯文·斯托拉里克制作的，覆盖了美国所有有超过30条反馈的邮政编码地区。每一个都对应五大性格类型的一种（见图11－1）。这张最终的地图令人吃惊，每一种性格类型都出现在很明确的不同的区域。

图11－1　美国人的性格特征分布图

资料来源：居住地与幸福程度调查　制图：凯文·斯托拉里克和莱恩·莫里斯

可以看出，开放型的性格特征比其他四种性格特征在全国的分布更为广泛，多聚集在大城市区域。开放型性格特征的人倾向于寻找和聚集在那些能够令人兴奋的地区。相反的，勤勉型和容易相处型的人们不像他们那样热衷于冒险而更愿意维持传统的关系，这些人慢慢从原来居住的地方往外扩散。

但是某个区域中往往不只有一种人或一种特征，而是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种不同的性格特征。因此，如果伍迪·艾伦——纽约客的一个原型的某些性格特征明显，某些性格特征不明显，那么是否纽约也会有他那样的性格特征呢？除了聚集了许多开放型的人之外，纽约还组合了哪些有其他性格特征的人？就此而言，纽约的性格特征与芝加哥、洛杉矶或者夏洛特和盐湖城有什么不同？我们是否能通过地区的不同性格特征来确认各个地区？如果是这样，我们能否设计一种方法将人们和各个区域匹配起来，这样能让人们找到最适应他们性格特征的区域？

为达到此目标，斯托拉里克利用一种强大的数据匹配技术进行了要素分析，根据几十万份性格调查中的数据来确定美国地区性格特征的聚集情况。他的分析表明美国所有的都会区域主要可以分成以下三类：

第一类聚集区我称之为外向型区域。这一聚集区域在“外向”这一项上得分很高，在神经质、勤勉和开放度这几项上得分低，在容易相处一项上得分最低。

伦特弗劳评论说，外向型区域很适合喜欢社交和外出的人们，这些人喜欢集体活动和盛大的集会，他们进行团队运动项目，喜欢和其他人在一起。希望与人建立密切关系和融入社区的人们可能不会太喜欢这些区域，因为这种想法在容易相处或者开放度高的人们中更为普遍。

第二种聚集区我之称为传统型或责任型区域。这一聚集区域在容易相处和勤勉以及外向这些方面得分都很高，但是在开放度和神经质方面得分较低。

伦特弗劳表示，责任型区域适合努力工作、友善、让人信任、乐于助人和有同情心的人。在某些方面，这些区域称得上是完美的模范市民区域。这些地方适合那些外表和价值观上都比较传统守旧，希望维持现状，遵守制度的人们。这些地方的人们相互信任，不愿意挑战权威和其他人，在工作与生活中勤勤勉勉，做人们希望他们做的事情。与外向型区域中喜欢结交许多朋友的人们不同，责任型区域的人们更愿意与数目相对较少的亲密朋友和家人保持联系。责任型区域不适合那些有文艺气质和创意，经常需要新的尝试的人们。

第三个聚集区是体验型区域。这一区域在开放度和神经质项目上得分较高，在勤勉、外向和容易相处方面得分较低。这一聚集区域包括大的创意中心，比如说纽约市及其周边、旧金山海湾地区（旧金山、圣何塞和奥克兰）、洛杉矶、圣迭戈、波士顿、西雅图、华盛顿和巴尔的摩、丹佛、奥斯汀、达拉斯，也包括拉斯韦加斯、布法罗（水牛城）、路易斯维尔和新奥尔良。

体验型地区对于那些不喜欢被别人包围着的人们是个好选择。他们怀疑权威，寻求强烈的体验，智力上的、创意上的、感情上的、甚至是心理上的，比如一些极限运动。关于这个聚集区还有一些有趣的事情，伦特弗劳说，这些地方适合那些有创意但是迷失在自己世界中的人们，他们独来独往、冷漠，甚至是任性，或者说他们不善于应对压力，容易焦虑和情绪失控。体验型区域不太适合喜欢结识新朋友和有着传统观念、喜欢安稳的工作或标准化任务的人们。

这项分析的结论是：区域和人们一样有着鲜明的性格特征。尽管有的时候人们生活的区域与自己的性格特征并不匹配，但还是生活在与自己个性相适应的区域时，人们更开心，更有满足感。由于伦特弗劳的数据中包括有关幸福和快乐的问题，因此我们能借以考察性格特征、居住地和幸福之间的联系。人们在与自己性格类似的人聚居的地方会感到更加幸福吗?

一个简短的回答是完完全全的“是”。心理因素确实在个人迁移背后发挥作用，当人们考虑要在何处生活的时候，牢记性格的地理分布情况是很重要的。

当然，即使在不能完美地反映你的品位和偏好的区域，你也完全有可能找到非常适合你的居住地。而且很明显，有些类型的人的行为并不符合他们居住地的规范，但他们仍然能够在那里生活得很好。这种情况在那些自认为是非传统型的人们身上常常出现。伦特弗劳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对此做出了如下解释：

> 在一个地方，比如说奥斯汀，规范是开放和有创意。仅仅喝咖啡和啤酒，抽美国精神牌（American Spirit）香烟，听迈尔斯·戴维斯①是不够的。如果你确实开放和有创意，而且希望人们认识到这些，那么培养一些非常规的偏好和习惯并表现出来就很重要。毕竟，有创意和创新精神意味着要打破传统。此外，我认为对于那些超级有创意的人们，为了表现出这一点，他们可能不仅仅需要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偏好，更需要一定程度的忠诚。偏好只有通过不断重复才会逐渐被人接受和认可（就如同一种转换仪式）。与众不同的偏好可能也是重新选择定居地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

但是性格特征的聚集和鲜明的地区性格特征是怎样出现的呢？作为经济地理学家，我首先想到的是经济和工业的历史烙印。容易相处型和勤勉型性格特征的人们高度集中在老工业区，比如匹兹堡和底特律，这些地方是制度推动的大规模生产工业的发源地。而在阳光地带，特别是在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和肯塔基州的75号州际公路走廊（Interstate 75 corridor）

① 迈尔斯·戴维斯（Miles Davis）是爵士音乐史上杰出的指挥家和小号演奏家，在他的一生中，对许多风格的爵士乐都有深入的研究。

一线，分布着大量新一代的重工业企业，例如日本和德国的汽车公司在美国设立的工厂。这些工业需要容易相处、勤勉、能努力做好本职工作的人。外向型的人们集中在芝加哥、亚特兰大和夏洛特，那些地方有许多销售和商业总部以及高端的服务业。喜欢体验的人们聚集在大城市，特别是在沿海城市，这些城市历来是经济结构多样化的地方，有移民人口和有艺术气质的波希米亚族群。

应该承认，很难确认是起初有了性格特征的聚集区，然后推动了工业布局，还是工业结构选择和改变了有相应的性格特征的人们？两者的重叠很明显。这种性格特征和经济结构的重叠可能会给老工业区造成更多的障碍。显而易见，老工业区吸引和激励容易相处型和勤勉型的人，这些人来这里从事标准的制造工作，甚至是高端服务工作。但全球化意味着很多这样的职能被转移到其他国家——制造业迁往像上海这样的经济中心和中国的其他区域，而标准服务业迁往像印度那样的区域。

这些区域有安于现状的倾向和不愿惹麻烦的价值观，这往往会阻碍这些地区的创意和创新，也会导致开放型的人才流失，而这些人往往是创意和创新的源泉。因此这些区域面临的更长期的问题不仅仅与商业环境和经济结构有关系，也和居住在这些地方的人们的心态，也就是伦特弗劳所谓的心理社会环境息息相关。

性格特征的聚集还有其他几个原因。如伦特弗劳和戈斯林解释过的，第一个原因是物质环境。人们普遍接受物质环境会影响文化和社会的观点。贾里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其产生重大影响的著作《枪炮、病菌与钢铁》（*Guns*, *Germs and Steel*）中指出，物质环境特征影响了北欧强有力的发展。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主任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说明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往往高于内陆地区。[8]

伦特弗劳和戈斯林认为，物质因素，例如气候和周边环境，能相应地影响我们的性格特征。居住在寒冷天气和冬夜很漫长地区的人们常常因为

季节的变化出现更多的心理失调、沮丧、压抑和焦虑的情绪。其他的研究也表明，生活在更为温暖气候中的人们通常表现得更为合群。伦特弗劳的研究发现，神经质这个特征和地区年均降水量间有正相关关系。

第二个原因是社会因素。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长期以来注意到价值观和文化对于工作和经济生活的影响。马克斯·韦伯曾提出的著名论断，将资本主义的增长归功于“新教徒的工作道德”。罗纳德·因格哈特在超过50个国家进行了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尊重个人自我表达的地方和高收入及可持续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9]

我们知道价值观、信仰和态度有地域分布的特征，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会通过社会交往互动而传承下来——这就是文化。伦特弗劳和戈斯林认为，一个地区以及这个地区的居民迟早会形成某种性格特征，他们称之为“社会创始者效应”（Social Founder Effect）。这就是说，人们会形成某种反映他们习惯、生活方式和信仰的性格特征。容忍和鼓励尝试的地方最终会吸引那些寻找能够自由选择和自我表现的地方。就连一开始思想不是那么开放的人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也会逐渐受到那些价值观和偏好的影响。最终，大部分人口会体现这些特征。

另一个因素被伦特弗劳和戈斯林称为“选择性迁移”。他们写道：“性格在地理上的差异，也可能是移民主动性选择的结果，他们会迁往能够满足和强化他们心理和物质需求的地方。”根据这一理论，这些最早的团体形成了某种性格特征，这些特征会传承给后代。伦特弗劳和戈斯林指出，这种想法得到了实际情况的充分支持。他们将之称为“基因创始者效应”，他们认为，想法相近的人迁移到特定的地方会逐渐减少基因库的变动，因此会增加具有特定性格特征的人的比例。

这些效应会不断被社会压力和影响强化。很明显，具有特定类型性格特征的人更容易被某些地方吸引。人们不断寻找更能表现出真实自我和更能让我们成为想成为的那种人的地方。

当然，迁移最开始很有可能是心理因素造成的。不必感到奇怪，不同性格类型的人倾向于定居在不同的地方。开放型的人们，可能试图逃脱小城市那种死气沉沉的气氛，去大都会定居，这样能更好地满足他们对文化和社会交往与激励的需要。那些很喜欢尝试的人们从本质上来说是最勇于冒险和流动的。因此，他们自然将会涌入那些能提供很多令人兴奋的体验和刺激的地方，最终他们也会聚集在一起。与此同时，其他更为保守传统的区域会逐渐失去开放型的人，这也会强化当地及其居民保守的性格特征，从而导致更多的开放型的人离开。

接受挑战、提高自己、成为最优秀的人才等心态也会起作用。伦特弗劳写道：

> 我的音乐家朋友们在奥斯汀取得了职业上的成功，然后搬到了纽约和洛杉矶。这一现象不是巧合，因为如果你想不断提高自己，那些地方才是你应该居住的地方。当然，这并不容易，而且在那里你要与专业人士竞争。我的朋友们搬到那些地方去接受挑战。奥斯汀对他们来说不再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地方了，所以他们会搬到那些强迫他们成长的地方。

伦特弗劳用音乐家作例子，但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在其他人身上，例如投资银行家迁往纽约和伦敦，或者是年轻的技术人员和企业家迁往硅谷。

当我有一天对苏格兰帝王（Dewar's）威士忌[①]的顶尖销售人员们作演讲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了性格对于流动性的影响。他们都读了我的《创意阶层的崛起》并且希望打破人们固有的想法——只有60多岁富有的白人男子才喝苏格兰威士忌。他们发现年轻的创意人士，他们称之为

---

① 苏格兰帝王（Dewar's）威士忌是全美销量第一的苏格兰威士忌品牌。

“城市独立人士”，也已经养成了对苏格兰威士忌的品味。帝王威士忌开始向这些客户推广，记录他们的嗜好和偏爱。

在会谈中，我问了销售团队一堆问题：喝苏格兰威士忌的人喜欢嘈杂的音乐和现场演出吗？他们是喜欢喝意式特浓还是拿铁咖啡？

回答甚至连我都感到吃惊。是的，销售团队的人们说这些年轻的苏格兰威士忌爱好者喜欢黑咖啡和意式特浓咖啡，喜欢嘈杂的音乐，更喜欢纯的威士忌，而不是混着其他饮料的那种。

这些都引起了我的共鸣，特定的性格类型似乎需要更多更强烈的刺激，无论是实际意义上还是比喻意义上的。那些有创意的年轻人被极限体验吸引——复杂的音乐、强烈的感觉、令人兴奋的地方和特立独行的人们。我想具有这些特质的人们不是因为偶然的因素聚集在那些能令人兴奋的地方的，他们总倾向于找到这样的地方。

分析这种情况

所有这些都指向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既然性格特征在地理分布上出现聚集，它们是否也会在地区的创新、才智和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作用？

在发现性格特征出现明显的聚集，并且了解了更多地点与心理之间的关系后，我的想法出现了一个微妙却很深刻的变化。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我都在关注社会和经济因素是如何影响世界的，但却从来没有真正关注过心理学，从来没有想到个人的偏好可能会影响其所在地的创新和经济发展。而我的想法的变化就是，我突然明白，心理发挥着核心作用。

多年以来，我一直在摸索更好的、更为精确的标准，来衡量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力资本或技能的东西。之前我提出过创意阶层和创意职业的标准，那是我试图探索这一类工作如何影响经济学家对人力资本和教育程度的看法。

但如果技能不仅仅是指教育和工作呢？伦特弗劳认为，性格特征与顺

利地学会并掌握特定的技能有关。他写道："经济学家看重的技能是在具备了相应的才智、意念和资源的基础上通过相应的训练可以学会的东西。但是，与性格特征理论更为一致的说法是，性格特征事先决定了人们愿意并能够学会某种技能。例如，勤勉型的人倾向于关注细节，事先做出计划以及明确分工。开放型的人会较快地学会新技能。"

很明显，有一些人比其他人更有创意，更有上进心，也更有目标。将史蒂夫·乔布斯和比尔·盖茨与其他人区分开来的不是他们所受的教育，甚至也不是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或者别的一些东西，而是根植在心理和性格特征中的东西呢？任何一个母亲都会告诉你她的孩子们从一出生就有自己完整的人格特征。如果性格特征本身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寻求新关系，调动各种资源，产生创意和取得成就的一个根本因素呢？

很多年来，我都在研究科技的飞速增长为什么会出现在麻省理工和斯坦福周围，而不是在卡耐基梅隆大学，这个我执教了近二十年的地方。显然不是因为明媚的天气。这说到底，似乎真的和一则老笑话有关系。

"如何建成第二个硅谷？"

"用一份好大学，两份阳光和三份风险投资，然后使劲摇晃。"

如果硅谷的成功不仅仅因为它吸引了高技能的人才，更重要的是它吸引了那些非常有目标、有上进心、好奇心强而且非常开放的人们呢？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迁往纽约和伦敦的金融骄子身上，也出现在洛杉矶的电影制作人和纳什维尔的音乐人身上。

那么，我们在第5章中讨论过的植根故土和四海为家的人们呢？我一直都在研究受过良好教育、拥有高技能的年轻人的迁移情况。但如果不仅仅是教育背景、工作技能和金融资源决定迁移呢？如果植根故土与四海为家的人们相比有不同的性格特征呢？如果我们在第6章中讨论的才能迁移不仅仅是指受过良好教育和有才华人们的迁移呢？如果重新选择居住地是具有某些性格特征的人们的行为呢？如果这些人都属于能容忍风险，喜欢

体验新事物，乐于创新和开创新的生意的一类人呢？

我渐渐觉得，也许最有可能迁移的同一类人也是最有可能创新的人。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出生地，聚集在一起，他们的聚集区成为创意活动、初创公司和经济增长的温床。我们经历的这一重新选择的过程不仅仅与教育和技能有关，也和基本的性格特征有关。

为了了解这种性格特征在地理上的重新选择对于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我和我的研究团队将我们获得的创新、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的数据与伦特弗劳和戈斯林的性格类型数据以及塞利格曼和彼得森的心理优势数据整合起来。我们随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数据分析来找到人格、创新、人力资本、创意阶层、收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结果让我们很吃惊。

首先，我们发现性格变量确实能够解释创新、人力资本、收入、房价和其他许多因素。在五种性格因素中，“开放度”是最为重要的，它与上述各因素间的联系最为紧密。但是，在谈这个问题前，我们先看看其他四种性格类型与上述因素间的关系。

“神经质”与拥有高技能和超级创意的人们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在更为复杂的模型中，神经质也同薪水间呈负相关关系。换种说法，受过良好教育和有超级创意的人才聚居的区域总体在情绪上显得更为稳定，较少出现波动，也更加灵活。这至少表明这些地方的人们更有可能从容应对风险，而较少考虑失败的一面。

“容易相处”与管理类的工作和医疗保健方面的工作相关，另外，它与创新、高科技行业、薪水和收入间呈现正相关关系，但是这种作用非常小。这也意味着能与其他人很好地合作有助于创新，尽管作用很微小。

“外向”和管理以及销售性工作密切相关。但它同时也对于地区总体人力资本、高科技工作或者是地区收入没有影响。

“勤勉”是在很多领域和行业中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特征。我认识的

一位管理咨询师喜欢说，每当一个有创意的人想出一个新点子，一个公司就需要十个或者是二十个勤勉的人来执行。心理学家发现，企业家通常具有开放和勤勉的混合特质，特别是具有坚韧不拔的品质——在逆境中坚持的能力。但是我们的统计结果表明，勤勉并非地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实际上，它与创新、薪水和收入、房价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如同伦特弗劳所提出的，勤勉的人们是制度的追随者，只要给他们明确的任务，他们就会找出最为有效的程序来完成任务。但当任务不明确，需要创意与想法的时候，勤勉但不是非常开放的人就可能做不好。我认为，仅靠勤勉不足以推动区域增长，但是，它与其他的因素结合时会起作用，比如那些人们又开放又勤勉的地区。

"喜欢体验"是唯一一个在地区经济增长中持续起作用的性格特征。它与计算机、科学、艺术、设计和休闲等行业，以及地区总体人力资本水平、高科技行业、收入和房价高度相关。

当我们将伦特弗劳和戈斯林的性格特征标准用于塞利格曼和彼得森的心理优势数据上时，结果发现开放度与两个特别的因素有关。一个是美感，这就有助于解释第10章中提到的美观因素的强大吸引力。另一个是好奇心，奇凯岑特米哈伊曾经告诉我，好奇心是创意人士聚集和创意能量的测量指标。彼得森关于心理优势数据的独立研究和我自己的创意能力的评测表明人们的性格优势，比如对美的感悟力、创意、好奇心和求知欲与城市创意能力之间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彼得森发现，创意型城市缺乏谦虚、感恩、对宗教的热忱、团队精神、友善以及公平这些与人交往的重要特征。很有可能是因为创意型城市中大多数人们根本的性格特征是专心做自己的事情。这和我与我的团队得出的研究结果近似，即地区的创意创

新和能力与多样性和开放度有关，但与帕特南所写到的社会资本①无关。帕特南最近的研究也表明多样化妨碍了社会资本的发展。[10]这些对于我们的社区精神和社会融合来讲是坏消息。这种多样化和有创意的优势似乎在破坏我们的社会资本和社区忠诚。

当我们进行更多复杂的数据测试时，性格特征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开放度”在每次测试中都有最大的正相关系数。而且它是唯一一个在每一个等式中都保持正值的重要变量。在我们设计的60个顶级模型中，“开放度”在50多个模型中都是影响因素之一。

但是目前最强有力的结论来自那些体现同性恋和波波族指数与开放度之间关系的模型。这让我感到我之前对于同性恋和波波族聚集现象的分析，其实可以看做是对大量乐于体验的人们聚集地区的分析。

当在《环球邮报》② 上看到我将要于2007年7月迁往多伦多的文章时，一位读者评论说：

> 我看不出来“同性恋”因素在城市转变中发挥什么核心作用，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现在，开放的思想确实很重要，我承认思想开放是所有创意人士的重要性格特征。但是某人可以很轻松地说为地区发展“铺设了”道路的人们对于很多事情都持开放的态度，他们不遵守社会标准，期望另类的生活……我只是很奇怪在他的论文中“同性恋”为什么这么重要。

我将用另一种方式来阐述这个读者说的的确有些道理。不是由于同性恋和波波族的聚集推动了地区创意和创新的集中，而是开放的区域环境恰恰可以由这两类人的聚集反映出来。

---

① 社会资本：指为实现工具性或情感性的目的，透过社会网络来动员的资源或能力的总和。

② *Global and Mail* 是加拿大的一家报纸。

我越思考这些结果就越相信开放型性格的聚集是区域创新和经济增长的推动因素。总而言之，区域经济增长需要深度和广度两方面因素。深度来源于专业化和在某些关键领域的丰富经验。广度来自多样化、包容和鼓励新想法的开放性。那些创新型区域就是能保持自我发展，并将广度转化为增长动力的地方。这些地方的弹性不仅仅来源于教育程度、技能和技术，还部分地取决于他们的区域性格特征——他们吸引和号召开放型人们的能力。

个性在理解人们的迁移和区域经济增长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性格特征和地点的互动是关键因素。“性格特征的表现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人们所处的环境，”伦特弗劳写道，“很显然，性格特征影响人们想要接近或者避免的环境和氛围，但有些时候我们发现自己处在无法选择的环境中。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有趣，并值得好好考虑的问题。如果我们将这个环境扩大，扩大到城市或者区域，然后我们可以考虑这个环境中的社会气候、经济条件以及可获得的资源等如何与它的性格特征相互影响并决定城市或区域经济增长。”

对于城市和区域来说，这意味着它们的领导层必须意识到性格特征的强大作用。各个地方确实有不同的性格特征，这源于不同的经济结构，也将限制这些地方的未来。吸引新的公司或者是新建一个体育馆都很容易，然而要改变一个区域的心理结构非常困难。区域领导层必须清楚意识到他们区域的性格特征能够影响哪类经济活动，吸引哪些人才，进而满足他们的需求并且将他们留下来。

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找到合适地方的关键是用战略的眼光来确认哪些事情对我们最重要，然后选择最适合我们的地方。本书的下一部分将说明，这些事情的重要性会随着我们的成长和人生不同阶段的经历而有所变化。

第四部分

我们要搬几次家?

WHO'S YOUR CITY?



12 三大迁移

生命由不同的阶段组成，这个看法似乎还挺新颖。人类历史中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生活在大家庭中。直到最近，人们才开始在婚后建立各自的小家庭。所以过去二十年，我们着实经历了一次重要的迁移——步入婚姻的殿堂，离开父母的住所。

如今，人们的单身时间越来越长，结婚越来越迟，寿命也越来越长。“青春期”是20世纪才产生的概念，它是介于童年和成年之间的一个独立的人生阶段。近些年，很多人认为大学前的时光就很接近“青春期”，这个新的人生阶段常被戏称为“成年青春期”（Adultalescence）。[1] 人们支持年轻人去尝试新工作，约会不同人，并住在不同的地方。而在人生的另一端，“退休”并不意味着一个人职业生涯的结束。对很多年长的人来说，这代表了一种崭新的生活机会。

每个生活阶段都让我们有机会重新思考我们的居住地如何影响自己的经济状况、生活方式以及幸福。当我们从一个人生阶段迈向下一个阶段时，大多数人已经不再期望仅仅一个地方就能满足我们的所有需求了。一个二十来岁的单身青年对开拓事业、结交朋友以及尽情玩乐感兴趣，所以适合这类人的地方显然就不适合有孩子的已婚夫妇。这一点显而易见，如果你还没意识到，那就去问问那些住在单身酒吧街却又想睡个安稳觉的人吧。

虽然每个人的人生阶段不尽相同，但大体都能分成三大阶段——大学毕业之后，有孩子之后，以及孩子搬离家庭之后（这个阶段需要格外注意）。目前，在每个阶段，越来越多的人都有能力更自由、更广泛地选择在何处定居。

其实当我们考虑要住在哪里时，需要同时考虑两个相关因素。一方面

是在前面已经阐述过的，我们最感兴趣的地方往往拥有大量的工作机会和繁荣的劳动力市场，同时也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性格。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联系自己的人生阶段来考虑居住地，就像有些地方能专门提供某些工作机会及生活设施，这有时会刚巧适合某个人生阶段。

为了更好地理解居住地和人生的关系，帮助人们做出更合适的选择，我的研究小组根据不同人生阶段的需求，做了美国大城市的新排名。首先，我们必须区分下面要说到的这五个不同的人生阶段。

大多数人都把20多岁和30多岁划分到一个阶段，我的研究团队和我更倾向于把他们划分成两个不同的阶段。我们按照五个人生阶段把人们分成五类。第一类是“大学毕业生”，比较年轻——20岁到29岁，刚刚独立进入社会，一般都是单身，希望寻找能够开拓事业、结交朋友、尽情玩乐并找到另一半的地方。第二类是“年轻职业人士”，年纪稍长——30到44岁，拥有自己的事业，有更多的资源用于购置房屋，而且渴求稳定。这类人包括单身贵族、同居情侣和已婚夫妇，当然前提是没有孩子。

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并不是结婚以后，而是有了孩子以后。所以第三类人是“拥有孩子的家庭”。尽管“家庭”的概念不一，目前相对标准的定义为正式“已婚”的夫妇，其中一方不超过64岁，家中有不满18岁的儿童。

很多人都认为退休是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可是当我们选择住处时，一个同样重要的时段是孩子离开家庭以后。我的研究团队将这部分人单独划分成一类。所以第四类是“空巢人士”，年纪大概在45岁到64岁。第五类是“退休人士”，年龄大都超过了65岁。

这个分类方法是凯文·斯托拉里克设计的，它建立在四个基本因素之上。第一个是某一阶段中的人口比例。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希望找出在某个特定的地方生活的是哪一类型的人。我认为这是判定一个地方是否适合某一类人最直接有效的指标。

第二个因素和经济有关，这是唯一一个贯穿五个人生阶段的因素，它包括区域经济增长以及一些具体的科技、人才和社会容忍度等因素。

第三个因素是与每个人生阶段相适应的生活环境及其质量。单身人士喜欢外出交友，那么我们就会选择餐厅、酒吧及适合开展社交活动的场所对他们进行研究。对于那些要发展事业的年轻职业人，我们会研究他们的平均通勤时间以及知识和创意类职位的工资增幅。对大多数有孩子的家庭来说，优质的学校及安全的街道更为重要，所以我们会选择犯罪率及师生比例作为研究指标。孩子不在身边的空巢人士通常会寻找一些享受生活的新刺激，所以我们会用文化艺术以及休闲活动的情况来衡量，譬如关注高尔夫课程和游艇停泊港的情况。年纪大的退休者更多考虑的是人身安全、天气状况以及医疗保障，所以我们会用犯罪率、医生出诊情况以及天气状况（如半年内平均温度变化）作为衡量指标。

第四个因素是具体花销。对很多年轻的大学毕业生来讲，房租是最大的开销。所以我们利用房租负担情况作为指标，通过租房成本占住户总收入的比重来衡量。大多数年轻职业人士都准备买房，所以我们用购房费用占住户总收入的比重来衡量。对于有孩子的家庭和空巢族，我们会用居住总花费做指标。而像我这么大年纪的人，医保和健康护理费用更重要，于是我们对 65 岁以上的退休者采用的指标就是医保花费。

斯托拉里克从 167 个地区、规模完全不同的三组数据中整理出这四个因素的排名，这三组数据包括：人口在 100 万的 49 个地区，人口在 50 万 ~100 万的 46 个地区以及人口在 25 万 ~50 万的 72 个地区。

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很多地方都与不同的人生阶段相适应。这个结果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中有所阐释。作为本书的背景研究，我的团队根据一大批独立的数据，整理了不下 25 项独立的排名，包括最适宜家庭居住的地点排名、氛围最友好的城市排名等。我们发现，不论如何比较，总有一些城市在每项排名中都名列前茅。总体而言，这些地方不仅在人们各个生

活阶段中排名靠前，在经济及其他社会因素方面都表现出色。排名最高的是旧金山海湾地区，在 20 项最佳城市排名中都位居前列。接下来是波士顿，在 13 项最佳城市排名中都跻身其中。然后是奥斯汀、明尼阿波利斯、罗利和西雅图。

这些地方并不一定适合每个人。现在仍有一部分人像我父母一样，很满意目前居住的地方，在同一座房子里（甚至没有换过邻居）生活一辈子。大多数地方都不是十全十美的，相反，为满足人们在不同阶段的需要，会有很多不同且特别的地区。这正好说明了简·雅各布斯所描述的真正的大都市——是满足不同人需求的“邻里联盟”。



13　又年轻又躁动

对多数人来说，第一次迁移是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父母最宝贵和最重要的财富——离开父母的家，开始自己的生活和职业生涯。

进入拉特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可以说从根本上改变了我的生活。当时我的高中同学陷入了各种麻烦之中，要么是在监狱中等死，要么是做着毫无前途的工作，我却感觉自己另有一番天地，在这里可以尽情挥洒人生，追逐梦想。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不再有任何压力去刻意掩饰“我很优秀”的事实。不久，我就在这里找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们。我住的地方是一个以音乐闻名的校区，事实上当时每个著名的乐队都会经过新泽西州的新不伦瑞克市（New Branswick）。

我太喜欢这里了，于是在麻省理工学院只当了一年的研究生，我就又回到了这里，在城市政策研究中心做研究工作。住得离父母不远是件好事情，我能和后来也进入罗格斯大学的弟弟经常见面，还能常常看望我的父母、姑姑和叔叔们。我和仍住在附近的大学同学走得很近，也能经常和我们乐队的其他朋友一起玩儿。住在新不伦瑞克的另一个好处是，我能抽空儿去逛逛哥伦比亚大学，后来我又决定在这里攻读博士学位。

我的第一次大迁移是因为我随后找到了第一份真正的工作——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担任助理教授。我租了一辆货运车，从纽约市出发驶向俄亥俄州首府哥伦布，并在德国城（German Village）找了一处小公寓，开始了我的新生活。

许多刚刚毕业的大学生都会觉得生活很混乱，尤其是当亲戚们想帮助他们的时候。下面的故事是这本书的编辑比尔·弗鲁科特（Bill Frucht）在和我讨论这本书的时候讲给我听的。

我妹妹玛莎刚从康奈尔大学毕业之后想去教艺术，可我姑姑

在伊利诺伊州罗克福德市做教育主管，她坚持要玛莎去那里参加面试。与其说她想帮玛莎，不如说我姑姑想让全家人知道自己很成功，可以为她侄女找到很好的工作。连续五天，她每天都给玛莎安排了半小时的面试，其余的时间玛莎就在罗克福德市毫无特色的街道上闲逛，这些街道上满是千篇一律的错层式建筑，她除了逛街就是看看电视。

第三天晚上，我姑姑和姑父带玛莎去他们最喜欢的餐馆吃意大利面，还配有土豆泥和肉酱。当天晚上玛莎哭着打电话给我妈妈说："姑姑希望我选择这里的工作，可我不愿住在这里，我该怎么办？"

当妈妈告诉她如果她不愿意就可以不用搬到罗克福德后，玛莎取消了她所有的面试，立即坐飞机回了家。那个秋天，她和一个朋友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找了间公寓，开始了她的新生活。

如今，很多年轻人拥有比我和玛莎更宽广的视野，他们一毕业就仔细考虑，调查研究，然后跑去全国全世界的各个地方。很多没毕业的学生告诉我，除了北美地区，他们更想到世界其他地方，譬如欧洲、南美洲、非洲或者亚洲去找工作，获取经验。很多人在世界各地都有自己的朋友和关系网。

目前住在北美洲温哥华的约翰·特里努斯（John Trenouth）和他的女朋友，在三大洲六个国家的十多个城市居住过。他们都很喜欢拥挤又开放的大城市，后来选择定居温哥华，是因为这里始终融合着"西海岸的生活方式和天气"以及"东海岸的真实和活力"，让他们兴奋难忘。

"每次去杂货店逛都很有意思。"特里努斯说。他们不喜欢只去一家大超市，而是从城里星罗棋布的蔬果摊、肉铺和面包店里购买生活用品。他们俩属于不同的种族，所以会被多元化和开放的城市所吸引，他们在那里感觉轻松惬意。

我们几乎可以随意选择除了海洋和边境以外的任何地方居住，其实这是近来才出现的情况。20世纪后期以前，大多数人都愿意住得离家近一些。这并不是说年轻人不愿意去上大学，而是说他们即使离得再远，也愿意毕业后回到自己的家乡。那些搬出去的人本来也希望植根故土，但可能因为婚姻的变化之类的原因不得已而离开。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早早结婚，然后直接从父母家搬到自己的新家开始新生活。就像我的父母，1959年在新泽西州的北阿灵顿买了一栋可以住两家人的房子，之后再也没有离开。

现在，人们结婚不那么早了，结婚年龄推迟到20多岁或30岁左右，有些人干脆选择不结婚。这样的结果就是人们单身的时间很长，所以有更多的自由而且有必要去选择适合自己的地方。

统计表明，年轻人是最愿意搬家的。2005年的研究结果显示，25岁左右是搬家的高峰，25岁到45岁这段期间搬家的可能性在快速降低，然后在进入退休和老年时期后持续走低。2005年的一份研究表明，一个25岁左右的人搬家的可能性大概比45岁或者50岁的人高三倍。

搬家的可能性还会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增加。“美国国家青年纵向调查”（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 of Young Adults）表明，37%具有学士学位的人会选择离开自己的故乡，拥有更高学位的人占45%，而高中毕业的人仅为19%。[1]

所以，年轻人可以从中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由于搬家的可能性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的，所以我们在离开学校后选择住在何处对未来有巨大的影响。

对城市和地区来说，能吸引年轻人的地方往往都成了全国人才竞争的赢家。有些地方认为年轻人为了玩乐和冒险而离开，他们一旦进入三十岁便开始寻求稳定并决定成家，就会被重新吸引回来。这种想法并没有依据。赢家城市的总数大致不会增加，那些年轻人逐渐流失的地方也不会恢

复元气，因为搬家次数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赢家城市都能抢占先机，吸引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定居，所以这些城市就会有长期的竞争优势，让那些不那么成功的城市望尘莫及。

评出最适合单身人士居住的地方，然后一路探寻他们在何处安家，逐渐变成了一种产业。其中有一份名单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就是由我的团队参与的《福布斯》杂志系列排名。[2] 为了编纂这份名单，《福布斯》根据不同的因素，包括文化、夜生活、单身男女的多寡、工作增长以及生活花销等来考察各个城市。那些上榜率最高的城市包括丹佛、奥斯汀、波士顿、旧金山、华盛顿特区、亚特兰大、洛杉矶、纽约、芝加哥和西雅图。

我当时居住的匹兹堡在《福布斯》的第一期系列排名中排在最后。幸运的是，2005 年的时候匹兹堡已经上升到榜单的中等位置了。

当被问及什么是这些城市最吸引人的因素时，23% 参与调查的单身男女认为是"单身人士的数量"；重要性紧随其后的是"良好的职业前途"（占 20%），而"疯狂的夜生活"和"低廉的生活花销"都排在了后面。我们从《福布斯》在线调查的结果中进一步发现，"能与其他单身贵族在一起"，以及"有较强竞争力的劳动力市场"，都是让年轻的流动人群决定居住地的重要因素。

到目前为止，对单身人群居住地及选择原因最全面的分析莫过于乔·科特赖特和卡罗尔·科勒塔的研究报告《知识经济中年轻躁动的一代》（*The Young and the Restless in the Knowledge Economy*）。[3]

科特赖特和科勒塔，通过全面深入的采访来研究。2000 年，美国最受年轻人（年龄在 25 至 35 岁之间）关注的城市前几名是奥斯汀、亚特兰大、罗利、达拉斯以及夏洛特。科特赖特和科勒塔还对拥有学士及以上学位的年轻人的居住地进行了追踪调查。领先的城市和区域包括罗利（45%）、波士顿（43%）、旧金山（41%）、华盛顿—巴尔的摩（41%）以及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40%）。

科特赖特和科勒塔推断，年轻人搬家的原因是由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在选择地点时都更看重“影响生活品质的因素”。而且，他们的研究还表明，高学历的年轻人“在60%的情况下，会选择就业增长比他们离开的地方慢的居住地”。

伴侣市场

在这些迁移背后其实还有个非常重要而且明显的原因，那就是在新的居住地能找到人生伴侣。我难以理解为什么很多人都会忽视这一点。

这么说吧，你认为人生中的哪种选择更重要些——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还是找到人生的另一半？

结婚可能不是每个人的人生目标，可是对大多数人来说，找到另一半与谋生一样重要。与邻家的男孩或者女孩结婚着实如童话一般，这在当今社会十分鲜见。选择在何处安家，对我们寻找人生的伴侣也至关重要。

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者莉娜·爱德朗德（Lena Edlund）做了一项很有意思的研究，名为“欲望都市”（Sex and the City），发现在大多数现代化城市中，年轻女子的数量要远远大于年轻男子的数量。因为城市能为很熟练的工人提供更好的劳动力市场，所以城市的工作环境本应该更容易吸引男性，或者至少男女比例相当。爱德朗德还发现，虽然在各个年龄层男性都比女性赚得多，可是25岁到44岁的年轻女性会住在更富裕的城市。她的答案在于她所谓的“婚姻市场的不对称现象”。她认为男人就是“为女人的婚姻买单”，也就是说女性需要承担生育和抚养孩子的重任，所以花费也会相对高一些。[4]

在提供工作和职业以及招揽和吸引人才方面，城市的分工变得越来越专业化，所以在某些地方找到合适伴侣的机会更大一些。某些地方会聚集比其他地方多得多的单身人士，而且也会为他们参加各种活动提供更便利的条件。而在这些幸运城市中，人们会发现有些地方的伴侣市场中有比其

他地方更多能吸引自己的人。简而言之，容易找到配偶的地方也像其他事物一样有聚集效应。

直到2007年4月我偶然登录了自己的博客，我才明白这个结论有多正确。下面是一张没有文字说明的地图（图13－1），名为“单身地图”(The Singles Map)。[5] 上面的浅色圆点表示那些单身女性远远超过单身男性的地区，而深色圆点则表示相反的情况，圆圈的大小反映了按性别分类在每一个都会区域中单身人士的多少。我的博客在2006年创建以后，每天也就千人左右的访问率，可是当我贴出这幅地图之后的几个小时内，点击率就超过了20万，而且这幅图还被转载到各大网站。

很显然，人们都很感兴趣能在哪里找到自己的另一半。根据我们最初发表在《国家地理》上的地图和资料，比较适合异性恋单身男子的地方是纽约州都市地区（New York metropolitan region），这些地方的单身女性要比单身男性多16.5万人。另一方面，比较合适异性恋女性的地区是洛杉矶都市地区（greater Los Angeles），这里单身男性要比单身女性多4万。

我的博客上因为贴了这张地图而引发了很多评论，有些是在试着解释这种情况，还有些就更私人一些，甚至有些自我表白的意思，现摘录一则如下：

> 我是个单身汉，一年半前搬到旧金山。因为我从芝加哥来，所以对这幅图深有体会。我在芝加哥的时候，约会非常频繁。后来因为新一轮的科技潮，我同很多年轻的单身汉一样搬到旧金山，一头扎进“淘金热”之中。
>
> 当我和朋友聚会时，常常一个大房间里只有极少数的女性，而且我们的话题通常都会转移到约会有多糟糕上。我的一个也是刚到这里的女性朋友说，她从来没有像在这里一样受到那么多男性的关注。可能这也是很多网上约会开始风靡硅谷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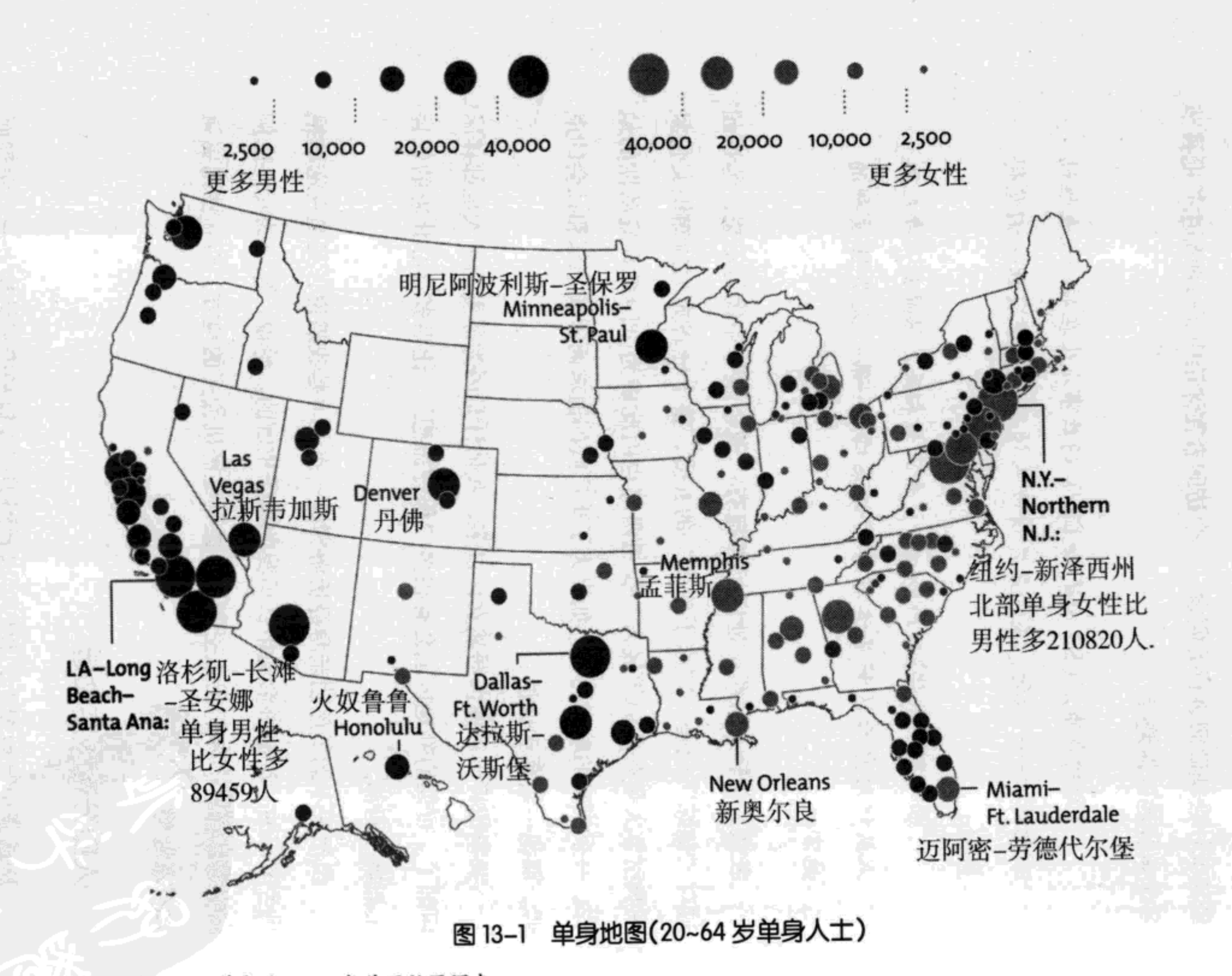


图 13-1 单身地图(20~64 岁单身人士)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2006 年美国社区调查

类似这种主题的评论还有很多，可是还有另外一些评论是基于深入的经济或社会基础而进行的假设。一个访问者在评论中通过两部主打电视节目来解释地区性差异：

> 《欲望都市》（*Sex and the City*）的故事发生在第一大女性过剩的地方——纽约，或许是单身女人过剩这个事实让她们觉得郁闷。
>
> 而《明星伙伴》（*Entourage*）却正好相反，很显然是年轻男人从纽约皇后区移居洛杉矶的好莱坞——第一大男性过剩的地方。

我认为年轻人对西部地区仍然抱有“淘金热”年代的幻想，远远超过对“辣妹”或是“富家子弟等”的喜爱，整个硅谷典型的知识文化氛围吸引着大量东部的年轻人。我想西部也因此成为全国最具流动性的地方。一个年轻的单身男子，如果为了更广阔的追求而挣脱家庭和社会的束缚，那他一定喜欢这里。

我很惊讶于东南部居然女性过多，我估计是因为那里的男人也都移居西部了。可能南部地区也会有很多“保守思想”，让很多雄心壮志的年轻人都逃往西部。

虽然我不能贸然用亲身经历解释这一点，可是我想说，我是在密歇根州兰辛市的一次演讲活动中认识我的妻子拉娜的。她说，那里的女性比例高很容易理解：年轻男人更倾向于搬到经济机会多的地方，而女性则更愿意离家近些。

人口分布决定命运

从这张单身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人口和家庭结构上一个深刻而重大的转变。这里有些数据发人深省：

• 20 世纪 50 年代，大约 80% 的美国人还居住在以已婚夫妇为主的大家庭中。

• 现在，这个数字还不到一半——49.7%，据人口统计局调查，相当于全国 1 亿 1110 万人中的 5520 万。

• 仅有 1/4 的人住在由已婚夫妇带着孩子组成的核心家庭中。

• 差不多 5% 的美国家庭是以未婚男女同居的形式存在的。

• 1/20 的人选择独居。

• 目前美国有 500 万同性恋，占全国人口的 2% ~3%。[6]

事实上，“家庭”的概念太过多样化也引发了一些问题。以前二三十岁仍然单身，会被认为非常奇怪甚至不好。1957 年，80% 的美国人认为没有结婚的女人是“有病”、“神经病”甚至“邪恶放荡”的。到 1986 年，只有 38% 的人不能接受单身。

滑稽的是，我们认识和融入这种全新生活方式的速度实在太慢了。1988 年出版的《社会学手册》用“非传统的二分关系”来描述那些不在传统的“丈夫—妻子—孩子”家庭中生活的人们。[7]

经历过这种转变，我也明白在大家庭中过日子的艰难。我出生在一个大家庭中，母亲有 10 个兄弟姐妹，12 个表亲。每周日我们所有人都要在纽瓦克的外祖母家吃晚餐。我父亲这边也同样如此。事实上，这些亲戚都住在距离纽瓦克 8 ~ 16 公里的范围内。距离我出生地仅有 8 公里的北阿灵顿就是一个家庭主导的城镇。我们这些孩子们彼此很熟，而且参加了同一支童子军和小联盟球队。我在这里度过的童年中没有遇到过离婚和单身的成年人。而且我的字典里根本没有“同性恋”这个词。我不记得我周围有谁不是像我这样生活在大家庭之中的。

时代变了，不论你承认与否，家庭的观念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不是政治或是意识形态上的要求，而是人们自身的改变。在一项全国调查中，75% 的美国人认为结婚的目的不仅仅是生儿育女，而我的父辈们肯定

难以理解这种观点。在历史长河中，婚姻最初和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生儿育女，这也是联结家庭的纽带。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3/4的家庭中都有18岁以下的孩子，到1960年，这个比例下降到了不足1/2，现在更是降到了1/4。

我前面提到过，现在人们还把结婚的年龄推迟了。从1960年到2007年，男性结婚的平均年龄从23岁增大到27岁，女性则从20岁增大到26岁。拥有大学学历的女性基本上到27岁才结婚，那些研究生或者有更高教育背景的女性，平均婚龄是30岁。

而且现在的年轻人也相当挑剔。根据全国范围内的相关的调查，2001年88%的单身人士认为会有一个“知己般的另一半在不远处等着自己”。[8]更让人惊异的是87%的单身人士认为，一定要找到适合的人才会准备结婚。

这种变化的一个结果是，1960年以来，未婚同居的人数惊人地增长了1200%。1/4的年龄在25~49岁的未婚女性都有一个同居伴侣，另外还有1/4在25岁以前就有了。刚和男朋友搬到一起住的28岁作家阿曼达·霍恩（Amanda Hawn），在2006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与别人合住时，即使你有三个牙刷，你每次睡觉前却总会发现它们在别人的房间中。”[9]“而且搬到一起住会比较省事儿。”根据罗格斯大学全国婚姻项目的研究，大概一半人在第一次结婚前都选择同居，一些专家现在把同居称为首次婚姻的替代品。

据主流的人口统计学家说，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第二次转型。第一次转型发生在20世纪初到中叶，是婚姻和家庭的黄金时期。那时候，更多的人选择结婚，离婚率相当低，无论男女第一次婚姻的年龄都非常小。第二次人口转型，始于20世纪60年代，盛行于80年代，标志是结婚率降低、离婚率增加、人口出生率下降以及男女结婚年龄推迟。

那么随着从离开父母家和到结婚之间的时间越来越长，人们从哪里寻

求支持和帮助呢？

伊桑·沃特斯（Ethan Watters）认为答案就是一个新的家庭替代品——都市部落（the urban tribe）。[10]沃特斯认为，都市部落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团体，由那些在不同领域生活和工作的年轻人组成，有自己的规则，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成员间互相提供支持和帮助。沃特斯写道："如果这些部落能联结城市中最薄弱的环节，我们就有可能在社会科学中创造类似暗物质的东西——一种不可见但是对于将所有的东西聚集在一起至关重要的东西。"而且沃特斯还认为，都市部落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自我展示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这些很多时候往往被家长和亲人所束缚。但是这些都市部落并不仅仅是替代品，相反，它会成为我们真正家庭的补充，让我们拥有更广泛的交际圈。

就像一个来自芝加哥的年轻人说的："你不能选择你的出身，但是可以选择你的新家庭——朋友圈。"

因生活阶段而改变

但是人们并不是选定一个地方然后终其一生，很多时候我们会根据具体的社区或地区情况重新做出决定。经过 20 多年的研究，我按照不同的人生阶段做出了一个地区分类。别的不说，我通过这个分类了解了各类地区和居民区类型。

我年轻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选择：要么是像我祖父母和父母住的纽瓦克这样的老式城区，要么是高端的都市地区，像纽约的派克大街（Park Avenue），当然还有些市郊住宅区和农村地区。如今，我们有一系列不同类型的地区，从而为不同的人们提供了更多样化的选择。

对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选择离学校不远的地方待上一两年是可以理解的。大多数年轻毕业生最终会离开，可是很多人还是会选择在学校附近待一段时间——参与一些研究，和朋友出去聚会，也比较容易得到与学校

相关的工作机会。

我当时就是这么干的，但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这样干。罗格·马丁（Roger Martin）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决定在剑桥继续住一段时间。因为他当时还担任哈佛排球队的队长，所以在教练宣布他离队之前，他都得待在那儿。

为了能更合理地向父母解释继续留下的原因，他申请并进人了哈佛商学院。他原先就想在剑桥待一年，结果一住就是二十年。在商学院，罗格和其他几位毕业生，还有包括战略名家迈克尔·波特等在内的几名教授，决定创立一家咨询公司。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们创办了获得巨大成功的公司——摩立特公司（Monitor Company），按他们的话说就是“空前绝后”。

所以对大学毕业生来说，一个比较合适的地方就是典型的大学城。那里有很棒的餐厅，高雅的文化和音乐氛围，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房租也比较便宜。大都市都会努力留住毕业生：譬如费城校区创议（Campus Philly Initiative）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留住费城9万多名大学生，帮他们在当地找到工作，提高生活质量以满足他们的其他需求。

年轻毕业生选择居住地的另外一个重要趋势是前往大城市。2006年8月的《纽约时报》故事专栏指出，2000年到2005年，纽约市新增学士学位以上的居民达到了28.5万人。[11]其他一些吸引毕业生的地方包括芝加哥、大华盛顿特区、波士顿、加州海湾地区、洛杉矶、明尼阿波利斯、亚特兰大、西雅图、奥斯汀和丹佛。

在大都市里，很多单身年轻人更倾向于住在商业中心区。“几乎纽约市的每个角落都变得更有文化，”《纽约时报》故事专栏报道，“曼哈顿（Manhattan）和布鲁克林（Brooklyn）最为典型。在曼哈顿，57%以上的居民至少拥有学士学位。”因为不用担心孩子，年轻人更愿意去拥挤和有大量交际网络的市中心，用不着买车，而且那里拥有充满活力的配偶市

场，到处都是可以见面、交往和约会的地方。

根据科特赖特和科勒塔的研究，25岁到34岁的单身年轻人中，有超过33%的人更愿意住在接近中心的地区（离市中心大概5公里远）。

年轻人喜欢聚集的城区有很多种，有一种我称之为“城市马赛克”（urban mosaic）的区域越来越受青睐，它是指多样化的内城区域，和简·雅各布斯提到的典型城市区域有些类似，但也不尽相同。这里有很便宜的公寓，提供廉价食物的各民族餐厅，拥挤的街道，可是也会有较高的犯罪率，没有多少商店和露天场所，夜生活也不丰富。这里曾经住着移民、工薪家庭以及上年纪的穷人，而现在吸引着二三十岁、需要考虑房价的年轻人。华盛顿特区的哥伦比亚高地（Columbia Heights, D. C.）就比较符合这个特征。不过，城市马赛克也正处于多种潮流中。一方面，它们在贫穷与颓废中挣扎摇摆；另一方面，中产阶级的兴起也慢慢消除着多元化。

另一个可选区域我称之为“时尚港湾”（hipster haven）。都市特色和时尚元素的汇聚为这里吸引了一批相对富裕的人们——他们并不希望显得特别富裕。音乐剧场、夜总会以及咖啡厅的涌现，让原来年纪大的居民不是开始消费，就是选择离开。这种区域还会吸引那些“过桥穿洞的人们”① 的目光，这些人来自郊区，不怎么适应都市生活，想借周末来这里走走看看。他们会逛形形色色的商店，偶尔在街边的咖啡屋坐坐，然后穿过熙熙攘攘的市中心。

在匹兹堡的时候，我目睹了南部地区怎样由一个过气的旧钢铁工业区变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时尚港湾”，集商场、餐厅和住宅等多种功能于一身。随着需求的增长和房租的提高，日益兴起的中产阶级也挤压了原来商店、酒吧和餐厅的生存空间，所以这些地方开始失去原有的创造力。此

① 英文原文为 bridge-and-tunnel crowd，是一种含有贬义的说法，原指那些从周边区域前往曼哈顿旅游的人，途中需要经过桥梁和隧道。

外，噪音也成了当地家庭的巨大威胁。

当然，不是所有的年轻人都希望成为赶潮流的城市居民。在我们的调查中，很多人明确表示更喜欢老式的郊区，而且这些地方也能提供许多城市中的设施。从小在离华盛顿特区不远的马里兰郊区长大的戴安娜·福克斯曼（Dianna Fooksman）发誓她“再也不会回到这里，尽管这里很适合成长”。到了上大学的时候，她的很多朋友都选择了附近的学校，而她则出发去新英格兰（New England），并在暑假周游了全国的大城市。二十多岁大学毕业后，她开始寻找艺术管理方面的工作。她和男朋友挑了四个备选的地方——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和华盛顿特区。她说他们比较确信的是，“不想住在市内”。让她吃惊的是，他们最终选择了马里兰州的哥伦比亚（Columbia，Maryland），那里能提供合理的通勤路程，到华盛顿特区很方便，有精致且生机盎然的餐馆和酒吧，比较划算的住宅，而且在这里成家，生儿育女也很方便。

像马里兰州的哥伦比亚之类的老式郊区吸引着很多年轻人。有些建在地铁沿线或是公交线路密集的地方，这使通勤变得更方便。总之，它们能为年轻人提供安全、舒适和便利的条件，也很容易进入配偶市场，而且没有住在市中心的那些危险。很显然，这些区域也比较符合30岁左右年轻职业人的需要，不论单身还是已婚，他们都愿意在一个地方生活一段时间。

我在这两种地区都住过。当我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开始我的第一份学术工作时，我住在哥伦布市非常著名的德国城，至今我都觉得这里是美国最美丽的市区之一。这里风景如画，19世纪末期德国啤酒商建造的精致砖房矗立在街道两边，鹅卵石铺成的街道斑驳成趣，还有因为社区的支持而躲过了一次次轰炸袭击的商店，这些都令人惊异。住在那里使我明白了文物保护有多重要。我非常喜爱这里，而且也结交了不少好朋友。

1987年我搬到了匹兹堡的卡内基梅隆（Carnegie Mellon），住在圣第

塞德（Shadyside），那里有很多历史的建筑以及一条充满活力的商业带。我亲眼目睹了这里的改变，原来这里满是书屋、小商店[①]、熟食店、“老人”酒吧和古董店，充满了学术和嬉皮气息；而现在则成了高档零售区，以香蕉共和国（Banana Republic）、陶器大库房（Pottery Barn）等知名品牌和苹果连锁店而著称。此外，市中心之外还有不断增加的一批设计师寓所（designer digs）。

与十年前相比，现在经济发展的压力、租金的增长以及连锁店的进驻，已经让这些地方变得日趋相似。设计师寓所区有非常棒的楼房，干净的街道，还有很好的经过翻修的建筑，可是房地产价格大幅上涨使多元化——尤其是经济多元化——正逐渐消失。

不管别人怎么想，重要的是你得找到适合自己的地方。约翰·怀特赛德（John Whiteside）就是这样，从华盛顿特区搬到了休斯敦。朋友们都很震惊，他们不敢想象他怎么会去一个完全不同而且缺乏魅力的地方。其实他做足了功课，之前去了很多次休斯敦并喜欢上了那里，他唯一要做的就是申请调离工作。

他喜欢那个城市的老房子和热带植物、风趣智慧的人们、欣欣向荣的民间艺术及公开的同性恋社区。他说：“只要你想做的话，你可以去实行、创造和完成任何事。”搬家后，他开创了自己的新事业，远离华盛顿那些你死我活的竞争，建立了自己的朋友圈。他认为休斯敦“没有美丽的景色或是离奇有趣的东西吸引你”，他也承认“这里不可能像洛杉矶那样时髦，像波士顿那样充满智慧”，可“它始终真实、充满活力和趣味”。

重新分类的巨大影响

我们所看到的事情，不论是好是坏，都体现着社区、国家甚至整个世

---

① 英文原文为 head shop，指售卖嬉皮士和吸毒者用品的小商店。

界的等级分化，就像比尔·毕肖普（Bill Bishop）所说的“大类别”（big sort）。[12]不同年龄、经济、文化和政治关系曾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可是现在事实上，经济和社会层面已经被隔离。我担忧的不仅仅是中产阶级化的蔓延或是城市的冷漠，还有这种“大类别”正威胁着我们的社会结构，并根据阶级来使这个社会分化和隔离。

每个年轻人，迁入城市马赛克或是时尚港湾时，当地一些低收入家庭，或者这些家庭的一部分成员很有可能被迫离开。当那些年轻职业人士在设计师寓所享受他们的生活时，许许多多低收入的工薪阶层正在拼命寻找廉价房来养家糊口，勉强做到收支相抵。一座城市的社区就如一个微观世界，能看到故土难离和四海为家的种种现象，这些情况对低收入人群影响最为严重。

很多人认为，不断扩大的社会经济分化并不是外包、移民甚至收入差距造成的。其实这些只是表象，罪魁祸首在于人力资本和教育的分化。“大学教育的回馈，以百分比计算的话，相当于19世纪末期美国黄金时代的水平”，经济学教授泰勒·科文（Tyler Cowen）在博客里写道。“所以现在大家都纷纷涌入名列前茅的大学。相反，从1915到1950年，教育的相对收益下降，因为很多新的大学毕业生都在竞争比较稀缺的好工作，这就导致工资不会涨得太高。”1950年开始，教育的相对收益开始提高，到了1980年开始飞速增长。

科文总结其原因在于供需矛盾。科文在《纽约时报》上写道：“这代人并没有比上一代明显接受更多的教育。那些需要高技能劳动力的公司面临着相对停滞的人才供给，因此必须提高价格以获得人才。”他又进一步说，“有证据表明，每在学院中多学习一年，每年的回报大约多出10%~14%，至少对于刚录用的新人来说是这样的。”[13]

阶级与居住地和种族密切相关。还有一个让人头痛的现实就是，一批年轻人——尤其是低收入年轻人和非裔美国人——不在他们成长的地方

居住，而是进了监狱。根据2006年的城市研究院报告，2000年20岁左右在高中辍学（包括进监狱和没有找到工作）的黑人男性的实际失业率是65%，2004年达到了72%。[14]对于白人辍学者而言，同样的比率是34%，拉美裔辍学者是19%。[15]分析2000年的数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斯蒂芬·拉斐尔（Steven Raphael）发现在20多岁的黑人辍学者中，在监狱中的人占34%，大于有工作的人的比率——30%。[16]

我们在何处安家影响着我们的成长、度过的时光、接受教育的机会以及所接触的人。在哪个地方安家落户取决于人们的经济状况以及整体的幸福感。可是显然对大多数人来说，固守在一个地方会带来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也就是说被束缚在一个地方，选择就会受到限制，而且搬出去的机会和方法也会越来越少。



14 结婚生子

佩内洛普·特伦克（Penelope Trunk）是位博客作家，博客名为“大胆的野心家”（The Brazen Careerist）。她去过不少地方。在伊利诺伊州的威尔梅特（Wilmette）长大后，她到洛杉矶参加了专业排球队，之后到波士顿上了大学，后来又到纽约市开始了她的写作生涯。结婚并生了孩子后，她和丈夫意识到应该搬到一个更宽敞、便宜而且有好学校的地方。

于是他们开始努力寻找。他们并没有局限在纽约地区，而是在全国范围内为他们的小家庭寻找合适的地方。关注了6个月的地区信息，配合各种有关幸福的数据，他们最终选择了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那里学术氛围浓厚，生活方式开放，户外设施便利，确实是榜上有名的好地方。不过在麦迪逊的生活并不完美，从特伦克的博客中可以看到。那里很冷，而且不像纽约那样富有文化教养。她开玩笑说她孩子学会的第一个词是“母牛”。

如同生活中的其他选择，对于生活地点的选择也包含了对自己需求和取舍的认知。所以明确权衡各种利弊，是在一个地方幸福生活的关键。

对大多数人来说，有了孩子之后就会开始第二次大迁移，所以很多选择必须斟酌再三——选择学校还是餐馆，选择安全还是冒险，选择宽敞的游乐空间还是美妙的音乐剧。就像我们上一章所提到的，很多年轻已婚夫妇仍旧住在自己单身时居住的地方，甚至孩子很小的时候他们也住在那里。可是一旦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他们就不得不忍痛割爱，选择更能满足他们当前需要的地方。

以前，大多数人选择就近搬到附近的郊区，就像我父母当初从纽瓦克搬到了8公里之外的北阿灵顿。更远的迁移通常都颇费周折，可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有着更宽广的视野和更多的选择。随着人们的工作更加灵

活，可以不受制于一个雇主，他们可以在全国甚至世界范围内选择合适的地方。

重视家庭

我们的社会有很多人认为自己是家庭的拥护者。批评家和言论家在支持家庭及其意义方面相互竞争，抢尽风头。很多人把家庭的衰落看做是美国社会的衰败。我能理解他们，因为我也曾有过这种愤怒。一位直言不讳的批评者，评论《创意阶层的崛起》一书时，说我的观点就是支持“雅皮士、诡辩者、叛逆者以及同性恋”，而反对“真正的家庭”。另一则评论说，我是促使犹太基督教文明衰落的帮凶。

我觉得没有理由把“真正”的家庭和其他家庭区分开，因为每种家庭都需要被重视和珍惜。

拉娜和我都来自大家族，家族内成员的关系一直都很密切。我们的家里经常会有前来拜访的亲戚和他们的孩子。可是当我们考虑组建自己的家庭时，我不得不承认这在现代社会有多么困难。

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家长告诉我，他们顶着工作、经济、时间和其他各方面压力，辛辛苦苦养家糊口。他们最需要的是优质而且不那么昂贵的照看儿童的服务。可是有多少地方会提供这样的服务呢？大多数地方都是因人而异，如果你很幸运，当地雇主会帮你搞定这些。想象一下，如果一个地方能够为每个人提供必要的儿童托管服务，那么必将吸引大批人才涌入，从而增加经济增长优势。

很多家长告诉我，他们最希望孩子能感受文化多样性。一个年轻女子完成了她在克利夫兰临床学校的医学培训后，渐渐喜欢上了这里以及周围的一切。可她却补充说明：“我绝对不会在这里成家，因为你得同小心眼儿的人们打交道，他们害怕改变，而且还限制他人的权利。”

当我们谈及子女和家庭时，教育必然是议题之一。越来越多的行业领

袖、学术专家、父母和孩子都不约而同地认为现行的教育制度有问题，用比尔·盖茨（Bill Gates）的话说就是“烂了”。[1] 问题是有多烂？这里有一组令人吃惊的数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研究人员在2007年的研究数据表明，超过1/10的美国高中都是“辍学者工厂”，不足60%的学生能完完整整地从入学读到毕业。[2] 如果这些地方真的能认真考虑提供一个适合家庭的居住环境，这个问题就会被及时发现和解决。只有像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罗得岛（Rhode Island）这样极少数的地方，拥有创新的都会校园项目（MET），能结合孩子们的兴趣开展实践学习活动，不过很多也仅是试图对固有模式进行适当的调整而已。

症结在于现行的教育制度适应的是过去的社会化大生产经济，而这种经济模式已经不再适应当前的创意时代。我们的教育制度批量生产出了很多墨守成规的人，他们能够适应机械的工厂式运作，或是严格的集体等级制度，却没有那些需要创意和知识的职业所需要的创造力和独立思考能力。“我们的教育制度像极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汽车工业，固守着那种软弱无力、毫无效率且过时的生产模式。”纽约市长迈克·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2006年12月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指出。[3]

未来主义者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2007年2月告诉一份教育核心期刊，这种生产模式还有一个预期目标，就是传播工业化的纪律——而不是真正的学问。[4] 就像传统的工业生产线，通过严格控制时间来维持高效率的工作节奏。他还谈到农业社会的工作非常灵活，并不需要精确计时，可到了工业生产线上却不一样，如果迟到，就会耽误整个生产流程。而学校也沿袭了同样的方法，托夫勒写道：“铃声一响，你的动作就不能拖拉，铃声再次响起时就得从一个教室奔向另一个教室。”

在现在这个为了标准化考试而教学的时代，许多孩子花大量时间死记硬背，并做着重复的功课，这让人不禁回忆起大工业时代。这种训练与知识经济的需求格格不入。托夫勒认为，我们现在的公立学校系统设立的目

的是为一个已经不存在的经济模式培养劳动力。

大多数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学校的时候，老师能够积极地对他们的课业负责。家长和教育者们都坚信这种工业时代的教育抑制了孩子们的创造力。不少教育专家写报告称，美国学校的低年级教育还说得过去，因为这时候孩子有充分的自由和闲暇来开发学习技能；当学校开始教授具体科目的时候，真正的问题就来了。这时候，美国学生就开始落后于同级的欧洲和亚洲学生了。

当然毫无疑问，我很清楚现在很多学校都比我曾经上过的城市辖区学校高级许多。我喜欢四五年级的时候，可是升到初中，我就觉得无聊了。当然我不怎么用功就可以学得很好，考试成绩也不错。你可能会说我“入门或开窍”了，可我真正关心的是我和弟弟一起组建的车库乐队以及每天在我家地下室的练习。到了高中我就觉得更没意思了。

很多我见过的非常聪明的孩子早早放弃学业，就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刺激让他们坐下来学习。让孩子开窍其实没有必要采用过多手段：良好的教育是可以让孩子全面发展的——不论是艺术、时尚、音乐、技术还是运动。

让教师背上骂名绝对大错特错，据我所知大部分老师都很兢兢业业。盖洛普公司2006年的调查发现，一个提高教学质量的方法就是让老师们更好地融入。[5] 这项研究表明，使学校工作变得更有效的关键，在于让所有老师都参与到教育进程的各个方面，这与那些成功且高效的公司吸引员工的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处。

家长也在寻找各种方法应付这个难题。《华尔街日报》2007年2月的消息称，很多家长为了找到合适的学校搬到很远的地方。[6] 当然部分原因是由于现在人们手头逐渐宽裕，工作场所也更加灵活，很多家长的工作可以不受地理变动的影响。通过互联网，你可以迅速访问全国绝大多数学校，使那些希望挑选好学校、让孩子接受更好教育的家长有了更大的选

择权。

还有些家长选择体制外的方法——直接让孩子在家接受教育。在家上学，按《商业周刊》的米歇尔·康林（Michelle Conlin）的说法，“不再是正统的基督徒或新嬉皮士指望消除文化隔阂的做法”，现在这种趋势在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当中极为普遍。[7] 根据美国教育部提供的数据，在家接受教育的孩子已经从 1999 年的 85 万增长到 2006 年的 110 万。

虽然大家一般都认为在家上学是由于宗教原因，可是一个更为普遍的原因是家长对学校环境的担心，包括坏学生的影响、安全和毒品等问题。据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al Statistics）调查，将近 1/3 的家长都表示“担心学校的环境”是其选择家庭教学的主要原因。越来越多的家长正在这么做，康林说：“即使最好的学校也在旧经济的掌控之下让孩子们被动学习，而此时正是孩子们应当主动学习的时候，而且如果想在这个全球知识经济时代取得优势的话就更是如此。”家长希望能够以更灵活直接的管理方式塑造自己的孩子。

全球化带来的改变大大影响了这一趋势，这种改变包括工作场所灵活性的提高，无论在家还是在办公室都可以自由工作，还有在不同地方居住的机会的增加。“在家上学，”康林写道，“让家庭脱离了地区和学校的约束，同时孩子可以依靠互联网脱离教室的束缚。他们可以从美联储获得经济学的指导，在线游览佛罗伦萨的乌飞齐美术馆（Uffizi Gallery），参加康奈尔大学的鸟类学讲座，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直接参与电影制作课程，这一切只需要操作电脑就可以完成。”

那些在家教育孩子的父母通常也会利用各种资源，譬如家庭教师、计算机社区、在线课程以及父母合作社等来辅导孩子。

近几年，很多创新成功的企业逐渐认识到，有子女的雇员在一个有利于家庭生活的环境里工作效率会非常高。吉姆·古德奈特（Jim Goodnight）是微软公司北卡罗来纳州卡雷 SAS 机构的首席执行官和联合创始

人之一，他认为从早9点上班到晚5点下班这段时间里，员工最能创造重要价值。他会保证让自己的员工在一种更有效率和创意的环境下工作。

这就是为什么公司要提供一整套适合家庭的服务——从配套的健康护理和日托幼儿园到学校，包括私立高中、现场辅导和标准考试的培训。这项政策保证了公司内部员工极强的凝聚力。古德奈特明白，如果员工还要操心孩子的话，是没法做好工作的。我也知道很多人宁愿选择不加薪也乐意待在像SAS这种能提供多种资源的公司。

人才竞争日趋激烈，而且更加国际化，这种教育的失败会让美国的社区陷入不利的处境。我的合作者夏洛塔·梅兰德是一位来自瑞典的母亲，她说瑞典“总体上就是一个社会可以帮助家庭承担更多责任的地方”。她提到自己社区优质的日托幼儿园时说：“每个月花费不到200美元，我的两个孩子一周40小时都可以待在那里，而且还包三餐。”她补充说，安全的环境，意味着“孩子们可以很早就培养起自己的兴趣。7岁左右就可以去自己感兴趣的活动中心。冬天，他们不用家长陪就可以带着雪橇去公园玩儿。所以孩子们可以更加自由，不用太考虑家长的时间”。

我们现在居住在多伦多，这个地方非常适合有孩子的家庭。我们住的地方离大学2.5公里远，离市中心也不过3.5公里。这里有很多公立和私立学校，也住满了有孩子的家庭。郊区和城市的差别在这里根本不存在。正如罗格·马丁（Roger Martin）所说：

> 在波士顿，我们住在美丽的韦尔斯利山地区（Wellesley Hills）。即使这里是个高档社区，有很多单身家庭住的大房子，我们还是不敢让7岁的儿子或者10岁的女儿独自穿过六七个街区去朋友家，也不敢让12岁的儿子独自步行去16街的商业区。这会让我们觉得自责。
>
> 可是在多伦多，我们最小的孩子13岁开始就可以一人骑车上学，沿着城市的南北主路骑车20分钟就可以到学校，在这里

我们一点儿都不担心孩子的个人安全。

有多少美国父母还会这么说呢？在我们原来住的华盛顿特区，每个孩子都上私立学校。不仅因为公立学校质量不达标，而且周围的环境确实很危险。当我有一天看到《华盛顿邮报》上刊登的华盛顿特区地区犯罪地图，就更明显地感觉到了这一点。我们住的地区就像一座岛屿，被一圈代表谋杀和其他暴力犯罪的点所包围。

在多伦多过的第一个万圣节让我们有了家的感觉，所以我将它命名为"不请客就捣蛋指数"（Trick-or-Treater Index），并写入了我的博客。我们在华盛顿时住在西北角一个很封闭的社区，三年来每年万圣节没有一个孩子来敲门。而在多伦多，我住的地方离市中心更近，而且比华盛顿更拥挤，万圣节晚上我家不断有人来"骚扰"，几乎没有停过。有人在我的博客上评论指出，前住宅和城市发展部（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的助理秘书凯瑟琳·奥斯汀·菲茨（Catherine Austin Fitts），引用了一个类似的指标——"冰棒指数"（Popsicle Index），即社区中认为孩子能安全出门买冰棒的人的比率。这似乎还不够，万圣节之后那天，美国统计局发表了一项研究，指出美国将近一半的孩子生活在那些父母觉得邻居可能会对他们造成不良影响的地区，超过1/5的孩子因为住在不安全的地区而被关在家中——对于非裔美国人，这个数字上升到了34%，对美籍西班牙人来说则是37%。[8]

我还要告诉你一个事实。2006年秋天，在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的研究班上，我和我的学生们讨论选择在何处定居的问题，他们大多是留学生。当我问那些留学生最后想在哪里定居，他们的回答让我震惊，大多数都说他们希望在美国拿到学位，开拓事业。可是一旦他们结婚生子，就会落叶归根，返回故土。不管他们来自东亚、印度、拉美、欧洲还是非洲，都想在美国之外抚养孩子。他们说这里的教育制度很不错，可他们的社会没那么物质主义，没有那么大的工作压力，可以有更

多的时间和精力照顾家庭。而且他们还补充，即使离开美国意味着放弃金钱和长期的职业生涯，他们也在所不惜。

这真是一个充满选择的世界，人们一直在寻找一处合适的地方建立家庭。

从流浪之乡到家庭之地

提到适合家庭居住的地方时，人们总会想象一个有森林的小镇或是有大屋子和花园的高档郊区，其实家庭在多种多样的都市地区中生活也很愉快。2006 年扬基洛维奇研究发现，有了孩子的年轻已婚夫妇中，愿意搬到离市中心近的都市地区与住在小镇或是更远的郊区的比例相当。总而言之，大多数年轻家庭愿意住在接近城市的旧郊区，而不是住在市里。[9]

其中一类适合年轻家庭选择的地方我称之为“流浪之乡”（Stroller ville）。这类地方充满了从未厌倦或抛弃城市生活的年轻家庭，每个城市都有他们的影子。我的弟弟带着三个孩子住在新泽西州的霍博肯（Hoboken），每次我去拜访他们的时候，城里小公园中的一大群流浪者都会使我惊奇不已。这让我想到了华盛顿特区的国会山或是多伦多的城市贫民区，沿街满是流浪者和儿童。

还有圣路易斯。当马克·奥尔盖耶（Mark Allgeier）和他妻子开始在那儿找房子时，最先考虑的是市郊。可是看过一些无论是房子还是街区都很普通的社区后，他们最后发现还是梅普尔伍德（Maplewood）比较合适——市里一个有独特房子的老式居民区吸引了他们，附近有邮局、酒吧、餐厅、教堂和杂货店。这里可一点儿都不乏味。“你应该看看这儿的万圣节之夜，”奥尔盖耶说，“所有孩子都会出门玩‘不请客就捣蛋’。”

纽约的街区曾经是单身区甚至是毒品交易市场，现在则到处是带着孩子的年轻妈妈和保姆。2007 年 3 月，《纽约时报》作者山姆·罗伯茨（Sam Roberts）写道：“曾经极富魅力的曼哈顿，一度是《欲望都市》里

主要的无子女区，现在看起来更像是标准的上层街区，甚至是《纯真年代》里20世纪60年代居民区的翻版。"[10]他指出2000年起，在曼哈顿5岁以下的儿童增长了近1/3（32%）。

罗伯茨在文章中采访了拥有一家市场管理咨询公司的戴维·伯纳德（David Bernard）和乔安娜·伯斯（Joanna Bers）夫妇。他们尽管出生在郊区，现在却和一对蹒跚学步的双胞胎住在第五大道。"我想让孩子们在城市长大，因为他们可以接触到很多不一样的事物。城市里有各种挑战，"伯纳德先生告诉记者，"还为人们准备好了生活所需。"尽管最近出现了白人婴儿潮，伯纳德夫妇仍然坚信纽约是一个大熔炉："我们刚刚去了儿童博物馆，根本没有发现多样化的缺失。"伯斯女士还补充道："我们就想把孩子送进P.S.6公立学校。纽约很适合抚养孩子，如果这儿有更多的孩子，可以提供给他们更多资源就更好了。"

当然，也有很多父母不愿在纽约建立家庭。在曼哈顿，买一个两居室公寓要花费200万美元或更多，而且P.S.6是在上东区仅有的纽约家长联合所认定的三所公立学校之一。

就像大学同学马里奥·巴塔利曾经告诉我的，成为名厨最大的好处是有能力让他的孩子去私立学校读书。这儿有太多的投资银行家和金融师，但是又有多少学校有厨师的孩子？

尽管这些"流浪之乡"生活便利，具有城市文明，可是抚养孩子还是会有一系列问题。比尔·伏路切特（Bill Frucht）说他和妻子就从来不让自己的孩子单独外出，必须要带着他们。孩子们也不能去看望朋友，比尔和他妻子不得不制造一个玩耍约会，带着孩子去朋友家玩儿，同他们的父母聊天直到回家。一直监督孩子玩耍让父母有些筋疲力尽，所以你会看到这里很多挡开流浪者的妇女不是孩子的母亲而是保姆——这也是这里生活昂贵的原因之一。

这样的监督更可能阻碍儿童创造力的发展。比尔的妻子说："我和比

尔的童年几乎没有大人的监督，这和现在孩子们的真实生活相去甚远。”讽刺的是，现在那些创意阶层的父母培养孩子的模式反而阻碍了孩子创造力的发展。

“流浪之乡”的多样化也在不断减少，而多样化正是家长试图为自己孩子所谋求的东西。在曼哈顿，白人、黑人、西班牙裔的孩子中，白人占大多数。2005 年，白人家长的平均年收入是 284208 美元。相反，曼哈顿其他家庭的年收入为：亚裔 66213 美元，非洲裔 31171 美元，西班牙裔 25467 美元。

这个结果引发很多质疑：在人口状况逐渐变得与郊区相类似的城市生活又有什么意义呢？

年轻家庭可选择的另一种地区就是“少数民族圈”（ethnic enclave）。这些地方主要是围绕具体的宗教、文化或民族认同而建立的移民社区。通常，那里的街道会让你有身处异国的感觉——杂货店、餐厅、教堂还有商店，都保持着独特的文化特征。我们现在居住的多伦多就有很多这样的地方。现在，少数民族圈星星点点地散布在郊外，想让孩子接受家乡风俗和语言洗礼的家庭尤其喜欢这里。不过这种社区通常都充满了火药味，他们要在充满竞争的生活方式面前努力维护自己的文化，而且这里极具家庭向心力，视孩子为重要的文化传承载体。

我妻子拉娜是约旦人，在密歇根州的特洛伊（Troy）长大，附近就是一个大的中东少数民族圈。毕业后她在底特律动物园找了份公共关系主任的工作。她的堂姐苏哈在底特律公立学校教书，给阿拉伯移民教双语课程。

几年前的一个春天，拉娜和她堂姐安排学生们参观动物园。一连几周苏哈都在跟她的学生们提起自己的堂妹。当同学们终于到达公园后，拉娜开着公园统一的高尔夫车去接他们，她长发披肩，身着迷你裙和高跟鞋。

当苏哈向穿着传统阿拉伯服装的同学们介绍拉娜时，他们开始叽叽喳

喳地嘲笑老师："她怎么可能是你的堂妹！"这群学生在自己的社区中不认识任何一个穿着和长相像美国人的人。

同样，当年轻人蜂拥进少数民族圈后，这些社区也发现自己的民族特征在逐渐消失。

对于那些想住在既有类似城市设施和建筑物又不拥挤的地区的父母，"波希米亚区"是个不错的选择。它们是拥有典型战前建筑群的老式郊区，通常位于有轨电车、铁路或地铁沿线，还有带咖啡店、餐厅、小服装店和商店的繁荣商业带。"波希米亚地区"有很多邻里、历史建筑以及数量繁多的零售街，可是这里也有同"流浪之乡"一样的问题：房价极高，儿童没有人陪伴不能随便出门。

这种地区的一个变异是"历史保护型城镇"（preservation-burg）。沿着河床或者铁道修建的维多利亚式建筑充斥着这些已经有150多年历史的地方，同时它们也披着过去工业化的外壳。这些地方很多都是真实的美国区域，有高贵而坚固的房屋，闪耀着富饶的历史光泽。这些曾经的交通、工业和商业中心，到20世纪中叶已经失去了昔日的繁华和气魄。现在，因为拥有坚固的老房子、逐渐复兴的城镇中心，以及可以再次利用的储藏建筑，这些"历史保护型城镇"吸引着一大批追逐真实城镇感觉的年轻家庭。纽约市外哈得逊河流域（Hudson Valley）的郊区就是这样的地方，就像伊利诺伊州的很多河岸城镇一样。这种城镇通常都有古色古香的老房子，可是对于在市中心或市中心附近上班的人来说，它们有点远，需要很长的通勤时间。

"家庭之地"（family land）仍然是家庭生活的典型选择。这里到处都是陪孩子玩耍的母亲、爱家的男人、健康活泼的婴儿、修葺完好的花园，以及巨大的汽油烧烤炉，还有非常棒的学校和修剪整齐的草坪。

佩姬·詹金斯（Peggy Jenkins）是"家庭之地"的推崇者。住过波士顿、华盛顿和檀香山后，她最终选择在爱达荷州的莫斯科市（Moscow）

建立家庭。"其他地方都不能和莫斯科相比，"她说，"想想森林、河流和草地，而不是仕途经济。再想想学校——莫斯科是爱达荷大学（University of Idaho）的所在地，而且这里离华盛顿州立大学（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只有10公里远。"她还补充说，在这个地方人们能够各取所需。这里有艺术家、科学家、自然爱好者，充满进步思想的人们和更保守一些的人们，都使这里变得丰富多彩。而且莫斯科还拥有交叉的社会阶层，这是美国社会逐渐消失的一大特征。"住在家庭拖车里的孩子们可以和住在山上别墅里的孩子成为朋友。"

虽然这里的学校要比城市的公立学校更好，可是这种地方的多样性也在渐渐缺失。通勤路程一般都很长而且辛苦，建筑也很庸俗。学校和教堂是连接这些社区的纽带，很多社交活动都在住户的后院、私人俱乐部或是其他私人会所举行，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被邀请参加，你永远也不会知道都有什么团体或组织存在。一个实体城镇中心的缺乏通常反映出的是社会中心的缺乏。[11]

还有一些人想住在更远的地方，他们希望在一个传统的郊区有一所带院子的大房子，乔耳·盖儒（Joel Garreau）所说的"边缘城市"（edge cities）可能会更吸引这类人。[12]盖儒对这类地区的定义包括每个工作日早9点以后人口会急剧上升——这意味着来这里上班的人要比离开这里去别处上班的人多。就像传统的居民区一样，这里以大型百货商场和商业联合体为中心区。硅谷就是个典型的技术导向型的"边缘城市"，类似的还有伊利诺伊州的绍姆堡（Schaumburg）、弗吉尼亚州的泰森斯角（Tyson's Corner）都是盖儒书中所列的典型边缘城市。"边缘城市在地理上太过分散，"盖儒写道，"所以很难对其进行准确定义。"

20世纪80至90年代崛起的很多边缘城市如今境况也很艰难。它们非常拥挤，而且商场也不是很成熟完善。现在这类地方也遇到了一系列挑战，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怎样把它们变成真正的社区？怎样减少对机动

交通工具的依赖？怎样增加人口密度？怎样使人们更愿意步行或者使用人力交通工具？怎样把它们从商场之中一个个的独立单元变成一个集生活、工作、学习、娱乐于一体的综合社区？

“新市区”（newurbia）是另外一个选择。根据建筑师安德烈斯·杜阿尼（Andres Duany）和彼得·卡尔瑟彼（Peter Calthorpe）的想法，新市区应该被设计成带有传统感觉的社区。[13]房屋紧密相连但周围被绿地环绕。这些地方的特色就是鼓励步行交通（这里会有车辆限行）。

接下来就是“城市远郊区”（exurbia）。这些地方都是位于主要大都市远郊的地方，近二十年来有了显著的增长。它们不是农村地区，而是主要大城市遥远的外围地区。一些人去那里是因为他们需要广阔的空间，而且没法支付市中心昂贵的房价；另一些人则是为了逃避城市里熙熙攘攘的生活。很讽刺的是，他们常常发现自己还没走就该回来了，因为每天要花超过90分钟的通勤时间。

每种类型的社区都需要仔细斟酌。“流浪之乡”便利、距离中心区近、文明而且多样化，但是昂贵且不利于儿童自然成长。“家庭之地”包括郊区和城市边缘，有大片的院子和空间让孩子玩耍，还有很不错的学校，可是却缺乏民族和种族的多样性。那些住城市远郊区却在市中心工作的人们，往往面临长距离的通勤路程，这是很多心理学家通过调研得出的生活中最不满意的活动之一。重要的是，尽管每个地方都有很多优势，可是没有一个地方是完美无缺的。所以关键在于你要想清楚自己的家庭需要什么，然后选择最适合的地方。

门当户对

人们经常说要维持良好的婚姻，仅仅有爱是不够的。很多成功的婚姻都是基于共同的价值观、相似的背景及共同的生活喜好。过去的55年中，女性已经维护了自己在这些方面的权利，结果也促成了很多所谓的“平

等主义婚姻”——夫妻双方中妻子和丈夫一样聪明富有且以事业为重。《纽约时报》2006年秋天刊登了一篇文章，呼吁人们关注这个看似进步的转变所隐藏的危机：“我们获得平等婚姻真的意味着我们处于一个平等的社会吗?”[14]

换句话说，当一些夫妻中两个人在教育和收入方面日趋平等的同时，那些双方没有同等学历和收入的伴侣之间就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分歧，更加剧了现存的社会经济分化。受过大学教育的男女现在不会同那些没他们学历高的人结婚。社会学家克里斯蒂娜·施瓦茨（Christine Schwartz）和罗伯特·梅尔（Robert Mare）2005年的研究表明，1940年到70年代后期，高中毕业生同大学毕业生结婚的比率已经下降了43%。[15]最近十年，研究者们在《人口统计学》期刊上发表报告称，拥有同等学历的夫妻比例已经达到了40年来的最高点。

诺贝尔奖获得者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曾提出“门当户对择偶”的概念——找与自己类似的人作为配偶，这一点我们很难再提出异议。[16]在那些高智商高收入人群集中的地区，他们结为连理不会让人觉得惊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不断增长的“同类结婚”只会加剧不同阶层的聚集效应和他们在地理上的分化，最终构造出一幅社会、经济和文化隔离的新图景。

我们有理由相信“门当户对择偶”其实反映了经济的不平等，而近期研究则提供证据表明这种现象是财富不均的推动力。经济学家拉克尔·费尔南德斯（Raquel Fernandez）和理查德·罗杰森（Richard Rogerson）在2001年的《经济学季刊》中发表文章指出，不断增加的婚姻分类（比如高收入者要同高收入者结婚）“会极大加剧收入不均”。[17]同样，布鲁金斯经济学家加里·博尔特莱斯（Gary Burtless）2003年分析发现，1979年到1996年间，在可观的经济不平等增长中，婚姻的增长还不足其13%。不过他并不认为“门当户对择偶”一定比以往更显著：男人始终都想与

自己社会地位相当的女性结婚。“既然那些能够工作或者追求更高学历的女性进入了大学、研究院，成为职业人，”安妮·穆菲·保罗（Annie Murphy Paul）在《纽约时报》上写道，“那么美国门当户对择偶的习惯所产生的经济影响就变得更清楚。”

不断加剧的社会经济不平等背后还存在已婚人士与单身人士之间的差距。近期研究表明，穷人和富人的婚姻前景是截然不同的。就像我之前提到过的，尽管有收入群体的整体结婚率在下降，可是在那些已婚人士中，高学历高收入的夫妻远比低收入的夫妻生活得好。“结婚并生孩子已经不是常态而逐渐成为例外，”《华盛顿邮报》2007年3月的报道称，“社会学家认为这已经变成高学历富人的自由选择。”[18]

阶层也许是美国人是否结婚或是同居（可能结婚花费太多）的最好预测，密歇根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帕米拉·斯默克（Pamela Smock）这样认为。[19]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城市里的穷人身上，它同样反映了郊区和农村地区的状况。

知道了彼此结合的简单规则，最终的结果就很显而易见了。随着时间的推移，高学历的家庭会有两份不断增加的收入，而缺乏技能和优势的人们则会在一份收入甚至一份收入都没有的生活中挣扎。在这个社会里，夫妻或情侣在哪儿相识，怎样发展，他们在哪里定居及其影响也与我们这个日益刻薄的世界息息相关。所以，家庭就像社会的其他方面一样，也受“物以类聚”这种集聚效应的影响。

同时，不同种类的家庭之间的差异也越来越不明显。虽然文化斗士们还在拼命鼓吹“嬉皮士、诡辩者和同性恋”正在破坏过时的“家庭意义”，可事实上最适合传统家庭的地方和最适合同性恋家庭的地方往往是重合的。所以现在，我们不仅要关注哪里最适合建立家庭，还需要反思家庭的真正意义所在。

15　空巢时代的不老传奇

2005年1月2日，玛格丽特·佩恩（Margaret Payne）实现了她的梦想。漫步于华盛顿塔科马（Tacoma）波光粼粼的码头区，经过由戴尔·奇休利（Dale Chihuly）设计的有精美玻璃饰品装饰的博物馆，佩恩告诉她已成年的女儿："我想住在这里。"不久，她就租了一间600平方英尺的阁楼。她准备放弃她已有75年历史的老房子、农场和在华盛顿吉格港口（Gig Harbor）6亩的花园。

"这次搬迁是我人生中的重要选择之一"，她说，"它改变了我的生活!"最初，新修葺的老建筑、工业以及塔科马码头工作区的水让她有些无所适从，不过新居住地的活力和畅通无阻让她激动。她交了很多新朋友，而且因为没有上班的压力，她还抽空参与了诸如塔科马艺术委员会（Tacoma Arts Commission）及和平社区中心（Peace Community Center）的志愿活动。她还用卖掉旧房子的钱买了一艘小型帆船。

当我和妻子住在华盛顿特区时，我的很多邻居都已经或者即将成为"空巢一族"。在夏日的周末，我们同邻居在一起时，总会在无意中听到至少两种谈话。

第一种是发生在邻居孩子们之间的，他们之中最大的有20多岁，回来探望父母，非常热诚地谈论着他们现在居住地的优劣，以及将来向往的地方。

第二种谈话发生在父母之间，他们的孩子已经或者即将离开家，所以他们会讨论卖掉大房子，搬到其他地方。

可他们会搬到哪里呢？一些人想搬到乔治敦，离华盛顿仅仅五公里远，而且可以走路去商店和餐厅。另一些人想搬离华盛顿特区，在其他拥挤可靠的市中心找个类似的地方。不止一次我听到有人提到佛罗里达、亚

利桑那或者其他传统的退休社区——这可不是歧视。

人生的第三次大迁移发生在我们的孩子离开家以后。一些空巢者和退休的人会搬到附近的地方，可是仍有一大批人会考虑更多的选择。65岁以上的美国人更愿意搬到很远的地方：37.3%的人会搬到离原居住地800公里以外的地方，相比而言，45~54岁的人中只有25.6%。

这个年龄层的地点选择也更加重要，因为有8000万"婴儿潮"时代出生的人，他们出生于1946年至1964年间，他们正步入60岁[1]。2000年美国65岁以上的人占总人口的12.4%（1900年还不到5%），预计到2025年将会上升到18.4%。

如果历史会引领潮流的话，"婴儿潮"一代的影响非同凡响。这一代人重新塑造了生活方式、消费习惯以及不同人生阶段的价值观，他们的居住地和生活环境也发生了改变。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期，"婴儿潮"一代刺激着城市中产阶级所有权的变革，而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又促进了内环郊区的复兴。他们步入老年后，当然也重新定义了我们现在所讲的退休地区。和以前任何一代人都不同的是，美国现在正在步入老年的这代人引领了空巢者和退休者的生活方式，他们拥有更多的财富、接受了更高的教育，同时还有更加积极的生活方式。由于他们本身的数量和不断积聚的财富，"婴儿潮"一代选择的居住地也会对年青一代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这并不是说所有"婴儿潮"一代的人都生活得很好。根据威廉·弗雷（William Frey）和罗斯·迪沃尔（Ross Devol）的一项研究，上了年纪的雅皮士，也就是那些已婚、身体健康、拥有坚固而不断增长的财力和更加积极灵活的生活方式，以及更多的地域选择的人，他们在今后几十年的增长，将会伴随另一批人，即"上了年纪的贫困人口"的增长，尤其是依靠家庭和社会相关机构资助的75岁以上的寡妇。[2]

不老的一代

“当想要找个地方居住时，”《华尔街日报》在2006年10月这样写道，“现在退休的人们总想找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3] 虽然天气情况和空闲时间仍然是很重要的因素，退休者还是觉得“不管是小城镇还是大城市中可以步行的街区，只要能很快结交到朋友，认识不同的人就好”。不论是多功能的开发区，还是小城镇，抑或是城市中心，只要能够延续往日工作的热情，有份第二职业，或者有一个新培养的运动或爱好，离子孙们近一些，他们就愿意住下来。空巢者和退休者现在有了更广泛的选择，没有全职工作和全职家长的束缚，他们可以更加自由灵活地选择居住地。

在长期抚养孩子照看家室之后，这类人中有很大一部分开始卖掉大房子，向往城市地区熙熙攘攘的生活。“我们不想再做房屋的奴隶了”。这是我以前在华盛顿特区的一个邻居告诉我的。很多空巢者也开始喜欢年轻职业人和同性恋聚集的地方。原因很简单：没有孩子。而且他们都喜欢彼此之间的亲切感和城市的便利设施。

很大一部分空巢者重新过上了单身生活，他们能在人群密集的地方结识朋友和其他独身群体，从而建立起他们自己的中年城市部落。

根据《华盛顿邮报》2007年5月的报道，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的罗斯尼—鲍尔斯顿走廊（Rosslyn-Ballston Corridor），已经吸引了上千名中年人前去。[4] 雷·特南霍兹（Ray Tenenholtz）与妻子分开35年后搬到了阿灵顿，在这里碰到了和他一样63岁的新同伴金·斯莱德（Kim Slade）。“像我们这样的人，离婚或者寡居，孩子也都长大了，我们也需要社交生活，需要交朋友”。特南霍兹告诉《华盛顿邮报》的记者。

单身年轻人和空巢者住在一起也会发生冲突，《华尔街日报》2007年5月就刊登了一则这样的特别报道，恰当地起名为《当空巢遭遇兽穴》（Animal House meets Empty Nest）。[5] 报道跟踪记录了全国分户出售的公寓

的增长趋势，最初由二三十岁的人提出，吸引的是年龄较大的买主。

这个报道也描写了两个群体直接的紧张关系。朱莉·拉米尔（Julie Lammel）是一位50岁出头的语言病理学家，她向记者描述了她在纳什维尔"兽穴"一样的住所以及惨不忍睹的景象。"有一次我上去一看，20多岁的那些人把整个屋子都霸占了，"她告诉《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我想，好吧，现在不是发脾气的时候。"这只是紧张关系的一个方面：年轻的"原住民"对这群老年人的笨拙和农民般的作息时间愤愤不已，而老年人对地产价格的影响又打击着这帮年轻的地主们。

大学城也是空巢者喜欢的地方，因为那里能提供优质的健康护理，完备的生活设施，而且多样化又充满知识刺激。

当然，不是所有空巢者都喜欢四处走动。很多人也喜欢不那么复杂的、田园诗一般的生活。结束了30年的传媒生涯之后，唐娜（Donna）和丈夫吉恩（Gene）从卡拉马祖（Kalamazoo）搬到了密歇根西南部的乡下。为了寻找自然而且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他们买了30亩地，自己种有机蔬菜，自己养鸡。吉恩是个业余铁匠，这可是他打造自己农场的好机会。而对唐娜来说，可以有机会用自己种的植物造纸，创作艺术品，开办自己的工作室——白橡树工作室（White Oak Studio & Gallery)。搬到这里还让夫妇俩有机会接近蓝色海岸艺术家（Blue Cost Artists）——一些工匠和手艺人联合起来，集中优势资源，向夏季旅游者、度假者以及二房东们销售他们的作品。

对大多数空巢者和退休者来说，他们选择居住地的关键在于离儿孙们近一些，他们所做的很多事情也都与此相关。当孩子们离校回家的时候，或者父母生病时，越来越多的父母，会竭尽全力跟着自己的孩子。很多情况下，父母会在经济等各方面资助年轻的家庭。有时候，"婴儿潮"一代的父母也会愿意在活力四射的大城市，同自己的孩子一起分享喜悦和激动，虽然这可能会让他们的孩子觉得很矛盾！

或者考虑一下一起搬家如何？汤姆·胡格（Tom Hoog）及其家人就是这么做的。当胡格从纽约的希尔诺顿（Hill & Knowlton）公司CEO的位置上退下来之后，他和妻子就在考虑要搬到什么地方去。他们与三个孩子开了个家庭会议，讨论这件事情。一个儿子住在科罗拉多——这个家最初形成的地方；另一个儿子住在弗吉尼亚；唯一的女儿住在得克萨斯。

讨论时，胡格说，显而易见“很有必要把这个家庭在一个地方重新结合起来”。他们最终选择的地方在丹佛州外的落基山脉（Rocky Mountains）附近，离他们以前住的地方不太远。于是他们在离老房子6个街区的地方组建了一个新家。儿子迈克尔（Michael）在那儿建了新家；女儿米歇尔（Michele）及其家人从得克萨斯搬了过去；另一个儿子马克（Mark）也紧随其后。孙子们都年纪相仿，胡格补充道：“他们都在一个小团队里玩儿，女孩子们也去同一个舞蹈中心，彼此关系非常好。”

不管“婴儿潮”一代人做什么，社会都会侧耳倾听并紧跟潮流。[6]不管他们走到哪儿，都会出现新的社区，房价都会飞涨。这一代人经历的两次大迁移分别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这迅速哄抬了房地产价格。当这一代人聚集在一起，讨价还价的市场不复存在，社区内的小商贩被来自亚洲的连锁餐厅所取代，五金商店让位于高端商业中心。那些曾经居住在这里的人们，觉得被外来文化侵袭，即使有些人卖掉房子赚了一大笔钱。

诚然，“婴儿潮”一代人倡导的“回归城市”运动改变了城市的生气和活力，使后代们几乎不可能在城市里买房，把他们赶到了城市的边缘甚至郊区。有时候，如果我刚好问到这儿，我的学生和研究团队里的年轻人就会告诉我，他们对“婴儿潮”一代的所作所为非常怨恨，不仅仅是强加在他们头上的“音乐”（their music），还有占据整个城市哄抬房价的行径。

我们真的是在城市里种下了世代纷争的种子吗？时间会给我们答案的。

16　找到你的安身之所

当我第一次宣布我想写本书，帮助人们找到适合自己的居住地时，很多同事觉得有些震惊。“你是一个很认真的学者。”他们说，“学者都不会去写自助手册（self-help books）的。”可总有一些例外。一些很有名的心理学家，像马丁·塞利格曼就写过一本书，全面阐述了如何利用自己的优势更好地生活。很多著名的医学研究者和临床学家也写了很多著作，分享了他们对从减肥到大众健康管理的点滴思考。

经过20多年对各地的研究，我也越来越觉得向人们传递一些有用的信息是非常必要的。我很感激编辑给我的明智忠告：“如果你真的想给人提出建议，那你就必须先得到它。你获得的方式就是写一本既严肃又不失风趣，而且令人信服的书，告诉人们地点选择的重要性。”如果你看到这里了，我希望你能明白我已经获得了它。

读到这里我希望你能明白，地点的选择变得比以前更加重要。诸如汽车、移动电话以及互联网之类的新技术让我们脱离了地域的限制，使工作机会遍布全世界，我们可以住在几乎任何想去的地方，除了这些预言，地域仍然是影响世界经济的重要因素。

世界上只有几十个地方真正肩负着创新和经济增长的使命。这些地方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经济增长中都会显得鹤立鸡群，不论在人口、经济活动、创新、科学才能中的哪一方面。除了这些因素，还有一些力量推动着这一趋势：创新人才希望寻找同类聚集的地方来发展壮大自己，这使经济的分界永远存在。地域不仅对世界经济十分重要，也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

这本书是伴随着两个我们需要仔细思考的关键问题开始的，一是我们靠什么谋生，二是谁会成为我们的人生伴侣。我们所有人，除了最终选择

的事业以外，时不时地都会挣扎于在哪里工作、怎样找到和发展自己的事业之类的问题。还有一些人会花更多的时间确保自己找到了合适的另一半，以组建家庭。

可是很少有人能花点儿时间去战略性地思考第三个问题：在何处安家。在做本书的调研时，我越来越相信这个问题同前两个问题一样重要。

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我们在何处定居已经和我们要找什么样的工作联系得越来越紧密了。在大部分专业领域，工作也因为不同的地点变得具有地域专业性。对人们来说，更重要的问题不是大量的工作或职业机会，而是有足够多能满足人们不同需要的定居地可供选择。

我们在何处定居也决定着经济稳定性的其他方面。就拿买房来说，这几乎是我们每个人要做的最重大的财政投资。房地产市场的表现——住房投资的增长和增值——着实因地而异。这并不是说，人们仅仅因为房地产的潜在回报而选择定居地，可是住房始终是人生最大的投资，所以提前根据不同的市场选准目标还是更好的。

除了我们的经济和职业生涯，我们选择在何处安家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个人生活的幸福。我们住在哪里，能决定我们会遇见谁，怎样遇见，以及我们同朋友和爱人相处的机会。

或许更重要的是，地点能决定我们能否获得幸福。除了经济和文化上的专业化分工，不同的个性也能产生地域上的聚集效应。不同的地方适合不同种类的人。在曼哈顿如鱼得水的人就不适合在博伊西、爱达荷之类的地方发展。洞悉哪些地方同自己的个性相和，是每个人都需要去做的事情。

所以，选择合适的地方安家，你需要权衡五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第一，你需要想清楚自己居住的地方会怎样影响你的工作和职业生涯。据我所知，很多工作机会都集中在某些固定的地方。所以在搬家之前，深入了解这个地方如何同你的短期及长期事业发展相匹配，是非常重

要的。

第二，你必须意识到距离家庭和好朋友近是多么重要的事情，你要清楚如果你搬离，你需要舍弃什么东西。在第 5 章我们讨论过一个研究结果，就是离开亲密的朋友相当于 6 位数的金钱损失。不管你觉得这个数字是否可信，它至少提醒你居住地会影响你与家庭和朋友的关系。

第三，你应该老老实实选择一个与自己生活方式相匹配的地方。一些人喜欢大城市的熙攘和活力，而另一些人则喜欢郊区的安逸，还有人喜欢融入自然和户外。什么样的兴趣爱好和生活情趣能带给你真正的快乐？我喜欢骑自行车，所以不会考虑住在不方便骑车的地方；如果你喜爱滑雪，那么你可能更愿意选择积雪覆盖的山区；如果你是个冲浪爱好者、水手或是个海滩游民，那么你更想选择一处不错的海岸线。

第四，你选择安家的地方应同你的个性品格相匹配。如果你喜欢冒险，那么你可能会选择一处能带给你强烈刺激的地方；如果你的性格外向，那么你会愿意选择周围朋友很多，而且易于交往的地方；如果你是个责任心强的人，那么你会希望周围的人都能认真工作，尽职尽责。

第五，你得确保你安家之地要适合自己不同的人生阶段。如果你是单身，那么你会选择能结交朋友和约会的地方；如果你已婚且有孩子，那么你会选择一个安全并有好学校的社区；如果你是个空巢者，那么你不能住得离孩子太远，而且要使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得到充分满足。

当你需要选择合适的地方并决定安家落户时，必须要好好权衡以上这五个方面。

找到对自己来说合适的地方其实并不容易——就像生活中的其他事情一样，但是绝对是可以做到的。为了帮你更好地评估你的首选居住地，我拟定了一个大体的框架，提出了一些可行的方法，还有一个“十步走”的计划，帮你缩小范围，做出正确的选择。

第一步：明白什么对自己最重要

如果你问别人一份工作或一个企业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答案就是机会总青睐于那些有准备的人。我们同城市的关系既没有多亲密，也不能被忽略、被藐视。确定什么是你的首要目标，是决定你在何处安家最初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在考虑这个问题之前，你应当问自己一些比较基本的问题，关于你住的地方或者想去的地方。

● 对于现在居住的地方，你最喜欢什么，最不喜欢什么？

● 你最喜欢居住在哪些地方？如果你现在居住的地方没有在此名单上，那么你就要格外注意。

● 你觉得在一个具体的领域找一份工作重要吗？或者你有没有考虑换一份工作？

● 你现在处于人生的哪个阶段？有没有把它列入你的人生规划？

● 现在对你来讲什么最重要？工作？找到另一半？周围的自然环境？还是你的家庭？

● 户外活动和自然环境对你来说有多重要？

● 气候和天气对你的影响有多大？

● 诸如艺术、电影、剧场和音乐这类文化活动对你意味着什么？

● 你是不是需要积累经验？你喜欢同其他人在一起还是独处？

● 你喜欢大城市的熙熙攘攘还是舒适的郊区，抑或是农村地区？你是喜欢刺激还是喜欢恬静？

● 什么是帮你一锤定音的因素？

请拿出纸笔，写下你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以及其他人生中的重要因素，无论庞大的还是琐碎的。

第二步 做一份简单的清单

对大多数人来说，对以上问题进行简单而初步的考虑会有很多新的发现。而我的团队和我也开发了一些基本的工具，帮助你从宽广的大都市地区中挑选最适合你的地方。

为了缩小所列城市的范围，你可以用 whosyourcity. com 这个网站上（或者点击网址 creativeclass. com）的地点计算器（location calculators）。另一个我比较喜欢的是伯特·司珀林（Bert Sperling）的“找到你的最佳地点”（Find Your Own Best Place）网站[1]。用地点计算器可以在大都市地区中产生 5～10 个比较适合你的备选地点。如果没有产生一组适合你的地方，也不要沮丧。在编写本书的时候，我就把这些工具整个都用了一遍，发现有时候并不尽如人意。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那就再试一遍，并仔细留心你的答案。如果仍然没有产生你觉得合适的地方，那就用最简单的办法：直接写下你最想定居的地方。

第三步 做足功课

如果你一按键就会出现完美的匹配结果，那就太棒了，可是事实并不是这么简单。有很多关于地方与人相匹配的信息无法全部塞入计算机程序中。

所以，只要你有一份简略的名单，我的团队和我就会构造一个框架结构，帮你评估你的选择。这是我们的“地点金字塔”（Place Pyramid）（参考图 16－1）所安排的结构，也体现了本书的研究成果。

金字塔的最底层是机会（opportunity）；倒数第二层则是基本服务（basic services），譬如教育、医疗等；领导力（leadership）则位于塔的中间位置；接下来是价值观（values）；塔的最顶部则是审美情趣和质量（aesthetics and quality）。就像第 11 章里所说的，每一层都很重要。当我

们找到的地方能够满足金字塔每个层面的需要时，我们一定会觉得非常幸福。我们的目标就是住在一个从下到上、从头到尾都满意的地方。当我们考虑要搬家时，关键是要分析一下你的新地点如何同金字塔每个层次的需要相对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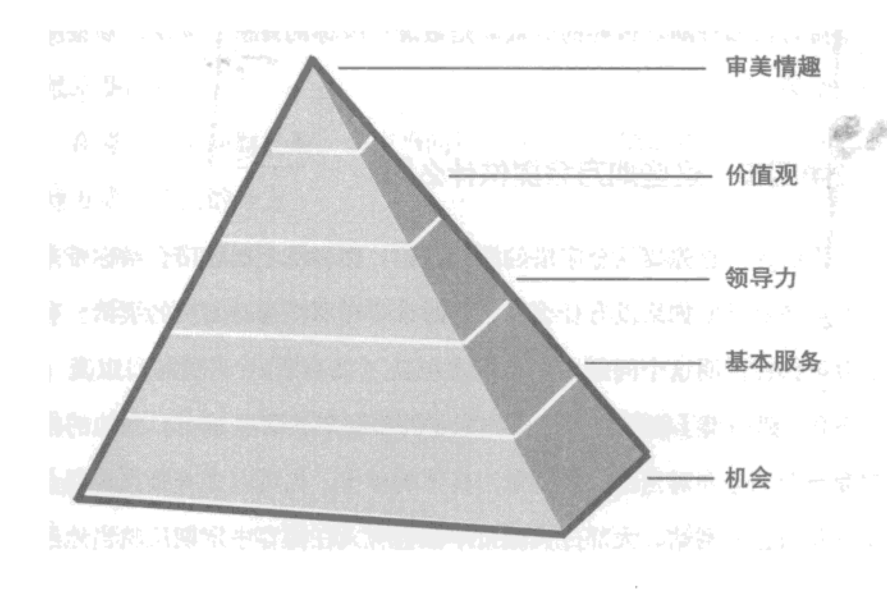


图 16－1　定居地金字塔

我可以告诉你从哪里找到以及如何使用详细的统计数据信息。可是很多时候，你应当知道更多的东西，这不是数据资料能够提供的。你得去收集一些定性而非定量的信息——阅读当地的报纸、和当地人聊天、自己去走走看看。通过这种方式收集到的信息，对你深入了解一个地方更加有用。最好是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强有力的数据事实，以及你自己的个人评价。如果大家都觉得一个地方不错，而你心里觉得这里不适合你，那就要注意了，要记住，底线就是你自己要觉得幸福。

为了帮你收集信息，我和我的团队开发了一个工具叫做地点确定器，在本书的附录中你可以看到（参考附录 C）。它看起来很简单，可是相信我，那可是经过数十载不计其数地调查研究得出的结晶。如果你愿意，你

可以在 whosyourcity. com 或是 creativeclass. com 上下载不同的版本。我希望它能帮你整理思路，确定首选目标，收集分析定性和定量的信息，最终将各个地方进行比较、鉴别和归类。把从 1 到 5 的数字填入表中的每个空格，1 表示最低评价而 5 表示最高。即便你已经收集了很多数据，仍然可以坚持自己的判断。最终的分数就是最能反映你的评价、需求、观察和感受的结果。

第四步　这些地方会提供什么?

你的评价首先要从金字塔的底端开始：你名单上的城市会给你带来怎样的经济机会？如果没有什么机会，那么住在那里是挺困难的事情。有很多数据都在说明这个问题。商业杂志包括《福布斯》、《财富》以及《商业 2.0》都列出了能提供好工作和职业的年度最佳商业城市。当地的报纸和商业期刊也会对当地的经济做出具体的评价。你可以去查查当地商业媒体以及商会的网站。大部分大城市中都会有人在博客中定期反映当地经济状况。

工作

你选择的地方如何同具体的工作机会相结合呢？你需要考虑几个问题：你想继续在这个领域内找工作，还是想改变职业道路？你是个风险偏好者，还是凡事图安全？你想为公司打工，还是想创立一个自己的公司？你可以在美国劳动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的网站找到关于工作市场的详细信息。这个网站棒极了，它有一大批有关工作、薪酬以及超过 800 个具体职位的介绍，遍及美国各大都市地区。[2] 这是我和团队在研究中运用的原始资料。你可以借此了解名单上的城市有多少工作机会以及各自的薪酬，然后逐一比较。

千万不要忘记生活花销。有些城市确实要比其他地方更贵一点儿，而且你的薪水在每个地方都会有所不同，最好根据实际消费水平来判断你的

工资到底能支持多久。网上也有一个计算工具，能够帮你精确计算出各个城市生活花销的差异。你还能看到在其他地方你需要怎样的薪水才能让你维持现有的生活方式。这类网站（www. salory. com 是其中一个）同时还会提供客观、有事实基础的工具，帮你计算薪水，尤其是当你搬了家需要一份新工作的时候。

职业发展

不管你是否处于职业快车道上，职业发展以及终身的学习机会对每个人都很重要，只要保证我们的思想也同个人成长一样活跃！不止一个研究表明，拓展思维可以增加人生阅历，并延长人的寿命。这些机会往往和优秀的学院、大学以及研究生项目挂上钩。正规教育机构之外的一些学习机会，譬如研讨会、人员交流会、总裁培训项目以及一些职业发展课程等，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你可以多关注一下研究生项目的所在地，查看当地报纸、贸易杂志以及网站上关于继续教育课程和研讨班的宣传。看清楚这个地方能够给你提供什么。你还可以去参观当地的大学或者研究生院，和里面的人聊聊，获取你需要的信息。

人脉

同样，研究还表明那些感觉孤单的人会很快变老，而且毫无疑问，会觉得不开心。联系并结交朋友，建立并融入你的交际圈，同时开启你的人脉网——这些不光是职业发展的需要，对你的整体幸福也至关重要。可是要注意，如同其他条件一样，每个地方的交际圈是不尽相同的。你认识那些交际圈中的人吗？如果认识，就去问问他们。同时还要问问自己：我会很容易融入这个地方吗，还是我会有本能的反抗呢？

第五步　满足基本需求

现在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不同的地方能提供的基本服务，比如教育、安

全、医疗保健、住房等。你应该回忆起来，这些是一个地方需要提供的最重要的因素，各个地方也确实存在很大的差异。

教育

对那些孩子该上学的家长来说，学校的质量和等级显然非常重要，可是其实每个人也都需要关注这个问题，因为一个地方教育的质量和发展情况会反映出其他因素（如安全）的质量和发展情况。很不巧，目前没有一份全面可信的有关学校的数据资料。一些人企图瞄准《新闻周刊》出版的年度最佳学校，可是这些标准太不可信。毕竟，孩子们在不同的环境中都能茁壮成长。我知道很多家长搬到高质量的公立学校附近，就为了之后将孩子转到更加专业的私立学校去。你得自己搜寻信息，当地报纸和杂志会时常刊登出一些在地方上名列前茅的学校，通常是根据测评总分和其他方法进行排名。可是当你要做出决定时，一定要去学校参观一下，并同学生以及家长好好聊聊。

健康和安全

当然你还需要关注安全和健康，它们是最基本的要素。所幸的是，犯罪率和安全的数据我们很容易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统一犯罪报告（Uniform Crime Reports）里找到。[3] 查阅当地的报纸也可以发现上面刊登的日常犯罪报告。你需要关注当地警察、消防以及法律强制机构的质量。住在当地的人们觉得满意吗？警察、消防队员和急诊医生是否反应及时？他们是不是过于积极而倒了你的胃口？

健康也是幸福的重要环节，所以拥有便利、高质量以及你负担得起的医疗保险至关重要。如我们所见，其重要性贯穿你的各个人生阶段。看病是否困难？会不会接受新患者？有没有保险？你可能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但当在华盛顿的时候我们发现，找到可以给新的患者提供健康护理的地方非常困难，而且几乎所有的地方都需要现金支付。附近最主要的健康

护理中心在哪里？有没有外伤治疗中心？大学附属的研究医院情况如何？急诊室需要等候多久？当地整体的医疗保健状况如何？在这里你还要同当地居民聊聊他们的健康护理和保障情况。去参观一下当地的医院，看看急诊室也未尝不可，尤其是在繁忙的周五或者周六晚上。

住房

在复杂多变的市场中，关注一个地方的房市势在必行。即使你现在租房住，你也应当知道自己能否在你想定居的地方买到房子。你不光要注意楼盘的现价，更要关注历史趋势和未来规划。《商业周刊》和《财富》上也都定期按照邮编对各地房价进行排名。www. zillow. com 和其他房地产网站都会以地图的形式提供详细的地产评估信息。即使没有这些资料，很多地产中介也有自己的网上名单和相关链接。此外，你也可以去待售的商品房看看，了解一下自己能力范围内的房屋情况。

出行

出行方便——通勤或者去其他地方——对每个人的日常幸福生活来说非常重要。据一位研究幸福的心理学家称，一个地方困扰人们生活的两大问题是：较长的通勤时间和交通堵塞。丹尼尔·卡内曼（Daniel Kahneman）及其同事根据人们每天活动的详细记录，得出出行往返是人们每天最不喜欢的事情。[4] 你能买得起位于合理通勤距离范围内的房子吗，还是你必须每天开很远的车？是否有地铁、火车或者其他可用的交通工具？你可以住在一个走路或者骑车就能办很多事的地方吗？如果你不得不开车，交通情况有多糟？美国地区调查（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在其网站上也公布了各地详细的通勤时间。还有一些专门的报告会告诉你主要城市里最拥挤的地方在哪里。想要了解每天的交通状况，你可以在出行高峰时间访问当地的网站，看看当地的新闻。对了，还有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得先试图掌握自己可能的通勤情况。

同时你还需要考虑大范围的运输和交通状况。你住的地方如何同世界相联系？附近有没有主要的航空中心？如果旅行是你工作或是生活的一部分，你家和目的地之间有多少条直航线？你和其他人进入和离开这个地方是否方便？航线的安全是否都有保证？

千万不要忘记你生活在一个密切联系的有线世界中。在现在这个年代，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切断同这个有线世界的联系无疑等于被判了死刑。

第六步　你选的地方拥有这些吗？

下面，让我们来评价一下你所列城市的领导能力吧！数据分析和进行民意调查是评估方法之一。然而要得知一个地方领导能力最好的方式，就是关注当地的媒体，尤其是一些观点标新立异的报纸或博客。如果可能的话，就要好好读读一个地方的政治历史，过去的事件的确会告诉我们当前形势的背景。谁是政治和商业领袖？他们的个人记录和民众支持率怎样？他们是否体现了你想见到的多样性？他们的价值观和远见同你的相匹配吗？他们演说的问题你觉得重要吗？这个地方的决策是公开做出的还是另有其道？公民有没有参与的机会？和居民谈谈吧！他们是怎样参与的？他们对领导有什么感觉？这里的领导是兼容并包思想开放，还是反对派的傀儡？你还可以去地方大会上看看，实地考察一下领导能力，向居民咨询一下他们的评价。

第七步　价值观检查

下一步就是仔细研究所列城市的普遍价值观，比如宽容、信任以及自我表现和展示。当人们搬到新地方时，这些往往容易被忽视，可是就像我们看到的，这些关系着你的终生幸福。

宽容

像人一样，各个地方也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欢迎和吸引着新成员，尤其是与现有居民不同的人。一些地方，例如纽约或者多伦多，有许多从世界各地来的新移民。还有些地方就有些孤立排外，让新来者感觉很难适应和不受欢迎。一些城市热情友好，另一些则冷漠淡然。你得考虑这对你来说有多重要，以及如何更好地融入一个新地方？同当地的人多交流交流，一起压压马路更好。看看你能在你身边见到自己希望和需要的人吗？

信任

信任——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还包括人与地点之间的信任——很难衡量，但并非不可能实现。到处都有预示：大街上人们会有眼神交流吗？当坐下时大家会把手包或公文包藏起来吗？日常商务交流中某个人的“承诺”还管用吗？当人们离开家或是汽车时会锁门吗？人与人之间是否互相尊重？人们如何对待孩子们？年轻单身人士、家庭、老人和残疾人的状况如何？有没有被边缘化的人群？离开华盛顿特区前往多伦多时，我们很惊讶人们如此有礼貌，汽车会为行人停下来，事实上没有人大声说话或者大发雷霆。当你参观某地时，应该格外注意人们怎样尊重和对待别人。

自我展示

这一点仍然是因地而异。一些地方欢迎自我展现，另一些则显得墨守成规。你想成为自己的信念有多强？在你每天的生活中，个人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在一个地方变得独一无二，或者说改变自己对你来说是不是很重要？

第八步　燃烧城市激情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你要选择的地方和你是否“来电”。需要提醒你的是，“居住地和幸福程度调查”发现“美感”和“活力”是决定人们在

一个地方幸福与否的重要因素。所以要认真对待它们。

你眼中的美景

每个人都会被美丽的事物 吸引，可是记住一句古老的格言：旁观者清。每个人都在自己住的地方看到不同的事物。一些人会流连于沙砾铺就的都市街景，另一些人则会在精心打造的公园内流连忘返。你寻觅到的美景是什么？名单上的城市哪些符合你的审美观？它们的出现真的会让你心旷神怡吗？

到底有多真实？

这是一个批量生产和销售的世界，所以很多人渴望真实的感觉。如果你是其中一员，问问自己：这个地方有多真实？这里有独特的街区或是商店吗？还是千篇一律？什么是它的核心精神？这里怎样评价和展示历史、独特性、物质结构以及文化？要根据你的心选出自己觉得重要的地方。

娱乐因素

居住地不完全与工作有关。什么是你最喜欢的事情——文化艺术、音乐戏剧、体育比赛、跑步骑车、攀岩钓鱼？在这个地方你可不可以做想做的事情？一个爱好骑车的人可能每天都会有不同形式的锻炼。人们 20 多岁的时候喜欢酒吧和夜生活，可能到了 30 多岁就开始喜欢交响乐或者成为爵士迷，有了孩子以后则会发现居然可以教他们踢足球。同可以和你分享兴趣爱好的人们多聊聊吧，如果你看见有人也在做你喜欢的事情，那该多好！如果我看见一群自行车爱好者在他们的装备旁边嘀嘀咕咕，我就会立刻告诉你那里就是适合我的地方。

生活的节奏

每个城市都有其固定的节奏。你更容易被充满活力、有许多活动的地方吸引，还是喜欢节奏舒缓的生活？这个地方的活力何在？是否同你理想的生活节奏相吻合？这里的节奏是否和你自己的相适应？

第九步 好好总结

既然我已经提醒过你应当考虑的所有事情以及原因，那么我要告诉你非常重要的一点：没有一个地方是完美的。所以在找寻最合适的地方时，千万不要抓狂。

现在算算你的总分，比较各个地方，用算出的分数权衡每个地方的优势和劣势。答案没有是非对错，记住：最终的目标是找到最适合你的地方。

第十步 身临其境

几乎没有人可以抛开二手资料，独自做出如开始新工作或是结婚这种重大的决定。决定在哪里安家同样如此。我经常碰见一些人，他们告诉我他们在搬家前从没有去过那里，这让我非常震惊。难道你会在判断如何与上司和同事相处之前，就开始这份工作吗？难道从没有过约会就要和某人结婚吗？

不要误解，我知道任何事情都有例外。所以我也知道有些人坚信两个人谈恋爱时间越长，结婚的可能性就会越小。

可是如果可能的话，有备无患总没有错，你应该亲自到你选择的地方看看。你可以与那里的熟人交流聊天。据2006年出版的《扬基洛维奇调查》（*Yankelovich survey*），人们对某个地方朋友或家人提供的信息评价非常高。[5]

我的个人经验就是在做出最后选择之前，一定要去拜访你列出的城市名单上的至少三个地方。周末拜访是获取有用评价的最好方法，我个人建议时间可以更长一些，应该花足够的时间去熟悉这个地方。相信我，这的确是为你自己、你的家庭和你的未来着想。

当你在那里的时候，设想一下在你人生的下一阶段，你会在这里感受

到什么。参观一个你现在可能会居住的街区，以及你可能会住十年以上的地方。扪心自问以后你会怎么看待这里：你能想象自己每天都要走过这条街道吗？你能忍受这种噪音吗？这里太拥挤还是太空旷？太多沙砾还是太多人造品了？你会感到不安吗？你会经常去什么地方？你怎么到其他地方去？

最重要的是，如果当你真的到了那里却觉得怎样都不对劲儿的话，那就跟着你的心拒绝这个地方吧！不管它在你的排名中有多靠前。你要明白直觉会告诉你什么最重要。这就是你如何去感受这个地方，以及它给了你什么样的感受。

最后　选择

既然你已经做足了功课，收集了充分的资料和信息，汇总了你的分数，同人们进行了交流，也做了拜访，现在是时候挑出你自己的地方了。深呼吸，在何处安家是你最重要的三个人生选择之一，如果你不是单身，那么这就是你所要做的最重要的选择。

当然，还有很多棘手的事情需要考虑，可是如果你的抉择正确，找到一个最适合你的地方，那将会让你的生活锦上添花。

做出明智的选择吧！

鸣 谢

这本书确实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很幸运地拥有一支独一无二的研究团队。首先我要感谢我长期的合作者凯文·斯托拉里克，他与我在多伦多大学马丁繁荣研究院（Martin Prosperity Institute）再次成为同事，他为这本书提供了大量数据。我也非常感谢来自延雪平国际商学院（Jönköping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的夏洛塔·梅兰德，她和我在为这本书进行的一系列项目中一起工作，我非常感谢她对于本书草稿的详细评阅。

我也想感谢其他参与到有关本书研究中的一些合作者。蒂莫西·古尔登发展了照明和超级区域数据并且制作了第2章和第3章的有关图表。罗伯特·阿克斯特尔（Rob Axtell），我早年在卡耐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就认识他——构建了第4章中城市发展的模型。达比·米勒-斯泰格（Darby Miller-Stiger）协助设计了居住地和幸福程度的调查问卷并参与了调查工作。艾琳·迪娜格里（Irene Tinagli）和大卫·威尔逊（David Wilson）合作进行了第9章和第10章中提到的有关分析。贾森·伦特弗劳提供了有关特性的数据并且合作进行了在第11章中提到的有关研究。这本书也受益于几位非常精明强干的研究助理：斯科特·杰克逊（Scott Jackson），他进行了音乐聚集地的相关研究；布莱恩·纳森（Brian Knudsen）和瑞安·萨特（Ryan Sutter）进行了地点和特性的研究。

有两位非常棒的助理编辑辛勤工作，让这本书更为通俗易懂。在阅读本书初稿的时候，杰西·埃利奥特（Jesse Elliott）和我并肩工作，之后他和他的乐队 These United States 去巡演并录制唱片了。阿比盖尔·卡特勒（Abigail Cutler）接替了他的工作，进行第二稿的阅读。她的编辑才华改进了整本书的语气，使论点更加缜密，使这本书更加好看。阿曼达·斯蒂伦（Amanda Styron）和阿比·列别斯金（Abby Liebskind）做了大量的注

释工作，帮助收集数据，彻查事实，并且做了大量我提出的工作。瑞安·莫里斯（Ryan Morris）设计了本书的图片。金·莱安（Kim Ryan）核对了技术性附录。

苏珊·舒尔曼（Susan Schulman）是我的经纪人，她相信这个项目会成功而且给予我大力支持。比尔·弗鲁科特（Bill Frucht）不仅仅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编辑，还是我的合作者和朋友。他的才智和活力激发了我的更好的想法。考特尼·米勒（Courtney Miller）和乔迪·玛考斯基（Jodi Machowsky）在文稿的出版过程中全程负责。整个基本图书出版社的团队都非常专业、高效而且易于合作。我感谢所有的人。

《大西洋月刊》的唐·派克（Don Peck）帮助我形成了不平坦世界和才能迁移的想法。威尔·威尔金森（Will Wilkinson）对手稿的初稿提出了有益的建议。有许多朋友和同事以各种方式支持了我的工作。他们中包括伊丽莎白·克里（Elizabeth Currid），马丁·凯尼（Martin Kenney）和盖里·盖茨（Gary Gates），在和我一起工作的这些年中，他们的才智，交流和评论对我的想法帮助很大。

我想不出还有比马丁繁荣研究院更加适合工作的地方。罗杰·马丁（Roger Martin）是最好的院长。他很聪明，关注好的想法而且从不知疲倦。他提出了设立研究院的想法并且获得了捐助。我非常感谢罗特曼管理学院（Rotman School of Management）的同事们给予我的支持和专业精神。我也想感谢杰奥夫·比蒂（Geoff Beattie）从一开始就相信和支持这本书的想法，还有我们的赞助人——特别是省长麦坚迪（Dalton McGuinty）和整个安大略省，以及约瑟夫·罗特曼（Joseph Rotman）对于这一项目的支持。

我在创意阶层组织（the Creative Class Group，CCG）的团队让我与真实的世界保持联系。大卫·米勒（David Miller）从这本书最开始的头脑风暴阶段就参与其中。史蒂夫·佩蒂格（Steve Pedigo）做了大量的不同

数据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并把它们制成图表。

在我出行的过程中，我遇见许多不懈工作来改善自己的居住地和社区的人们。他们的努力让我能够了解现实世界，激发我的灵感，给予我活力。我感谢阿尔贝托·伊巴尔根（Alberto Ibargüen）和骑士基金会（Knight Foundation）支持我在美国进行的一些社区能力建设倡议。

我非常幸运能够有一个大家庭，为我带来了安慰和欢乐。作为结尾，我对我的妻子拉娜怀有深深的歉意。她的活力和热情是无限的，她对生活的热情无穷无尽，她奇思妙想的幽默让我忍不住开怀大笑。顺便提一下，她经营着创意阶层组织，和律师、会计师、网站及IT人员打交道，并且管理着整个团队——基本上让我能够腾出时间、空间专注于研究和写作。我能够拥有她作为我一生的生活和精神伴侣是我最幸运的事情。

附 录

附录 A 世界上的超级区域

区域名称（按 LRP 排序）	人口（百万）	人口排名	LRP（十亿美元）	创新/专利（排名）	著名科学家（排名）
大东京地区	55.1	4	2500	2	24
波士顿—华盛顿	54.3	5	2200	8	2
芝加哥—匹兹堡	46.0	9	1600	9	14
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安特卫普	59.3	3	1500	22	18
大阪—名古屋	36.0	14	1400	7	22
伦敦—利兹—莱切斯特	50.1	6	1200	25	10
米兰—都灵	48.3	7	1000	34	23
夏洛特—亚特兰大	32.4	18	730	16	9
加利福尼亚南部	21.4	22	710	13	4
法兰克福—斯图加特	23.1	17	630	21	12
巴塞罗那—里昂	25.0	16	610	24	20
多伦多—布法罗—罗切斯特	22.1	19	530	19	7
首尔—釜山	46.1	8	500	6	32
加利福尼亚北部	12.8	28	470	3	1
佛罗里达南部	15.1	25	430	17	17

（续表）

区域名称 （按 LRP 排序）	人口 （百万）	人口 排名	LRP （十亿美元）	创新/专利 （排名）	著名科学家 （排名）
福冈—九州	18.5	24	430	23	19
巴黎	14.7	26	380	4	16
达拉斯—奥斯汀	10.4	30	370	14	13
休斯敦—新奥尔良	9.7	32	330	15	5
墨西哥城	45.5	10	290	35	32
卡斯凯迪亚	8.9	33	260	10	3
里约热内卢—圣保罗	43.4	12	230	32	32
香港—深圳	44.9	11	220	28	31
札幌	4.3	37	200	27	32
维也纳—布达佩斯	21.8	21	180	26	29
特拉维夫—安曼—贝鲁特	30.9	15	160	31	21
布拉格	10.4	29	150	12	25
布宜诺斯艾利斯	14.0	27	150	33	32
丹佛—博尔德	3.7	40	140	5	6
凤凰城—图森	4.7	36	140	11	15
上海	66.4	2	130	30	32
台北	21.8	20	130	36	30
里斯本	9.9	31	110	36	28
北京	43.1	13	110	29	32
德里—拉合尔	121.6	1	110	36	32
格拉斯哥—爱丁堡	3.8	39	110	18	8
柏林	4.1	38	110	1	11

（续表）

区域名称（按 LRP 排序）	人口（百万）	人口排名	LRP（十亿美元）	创新/专利（排名）	著名科学家（排名）
新加坡	6.1	34	100	36	27
马德里	5.9	35	100	20	26
曼谷	19.2	23	100	36	32

注释：排名选择 40 个 LRP（以灯光为基础的区域生产总值）超过 1000 亿美元的超级区域、创新和著名科学家的排名，并根据人口进行了调整。

来源：数据由蒂莫西·古尔登提供；夏洛塔·梅兰德分析了数据并作了排名；如需了解全部的信息和有关方法，请参阅理查德·弗罗里达、蒂莫西·古尔登和夏洛塔·梅兰德的文章《超级区域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Mega-Region*），《剑桥区域经济与社会杂志》（*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2008 年 1 月 1 日。

附录 B “居住地与幸福程度调查”的一些重要结论

因素	总体评价	总体幸福感	对城市的满意程度	向朋友和家人推荐度	对未来的期望
美感和生活方式	3.65	0.622	0.581	0.579	0.503
美感	3.88	0.560	0.534	0.510	0.456
美观和物质环境	4.00	0.499	0.475	0.463	0.395
户外公园、游乐场和散步小路	4.06	0.445	0.424	0.413	0.355
空气质量	3.76	0.389	0.371	0.341	0.333
气候	3.70	0.373	0.358	0.340	0.300
生活方式	3.35	0.457	0.412	0.438	0.367
结识新朋友	3.65	0.528	0.486	0.500	0.422
文化活动	3.38	0.342	0.309	0.329	0.272
夜生活	3.08	0.289	0.254	0.281	0.233
基本服务	3.46	0.603	0.545	0.558	0.509
小学和中学教育	3.55	0.468	0.443	0.427	0.384
健康医疗	3.83	0.410	0.383	0.380	0.334
就业机会	3.15	0.401	0.365	0.380	0.327
宗教场所	4.23	0.346	0.324	0.334	0.265
高等教育	3.93	0.321	0.292	0.305	0.261
住房	3.03	0.310	0.257	0.278	0.293
交通	3.33	0.306	0.266	0.257	0.299
公共交通	2.77	0.188	0.161	0.179	0.162
开放度	3.03	0.509	0.455	0.475	0.427
有孩子的家庭	3.75	0.558	0.506	0.516	0.466
老年人	3.49	0.466	0.432	0.418	0.394
单身的年轻人	2.94	0.384	0.337	0.373	0.310

（续表）

因素	总体评价	总体幸福感	对城市的满意程度	向朋友和家人推荐度	对未来的期望
新近的院校毕业生	2.69	0.375	0.322	0.361	0.314
民族和种族群体	3.19	0.252	0.219	0.236	0.218
移民	3.00	0.201	0.177	0.188	0.175
男女同性恋	2.75	0.176	0.156	0.171	0.140
穷人	2.49	0.169	0.142	0.153	0.155
经济和个人的保障	1.72	0.497	0.454	0.441	0.437
整体经济保障	0.66	0.440	0.393	0.390	0.395
经济条件	3.24	0.548	0.514	0.495	0.458
找工作的好时机	未获取	0.294	0.265	0.267	0.256
经济回升	未获取	0.256	0.206	0.221	0.260
个人保障	3.54	0.409	0.394	0.354	0.352
领导力	未获取	0.432	0.408	0.377	0.376

注释：财富评分基于1~5档，1为最低，5为最高。

附录 C　地点确定器

对每一栏用 1－5 分评价，1 是最低分，5 是最高分		现居住地	选择 1	选择 2	选择 3
机会					
经济条件	总体经济情况如何？				
就业市场	该地在你的专业领域是否提供好的工作和较高的薪酬？				
职业发展	是否容易得到你生活和职业发展所需的资源？				
社交网络	你是否已经有职业方面的社交网络？如果没有，获得和建立新网络是否容易？				
本栏加总					
基础服务					
教育	该地是否提供你和你的家庭所需要的教育条件？				
医疗和安全	该地是否满足你对安全和医疗条件的要求？				
住房	该地是否有你能支付的满意的住房？				
联系	该地是否有顺畅的联系方式——本地的、全球的和数字的等等对你最为重要的联系方式				
本栏加总					
领导力					
政治	政治领袖是否能让你信任并充满信心？				

（续表）

对每一栏用 1 －5 分评价，1 是最低分，5 是最高分		现居住地	选择 1	选择 2	选择 3
商业	商业领袖是否是你尊敬和信任的类型？				
多样性	领导层是多样化的吗？按性别、种族、年龄、民族、性取向和其他因素？				
参与与融入	决策过程有多公开和包容？				
本栏加总					
价值观					
容忍度	不同种族、民族、宗教和生活方式的人受到了怎样的对待？				
信任	总体而言，人们是否彼此信任？				
自我表达	你能做你自己吗？				
人文环境	该地是否尊重人民？				
本栏加总					
美学和生活方式					
物质之美	你如何评价该地的物质和自然之美？				
真实之美	该地是否有其独特性？				
人文之美	该地的艺术、生活方式和休闲设施是你所需要的吗？				
其他注意事项	该地的“能量场”是否和你的相配？				
本栏加总					
全部加总					

注 释

1

1. 贾森·斯卡特(Jason Schachter),《人们为什么迁移》(*Why People Move*),美国人口普查局2000年3月《人口现状调查》(*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和2001年5月《人口现状调查》。这些数据每年进行更新,并可以在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网站查到。

2. 查尔斯·蒂布特(Charles Tiebout),《一个关于地方支出的纯理论》(*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政治经济学》第64卷,1956年第5期。

2

1. 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2006年出版。

2. 原文作者为弗朗西丝·凯恩克洛斯(Frances Kairncross),《距离的消亡》(*The Death of Distance*),哈佛商学院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一版1997年出版)。此外还有文章《征服距离》(*Conquest of Location*),《经济学家》,1997年10月7日。

3. 爱德华·利默(Edward Leamer),《平的世界、公平的竞争场、终归是一个小世界,还是都不对? 评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A Flat World, A Level Playing Field, A Small World After All or None of the Above? Review of Thomas L. Friedman, The World Is Flat*)《经济文献》第45卷,2007年第1期。

4. 城市化数据来源于《世界人口展望:人口数据库的2006年修订》(*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06 Revision Population Database*),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人口司2007年出版。数据可以在esa. un. org/unpp上查到。

5.《与迈克尔·波特的问答时间》(*Q&A with Michael Porter*),《商业周刊》2006 年 8 月 21 日。www. businessweek. com/magazine/content/06_34/b3998460. htm。

6. 理查德·弗罗里达,《世界是不平的》(*The World is Spiky*),《大西洋月刊》第 296 卷,2005 年 10 月第 3 期。

7. 古尔登使用能从太空看见的灯光作为估算经济活动的基础。他用美国大陆 48 个州的地区生产总值(GRP)来校准了灯光数据。他通过将各个国家 2000 年的 GDP 按现在的汇率进行计算,将实际的经济活动转化为标准单位,随后他又将灯光图与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用 Landscan 软件制作的 2005 年的详细的人口网状图重叠。结果与他对于世界上每一个 30 分弧度的网格(小于 1 平方公里),估算的结论都是很一致的。如果想更多地了解这种方法,请参阅理查德·弗罗里达、蒂莫西·古尔登和夏洛塔·梅兰德 的《超级区域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Mega-region*),《剑桥区域经济与社会》,2008 年 1 月 1 日。

8. 安娜李·萨克瑟尼安(Annalee Saxenian),《硅谷的移民企业家》(*Silicon Valley's Immigrant Entrepreneurs*),旧金山,加州公共政策研究院(Public Policy Institute of California),1999 年。维韦卡·沃德瓦(Vivek Wadhwa)、安娜李·萨克瑟尼安、本·瑞斯因(Ben Rissing)、加里·杰瑞夫(Gary Gereffi),《美国新移民企业家:第一部分》,杜克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普莱特工程学院,2004 年 1 月 4 日。还请参阅拉夫克·多萨尼(Rafiq Dossani),《中国和印度的企业家以及他们在硅谷的社交网络》(*Chinese and Indian Entrepreneurs and Their Networks in Silicon Valley*),斯坦福大学修伦斯坦亚太研究中心(Shorenstein APARC),2002 年 3 月。

9. 更多关于首次公开募股的信息可以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The U. 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简称 SEC)获得。网址是:www. seclaw. com/centers/ipocent. shtml。

10. 这些数据可能不完全准确,因为它们不包括许多非英语期刊的引用数量。如前所述,大多数的全球科学交流使用英语,用其他语言发表文章的作者不太可能在这张图上出现很多次。参阅迈克尔·巴蒂(Michael Batty),《科学引用的地理分布》(*The Geography of Scientific Citation*),《环境与规划》A卷,2003 年 35 期。

11. 林恩·朱克尔(Lynne Zucker)和迈克尔·达比(Michael Darby),《高科技公司竞争中的明星科学家和工程师的迁移》(*Movement of Star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in High-Tech Firm Entry*),美国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NBER)第 12172 号工作文件,2006 年 9 月。

12. 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贫民窟星球》(*Planet of Slums*),Verso 出版社,2006 年出版。

13. 罗伯特·兰(Robert Lang)和彼得·泰勒(Peter Taylor),《世界城市网络中的美国城市》(*U. S. Cities in the "World City Network"*),布鲁金斯学会,2005 年 2 月出版。

14.《金钱磁石》(*Magnets for Money*),《经济学家》,2007 年 9 月 13 日。

15. 本杰明·巴伯(Benjamin Barber),《麦当劳世界与圣战》(*Mcworld vs. Jihad*),《大西洋月刊》269 卷,1992 年第 3 期。

16. 李泰然和理查德·弗罗里达,《中国的人才、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Talen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2006 年 2 月。可以在以下网址获得:creativeclass. com。

17. 吴涛,《中国的城乡差距持续扩大》(*Urban-Rural Divide in China Continues to Widen*),盖洛普公司(Gallup organization),2007 年 3 月 28 日。

18. 拉夫克·多萨尼(Rafiq Dossani),《印度软件业的起源与发展》(*Origins and Growth of the Software Industry in India*),斯坦福大学修伦斯坦亚太研究中心(Shorenstein APARC),2005 年 9 月。可以从以下网址下载:aparc. stanford. edu/people/rafiqdossani。

3

1. 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Cosimo Classic 出版社,2006 年出版(第一版时间为 1817 年)。

2. 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城市经济》(*The Economy of Cities*), Vintage 出版社,1970 年出版(第一版为 1969 年)。也请参阅简·雅各布斯的《城市与国家财富——经济生活的基本原则》,(*Cities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Vintage 出版社,1985 年出版(第一版为 1984 年 5 月,兰登书屋 出版)。

3. 琼·戈特曼(Jean Gottman) ,《超级都市》(*Megapolis*),20 世纪基金(Twentieth Century Fund),1961 年。

4. 大前研一(Kenichi Ohmae)) ,《民族国家的尽头:地区经济体的崛起》(*The End Of the Nation State*: *The Rise of Regional Economies*),Simon & Schuster 出版社,1995 年出版。也请参阅他的文章《地区国家的崛起》(*The Rise of Regional State*),《外交杂志》 ,1993 年春季刊。

5. 约翰·盖帕(John Gapper) ,《纽伦,双城国家的危险传说》(*NyLon, a Risky Tale of Twin City States*),《金融时报》,2007 年 10 月 24 日。

6. 罗伯特·兰(Robert Lang)和唐·德哈维尔(Dawn Dhavale),《超越超级都市:探讨美国新的超级都市的地理分布》(*Beyond Megapolis*: *Exploring America's New Megalapolitan Geography*),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 2005 年 7 月。也请参阅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地区经济体需要地区协调吗》(*Do Regional Economies Need Regional Coordination?*) ,哈佛经济研究所 2131 号讨论文件,2007 年 3 月。

7. 为了做到这些,古尔登设置了照明底线来获得兰、德哈维尔以及其他采用更为复杂方法的研究人员所得到的关于美国超级区域的地理分布特点。这些方法包括人口、收入或者交通方式等确认超级区域的方法。他发现尽管这些方法对于了解超级区域而言极为重要,连绵不绝的灯光是反映经济一体

化的一个很好的指标,而且可以在其他条件下使用。在通过调整照明底线,并据此对美国业已形成的超级区域形成了最佳的近似结果后,他将这一照明底线应用到世界其他地方的夜间照明数据库中。这一方法划分出了代表各种规模定居点的照明小块,最大的超级区域覆盖数千平方公里,到小的村庄以及其他的照明区域等只有几平方公里的区域。如欲了解更多关于此方法的情况,请参阅弗罗里达、古尔登和梅兰德的《超级区域的崛起》(*The Rise of Mega – region*),2008 年。

8.《作为超级都市的得克萨斯三角区域》(*The Texa Triangle as Megalopolis*),达拉斯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休斯敦分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Dallas Houston Branch),2004 年 4 月。也请参见 www. dallasfed. org/research/houston/2004/hb0403. html。

9. 关于蒙特利尔,请参阅凯文·斯托拉里克(Kevin Stolarick)和理查德·弗罗里达的《创意、联系和创新:关于蒙特利尔区域联系的研究》(*Creativity, Connections and Innovation: A Study of Linkages in the Montreal Region*),《环境与和规划》A 辑,第 38 卷,2006 年第 10 期。

10. 多米尼克·威尔逊(Dominic Wilson)和鲁帕·佩鲁肖莎曼(Roopa Purushothaman),《与"金砖四国"共同创造梦想:通往 2050 年之路》(*Dreaming With BRICs: The Path to* 2050),高盛公司全球经济报告第 99 号,2003 年 10 月 1 日。

4

1. 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关于经济发展的机制》(*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货币经济学》,1988 年 22 期。

2. 亚当·斯密 (Adam Smith) ,《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Bantam 出版社,2003 年出版(第一版为 1776 年)。

3. 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Cosimo Classic 出版社，2006 年出版（第一版时间为 1817 年）。

4.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经济发展理论》（*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哈佛大学出版社，1934 年出版（第一版为 1911 年）。

5.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Haper 出版社，1975 年出版（第一版为 1942 年）。

6. 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技术变革和总生产函数》（*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经济学和统计学评论》（*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第 39 卷，1957 年 8 月第 3 期。

7. 保罗·罗默（Paul Romer），《收益递增与长期增长》（*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 Run Growth*），《政治经济学期刊》第 94 卷，1986 年 10 月第 5 期。保罗·罗默，《内生技术变化》（*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政治经济学期刊》第 98 卷，1990 年 10 月第 5 期。

8. 比尔·斯泰格瓦尔德（Bill Steigerwald），《城市观察：城市研究传奇人物简·雅各布斯关于中产阶级化、新城市主义的研究及其影响》（*City Views: Urban Studies Legend Jane Jacobs on Gentrification, New Urbanism and Her Legacy*），Reason 出版社，2001 年 6 月。

9. 大卫·埃勒曼（David Ellerman），《简·雅各布斯的发展理论》（*Jane Jacobs on Development*），《牛津发展研究》第 32 卷，2004 年 12 月 4 日。

10. 杰弗里·韦斯特（Geoffrey West）、路易斯·贝腾科特（Luis Bettencourt）、乔斯·洛博（Jose Lobo）、德克·赫尔冰（Dirk Helbing）和克里斯蒂安·昆奈特（Christian Kuehnert），《增长、创新、规模和城市中的生活节奏》（*Growth, Innovation, Scaling and the Pace of Life in Cities*），美国国家科学院会议文件第 104 卷，17 期，2007 年 4 月 17 日。

11. 罗伯特·阿克斯特尔（Robert Axtell）和理查德·弗罗里达，《新兴城

市：齐普夫法则的微观基础》（*Emergent Cities：Micro-foundations of Zipf's law*），2006 年 3 月，可以在以下网址获得 creativeclass. com。

5

1. 关于此主题，2005 年有一项综合研究，研究发现处于国家收入分布的中间层的美国人的工资和年薪在 1966 年到 2001 年间上升了 11%。而最高收入者工资和年薪的上升的幅度是令人震惊的 617%。这意味着在 35 年间，只有十分之一的美国劳动者的工资和年薪收入的增长不低于国家生产力增速。正如康奈尔大学教授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在 2007 年的著作《落后》（*Falling Behind*）中所指出的，1% 最富裕的美国人收入占国家总收入的比例从 1980 年的 8.2% 上升到 2005 年的 17.4%。"更加令人震惊的是，"记者克莱夫·克鲁克（Clive Crook）2006 年发表在《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从 1997 年到 2001 年，1% 最富裕的人口攫取了远远超过贫穷的 50% 的人口所获得的工资与年薪收入。而且即使是在最富裕的人口之中，获益也是高度集中在最最富裕的人口手中。"

2. 赫伯特·马斯卡姆（Herbert Muschamp），《考察逃避现实》（*Checking in to Escapism*），《纽约时报》，2002 年 11 月 2 日。

3. 贝森·托马斯（Bethan Thomas）和丹尼·多林（Danny Dorling），《英国的身份认同：从摇篮到坟墓的地图集》（*Identity in Britain：A Cradle-to-Grave Atlas*），Polity 出版社，2007 年出版。也请参阅露西·沃德（Lucy Ward），《生活在何处对你的未来至关重要》（*Where You Live Can Be Crucial to Your Future*），《卫报》，2007 年 9 月 8 日。

4. 贾森·斯卡特（Jason Schachter），《人们为什么迁移：2000 年人口现状调查》（*Why People Move：Exploring the March 2000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美国人口普查局 2000 年 3 月公布。

5.《挑一个地方生活，之后再找工作》（*Pick a Place to Live, Then Find a*

Job)，《华尔街日报》，2002 年 1 月 27 日。原研究报告是下一代咨询公司(Next Generation Consulting)所作，《人才资本：人才争夺战的新兴战场：2002 年白皮书》(*Talent Capital: the Emerging Battlefield in the War for Talent: A White Paper*, 2002)。2006 年 5 月的调查是由城市 CEO 组织(CEOs for Cities)委托扬基洛维奇研究公司进行的。《吸引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去城市》(*Attracting Young College-Educated to Cities*)，城市 CEO 组织，2006 年 5 月 11 日出版。

6. 那塔乌德·鲍德哈维(Nattavudh Powdthavee)，《为朋友、亲人和邻居贴上价签：使用生活满意度调查来评价社会关系》(*Putting a Price Tag on Friends, Relatives and Neighbors: Using Surveys of Life Satisfaction to Value Social Relationships*)，《社会经济学杂志》，2008 年。

7. 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退出呼吁与忠诚》(*Exit Voice and Loyalty*)，哈佛大学出版社，1970 年出版。

6

1.《进入城市的世界》(*The World Goes to Town*)，《经济学家》，2007 年 5 月 3 日。

2. 阿方索·埃尔南德斯·马林(Alfonso Hernandez Marin)，《文化变化：从农业到城市》(*Cultural Changes: From the Rural World to Urban Environment*)，《联合国编年史》，2006 年 11 月 4 日。

3. 肯尼斯·杰克逊(Kenneth Jackson)，《边疆马唐草》(*Crabgrass Frontier*)，牛津大学出版社，1987 年出版。罗伯特·布鲁格曼(Robert Bruegmann)，《城市蔓延简史》(*Sprawl: A Compact History*)，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5 年出版。

4. 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天堂中的波波族》(*Bobos in Paradise*)，Simon & Schuster 出版社，2001 年出版。《在天堂里行驶》(*On Paradise*

Drive),Simon & Schuster 出版社,2004 年出版。

5. 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和克里斯托弗·贝里(Christopher Berry),《人力资源水平在各城市的差异》(*The Divergence of Human Capital*),哈佛经济研究所,2005 年 8 月。

6. 理查德·弗罗里达,《聪明的头脑在哪里》(*Where the Brains Are*),《大西洋月刊》第 298 卷,2006 年 10 月第 3 期。

7. 约瑟夫·吉尔科(Joseph Gyourko)、克里斯托弗·迈耶(Christopher Mayer)和托德·思奈(Todd Sinai),《超级明星城市》(*Superstar Cities*),美国经济研究局工作文件第 12355 号,2006 年 7 月。

7

1. 丹·平克(Dan Pink),《自由职业者国度》(*Free Agent Nation*),华纳图书出版社,2001 年出版。

2. 彼德·德鲁克(Peter Drucker),《后资本主义社会》(*Post - Capitalist Society*),Harper Business 出版社,1993 年出版。也请参阅德鲁克的《超越信息革命》(*Beyond 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大西洋月刊》第 284 卷,1999 年 10 月第 4 期,还有德鲁克的《下一个社会》(*The Next Society*),《经济学家》,2001 年 11 月 1 日。弗里茨·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通常被认为是首先使用"知识型工人"这一术语的人,他在 1962 年的著作《美国的知识生产与分配》(*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Knowledge in the United States*)中使用了这一术语,该书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62 年出版。

3. 理查德·弗罗里达,《创意阶层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基本图书出版社,2002 年出版,凯文·斯托拉里克(Kevin Stolarick)更新了数据。

4.《世界首富》(*The World's Richest People*),《福布斯》,2007 年 3 月 27 日。

5. 理查德·弗罗里达、夏洛塔·梅兰德(Charlotta Mellander)和凯文·斯托拉里克(Kevin Stolarick),《深入经济发展的黑匣子:人力资本、创意阶层和包容》(*Inside the Black Box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Human Capital, the Creative Class, and Tolerance*),《经济地理学杂志》第8卷,2008年第5期。

6. 有关例子请参阅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工业区位理论》(*Theory of the Location of Industries*),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29年出版(1909年第一版)。

7. 迈克尔·皮奥里(Michael Piore)和查尔斯·萨贝尔(Charles Sabel),《第二次工业分界》(*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基本图书出版社1984年出版。

8.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Cosimo Classics 出版社,2006年精简版(1890年第一版)。

9. 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集群与新竞争经济学》(*Clusters and the New Economics of Competition*),《哈佛商业评论》,1998年11—12月号。《选址、竞争和经济发展:全球经济下的本地集群》(*Location, Competi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ocal Clusters in a Global Economy*),《经济发展季刊》第14卷,2000年2月第1期。

10. 约瑟夫·科特赖特(Joseph Cortright)和海伊克·迈耶(Heike Mayer),《生命之迹:美国生物科技中心的增长》(*Signs of Life: The Growth of Biotechnology Centers in the US*),布鲁金斯学会城市政策研究中心,2001年出版。

11. 安·马克森(Ann Markusen)和格雷格·施罗克(Greg Schrock),《不一样的城市:不同的增长、层级和专业分工方式》(*The Distinctive City: Divergent Patterns in Growth, Hierarchy and Specialization*),《城市研究》第43卷,2006年7月第8期。

12. 玛丽安·费尔德曼(Maryan Feldman)和罗杰·马丁(Roger Martin),《行政区优势》(*Jurisdictional Advantage*),美国经济研究局,2004年10月。

13. 丹·费兹帕特里克(Dan Fitzpatrick),《匹兹堡国家银行的上班族扬眉吐气了》(*Extreme Commuters at PNC Raise Eyebrows*),《匹兹堡邮报》,2005年8月7日。

14. 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独自打保龄球: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Simon & Schuster 出版社,2000 年出版。

15. 安德鲁·哈加登(Andrew Hargadon),《沟通旧世界和建设新世界:关于创意的微观社会学》(*Bridging Old Worlds and Building New Ones: Toward a Micro-sociology of Creativity*),文章收录在利·汤普森(Leigh Thompson)编辑的《组织和团队中的创意与创新》(*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in Groups and Teams*)中,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出版社,2007 年出版。

16. 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松散联系的力量》(*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美国社会学杂志》第 78 卷,1973 年 5 月第 6 期。

17. 理查德·凯夫斯(Richard Caves),《创意产业:艺术和商业的契约》(*Creative Industries: Contract between Art and Commerce*),哈佛大学出版社,2002 年出版。也请参阅伊丽莎白·克里(Elizabethe Currid)的《沃霍尔经济》(*The Warhol Economy*),书中详细分析了当代纽约设计、音乐和艺术场景相互交织的情况,该书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2007 年出版。

18. 特里·克拉克(Terry Clark),《将文化变为魔术:怎样吸引游客和定居者》(*Making Culture Into Magic: How Can it Bring Tourists and Residents?*),《公共管理国际评论》,2007 年 1 月第 12 期。也请参阅特里·克拉克的《作为休闲机器的城市》(*The City as an Entertainment Machines*),《城市社会学研究》,2001 年第 6 期。

19. 斯科特·杰克逊(Scott Jackson),《音乐机器:地理冲击,美国 1970—2004 年音乐创新的历史与形势》(*The Music Machine: The Impact of Geography, History and Form on Music Innov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970—2004*),乔

治梅森大学,2007年5月。

20.《杰克·怀特离开了"糟透了"的底特律》(*Jack White Leaves 'Super-Negative' Detroit*),《今日美国》,2006年5月25日。

8

1. 这些关于住房趋势的数据来自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美国社区调查》(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数据可以从以下网址获取:www.census.gov/acs/www。

2. 彼得·科伊(Peter Coy),《最富裕的邮政编码区及其成因》(*The Richest Zip Codes and How They Got That Way*),《商业周刊》,2007年4月2日。

3. 约瑟夫·吉尔科(Joseph Gyourko)、克里斯托弗·迈耶(Christopher Mayer)和托德·思耐(Todd Sinai),《超级明星城市》(*Superstar Cities*),美国经济研究局工作文件第12355号,2006年7月。

4. 罗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超级明星城市可能成为投资者的超级明星般破灭的泡沫》(*Superstar Cities May be Investors' Superstardust*),《上海日报》,2007年5月22日。更多信息可以从以下网址获得:www.taipeitimes.com/News/editorials/archives/2007/05/20/2003361715。

5. 罗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房地产的历史转折点》(*Historic Turning Points in Real Estate*),耶鲁大学,柯氏经济研究基金会(Cowles Foundation for Research in Economics),第1610号讨论文件,2007年6月。可从以下网址获得cowles.econ.yale.edu/P/cd/d16a/d1610.pdf。更具体的数据来自"希勒住房价格指数"案例,可以从以下网址获得:macromarkets.com/csi_housing/sp_caseshiller.asp。

6. 罗杰·洛温斯坦(Roger Lowenstein),《大众心理》(*Pop Psychology*),《纽约时报》,2007年3月18日。如欲了解关于更普遍意义上的泡沫的有趣观点,请参阅丹尼尔·格罗斯(Daniel Gross)的《砰!为什么泡沫对于经济非

常有益》(*Pop! Why Bubbles Are Great for the Economy*),Collins 出版社,2007 年出版。

7. 瑞安·埃文特(Ryan Avent),《超级明星城市是超级投资机会吗?》(*Are Superstar Cities Super Investments?*),*The Bellows*,2007 年 5 月 22 日。可从如下网址获得:www.ryanavent.com/blog/? p=403。

8. 理查德·弗罗里达、夏洛塔·梅兰德(Charlotta Mellander),《那些邻居们:艺术家、波波族和同性恋为什么以及怎样影响房价》(*There Goes the Neighborhood: How and Why Artists, Bohemians and Gays Affect Housing Values*),2007 年。可在以下网址获得:creativeclass.com。

9. 詹妮弗·罗贝克(Jennifer Roback),《工资、租金和生活质量》(*Wages, Rents, and the Quality of Life*),《政治经济学》第 90 卷,1982 年第 6 期。

10. 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杰德·科尔科(Jed Kolko)和阿尔伯特·塞兹(Albert Saiz),《消费城市》(*Consumer City*),《经济地理学》第 1 卷,2001 年第 1 期。格莱泽和乔舒亚·戈特利布(Joshua Gottlieb),《城市复兴和消费城市》(*Urban Resurgence and the Consumer City*),《城市研究》第 43 卷,2006 年第 8 期。

11. 玛雅·罗尼(Maya Roney),《今天的波希米亚,明天的高额租金》(*Bohemian Today, High-Rent Tomorrow*),《商业周刊》,2007 年 2 月 26 日。

12. 安·马克森(Ann Markusen)和格雷格·施罗克(Greg Schrock),《艺术专业化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The Artistic Special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mplications*),《城市研究》第 43 卷,2006 年第 10 期。

13. 蒂姆·哈特福德(Tim Hartford),《卧底经济学家:迁移》(*The Undercover Economist: On the Move*),《金融时报》,2007 年 3 月 9 日。

14. 安德鲁·奥斯瓦尔德(Andrew Oswald)、大卫·布兰奇福劳(David Blanchflower)和彼得·桑菲(Peter Sanfey),《工资、利润和租金分担》(*Wages, Profits and Rent-Sharing*),《经济学季刊》第 111 卷,1996 年 2 月第 1 期。

9

1. 克劳迪娅·威利斯(Claudia Willis),《幸福的新科学》(*The New Science of Happiness*),《时代》,2005 年 1 月 9 日。

2. 丹尼尔·卡内曼(Daniel Kahneman)认为通过使用详尽的日常重建法(用于测算幸福程度)可以精确地评判人们是否幸福。也可以参阅丹尼尔·卡内曼、阿兰·克鲁格(Alan Krueger)、大卫·史卡德(David Schkade)、诺伯特·施瓦茨(Norbert Schwarz)和阿瑟·斯通(Arthur Stone)的《确认日常生活体验的调查方法：日常重建法》(*Survey Method for Characterizing Daily Life Experience:The Day Reconstruction Method*),《科学》第 306 卷,5702 期,2004 年 12 月 3 日。也请参阅丹尼尔·卡内曼、阿兰·克鲁格、大卫·史卡德、诺伯特·施瓦茨和阿瑟·斯通的《如果更富有你会更幸福吗？令人关注的幻象》(*Would You Be Happier If You Were Richer? A Focusing Illusion*),普林斯顿大学经济政策研究中心,2006 年出版。

3. 丹尼尔·吉尔伯特(Daniel Gilbert),《为什么快乐不幸福》(*Stumbling on Happiness*),Knopf 出版社,2006 年出版。

4. 爱德华·迪纳(Edward Diener)和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超越金钱:面对幸福经济》(*Beyond Money: Toward an Economy of Well-Being*),《公共利益心理学》第 5 卷,2004 年第 1 期。

5. 尼克·鲍默加顿(Nick Paumgarten),《去了就回来》(*There and Back Again*),《纽约客》,2007 年 4 月 16 日。

6. 米哈利·奇凯岑特米哈伊(Mihaly Csikszentmihalyi),《心流:最佳体验的心理学》(*Flow:The Psychology of Optimal Experience*),Harper Collins 出版社,1990 年出版。《找到心流:融入日常生活的心理学》(*Finding Flow: The Psychology of Engagement with Everyday Life*),基本出版社,1997 年出版。

7. 特里萨·阿玛贝尔(Teresa Amabile)与他人合著的《工作中的情感与创意》(*Affect and Creativity at Work*),《管理科学季刊》第 50 卷,2005 年 3 月。

10

1. 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人类动机的理论》(*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心理学评论》第50卷,1943年。也请参阅他的著作《动机与人格》(*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Harper Collins出版社,1987年出版(1954年Harper出版社第一版)。如欲了解更多情况,可以登录以下网址www.maslow.com。

2. 弗吉尼娅·波斯特尔(Virginia Postrel),《为什么买你不需要的东西:美学的边际吸引力》(*Why Buy What You Don't Need: The Marginal Appeal of Aesthetics*),《创新》,2004年春。《美学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Aesthetics*),《战略与商业》,2003年春。《风格的本质:美学价值的兴起如何重塑商业、文化和意识》(*The Substance of Style: How the Rise of Aesthetic Value Is Remaking Commerce, Culture, and Consciousness*),Haper Collins出版社,2003年出版。更多内容请浏览一下网址:www.vpostrel.com/。

3. 米歇尔·巴斯卡尔(Michèle Bhaskar)和伊容·范·德·文(Jeroen van de Ven),《美丽只是肤浅吗?》(*Is Beauty Only Skin Deep*),《解密一场选秀节目的美丽溢价》(*Disentangling the Beauty Premium on a Game Show*),埃塞克斯大学讨论文件,经济学系,2007年1月。

4. 詹姆斯·罗加斯(James Rojas),《混乱却激发灵感的都市主义》(*A Messy, Inspiring Urbanism*),《国家邮报》,2007年10月18日,参见www.canada.com/nationalpost/news/toronto/story.html?id=4e82b4f5-941a-421ea50c-18bd1d6dbff8&k=1731。

5. 米勒·麦克弗尔森(Miller McPherson)、林恩·史密斯(Lynn Smith)和马修·布拉西尔斯(Mathew Brashears),《美国的社会孤立现象:20年间核心谈话圈的变化》(*Social Isolation in America: Changes in Core Discussion*),《美国社会学评论》第71卷,2006年6月第3期。

6. 伊桑·沃特斯(Ethan Watters),《都市部落:朋友是你的新家庭成员

吗》(*Urban Tribes: Are Friends the New Family?*)，美国 Bloomsbury 出版社，2004 年出版。

7. 理查德·劳埃德(Richard Lloyd)和特里·克拉克(Terry Clark)，《作为娱乐机器的城市》(*The City as an Entertainment Machine*)，《城市社会学研究》，2002 年第 6 期。

8. 泰勒·克拉克(Taylor Clark)，《独立摇滚之城：为什么波特兰是美国的独立摇滚圣地》(*The Indi City: Why Portland Is America's Indie Rock Mecca*)，《记事板》(*Slate*)，2007 年 9 月 11 日。参见 Slate. com/id/2173729/。

9. 罗纳德·因格哈特(Ronald Inglehart)，《现代化和后现代化：43 个社会中的文化、经济和政治变化》(*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7 年出版。如欲了解更多关于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情况，请参阅 www. worldvalues-survey. org/。

10. 本杰明·弗里德曼(Benjamin Friedman)，《经济增长引发的道德后果》(*The Moral Consequesnces of Economic Growth*)，Knopf 出版社，2005 年出版。

11

1. 心理学家发现有三种主要因素影响人们与他们所处环境之间的适应。他们把第一种称之为"筛选(selection)"，也就是说，人们寻找能够满足和支持他们心理需求的社会和物质环境。第二种是"召唤(evocation)"，即人们下意识地引出对他们的社会和物质环境的反应，这是他们心理特征的产物。第三种是"操纵(manipulation)"，人们实质上通过调整和改造环境来强化和表现他们的心理素质。请参阅大卫·巴斯(David Buss)的《筛选、召唤和操纵》(*Selection, Evocation and Manipulation*)，《性格与社会心理学》第 53 卷，1987 年第 6 期。

2. 威尔·威尔金森(Will Wilkinson)，《寻找幸福的研究：是否可靠？对

于政策有何影响?》(*In Pursuit of Happiness Research: Is It Reliable? What Does It Imply for Policy?*),凯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政策分析,2007年4月11日。可以从以下网址获取:www. cato. org/pub_display. php? pub_id = 8179。如欲了解更多资料,请浏览作者博客:willwilkinson. net/。

3. 如欲了解更多关于心理学家的"性格五要素模型",请重点参阅刘易斯·戈登伯格(Lewis Goldberg)的《性格的替代描述:五大要素结构》(*An Alternative Description of Personality: The Big-Five Factor Structure*),《性格与社会心理学》,1990年第59期。戈登伯格的《五大要素结构的指标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Markers for the Big-Five Factor Structure*),《心理评估》,1992年第4期。保罗·科斯塔(Paul Costa)和罗伯特·麦克克拉(Robert McCrae)《修订性格清单(NEO-PI-R)和后五要素清单(NEO-FFI) 专业手册》(*Revised Personality Inventory (NEO-PI-R) and NEO Five Factor Inventory (NEO-FFI) Professional Manual*),《心理评估资源》(*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Resources*),1992年出版。

4. 贾森·伦特弗劳(Jason Rentfrow)、山姆·戈斯林(Sam Gosling)和J. 波特(J. Potter),《性格特征的地理分布:出现、持续和表达,关于性格特征地区变动的理论》(*The Geography of Personality: A Theory of Emergence, Persistence, Expression*),《心理科学视角》,2008年出版。

5. 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原始社会的性与性情》(*Sex and Temperament in Primitive Society*),Morrow 出版社,1935年出版。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特点》(*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Patterns of Japanese Culture*),Houghton Mifflin 出版社,1946年出版。

6. S. E. 克鲁格(S. E. Krug)和 R. W. 卡尔哈维 (R. W. Kullhavy),《美国各地区性格特征差异》(*Personality Differences Across Reg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社会心理学》第91卷,1973年。

7. 如果愿意,你也可以参与该项测验,或者只是看一下:www. outofser-

vice. com/bigfive/。

8. 贾里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枪炮、病菌与钢铁》(*Guns, Germs and Steel*),W. W. Norton 出版社 1997 年出版。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和约旦·拉帕波特(Jordan Rappaport),《作为沿海国家的美国》(*The United States as a Coastal Nation*),《经济增长》第 8 卷,2003 年 3 月第 1 期。

9.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Dover 出版社,2003 年出版(1905 年第一版)。罗纳德·因格哈特(Ronald Inglehart),《现代化和后现代化:43 个社会中的文化、经济和政治变化》(*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7 年出版。

10. 加里·盖茨(Gary Gates),《种族融合、多样化和社会资本:关于它们对人口和就业增长的作用分析》(*Racial Integration, Diversity, and Social Capital: An Analysis of Their Effects on Regional Population and Job Growth*),威廉斯学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院,2003 年 4 月。布莱恩·纳森(Brian Knudsen)、凯文·斯托拉里克(Kevin Stolarick)、丹尼斯·罗素(Denise Rousseau)和理查德·弗罗里达,《沟通与联系:区域社会资本的多方位探讨》(*Bridging and Bonding: A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 to Regional Social Capital*),卡耐基梅隆大学,2005 年。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大熔炉:21 世纪的多样化和社区》(*E Pluribus Unum: Diversity and Commun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斯堪的纳维亚政治研究》第 30 卷,2007 年第 2 期。

12

1. 有关青春期的历史和概念请参阅乔恩·萨维奇(Jon Savage),《青少年:青年文化的产生》(*Teenage: The Creation of Youth Culture*),Viking Adult 出版社,2007 年出版。格兰维尔·斯坦利·霍尔(Granville Stanley Hall),《青春

期:心理及其与生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性、犯罪、宗教和教育的关系》(*Adolescence: Its Psychology and Its Relations to Physiology, Anthropology, Sociology, Sex, Crime, Religion and Education*),D. Appleton and Co. 出版社,1904 年出版。关于"成年青春期"(Adultalescence)一些有意思的看法,请参阅威廉·萨菲尔(William Safire),《成年青春期的特殊用语》(*Lingo of Adultalescence*),《纽约时报周日版》,2007 年 9 月 30 日。

13

1. 国家青年纵向调查(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 of Young Adults),劳动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可从以下网址 www. bls. gov/nls/ 获得。

2. 拉斯·罗斯(Lacey Rose)和李·霍夫曼(Leah Hoffmann),《单身人士的最佳城市》(*The Best Cities for Singles*),《福布斯》,2006 年 7 月 25 日。

3. 参阅乔·科特赖特(Joe Cortright)和卡罗尔·科勒塔(Carol Coletta),《知识经济中年轻躁动的一代》(*The Young and the Restless in the Knowledge Economy*),城市 CEO 组织,2005 年 12 月。

4. 莉娜·爱德朗德(Lena Edlund),《欲望都市》(*Sex and the City*),《斯堪的纳维亚经济学》,第 1 卷,2005 年第 107 期。

5.《单身地图》(*The Singles Map*),《国家地理》,2007 年 2 月。

6. 加里·盖茨(Gary Gates)和贾森·奥斯特(Jason Ost),《同性恋地图》(*Gay and Lesbian Atlas*),《城市研究》, 2004 年 5 月。

7. 尼尔·斯梅尔瑟(Neil Smelser),《社会学手册》(*Handbook of Sociology*),Sage 出版社出版,1988 年 8 月。

8. 这一部分大量的数据都来源于拉特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的"国家婚姻状况"项目。例如《国情报告》(*The State of Our Unions*),罗格斯大学 2007 年公布。此外还有大量其他研究报告,相关数据和信息可以在以下

网址获得：marriage. rutgers. edu/ 。

9. 山姆·罗伯茨(Sam Roberts)，《在美国，已婚人士是少数》(*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Married Are in the Minority*)，《纽约时报》，2006 年 10 月 15 日。

10. 伊桑·沃特斯(Ethan Watters)，《都市部落：朋友是你的新家庭成员吗》(*Urban Tribes: Are Friends the New Family?*)，Bloomsbury 出版社，2004 年出版。

11. 帕特里克·麦克金罕(Patrick McGeehan)，《纽约是吸引毕业生的磁石》(*New York Area Is a Magnet for Graduates*)，《纽约时报》，2006 年 8 月 16 日。

12. 比尔·毕肖普(Bill Bishop)，《大类别》(*The Big Sort*)，Houghton Mifflin 出版社，2008 年出版。

13. 泰勒·科文(Tyler Cowen)，《收入和不平等：还有什么数字没有告诉我们》(*Incomes and Inequality: What the Numbers Don't Tell Us*)，《纽约时报》，经济版，2007 年 1 月 25 日。

14. 罗纳德·敏希(Ronald Mincy)，《黑人男性落后了》(*Black Males Left Behind*)，城市研究出版社，2006 年出版。

15. 埃里克·埃克霍尔姆(Erik Eckholm)，《黑人的苦难在加深》(*Plight Deepens for Black Men, Studies Warn*)，《纽约时报》，2006 年 3 月 20 日。

16. 斯蒂芬·拉斐尔(Steven Raphael)，《黑人男性的社会经济状况：监禁的日益重要性》(*The Socioeconomic Status of Black Males: The Increasing Importance of Incarceration*)，在阿兰·奥尔巴克(Alan Auerbach)、大卫·卡德(David Card)和约翰·奎格利(John Quigley)共同编纂的《贫穷，收入分布和公共政策》(*Poverty,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nd Public Policy*)，拉塞尔·塞奇基金会，2005 年出版。

14

1. 比尔·盖茨,《为高中教育国家教育峰会准备的发言》(*Comments for the National Education Summit on High Schools*),2005年2月26日。

2. 根据该研究,在这些学校中只有不超过60%的新生读到了高年级。南希·萨克尔布罗德(Nancy Zuckerbrod)说:"十分之一的学校产生大量的退学者。"联合出版社,2007年10月29日出版。

3. 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暴躁、低效、过时》(*Flappy, Inefficient, Outdated*),《华尔街日报》,2006年12月14日。

4. 詹姆斯·达利(James Daly),《未来学校:阿尔文·托夫勒告诉我们公共教育的对与错》(*Future School: Alvin Toffler Tells Us What's Wrong-with Public Education*),《教育乌托邦》,2007年2月。

5. 加里·戈登(Gary Gordon)和史蒂夫·克拉伯特里(Steve Crabtree),《建设适合的学校:尽可能使用好美国的教室》(*Building Engaged Schools: Getting the Most Out of America's Classrooms*),盖洛普出版社,2006年出版。

6. 黄素恩(Hwang Suein),《高度焦虑:迁往学校》(*Anxiety High: Moving for Schools*),《华尔街日报》,2007年2月20日。

7. 米歇尔·康林(Michelle Conlin),《遇见我的老师:妈妈和爸爸》(*Mect My Teachers: Mom and Dod*),《商业周刊》,2006年2月20日。也请参阅《2003年的美国家庭教育》(*Homeschool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2003*),国家教育数据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2006年2月。

8. 梅甘·阿瑟森(Megan Othersen)、罗克珊·帕特尔(Roxanne Patel)和桑德拉·戈登(Sandra Gordon),《10个最佳家庭城市》(*10 Best Cities for Fmailies*),《儿童》,可在以下网址找到:www. child. com。

9. Segmentation公司(扬基洛维奇研究公司的一个部门),《吸引年轻的

大学毕业生去城市》(*Attracting Young College-Educated to Cities*)，城市CEO组织，2006年5月11日出版。

10. 山姆·罗伯茨(Sam Roberts)，《曼哈顿的儿童潮：富裕的白人家庭引领潮流》(*In Surge in Manhattan Toddlers, Rich White Families Lead Way*)，《纽约时报》，2007年3月23日。

11. 詹姆斯·霍华德·康斯特勒(James Howard Kunstler)，《无名之地的地理学：美国人造风景的兴起和衰落》(*The Rise and Decline of America's Man-Made Landscape*)，自由出版社，1996年出版。

12. 乔耳·盖儒(Joel Garreau)，《边缘城市：新前沿的生活》(*edge cities: Life on the New Frontier*)，Anchor出版社，1992年出版。

13. 安德烈斯·杜阿尼(Andres Duany)、伊丽莎白·普雷特－斯贝克(Elizabeth Plater-Zyberk)和杰夫·斯佩克(Jeff Speck)，《郊区国家：城镇扩张的兴起和美国梦的衰落》(*Suburban Nation: The Rise of Sprawl and the Decline of the American Dream*)，North Point出版社，2001年出版。

14. 安妮·穆菲·保罗(Annie Murphy Paul)，《现实的婚姻惩罚》(*The Real Marriage Penalty*)，《纽约时报》，2009年11月19日。

15. 克里斯蒂娜·施瓦茨(Christine Schwartz)和罗伯特·梅尔(Robert Mare)，《不同教育背景下的婚姻趋势：1940—2003年》(*Trends in Educational Assortative Marriage from* 1940 *to* 2003)，《人口学》(*Demography*)，第42卷，2005年11月第4期。

16. 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论家庭》(*A Treatise on the Family*)，哈佛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

17. 拉克尔·费尔南德斯(Raquel Fernandez)和理查德·罗格森(Richard Rogerson)，《等级与长期不平等》(*Sorting and Long Run Inequality*)，《经济学季刊》，第116卷，2001年11月第4期。也请参阅侯峰(Feng Hou)和约翰·迈尔斯(John Miles)的《教育在婚姻市场中的作用变化：1970年以来加拿大

和美国不同背景的婚姻》(*The Changing Role of Education in the Marriage Market:Assortative Marriage in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970),加拿大统计局,2007 年 5 月。请参见 www. statcan. ca/english/research/11F0019MIE/11F0019MIE2007299. pdf。

18. 布莱恩·哈尔顿(Blaine Harden),《结婚生子的人在减少:婚姻制度成为受过教育的有钱人的选择》(*Numbers Drop for the Married with Children: Institution Becoming the Choice of the Educated, Affluent*),《华盛顿邮报》,2007 年 3 月 4 日。

19. 帕米拉·斯默克(Pamela Smock),《婚姻的盈与缺:21 世纪的婚姻展望》,《婚姻与家庭》第 66 卷,2004 年第 4 期。也请参阅莎拉·阿维拉(Sarah Avellar)和帕米拉·斯默克的《同居关系的解体和对经济的影响》(*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Dissolution of Cohabiting Unions*),《婚姻与家庭》第 67 卷,2005 年第 2 期。

15

1. 伦纳德·斯坦霍恩(Leonard Steinhorn),《更伟大的一代:为婴儿潮的遗留问题辩护》(*The Greater Generation: In Defense of the Baby Boom Legacy*),St Martin's 出版社,2007 年出版。

2. 威廉·弗雷(William Frey)和罗斯·迪沃尔(Ross Devol),《新世纪的美国人口学:变老的婴儿潮一代和新移民是主角》(*Aging Baby Boomers and New Immigrants as Major Players*),梅肯研究院政策摘要,2000 年 3 月。

3. 彼得·林登斯(Peter Lydens),《忘记高尔夫课程、海滩和山峦》(*Forget Golf Courses, Beaches and Mountains*),《华尔街日报》,2006 年 10 月 2 日。

4. 丹妮拉·迪安(Daniela Deane),《克拉伦登区域的城市活力有助于消除中年痛苦》(*Clarendon Area's Urban Energy Helps Melt Midlife Ordeals Away*),《华盛顿邮报》,2007 年 5 月 21 日。

5. 本·卡瑟曼(Ben Casselman),《当空巢遭遇兽穴》(*Animal House meets Empty Nest*),《华尔街日报》,2007 年 5 月 11 日。

6. J. 沃尔克斯·史密斯(J. Walkers Smith)和安·克莱曼(Ann Clurman),《不老的一代》(*Generation Ageless*),Collins 出版社,2007 年出版。

16

1. 伯特·司珀林(Bert Sperling)的网站:www. bestplaces. net/fybp/quiz. aspx。

2. 美国劳动统计局在其网站 www. bls. gov 上有非常详细和便于查找的有关职业和收入的数据。

3 请浏览一下网址:www. fbi. gov/ucr/ucr. htm,上面有各地关于恶性犯罪的详细数据。

4. 丹尼尔·卡内曼(Daniel Kahneman)、阿兰·克鲁格(Alan Krueger)、大卫·史卡德(David Schkade)、诺伯特·施瓦茨(Norbert Schwarz)和阿瑟·斯通(Arthur Stone),《确认日常生活体验的调查方法:日常重建法》(*Survey Method for Characterizing Daily Life Experience: The Day Reconstruction Method*),《科学》第 306 卷,5702 期,2004 年 12 月 3 日。

5. Segmentation 公司(扬基洛维奇研究公司的一个部门)进行的,《吸引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去城市》(*Attacting Young College-Educated to Cities*),城市 CEO 组织,2006 年 5 月 11 日出版。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你属哪座城？
作者=
页数=250
SS号=12310821
出版日期=
出版社=
DX号=000006759053
URL=http://book.szdnet.org.cn/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6759053&d=CB24648FFFE33CD59A7899B1FE4057B4